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 FRIENDS | 人类学 OF ANTHROPOLOGY | 之友

田野记趣 · 书海撷趣 · 域外之音

复旦大学  
IAES-FDU  
人类学民族学所



NO.1 2018  
总第十一期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 FRIENDS | 人类学 OF ANTHROPOLOGY | 之友

田野记趣 · 书海撷趣 · 域外之音

主编：潘天舒

编辑：张宇芯、柴茜、冯博雅

美编：张路尧、刘斌娟、裴阳蕾



复旦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ical  
& Ethnological Studies

NO.1 2018  
总第十一期

瓦伦纳西的孩子 |

她因为做了母亲  
不再发育  
他因为拿了工钱  
开始计划一个家庭  
他们一个 14 岁  
一个 15 岁  
这里的古老不曾改变  
这里的年轻却不断更替  
5.23



恒河 |

谁能去河坛  
打捞那插满玻璃的河  
要她就闭上眼  
坐进婴儿车  
停止吵吵闹闹  
5.26



广场上乞讨者 |

他们黑色的眼睛  
看见了我  
黑的身体  
牵动黑的足底  
黑的舌头含在嘴里  
还有什么  
隐没在日光里  
柔软湿濡的手  
沿着黑色而来  
却看不清要去向哪里  
5.26



倒地的穷 |

河坛后面密织如纱的小道  
近处看去  
有狗，有猴，  
有堆积的垃圾  
有捡拾垃圾的牛  
有久不移动的人  
再往近处看  
有沉默，有瞪视，有叹气  
有低头回避  
有空洞又有看深一切的冷眼  
还需要往近处去吗？  
5.28



**想起恒河 |**

是一条宽胖的河  
几万万年了吧  
不生不死，真是可怕  
印度人在里面洗澡，撒尿  
还有一些祈祷，忏悔  
信它的人  
世世代代拜它  
认定它是母亲  
不信的人  
认为里面有几万种细菌  
8.28



**中印混血儿 |**

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冲进去  
把手抵在孩子

咖啡色的肚皮上  
他笑了  
虚脱的中国妻子  
伸来黄色的手  
8.26



**圣城 |**

我和古老  
照面  
擦身  
回望  
彼此看见  
却一无所知  
5.26



作者/摄影 陈晓琼(复旦人类学 2017 级 博士研究生)

# 目录

<b>卷首语</b> .....	<b>4</b>
<b>田野记趣</b> .....	<b>5</b>
制造市场：论 CC 银行的精英文化建构和实践（节选）.....	6
再造古镇：地方转型背景下的文化旅游实践（节选）.....	26
传统、地方与消费——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断裂与再造（节选）.....	40
赛博空间的抑郁叙述与自我呈现（节选）.....	59
成为“绿围裙”：上海星巴克员工的身份建构与话语实践（节选）.....	67
美丽乡村：多元话语与乡村再造（节选）.....	92
记忆之城：平遥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地方与晋商想象（节选）.....	109
“原始部落”的打造：一个村寨的权力关系与族群变迁（节选）.....	120
民族志视角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基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田野研究（节选）.....	130
<b>书海撷趣</b> .....	<b>149</b>
医学的符号现实：有关医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150
深读《努尔人》.....	151
对于“多点民族志”的再思考.....	154
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和人文主义.....	158
血缘，地产，和移民社群的变迁——再访文氏家族.....	162
人类学视域下医患关系研究的两种理论路径比较：以围产期研究为例.....	167
我们，蒂蔻比亚人.....	170
朋友、兄弟和报道人：贝拿勒斯田野研究回忆录.....	172
大众社会中的小镇.....	174
田野笔记.....	176
基布兹的家庭和社区.....	186
生人与朋友：人类学家之道.....	189
<b>域外之音</b> .....	<b>191</b>
芬兰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企业在社区服务和管理上的经验.....	192

## 卷首语

人类学界，不管你的领域、特长和旨趣是什么，你的专业发展过程必定会有一个叫做“田野工作”的阶段。田野研究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其重要性就像档案研究之于历史学家，实验室研究之于生物学家。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当年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导师马林诺斯基

（Malinowski）在实践中所创立和完善的参与式观察法，为田野研究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之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标志，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内涵和形式。作为最具学科特征的观察和了解现实世界的手段和路径，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已成为众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来描述和分析繁杂文化过程的主要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参与式观察为特色的田野研究方法的开始受到包括商业领域在内的学术界外专业人士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

所谓参与式观察，就是要求人类学者在具体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深入他（她）所研究的特定社区的日常生活，最大程度地参与被研究对象的社会活动，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缜密严谨的判断，来获得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一系列专门性的地方知识和资讯。必须说明的是，与人类学其他传统分支（尤其是考古和生物）的同行们所惯常使用的“科学”研究手段相比，参与式观察是文化人类学者最为倚重的一种强调人际互动和实地收集数据的技能。

本辑《复旦人类学之友》将围绕田野体验这一主题，通过展示近年硕士论文篇章节选和推介经典民族志案例以及论文，试图探讨以参与式观察为特征的人类学方法作为一种极具开放性、强调“跨界”学科互融的手段和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能为从事实证研究的专业人士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可靠基础，进而确保田野发现的学理和应用价值。

潘天舒 于花园城

2018年1月22日

## 田野记趣

推介：张小星的硕士论文《制造市场：论 CC 银行的精英文化建构和实践》以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某银行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探讨“市场”在中国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具体意涵。文章架构清晰，首先以银行校园管理培训生招聘过程为例，检视银行内部“聪明”、“优秀”等概念的建构和员工的社会化过程；接着呈现银行内部存在的前台、中台和后台制度，探讨银行中精英文化的等级化；最后重点剖析论文研究主体—银行前台员工与金融市场的互动模式和社会流动。通过生动的微型民族志写作，文章直观揭示出“市场”并非抽象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嵌合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动态循环并不断在生产的意义系统。

复旦人类学 2015 级 陈若云

## 制造市场：论 CC 银行的精英文化建构和实践（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2 级 张小星

### 第三章 深入银行：精英文化的等级化

“做不成真正的玩家，就只能当无名小卒。”

——电影《华尔街》台词

当新人们通过校园招聘进入 CC 银行后，是如何在不同的岗位间流动呢？CC 银行信贷部门的员工一般分为三类，分别是前台、中台和后台。前台员工，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中称为“征审岗”，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直接为银行创造利润。一般来说，只有管培生才有资格坐上银行的前台岗位。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对资料进行审核，二是对贷款进行审批。这一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银行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因而也是银行中最受尊重和地位最高的岗位。中台一般是从事某一项简单工作的岗位，例如电话催收和计算流水，由于这一类工作大多是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技术含量最低，因而在银行最不受重视。中台岗通常不是银行的正式员工，而是银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的派遣制员工，招收的主要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并且以本科生为主。后台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岗，主要处理的是财务和人事等行政事务，是为前台员工提供支持的服务性岗位。这一类员工虽然也属于银行的正式员工，但由于技术性不强，往往由“没那么优秀”但性格认真耐心的员工担任。例如笔者因为不是金融学相关专业背景，而性格相对仔细认真，就被分配到了后台的行政岗位。而其他更



加“优秀”的管培生则被分到前台，成为最有价值的员工。

对于银行来说，后台的重要性介于前台和后台之间，是一个不可或缺却又经常被人遗忘的角色。而后台的员工看上去也和前台的员工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银行的一部分，银行“精英文化”的荣耀同样属于他们，能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共事，这令他们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后台作为支持部门并不直接创造利润，使得他们的工作经常被人忽略。另外，由于后台的工作不能以利润的数字来衡量，因此他们的工作成绩经常被低估。正如后台员工高某所说，

“虽然我也是银行的，但我并不像前台员工那样可以直接创造利润。于是我们的工作经常会被人忽视。各种关于业绩的战报上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表现也不能通过利润来衡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为公司节省成本，但这毕竟十分有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价值。”

### 第一节 社会空间的等级化

空间作为承载人们日常生活的形式，即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关系的再现。在空间的分配上，前台、中台和后台的员工因地位的差异产生了空间隔离。在前台、中台和后台三类岗位中，中台的地位最低，他们通常不被认为是银行的员工，并且被排除在各类培训、户外拓展和俱乐部活动之外。前台的地位最高，代表着最优秀和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一位前台员工章某以“搞脑子”和“不动脑子”来解释前台与中台在工作上的差别，

“我们平时所做的工作是很搞脑子的事情，需要对借款人和借款人提供的材料进行综合考察。这样的工作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得来的。那他们中台天天做的都是重复性的，很机械的东西，比如打电话啦，按一下计算机算流水啦，这些都是不用动脑筋的事情，说实话，没啥技术含量，是个人都能做，就是速度的快慢问题。”

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前台位于整个空间的核心位置，后台的位置相对边缘，而中台的位置则是在最偏僻的墙角。在这里，空间承载的权力关系不是“高”与“低”，“上”与“下”的绝对位置，而是表现为“中心”与“边缘”的相对距离。其中前台和后台的位置是相通的，联系较为密切，但中台与前台的位置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消防通道，要走大概十分钟的路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台与前台的交流，使得中台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消防通道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成为连通中台和前台社会空间的唯一中介。然而，要打开这一扇门，就必须刷卡，只有前台员工的工卡才能将门刷开，中台的员工是刷不开的。这意味着前台员工对空间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在所有的空间中畅行无阻，而中台员工仅有被分配的狭小空间。事实上，即使在日常的工作时间，前台的员工也很少与中台员工进行社会交往。两者发生互动的唯一场合就是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年会。

类似的空间隔离还体现在厕所的使用上。厕所的制度和空间安排及其涉及的一系列规范、法则、仪式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所处文化和政治语境的独特性。工厂的四个卫生间

分别位于在东部和西部的走廊上，呈对称分布。对于前台员工来说，东部或西部的卫生间对他们来说距离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因为中台员工的位置集中在西部，因而在西卫生间会经常碰到中台员工。这在前台员工看来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不是我对他们有偏见，而是他们每次到卫生间都说说笑笑，甚至吵吵闹闹，没有公德心。”“我很怕遇到那些中台员工，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的，不知道又在聊什么八卦。”“我特别讨厌上厕所也要吵吵闹闹的人，因为我经常会边上厕所边思考问题，他们把我的思路都打断了。”

上厕所这一日常行为对于前台员工和中台员工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台员工将厕所视为社交延伸的空间，认为如厕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因而中台员工通常是“一起上厕所”。在人少的时候，他们会聊一些只有在亲密朋友之间才会涉及的私密话题，比如恋爱，或者职场中的八卦。类似的谈话只会在相邻的隔间中进行。在与外部空间隔绝的隔间里，两个人彼此看不到对方的神态和表情，却能从讲话的语气中揣测出对方的心理，然后默契地一笑，伴随着冲水的声音，这场私密的谈话就结束了。在人多的时候，他们会相互调侃，当着别人的面开玩笑，以此作为亲密关系的暗示。

对于前台员工来说，上厕所则是一种个体行为。不同于中台员工的积极社交行为，前台员工总是一个人去厕所，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私密性，还是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

“一般来说你和别人一起上厕所，结果只会有两种，要么你等他，要么他等你。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了最大限度利用时间，他们将厕所作为工作的延伸空间，希望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思考工作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而不是嘈杂的公共厕所。”

因而，相对于中台员工集中的西卫生间，他们更偏好相对安静的东卫生间。不仅如此，前台员工总是认为西卫生间与东卫生间相比更加肮脏。虽然西卫生间和东卫生间在打扫频率和整洁程度上实质没有任何差别。

“不知道为什么，我偶尔去西卫生间的时候，总是能闻到一股异味，让我感觉西卫生间没有那么干净。”“我从来都不上西卫生间，因为我担心那里的人冲水冲得不够干净，而且我还听说那里的味道不好闻要么就是打扫的不够干净，或是经常去那里的人不够干净。”

笔者在做田野的过程中，分别到东卫生间和西卫生间进行体验，但并没有发现东卫生间比西卫生间更加干净，也没有发现西卫生间的人冲水不够干净。因而，前台员工关于洁净与肮脏的想象反映的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认知。玛丽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将肮脏界定为失序，“在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不占据清晰位置的因素与力量，以及处于结构位置转变过程中的因素都是‘危险’的异类，因为它们处在一种‘过渡’或‘位置无法确定’的状态。”（道格拉斯，2008）

在 CC 银行，中台员工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位置无法确定的状态。他们不是银行的正式员工，却和其他正式员工同处于一个空间中，他们不是最聪明的存在，不属于银行的精英范畴，

但他们周围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银行中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对中台员工进行定位和控制，是难以分类的结构，于是他们在前台员工眼中成为了“危险”和“肮脏”的象征。前台员工试图避开象征肮脏与危险的西卫生间的行为，正是其实是在有意识地重组结构，是一个创造性的行动。他们不仅通过卫生间的区分将自己与中台员工区别开来，并在上厕所这一行为中明确了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建构了“时间”和“效率”的观念，成为了公司中最擅长利用时间的人——那就是在厕所中继续工作。为此，银行对东卫生间进行了改造，首先在隔间对面的墙上挂上一面钟，目的是让每一位员工都“看着时间上厕所”，确保不会错过某一场重要的会议或某一项重要的工作。其次，在东卫生间的每一个隔间里，在放纸器的旁边都设有一个用来摆放文件、手机和 IPAD 的铁架。因为前台员工经常会带着手机、ipad 甚至文件来上厕所，目的就是解决生理需求的同时继续工作，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另外，在东卫生间通常会弥漫着香薰的味道，可以静心养神，确保员工们能够在短暂的休息后集中精神进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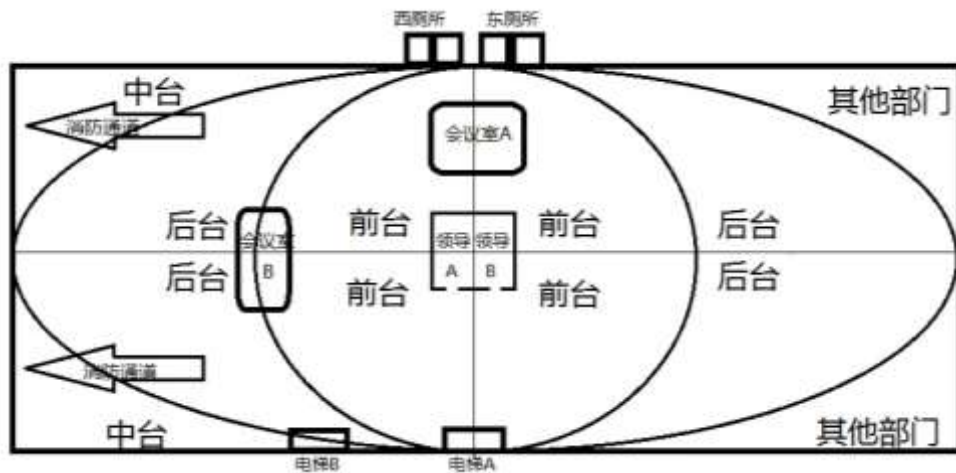
就工作环境来看，前台的工作环境相对最好，所在的位置常年可以见到阳光，空调最为充足，电脑和桌椅等工作设施也是最新的。而中台的员工工作环境最差，不仅常年见不到阳光，工作设施也是最陈旧的，并且没有人为他们服务。因为后台员工只为前台员工负责。

“当你来到中台员工的位置，你会惊讶的发现在偌大的银行中还存在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老式的电脑，破旧的椅子，潮湿的地板和脱落的墙面，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这里和干净明亮的银行是两个没有关系的地方。实际上，的确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来就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银行员工。大家都把我们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引自中台员工费某）

不仅如此，前台员工还拥有专享一部电梯和一间会议室的权力。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一共有两部电梯和两间会议室。其中离前台员工位置最近的一部电梯和一间会议室为前台员工专用，而中台与后台员工没有资格使用。管理人员解释，为电梯和会议室设置使用权是为了提高前台员工的效率，避免浪费他们的时间。

“银行一百多号人要挤两部电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经常一等就是半个小时。时间都浪费在等电梯上了。我们设置一下，让前台的员工先走，这样就能最大限度节约他们的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开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前台员工开会的次数最多，也最为频繁，为了避免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没有会议室可用，我们就专门为他们留出了一间会议室。”

（后台员工，陈某）



图为 CC 银行信贷部门日常空间示意图

##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等级化

与中台员工相比,前台员工和后台员工的空间区隔不足以明显到将二者的身份区分开来,主要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比如日常着装和用餐。

在银行,日常工作中的自我呈现是非常重要的,在银行,形象就是一切,这也是精英文化的自我呈现。与男性主要以服装品牌来区分等级的习惯不同,女性员工之间的着装差异则更加微妙。在银行的着装标准中,穿运动鞋上班是绝对禁止的行为。然而,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多后台的员工采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即穿运动鞋来上班,到达办公室以后再把运动鞋换下来,登上高跟鞋。因为很多女性都是穿职业套装来上班,他们的服装搭配就变成“裤袜搭运动鞋。这样的服装搭配在前台女性看来是很俗气的“土鳖”行为。笔者在访谈一位前台女性员工时,她表示,自己在刚参加工作的头几个月一直是这么做的,因为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比较舒服,但很快她摸清了事情的内幕,裤袜+运动鞋的搭配在银行是“下层地位”的象征。首先,由于 CC 银行位于市中心的陆家嘴核心金融区,如果女性员工居住在上海较好的地段,交通相对比较便利的话,那么她们不会在上班的路途上花费太多时间,也没有必要穿运动鞋来上班。穿运动鞋来上班恰恰暗示了她们的居住地属于上海较差的地段,交通并不便利,在路程上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而才有了换运动鞋的必要。其次,一个女性需要从运动鞋换上高跟鞋,说明她并没有真正适应银行的精英文化,是不专业的表现。“嘴上说习惯是假的,身体的习惯才是真的。连高跟鞋都穿不了,怎么在金融圈里混。”运动鞋代表了与银行相反的平民文化,而不会穿高跟鞋的女性则没有资格进入银行。因此,很多女性在踏入银行的第一课都是学习如何穿高跟鞋。

在银行,高跟鞋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不能太亮也不能太闪,不

能太花也不能太露。以 5 厘米左右的黑棕色皮鞋为宜。另外，从运动鞋换上高跟鞋的行为还往往被看作是衰老的表现。

“你看看工厂里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谁是把鞋带过来换的，大家不都是一双高跟鞋走到底嘛。只有那些中年阿姨，脚实在受不了，才会把鞋换来换去。所以，你要是有一天也开始换鞋了，那就说明你老了，走不动了。这在银行里可不是什么好事，大家都开始把你当大妈看了。”（前台员工，张某）

可见，在银行，一双合适的高跟鞋是时尚，青春和活力的象征，也是职业化的最好表现。

除了高跟鞋，女性的着装在不同群体间也有差异。在第一章提及的女性仪表标准中并没有对女性的着装进行严格的要求。在面试的时候，银行要求无论男女，一律穿正装。然而，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在银行的正式女员工中，几乎没有人穿正装。前台和后台的正式员工穿的则是风格多样的职业套装。“为什么不穿正装，很简单，你看看银行里做什么工作的女性才穿正装。对，是银行的柜员。我们不想穿的跟她们一样，被别人误认为是在支行里从事最低微工作的人。”而对于 CC 银行信贷部门的中台女性来说，银行对她们的要求是必须穿正装，因为他们不是银行的正式员工。虽然在面试的过程中，标准化的正装被视为银行专业化的外在表现，但在正式的职场中，女性统一的正装却被看作是象征低微工作的符号。多元化的着装风格为白领女性营造了个性化的视觉效果，成为张扬个性，宣扬个人主义的最佳代言。可见，银行中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无一不在外显的着装和服饰搭配中得以身体化。

实际上，银行中的自我呈现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日常着装，言行举止，还涉及到对问题的反应速度和解决能力。甚至还影响到吃饭方式等生活细节。在用餐方面，CC 银行专门为员工提供了食堂。虽然食堂的价格较为低廉，但口味相对较差，而且在就餐高峰期十分拥挤，经常需要排很长的队伍。除了食堂以外，CC 银行另外还有一个咖啡厅，同样有午餐供应。不同于食堂的是，咖啡厅提供的午餐以西餐为主，价格相对较为昂贵，比如食堂的消费水平大概是一顿午餐 10 元钱，那么咖啡厅的消费水平至少要高出一倍。

CC 银行信贷部门的中台员工绝大多数都在食堂里用餐，最主要的原因是价格便宜。前台员工则会选择在咖啡厅购买午餐。但是，他们并不经常在咖啡厅用餐，而是将午餐从咖啡厅打包回办公室。前台员工对此的解释是为了节省时间。“如果你经常在咖啡厅吃饭，给人的感觉是你很悠闲。实际上，你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而如果你把饭带回办公桌，那么即使你是在办公桌前开玩笑或者聊天，也会营造一种你正在工作的假象。区别就在于——你面前是办公桌，还是餐桌。”（前台员工，李某）

而后台员工对于午餐有更折衷的方式，那就是“带饭”。后台员工经常带饭，他们认为这是既省钱又节约时间的办法。“我们都不愿意去食堂，那是中台员工才去的地方。到中午的时候食堂挤得不行，我们没空去排队。而且食堂的饭虽然便宜，却很难吃。我们都不会去的。家里的饭就不同了，又干净卫生，又经济实惠。早上早起一会儿，做好了带过来，中午

热一热就可以吃了。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带饭的，比外面买的好。”（前台员工，丁某）

然而对于前台员工来说，“带饭”意味着节省和节俭，“这表示你很在乎钱，在乎钱的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你赚得没有那么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对于另外一些前台员工来说，“带饭”不仅暗示着节俭和拮据，还是一种反社交的自我孤立行为，“你选择带饭，就说明你看重钱的程度高于你与同事一起出去买饭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带饭是很愚蠢的，因为这会让你隔绝到与同事的社交圈子以外，逐渐成为被同事孤立的对象。最愚蠢的是，这都是你自愿放弃的。并且，我们根本没有额外的时间把饭做好再带来。这些都是闲人才做的事情。”可见，午饭吃什么，在哪里吃午饭成为员工建构群体认同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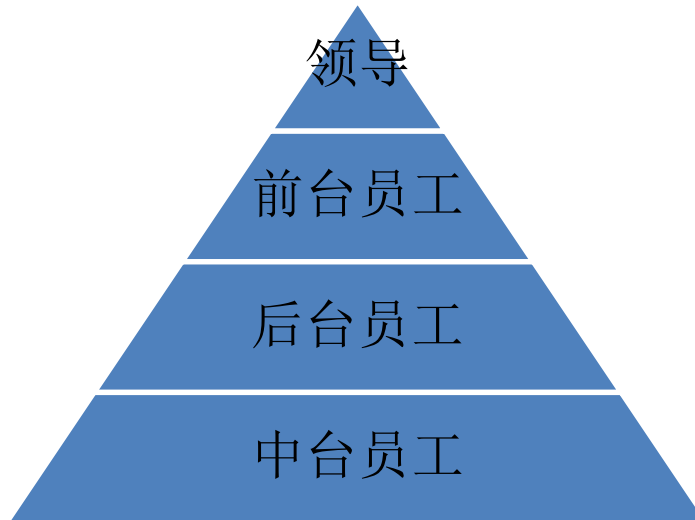
同时，出去到咖啡厅吃饭是员工必须严格控制的活动。经常被看到在咖啡厅吃饭或在咖啡厅吃饭的时间过长都会被看作是不专业的行为，因为这远离了你的工作。因而，“打包”午餐成为前台员工最习以为常的就餐方式。为了节约时间，他们每天通常派一个人去咖啡厅打包所有人的午餐，而这个人一般都是部门的新人。打包的程序是，在中午下班前的十分钟，新人要轮流到每一位前台员工的位置上跟他们确认今天的午餐。确认无误后，新人就拎着部门专用的环保袋去咖啡厅买饭。一般来说，新人要在下班时间的前 5 分钟出发，否则就可能碰上人流高峰。买好以后，新人再拎着装满午餐的环保袋回来。等所有人用餐完毕后，大家开始算钱，把今天的午餐费付给新人。现在付现金已经被视为老土和落后的行为，“现在谁还付现金，显得多俗。而且也不方便，零钱还要找来找去的。我们一般都微信发红包，既避免了找钱的麻烦，也增进了同事间的关系。发个红包，捎个话，关系一下就拉近了。”（前台员工，符某）

显然，“打包”的用餐方式对前台员工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象征着省时高效的工作方式，提醒员工尽快就餐，吃完后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另一方面也是银行同事进行社会交往和深化关系的重要方式。而“打包”和“带饭”的区别就是，前者充分表达了有钱阶级的消费观，那就是充分享受赚钱与花钱的乐趣。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后台员工重经济实惠的消费理念。

可见，在前台、中台和后台三类员工中，前台员工由于能够直接为银行创造利润，而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员工，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中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不仅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控制了电梯、会议室等日常公共设施的使用权，还通过改造厕所等空间实践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结构的重要元素，并按照自己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重新组织和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另外，他们还通过日常着装和用餐方式建构着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和有钱阶级的消费观，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中内化为身体的惯习，成为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一部分。

### 第三节 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结构

虽然中台员工在工厂的三类员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普通的员工。在整个工厂的等级结构中，还有在地位上比他们更高一级的存在，那就是工厂的领导。领导在文中泛指机构中控制最高权力的人，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的最高职位是总经理。尽管 HR 总是声称银行的工作方式是平等而灵活的，其中最优秀的和对公司利润贡献最大的员工最有可能获得成功，但银行工作的日常化却并非 HR 描述的那样美好。在 CC 银行信贷部门已经工作 3 年的前台员工王某对于工厂的等级制度进行了广义的描述。



图为 CC 银行金字塔等级结构

“实际上，银行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地方。这个制度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领导说了算。普通员工通常是没有话语权的。例如说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忙着自己的工作，领导突然走到你面前。这时候，你必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等领导给你派发任务。他可能会说，小王，我想要你帮我写一份材料，不管你怎么写，要在今天下班前完成，我急着要。又或者，他会简单告诉你一个很初步的想法，然后定一个时间，说我想要你根据这个想法拓展出一个方案，明天下班前给我。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抓狂，因为他的想法通常很简单，比如我想做互联网征信，或者我想上一个新的产品。你又不能多问，因为领导总是很忙的，你不能打扰到领导的工作。每次我都很发愁，只能上网查点资料应付过关。有时候他交代给你的任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你去跟他说，领导，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所以，你只能坐在位置上发呆，因为你知道这是在浪费时间。然后，等他向你走来的时候，你又要装出一副在认真准备的样子，拍着胸脯对他说保证完成任务。你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只要你还想在这里干下去，就不能忤逆领导的意思。”

可见，银行的等级制度是很严格的，领导掌握着绝对的权威，普通员工并没有反抗的权力，是一种绝对自上而下的从属关系。在银行，影响工作开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您是否有“权

限”。“权限”是指行为主体对于某个事项进行控制和决策的权力。由于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客户信息，银行特别重视信息资料的保密工作。为了防止信息的泄露，银行为每一位员工都设置了与其工作内容和职务相匹配的权限。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超越权限的信息。例如，CC 银行信贷部门对员工上外网的行为进行严格控制。只有领导才有完全的外网权限。普通员工即使想要在外网上下载一工作需要的控件，也必须得到领导的批准。在银行，要想获得领导的批准需要经过正式的程序，必须要走“签报”。“权限”是由权力顶端由上至下一级一级下沉，而“签报”则是从权力低端由下至上一级一级到达权力的顶端；两项制度最终在权力的顶端会合，从而建构起象征整个 CC 银行信贷部门等级结构的金字塔。这一结构类似于韦伯构建的“科层制”，练达的专业活动、权限的划分和金字塔式的等级服从关系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统治技术体系。虽然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最初产生于现代化的理性，但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低效率、官僚化和压抑人性的反理性倾向，最终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驱逐。在工厂日常结构的运作中，从发起签报到签报最终审批完成的流程至少要持续一个星期。“在银行，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不走签报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走签报，少则两三天，多则半个月，其实是很耽误事情的。”（引自前台员工沈某）

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运作效率，这与银行强调的“高效工作”显然是相悖的。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效率，银行默许员工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先斩后奏”的形式，即先通过后审批来缩短整个流程的时间。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通过电话或邮件向上级申请，并得到他们的批准。事实上，领导在进行上传下达的时候往往会采用电话或邮件等非正式的形式来通知到个人。在突发情况下，领导是可以绕过金字塔的层级直接找到他最需要的那个人，但员工越过自己的直接上级去向更高层级领导汇报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这种越级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守规矩和无视制度的表现。

“一般来说，上级主要通过电话和邮件的方式给员工布置任务。因为他们经常在出差。当然，如果恰好在公司，他会把你叫到办公室里，告诉你他想要什么，你需要做什么，以及你需要在什么时间内完成。当你接手了这项任务以后，要随时与你的上级汇报任务的进展情况，因为他总是想了解最新的信息，以便掌控一切。这就意味着你必须 24 小时保持开机状态，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休假，无论时间是周末或者是下班后，只要领导想要找你，你就必须要让他找到，否则你就死定了。”（引自前台员工张某）

任务的完成并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员工仍需要按照领导的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修改只是在细节上的完善。

“其实我在银行干了那么些年，就没发现有一次通过的任务。就像我帮上级做的汇报工作 CCT，明明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但领导一定要让我改格式，改字体，尽可能做的美观一些。反正无论你的工作完成度如何，即使真的没有问题，领导也总能挑出他不满意的地方让你修改。”（引自前台员工吴某）



事实上,领导正是通过让员工在修改的过程中不断确认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来树立领导型权威,从而进一步巩固领导与员工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

#### 第四节 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的等级化

在前台员工内部,也存在着因入行年限和经验产生的结构性分化。除了个人才能以外,银行十分看重员工的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不仅将工作年限(简称工龄)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还将其作为制定员工薪酬标准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员工的工资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稳步提升的,两者是正相关关系。除了工资,员工福利也是和工作年限挂钩。就年假来说,刚入职的新人没有年假,入职一年后才只有3天的年假,而工作了5年的同事则有7天的年假。除此之外,小到报销的额度、每个月的各种补贴,大到年终奖的金额都因工作年限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

工作年限不仅影响着员工的经济结构,还决定着他在整个银行中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在银行,工作年限超过3年以上的老员工往往被同事被尊称为“老师”。他们虽然未取得等级制度中的正式权力,却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娴熟的业务知识获得同事们的认可,社会地位很高。而刚入职的新人就自然成为银行科层制中的最底层。作为新人的应届毕业生必须接受一个月的业务培训,了解基本的信贷知识,之后要经历4个月的实习,待实习结束通过考核以后才有资格转正。在实习期间,新人对工作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他们的权限是受控制的,每天都要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们学习。一般来说,每一位实习生都有一个固定的带教老师,但这种师生关系是单向度的,即学生必须对老师负责,而老师没有必要对学生负责。在绝大部分时间,实习生主要靠自学,也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培养,意在学会自力更生。他们坐在老师旁边,通过观察和提问学习如何操作。“老师从来不教我们,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要学会自学,因为没有人会对我们负责,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虽然老师没有教授实习生的义务,但学生需要对老师负责,因此老师往往会把相关的行政事务甚至个人的私事交给实习生处理。这在工厂里被称为“干私活”。实习生更类似于在扮演“小秘书”的角色。例如寄快递,报销,贴发票,订午餐,打印文件,修改CCT等闲杂事务都是由实习生一手包办。在实习期间,实习生通常是以恭敬的态度来迎合老师的需求,基本是有求必应,而且认真完成老师交代的每一项任务,生怕因为不小得罪了他们而无法转正,这样的处事方式被他们戏称为“夹着尾巴做人”。实习生小周告诉笔者,“当时进银行的时候,野心很大,谁知道实习的时候老让我们做些跑腿的事情,给他们打杂,虽然心理很不爽吧,但也不敢反抗,还是得屁颠屁颠地去跑腿。毕竟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不容易。”

虽然新人在前台员工中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但他们还是保持了作为前台员工的优越感。在笔者问新人是否愿意去后台轮岗时,他们普遍表示了拒绝。“我们是公司以管培生的名义招进来的,将来要从事的最有价值的职位。对于后台的工作我不感兴趣。”(引自实习生小钟)

在实习的过程中，新人也往往将自己与中台和后台的员工区别开来，认为他们不能与自己所做的工作相提并论。

“我现在虽然没有权限能够亲自操作，还要给老师打杂，可是一旦实习期结束，我通过了考核，就能像老师一样正式开始征审工作了。这可跟他们中台和后台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从事我们的工作。”（引自实习生小陈）在实习生们看来，现在不受

，由想象中的精英主体沦为现实中被统治和压抑的对象。除此之外，工作年限和工作经历也是影响其结构性位置的重要社会资本。

#### 第四章 拥抱市场：精英文化的市场化

“在新人们踏入职场的那一刻，他们会发现，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阔佬式的挥金如土般的奢侈生活，而是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

——电影《华尔街》台词

##### 第一节 适应市场：市场时间和高强度的加班

虽然地理区位和建筑外观是银行声誉和影响力的重要象征，但银行内部却远没有人们想象的光鲜亮丽。相比于人们对于银行高档奢侈办公环境的想象，CC 银行的信贷部门更像是一个大的工厂车间。与现代写字楼普遍流行的“格子间”不同，CC 并没有将个人的空间进行“封闭式隔离”，而是简单地以“行”为重视的地位只是暂时的，等待他们的是充满希望的未来。

银行的等级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自上而下的金子塔结构。无论是等级较低的中台员工和后台员工还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前台员工，无所不在其控制之下。虽然前台员工不断通过着装和用餐等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建构精英化的自我形象，并且在空间分配享有特权，但他们却被更强的等级制度所形塑单位，将行与行之间分割开来。于是，密集的隔间被整齐划一的空间规制而取代。然而，空间的统一规制隐喻着监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共空间之下，没有所谓的私密性可言，每个人都是被整齐划一的空间制约着的个体。领导的办公室位于整个工厂的中轴线上的中心位置，是两个正方形隔间，这两个隔间的特别之处在于，里面可以将外面的情况一览无余，而外面的员工却因隔板的遮挡无法看到里面在做什么。两个隔间相背而建，恰好保护了两间办公室的隐私不被对方看到。这样的空间布局实质上是对福柯“全景性敞视空间”的改造：掌权者为了更好地监视员工而撤掉了阻碍视线的隔板，但员工却无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监视，在何时被监视以及被监视了多久。在 CC 银行，高度监视化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使其更加类似于 Jill Andresky Fraser 笔下的“白领血汗工厂”。（Karen Ho, 2009）

Herzfeld 用“社会时间”和“里程碑时间”分别表达了官方和普罗大众对于“时间”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态度，社会时间浓缩了人们的日常体验，其所塑造的记忆和解析历史模式充

斥着人生百态的烙印，是一种具有各种形状、气味和声音的公共性记忆，而里程碑式的时间意图构建一种静止的、纯洁的、可简约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记忆模式。(Michael Herzfeld, 1991) 在 CC 银行，早上 9 点钟上班，晚上 6 点钟下班的 8 小时工作制是官方规定的工作时间。然而，在前台员工们看来，他们的时间是跟着“市场”走的，可明显地分为忙季和闲季。在每个月的月末，每个季度的季末和每年的年底，都是各个支行业绩冲刺的高峰，这往往是他们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到晚上 8、9 点钟是很正常的。春节前后则是闲季。在银行，忙季的时间要远远长于闲季的时间。与传统意义上将春节看作新年开始的时间观不同，金融市场的“新年”比春节有所推迟，往往是在元宵节前后。因为市场往往是在元宵节左右才开始正式启动，从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只能算是市场在假期后的“预热”。

“我们最清闲的时候，就是春节前后。过了腊月二十八，客户都回家过年了，整个市场一片惨淡。到了每个月月底和每个季度季末，比如 3 月底，6 月底，9 月底和 12 月底就很忙了，你可以看到“市场”的数据，蹭蹭的往上升，很猛的。每年的年底都是最忙的时候，因为到年终考核了嘛，客户经理都很拼的，你看看哪个银行在年底的市场不是一片火爆。大家都想把年报的数据拉得好看些，好多拿点年终奖。”(引自前台员工小潘)

相对于官方规定的 8 小时工作制，员工们往往更加认同市场的时间，并将自己的时间观看作与金融市场节奏和脉搏同步的内部“生物钟”。金融市场的“生物钟”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双重的体验。旺季时，他们感到时间稍纵即逝，难以把握，总是陷入到追求时间的狂热中，而在淡季时，他们又往往感到度日如年，不知道应该如何消磨时间。

“忙起来的时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这个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想要尽可能的利用好每一秒钟，可以多做一笔件；在闲下来的时候又觉得空虚，不知道做什么，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看着屏幕发呆。这个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发时间。”(引自前台员工小乔)

除了淡季和旺季的区别，前台员工在日常工作时间中的工作量波动并不明显。一般来说，前台员工一天的工作量是由每天早上市场的进件量所决定的。每天早上 9 点半左右，这一天的进件量就会在墙上的大显示屏中显示出来，并自动生成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每个前台员工在今天要完成的任务量。实际上，系统每天自动生成的业务量只是一个基准值，做到这个量只能算是及格，只有做到基准值的 1.5 倍，才能拿到满分。对于每一位前台员工来说，这样的规则充满了挑战性，拿到满分是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往往是在 9 点半之前就把水打好，上好厕所，以便全力以赴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每天的基准业务量大概是 18 笔，满分的业务量是 27 笔，按照每一笔花费 25 分钟的时间来算，做满 27 笔大概需要 11 个小时的时间。因而，前台的员工们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直趴在电脑前工作。即使这样，他们还是需要每天加班才能确保任务量拿到满分。

笔者对于前台员工一定要做到满分的行为表示好奇，对此，他们普遍表示，这是对他们

个人能力的最好证明。

“我们是作为全国最优秀的人被招进银行，如何来证明自己的优秀呢？我认为努力把工做到最好，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另一位前台员工吴某认为，这种基准值和满分值并行的做法既照顾到能力较差的同事，因为一般人都可以做到基准值，又激励了能力出众的员工努力做到最好，是很适应银行环境的规则。“我想每一位前台员工都会为他们能够拿到满分而骄傲和自豪。因为这充分证明了他们是银行中最优秀的人。”（引自前台员工小孙）

在完成业务量以后的第二天早上，系统会自动对每个员工完成的业务量进行统计和排名，并且将这个数据以邮件的形式群发给每一个人。谁做的最多，谁做的最少，谁是第一，谁最后垫底，都在 EXCEL 表格中展现的十分清楚，一目了然，关于业务量的统计排名是完全公开的，目的就是为全体员工施加竞争压力，督促他们完成工作任务。对于前台员工来说，任务量是没有上限的，如果一个人有足够多的时间，他可以无限制的做下去。因此，在业务量的统计排名中，业务量满分并不等于排名靠前，因为总有人做的比满分值还要多。

在前台员工中经常流行着“一哥”、“一姐”、“五十三姐”的绰号，这里的“一哥”和“一姐”是指在业务量排名中经常位居第一的同事。“五十三姐”指的是一位符姓同事，她曾在一天内做了 53 笔件，她至今仍保持着“五十三姐”的记录，尚未有人超越。对此，前台员工普遍感受到了竞争的残酷性，

“银行的文化是很残酷的，这种每天排名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优胜劣汰。如果你很擅长这项工作，那么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直都是中游水平甚至更差，那么你很快会被筛选出来，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如果你还没有进步，对不起，请你离开，总会有人能取代你的位置而且做得比你更好。”“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谁会不努力呢，说实在的，我每天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事实上，除了每日排名以外，系统还会根据每个人的业务量进行整个月的排名，而每个月的最后几名必须要参加“回炉培训”，如果培训之后业绩仍然没有提升，很有可能会被银行开除。在银行，“回炉培训”实际是一个污名化了的概念，只有排名垫底的员工才会参加，也就意味着需要参加“回炉培训”的人都没有别人优秀，甚至等于说“你很差劲”。因而大家都想尽办法多做件，以避免被纳入到“回炉培训”中的尴尬。

事实是，大部分前台员工在排名中的差距都很小，分数咬得很紧，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尽可能占得先机，前台员工们往往选择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加班，比如周末。“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每个人能力差距都不大，关键就在于时间。谁的时间多，谁会利用时间，谁就能在竞争中排在前面。”在竞争排名的刺激下，CC 银行的加班文化就这样形成了。

前台员工小吴对加班是这样描述的：“刚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加班是不正常的，后来我发觉不加班是不正常的。刚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周末不用上班，后来发现周末确实不用上班，但大家都是自觉过来加班。你看同事们都在加班，如果你不加班的话就会被甩在后面。大家都

是名牌学校的高材生，能力能差多少呢，其实比的就是谁更拼。”

为了适应市场的节奏，CC 银行特别制定了早晚班制度，早班是早上 9 点钟上班，下午 6 点钟下班；晚班是早上 11 点钟上班，晚上 8 点钟下班。但是在员工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两个班次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上早班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早上 9 点钟上班，晚上从 6 点钟加班到 8 点钟才下班，上晚班的人则把上班时间提早了 2 个小时，同样也变为早上 9 点钟上班，晚上 8 点钟下班。这在前台员工看来是适应市场时间的调试性策略，“我们的时间其实就是要适应市场的时间，跟 8 小时工作制没啥关系。要适应市场嘛，就要早来晚走多加班。”（引自前台员工小赵）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 HR 在招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招收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从中挑选出年轻而有野心的单身青年，因为他们往往会工作到强度极限。“如果你是单身，在上海没有房子，家庭又不在上海，那么你有可能会成为最优秀的前台员工。”CC 银行的 HR 沙某将符合上述条件的员工戏称为“三无”：无家，无房，无对象。“只有这样的员工才能不被其他的事情分心，心无旁骛，没有顾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目前，在 CC 银行招收的应届生中，有大约 80% 的员工符合“三无”的标准。他们都是外地学生，在上海念书，毕业后便留在上海工作。由于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他们只能在公司附近与别人合租。为了改变自己当前困窘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确比别人有更强烈的工作动力。

除了工作量上的竞争，银行对于员工的工作质量也有要求。银行定期会组建一个质量抽检小组，由满足一定工作年限的资深员工组成，来抽查每个前台员工的作业质量。时间一般是一个月一次。如果发现差错，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一个差错扣掉 3 笔业务量，也就相当于只要做错了 1 笔，3 笔件都算白做了。

“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我想，如果在其他行业，你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大家会说，没关系，改正过来就好了。但银行是默认你不会犯错，因为你是最优秀的。你的文化层次要远远高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如果你不小心算错了一个数字，搞错了一个小数点，他们会说，哦，这里错了，那里也会错，那么整个结论就都错了。所以，你必须做到完全的准确，但这是很难的，每一位员工的压力都很大。但银行要求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引自前台员工小郑）

相比于压力，前台员工更倾向于将这高强度的工作挑战看作是企业家精神在工作上的贯彻，并且将类似的加班文化解读为充满“进取心”的行为。前台员工小卓对此深有体会，他刚刚从一家信托公司跳槽到 CC 银行，

“这当然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你周围全都是优秀的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之前的同事们不优秀，但银行的伙伴们确是很不一样的。在信托公司，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对自己的工作前景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中有一些有进取心，有一些确实没有。但是在银行，每个人都足够的进取心，你周围都是优秀的人，每个人都是那么有竞争力。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

环境。”

员工小施则将高强度的工作视为有效率的表现，并以此来区分银行和其他贯彻 8 小时工作制的职业，她将实行朝九晚五工作时的职业称为“外面的行业”，将保持着 8 小时工作时间的的工作人员看作不同于他们的“普通人”。

“如果你走到外面的世界和普通人一起工作，你会明显感到外面的人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早上 9 点开始工作，下午 5 点或 6 点就下班了，虽然这一天他们也许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们可能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做，很没有成就感。但我们就不同。每天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拿到满分，每个人都会为此努力，最后大部分人都达到了，这就是有效率的工作。你看着表格上的数字，告诉自己说你今天又完成了目标，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笔者访谈的很多员工中，他们总是抱有某种“道德优越感”，认为其他行业的工作都很没有效率，因为那些员工们的动作太慢。因而，前台员工对自己高强度的工作和过度加班的文化翻译是，这不仅是他们工作能力的最好证明，也是工作效率的外在表现，是准确、高效和充满进取精神的象征。

但是，在银行，并非所有的员工都享受着高强度的加班文化。中台员工和前台员工有着不同于前台员工的时间安排，他们遵守的是 8 小时的工作制，早上 9 点钟上班，晚上 6 点钟下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后台员工小陈以此来描述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相对重复而简单的，没有加班的必要，不像前台工作似得有挑战性。我们期望的就是稳定，能按时上下班就很不错。”而后台员工对于“稳定工作”的看法也往往被前台员工看作是没有“进取心”的表现，“稳定就等于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退步，我们渴望的是每天都要向前进。要不断超越以前的自己。”

高强度的工作对于前台员工来说正是“优秀”、“速度”、“效率”、“努力工作”、“进取”的自我表征，而奉行“朝九晚五”工作制的员工在带有霸权意味的加班文化之下被异化为每天墨守成规，老是看着钟等着下班的“懒人”，成为“静止”、“停滞”和应该被“修剪”的“呆木头”。于是，高强度的加班成为前台员工将那些看着钟点准时下班的自己与中台员工、后台员工以及其他行业的员工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通过每天日常加班的实践，他们将高强度的过度工作内化为证明自己“优秀”的文化基因，并作为理解市场和效率的意识形态，支持着他们建构与市场节奏同步的时间观。

## 第二节 感觉市场：有限的理性和市场感

在 CC 银行，前台员工不仅是信贷部门的核心，也是与金融市场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银行的信贷政策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核，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从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的发生概率。在一般银行的信贷部门中，信贷员需要对每一笔贷款涉及的企业展开详细的实地调查，以全面和深入了解贷款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但是在

CC 银行集中审批的作业模式下，所有的贷款资料都是以数字化的形式上传到电脑中供审批师集中审阅，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就通过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将自己的贷款需求反映到审批师处。这种远距离的交易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市场化逻辑。它在促使信贷关系超越地方性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增加了不确定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审批师无法与客户直接接触，从而将经济实体从其嵌入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分离开来，造成了市场的“脱嵌”。在处理“形实分离”的市场信息时，前台员工并没有完全遵循经济学推崇的理性手段，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基于有限理性的调适性策略。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通常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经济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并将其视为人类的普遍本性。而人类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试图通过文化的棱镜透视市场是如何镶嵌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并与其发生互动的。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理性是一种基于具体情境形成的文化图式。即使是在高度理性化的金融市场，仍存在快速的流动性和模糊的不确定性，并成为高风险的主要来源。具有上述特点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有限的理性”并嵌入到风险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得以体现。通过田野研究，笔者发现，CC 银行审批师的决策并非是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而更多地是依赖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不断被仪式化的习惯。这种习惯主要表现为一种基于经验的本能判断。

CC 银行的前台员工在审批过程中主要分为 3 步。第一步是市场信息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类。在 CC 银行，审批师每天早上都要开晨会，晨会的主要内容是由专业的经济分析师介绍最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数据。在晨会中，每一位审批师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搜索尽可能多的数据信息和多样化的市场解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绝大多数审批师都有一个惯例化的分类模式以找到他们偏爱的信息来源。“现在互联网金融啊，大数据啊都特别火，信息多的咧，看是看不完的。所以每次开晨会的时候，我都只盯着里面最有用的信息。”（引自审批师曹某）当笔者问他们如何界定信息是“最有用的”，审批师张某对此的解释是，

“无所谓怎么界定，看个人习惯啦。每个人平时的习惯和喜好都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国泰君安的数据很准，喜欢用国君的，有些人觉得国金证券的数据更有代表性，喜欢国金的，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和专业水平关系不大。”

等信息搜集并整理完毕后，审批师通过设定的网络程序来了解相关金融行业如何对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解读。对此，他们有一个共识：数据解读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多大程度上其他人会相信你的解释。最后一步是确定贷款主体的价值。根据已有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并结合银行大的信贷政策，审批师将市场的抽象认识与贷款主体具体的资料进行比较，并对其经营状况进行预测，进而决定哪些贷款主体是有价值的，从而赋予他们贷款资格。其中对市场信息的理解和解释影响并决定着他们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关键预测和判断。然而在更

多情况下，一方面受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另一方面受到市场交易瞬时性的限制，审批师进行决策所依据的数据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这使得审批师根据数据预测市场的行为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上述的分析性策略经常因为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不足而被审批师抛弃。实际上，决定审批师最终判断的“杀手锏”不是所谓的“分析性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关于市场如何反应的本能性直觉。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前台员工告诉笔者，决定他们判断的不是什么逻辑性的推算，而是一种直觉。

“很多情况下，直觉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可能你做的多了就会有啦，你没有做过肯定就不会有嘛。这不仅仅是通过后天学习或者培训出来的。你必须自己做，而且每天做，这样直觉才有可能形成。”（引自审批师吉某）

审批师经常会说他们干掉了一笔贷款，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两个字——直觉。他们有自己的诀窍，但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和描述。基于本能的直觉性判断往往包含着运用隐性知识以得出结论的无意识过程。因而，比起科学技术，前台员工更认同于将审批作为一门艺术。

“如果你相信自己知道应该如何审批，那你永远是做不好审批的。对于审批来说没有绝对的确定性。审批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你很难通过学习掌握它，同样的我们也从不教它。我们只能接触它，然后自己去领会。”（引自审批师朱某）

在笔者问到这样一种直觉到底是什么，基本上每一位审批师的答案都相当一致：这是一种市场感。“比如说最近的经济数据反映金价下跌的很厉害，那么我心里大概就有数了。那么最近一期黄金市场价格波动又很明显，这基本反映了近期黄金行业风险就比较大，这就是我说的市场感，讲不清楚啦，但还是蛮准。”而起源于银行的优秀文化和同步于市场的时间结构是赋予“市场感”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你可能不太懂，这种市场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有专业知识扎实并且足够优秀的前台员工才可能会在经验和习惯的累积中慢慢获得这样一种感觉。”而这里提到的习惯和经验不是指历时性的时间累积，而是同步于市场节奏的时间安排。对此，审批师戚某做了很好的诠释，“跟着市场走才能感觉到市场的波动，感知市场的趋势。那些按时上下班的人，连市场都不懂，怎么可能知道啥叫市场感。这对他们来说太高深了。”

在经济与社会和文化脱嵌的情境中，由于市场信息是不完全对称的，每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对于市场的全部信息。金融市场的高速流动性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审批师难以根据数据模型的预测结果得出他认为准确的判断，而往往依靠基于经验和习惯的市场感来做出决定。与经济学强调的“绝对理性”不同，CC 银行前台员工的经济行为是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判断来完成的，实际是一种伴随着地方性知识的有限理性。类似于人类学宗教研究的“船货崇拜”，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同样存在着非理性的神秘因素，因而在某



某种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市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宗教崇拜，实质是关于理性和资本的崇拜。（Arjun ACCadurai, 2014）通过日常经验积累和惯习的养成，CC 银行的前台员工进一步将理性崇拜神秘化，并将其表述为基于经验、习惯和直觉的市场感。

对于市场的感觉来源于前台员工所信奉的优秀文化背景和无限趋近于市场节奏的时间结构，而这种难以言说的市场感无形中强化了前台审批师对于市场本身的话语权，并赋予他们作为金融市场代言人的合法性。通过预测市场走势和分析市场数据，前台员工认为自己把握了市场的“脉搏”，从而拥有了分析和解读市场的权力，以此来建构专属于自我的“市场感”。

### 第三节 制造市场：短期的利益和市场波动

实际上，前台审批师不仅是金融市场的代言人和具体化身，也是制造市场的主要能动者。在 CC 银行，前台员工通过市场具身化建构的精英文化反过来也在塑造着整个金融市场。首先，他们的时间观是建立在市场时间之上的，追求的是“跟上市场的节奏”。为此，前台的员工们不但对高强度的加班习以为常，还要即时和快速地对市场做出反应。在 CC 银行，时效作为测量员工与市场互动的快速程度，是考核员工最重要的指标。前台员工的时效不是用小时或分钟计算的，而是以秒来计算的。时效越短说明反应速度越快，绩效就越高，以此来激励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

由于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明天与今天相比可能是沧海桑田，前台员工可以抓住当下的市场波动，却难以预测长期的市场走势，因而审批师日常的工作实践往往是针对最近市场的短期行为，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看今天，不管明天”。

“我们每一天的业务量都只是针对这一天的。如果你在这一天完不成，那你这一天的工资就废了，拿不到多少钱。不管你是明天补还是后天补或者之后加班把量补回来，那也没用了。因为银行要求的是今天的业务量一定要在今天完成。你今天没完成就是没完成，到明天就一切清零，从零开始。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引自前台员工王某）

这导致前台审批师在贷款审批的时候往往只看重贷款主体当前是否有风险，而忽视了长期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审批师毛某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市场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别说每一天，就是每一秒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只能发现当前的风险点，对于以后的事情谁都不能保证。你看看前两天 P2P 还搞得好好的，今天就曝出有多少坏账。所以我们只对当前做出判断，从不断言未来。”“只看当下，不管未来”成为主导他们日常工作实践的主流价值观。

该价值观的内隐意义是短期利益因为其可见性而比长期利益更加重要。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短期效益，CC 银行会定期举办审批工作竞赛，一般是以季度为单位，每个季度一次，大概在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底。竞赛考核的主要内容是作业量、作业时效和作业质量，其中作业量的分值比重高达 50%，时效和质量则各占 25%。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

地完成工作量，审批师甚至对当前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有选择性的忽视，“问题看起来比较明显的肯定过不了，比较隐晦的就算了。如果你仔细看，时间都浪费掉了，那当然做不过别人了。”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审批师更看重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产出，而不是长期的风险权衡。他们倾向于相信足够多的产出可以抵消市场风险。审批师孙某借鉴金融业的专业术语“大数法则”来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在金融行业，有一个著名的法则叫做大数法则，意思是当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样本自身的风险系数其实是减小了。所以我们对量的追求也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法。”（引自前台员工李某）于是，在“大数法则”的话语之下，控制风险成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附属品。

在 CC 银行，前台员工不仅要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取舍，还要在利润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审批师吴某在不经意间谈到了有关“审批师”的隐喻，“有人说，审批师像个警察，这理解就错了。没有利润的存在，审批师便毫无价值。所以，其实审批师更像一个保镖，保护的是利润。”类似的隐喻实际在传达这样的概念，审批师控制风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在审批师实际审批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放过处于灰色地带的贷款主体，甚至以更高的利率将贷款贷给资质较差的企业，以赚取更大的利润。“有时候某个企业的资质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就是你否掉也可以，放过也可以，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要放过。因为这样银行可以多赚些钱嘛。”但是，上述的“越轨”行为是有制度约束的，底线是不能给银行造成损失。在审批师对利润和风险进行权衡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基于直觉判断的“市场感”。“有时候这个尺度你很难把握，到底是以更高的利润抵消可能的风险还是以较低的损失弥补更大的损失，你靠逻辑推是推不出答案的，这时候只能靠感觉。”在现实中，利润和风险的动态平衡引发了市场的波动。当利润大于风险时，市场的趋势是上行，最终达到高点，当利润小于风险时，市场的趋势是下行，并最终跌至低谷。

另外，前台审批师之所以敢于将追求利润置于控制风险之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信国家会对市场进行“救市”。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奉行的自由市场话语相反，前台员工认为政府有维持市场秩序的义务。当风险不可控时，他们往往依赖政府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而他們要做的就是专注于即时的利润。然而，在利润大于风险的时期，他们又往往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宣称调节市场的最佳手段是看不见的手。“一般情况下，市场自己是可以运行的很好的，但也不排除遇到经济危机什么的，市场一下子缓不过来，就要靠政府的力量去救市，帮助经济走出低谷。”

可见，金融市场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文的研究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制造和建构起来的。为了即时快速地对市场做出反映，他们只关心当下，不在意明天，认为短期利益比长期利益更加重要。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只关注企业当期的风险而忽视了长远的风险隐患，反而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利润和风险的动态平衡中，他们往往以追逐利润取代控制风险，甚至将贷款贷给风险很高的企业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而埋下了“次贷

危机”的隐患。因此，CC 银行前台员工虽然以控制风险为名义，却以追求短期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实，原本的目的是通过控制风险减少企业的不确定性，最终却让市场的运行偏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增加了风险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引发了市场频繁的波动。短期内市场在利润的刺激下往往会扶摇直上，但从长期来看，当风险不断累积，最终爆发“次贷危机”时，市场最终会跌至低谷。此时银行再依靠政府介入进行“救市”，通过各种政策迫使市场回归暂时平稳的状态，于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又开始了。

CC 银行前台员工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在被市场塑造着。他们都过度工作，并通过高强度的加班来传达他们对“效率”的信仰，以及立即能对市场做出反映的影响力，藉此来把自己与那些呆滞和懒惰的其他员工区分开来。通过对市场的快速回应，CC 银行的前台员工对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市场趋势进行预测，依据是基于经验和习惯积累的本能性直觉，被他们称之为“市场感”。“市场感”成为前台员工的身份象征，他们也往往将自己定义为市场的代言人。前台员工通过以上的文化实践掌握了市场的脉搏，并最大程度地适应和还原了市场的节奏，因而获得了“控制”市场的权力，成为市场的具体化身。在控制风险的市场实践中，他们只管当下，不看未来，只追求短期利益，无视长期利益，并将利润最大化置于控制风险的职责之上，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波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因而前台员工的行为在被市场塑造的同时，也在塑造和建构着市场。

推介：如今的江南水乡，游人如织，各式特产琳琅满目，仿古的建筑和表演似乎令人做了一场穿越百年的梦。但是，在这繁华表面的背后可能是古镇的艰难转型，是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人们不同的情感和记忆。本文的研究主体是旅游开发背景下木渎古镇区的地方再造实践，作者利用自己“本地人”的独特优势，通过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究了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官方力量、外来旅游从业者及本地居民三者古镇再造实践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文章揭示了在木渎古镇再造实践中，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官方力量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塑造并定义了古镇的文化符号。古镇景区中的外来旅游从业者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一方面利用官方建构的文化符号谋利，一方面也对既有的文化符号有所修改和补充。在官方和外来经营者再造实践的推动下，本地居民失去了在古镇再造实践中的话语权。功能单一的旅游空间无法满足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居民生活脱嵌，他们选择渐渐地从中撤出。这种看似主动的避让旅游空间策略，实际上是对政府主导下的景区商业化和制度化的消极抵制。木渎古镇区的地方再造成为不需要本地居民参与，只为旅游业而存在的实践。

从文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旅游市场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古镇开发背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与文化传统之间、开发再造与记忆和认同之间纷繁复杂的碰撞与交融。笔者认为，文中论述的本地居民对“空间”的认同和重构颇具启发性，“空间”并非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概念，也与内心认同和社会交往紧密相关。不过，虽然文章探究了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官方力量、外来旅游从业者及本地居民三者古镇再造实践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但更多是从本地居民的角度出发，比如在论述“古镇空间重组”时，分析几乎均来自本地人的讲述，而外地旅游从业者本身也是这个空间重组的重要主体，他们对此的想法和策略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同时，对于在古镇再造中各主体之间互动考察得不够充分，如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只论述了其商业项目的开发和策划，而几乎没有涉及它们与其它主体间的互动，笔者认为居民与官方力量的互动也应该是可以进一步探究之处。

复旦社会学 2015 级 张天格（本科）

## 再造古镇：地方转型背景下的文化旅游实践（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2 邹俊飞

## 第四章 古镇空间和街区记忆的重构

### 一、古镇空间重组

#### 1、居民空间-旅游空间

现在，古镇区居民基本分布在南街、下沙街和书弄的支巷、支弄，其中本地居民主要集中在南街和西街的交汇处，外来人员主要居住在下沙街和西街后半段。这些区域围绕山塘街分布，山塘街是联系古镇区中众多街巷的主要交通性道路。换言之，山塘街是古镇区的中心街道。然而在田野中，笔者发现本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去山塘街，不会去山塘街上散步购物，更不会去景区的园林里玩赏。“那条街（山塘街）我们一般不会走的，人太多，而且都是游客、外地人”，本地居民将古镇区划分为两个不同功能的场所——旅游空间和居民空间。旅游空间，即山塘街，是专属游客的场所，这个场所内的一切，包括销售的商品、举办的活动，都是为游客准备的。在居民看来，山塘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他们在外出通行时也很少选择经过山塘街。为了避免经过山塘街，他们甚至会选择绕路，宁愿选择更隐蔽更远的小路绕行。另外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大量涌入迫使本地居民发挥对本地环境的掌控度，不断寻找隐藏在古镇区中的胡同、小街巷和游客并不熟知的饭店，在这一过程中，本地居民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新的空间，即生活空间。对于这两个空间，本地居民希望能够保持较为清晰的界线。一方面，他们不会主动踏足为游客准备的旅游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游客可以在旅游空间内尽情享受旅游公司和沿街商贩为游客精心准备的“真实的舞台”里，但不要再侵入属于他们本地人的生活空间。同样的，在出行路线的选择上，本地居民也作出了旅游线路和非旅游线路的区分，居民把通往各旅游景区的交通要道以及旅游团惯常经过的路线都“让”给了游客，他们则在自己开辟出来的胡同、小街、小巷中穿梭，去上班、购物、聚会，然后再原路回家。总之，本地居民利用他们对古镇区背后空间的掌控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旅游空间分隔开来（汪永青等，2008），并且通过避开旅游空间的方式拉远山塘街与日常生活的心理距离。

东道主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空间冲突现象现今在各旅游景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多数东道主社区的居民都采取了与古镇区本地居民相同的策略，即选择避开游客。这一策略看似是东道主社区对旅游业的主动排斥，然而究其根本，旅游空间的商业化和制度化导致其与居民生活的脱嵌。以笔者在古镇区的调查来看，本地居民觉得“（山塘）街是景区，都是外地人在卖特产，卖给游客的，又没有我们本地老百姓能用得上的东西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会食用的景区内出售的糕点，也不会使用景区内出售的工艺品，景区内出售的服装也

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本地居民对景区商品的普遍评价是价格贵但是质量太差，“我在山塘街上买过一个头梳，还号称是牛角梳，结果我女儿洗头的时候梳了几下就断了几根齿，质量不过关，只能买回来看看，上过一次当就不会再上当了”。居民之所以会有上当的感觉是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商品的实用性价值，但是景区内的大部分商品恰恰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这些商品之所以卖得贵并不是因为具有更高的实用性功能，而是它具有文化价值和观赏价值。这种价值错位使得景区商品脱离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旅游空间中的旅游设施和商品从其所处的文化情境和社区居民固有的生活流程中分离出来。

另外，本地居民并不是完全排斥景区的园林景点，但是景区的一些制度性条例限制了他们对景区设施的利用。在田野中，笔者不止一次听到社区内的老年人抱怨景点的开放时间。本地居民希望能利用这些景点进行晨练和晚练，或是成为休闲的场所。但是景点制定的开放时间限制了希望来此锻炼的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尤其是社区内的老年人，通常的锻炼时间是早上八点前和傍晚五点后，但是古镇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是早上九点至傍晚五点，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因此，本地居民只能选择去较远的灵岩山和木渎公园进行锻炼，因为这两个地点没有时间的限制。另外，景区的门票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来此休闲的本地居民的数量。目前景区内的景点收费较高，且对本镇居民没有任何优惠措施。更让居民气愤的是，古镇区内景点不包括在苏州园林年卡<sup>1</sup>的适用范围内，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园林卡免费游览苏州其他区县的景点，但是却无法免费参观自家门口的景点。本地居民若想参观古松园、严家花园或其它景点还是需要原价购买门票。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日常生活的独立性，本地居民将古镇区划分为居民空间和旅游空间。在政府、旅游公司和旅游市场的主导下，旅游空间的商业化和制度化运作方式迫使本地居民采取避让策略。本地居民看似主动的避让策略，事实上是无奈之举。

## 2、本地人空间-外地人空间

“本地人”指的是生于本地长于本地的居民群体，“外地人”指的是非本地出生、在本地居住时限较短的居民群体。在木渎的语境中，“外地人”的称谓使用时要格外小心，因为这是一个稍带歧视意味的词汇。在本文中，从可操作化的角度来定义，我将以地方方言为指标，

---

<sup>1</sup> 苏州园林年卡是苏州市政府针对苏州市区（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吴江区）市民发售的惠民休闲年卡。根据规定，此卡的适用范围有虎丘山风景名胜区、拙政园、环秀山庄、留园、狮子林、网师园、沧浪亭、艺圃、耦园、怡园、五峰园、东园(动物园)、天云寺、石湖景区（上方山森林公园、石佛寺、楞伽塔园）、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枫桥风景名胜区（以上均不包括夜花园）。持卡市民一年内可累计游览以上景点100次。

将能否用地方方言日常交流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准。

在田野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住在南街上的本地居民觉得去下沙街的距离比去中市街要远。但是从实际距离来看，南街和下沙街之间仅仅隔着一条横向山塘街，步行距离不超过 100 米；但是南街和中市街之间却远隔着半条纵向的西街，步行距离超过 500 米。从南街去下沙街只需要五分钟，但是去中市街至少需要十分钟。即便笔者指出了这一点，不少居民仍旧觉得下沙街更远。当笔者继续追问时，有居民表示，之所以觉得中市街很近是因为中市街是每日必去的地方，而下沙街主要是“外地人住的地方”，平时很少去到那里，很少有交集。与其说下沙街离得远，不如说是下沙街离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很远。除了鲜少涉足山塘街，本地居民也很少去外来人员群居的地方，如下沙街。除了下沙街，本地人聚居的南街和外地人聚居的西街后半段相距不远，但是本地居民极少踏足外地居民的“领地”，一则是因为本地居民生活的区域内有比较完备的生活设施，如老虎灶、理发店、菜市场、五金店等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二则是本地居民觉得外来人员居住的区域“不安全”，环境“脏乱差”，外地人“穷，没文化”。

当笔者问及如此评价的缘由时，本地居民会给出许多负面事例来佐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些负面事例大多不发生在本社区，也与本社区内的外地居民毫无关联。这些事例的来源有他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犯罪案例，也有他们从别处听来的小道消息，还有对社区内的外地居民某些举动的主观臆想。一些本地居民不仅笃信这些事例的真实性，还乐于在本地人组成的社交圈内传播这些事例。这种将个别事例中外地人的形象普化为所有外地人的潜在特性的做法，不但遮蔽了其内部重要的差异性，也将他们从活生生的人变为一类缺乏道德感的、异常化的同质性群体。这种去人性化和客体化的话语是对外来人的污名化，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张鹂，2014）。

对于那些少数还住在外地居民“领域”内的本地居民而言，他们与外地人的互动较多，基本上是日常礼节性问候，或是问外地租户收取房租。他们对外来居民的认识更立体，不少居民评价他们的“外地”邻居“人都还不错，挺规矩的”，对外来居民的抱怨主要集中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摩擦中，比如某家外地人养的狗随地小便，或是某家外地人随处丢弃的食品加工废料污染了社区环境。本地居民会将这些细节归结为外来居民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不会上升到对外地人人格品德的质疑。

在应对这些摩擦时，如果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本地居民一般会采取忍让的策略，更进一步的策略是向房东抱怨，希望房东出面提醒干涉。如果摩擦较严重，本地居民感到对自身利益造成比较大的损害时，他们会采取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偶尔也会有争吵。不过总体来说，本地居民倾向于用较为平和的方式解决摩擦。他们和周围“外地”邻居的交

往策略是不冲突不深交，用本地话说是“大家客气”，即他们会尽量避免和外来人员发生冲突，“我们不会去得罪他们，大家各归各，跟他们（外地人）客客气气的……平时也不会有什么往来，最多看到住在家附近的打个招呼，或者在打开水的地方碰到了就随便聊聊天”，但是在打完水后，他们一般不会等“外来”邻居打完水后一起走回家。通常情况下本地居民会留在开水房附近和其他本地居民聊天，或者是直接回家。通常情况下，本地居民不会与邻近的外来人员深交，其交往深度仅限于见面点头寒暄。他们主要的社交对象仍然是本地居民；出入最频繁的活动范围是西街前半段区域，因为这里是本地居民较为聚集的地段。

### 3. 构建“熟人空间”

从上文可以看到，古镇区里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的群体关系较为缓和，平时会有礼节性和经济性互动，且不会发生激烈的矛盾。但这并不代表外地居民和本地居民已经达到较高的社会融合水平。随着古镇区旅游开发和外来人口涌入，旅游空间和外地人空间膨胀，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逐渐被侵占。在古镇区中，存在着一些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熟人空间。这些空间具有排外性，空间中行为的发生均以熟人间的信任和规矩为前提，对话的展开以会说本地方言为基础。

在这些熟人空间中最典型的就位于西街上小林理发店。从地理位置来看，西街一带曾是木渎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街，直到现在，西街上依然保留着裁缝店、五金杂货店、家具店、寿衣店、香烛店等各式商铺。这些店铺虽小，但是辐射面广、辐射力强，例如镇上的居民如果碰上丧事，还是会到西街的寿衣店置办。其他店也是如此，木渎镇别的地方商业再发展交通再便利，但是只要镇上的居民有这方面的需求，还是得回到西街的这些小店铺里采买。<sup>2</sup>

小林理发店就是处在西街上的一家很特殊的理发店。小林并不是西街一带唯一的理发店——单是在西街短短百来米的街道上，还开着好几家理发店，除了一家是非常传统老式的小上海理发店外，其余几家都是外地人经营的新式发廊。经笔者观察发现，小林理发店在客源、秩序、服务内容和交流内容这四个方面的特殊性使它得以成为专属本地人的熟人空间。

**①客源本地化。**从客源上来看，街上几家新式发廊的顾客基本是附近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而小林理发店的顾客主要是中年人居多，如果是小姑娘去理发，大多都会有女性长辈陪同。周围人都说小林家不用特地打广告，他家的顾客基本上都是老顾客口口相传介绍来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几乎都是本地人。这里的“本地人”不只是木渎人，还包括木渎周边城镇的顾客，不过他们共同点在于，都会说本地方言。我曾遇到过一位老阿姨在店里烫头

<sup>2</sup> 笔者认识到这一点是源于一次同学的婚礼，根据木渎地区的习俗，新人家庭需要准备一些仪式用品，例如子孙桶、竹匾、烛台等，同学的爸妈告诉笔者，类似这一类物品，全木渎镇只有西街能买到。



发，她告诉我她是听人介绍特地从金庭镇（木渎镇以西的农业城镇）赶过来的，别人告诉她小林家烫头发烫得特别好，她儿子周末就要结婚了，所以特地跑来木渎“做头发”。在店内，“官方语言”是木渎本地方言，极少数的普通话交流一般发生在顾客和学徒之间。学徒是这一空间内为数不多的外地人，事实上学徒待满一段时间后，也渐渐能够听懂本地方言，虽然无法直接用方言和顾客与师傅沟通，但是已经可以和说方言的顾客顺利交流了。

**②空间布局趋生活化。**在空间布局方面，小林理发店前店后家的布局趋于家庭化和生活化。小林理发店的店内布局一目了然，他家对街开着一扇双面推移式木门，除了夏冬开空调和雨雪天气时会关门外，其余时间都开着门。进入店内，左手边是理发专区，一面半身长镜，镜子前是理发桌，桌上放着各类理发用具，桌下挂着电吹风，桌子前面是三张理发座椅。右手边是焗染烫专区，通常顾客在涂上染发焗发的用剂后，就会移座到这里，带上头套开始焗发。这里还放着很多张凳子，这是用来给顾客等候排队时坐的。大门正对面是洗发池——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与一般理发店不同的是，小林店内的厨房与水池仅一墙之隔，平时在店内除了可以闻到洗发水和各种美发护发用剂的气味外，如果餐点去理发，还能闻到厨房传出的饭菜香。

**③基于信任和规则的秩序。**在小林理发店，有一些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规矩，而这些规矩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基于熟人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感。如果挑周末或是工作日晚上去小林家理发，基本上是要等位的。根据观察发现，师傅并不会严格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安排顾客理发，他会根据各人理发所需时长和技术难度来决定理发的先后顺序，以及由谁来理。一般来说，他会安排那些耗时短的顾客先理。如果顾客有急事，跟师傅打个招呼，师傅也会安排先理。令人惊讶的是，面对这样的安排，其他顾客并不会有多抱怨。我问师傅这是为什么，他告诉我，来他店里的一般都是熟人了，大家都懂他这套规矩的，也可以互相谅解。而且顾客刚进店门他就会告诉顾客一个大致的等候时间，顾客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就会留下来等，觉得太久就会选择换别的时间来。另外他会注意控制顾客的等候时间，很少会出现让一个顾客等太久的情况，因此他的店里很少会出现顾客因为等候时间而争吵的事。我的观察也佐证了这一点。师傅不会为了招揽顾客而（在等待时间明明很久的情况下）故意告诉客人不会等很久。有很多次店内生意实在忙不过来时，师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客人，现在特别忙，要等很久，最好换个时间来。这种秩序源于师傅对客户的责任和客户对师傅的信任，源于师傅和顾客共同遵守这一空间内的既定规则。正是这种信任和规则构成了小林理发店作为熟人空间的特性。

在人员的分配方面，如果顾客没有特殊要求，男顾客会安排给学徒，老板娘负责焗焗染以及给老人理发，师傅自己则是“男女老少通吃”。由于小林家的顾客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因此大部分情况下，顾客一走进理发店，师傅就知道要把顾客安排给谁了。

**④服务商品化程度低。**小林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性价比高。笔者在顾客口中不止一次听到过类似“格算”“便宜又好看”这样的评价。他家的收费标准基本上比其他理发店便宜 50%，而且很少涨价。在我记忆中，他家仅在 2008 年和 2011 年提过价，洗剪吹从原本的 5 元涨至 8 元到现在的 10 元，焗染烫的基本价格也维持在 60-80 元之间。正是这样实惠的价格吸引了许多中老年女性到小林家理发。

除了收费低于同行业标准，小林理发店也不会有推销产品和“过度服务”行为。在愈发强调精致服务的美发行业，许多理发店将理发涉及到的每一道工序都尽量细化并提供专门的服务，比如大部分新式发廊都采用仰躺洗头，而且会有专门的洗头小弟负责给客人洗头，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询问客人是否需要使用护发素，是否需要头部按摩等，这些拆分的“增值服务”为理发店提供了更多的盈利空间。而小林理发店没有这些行为。小林家的洗头工序通常都是由学徒完成的，在学徒能独立帮客人理发之前，学徒的唯一任务就是洗头。小林家的洗发池还是一个水池，在学徒调好合适的水温后，客人坐到水池前的凳子上弓着背向前把头凑到水龙头下。学徒从水池旁边摆放着大瓶中挤出洗发露涂在客人头发上，稍作按摩后冲洗干净，给顾客裹上干发巾，洗头这道工序就很快完成了。

小林家的理发工具是比较传统的。在小林家的理发工具中，剪刀、剃刀和推子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曾经问过新式发廊的理发师，为什么他们帮客人剪头发只用剪刀，不用剃刀和推子，这些理发师带着一丝骄傲地告诉我，只有那些传统的理发店才用剃刀和推子理发，而像他们这些专业的“造型师”主要依靠剪刀理发。剪刀剪出来的头发线条更柔和，而且不会让顾客觉得“被扯着头皮”（用剃刀理发时的确会有“扯着头皮”的感觉）。在小林理发时我和师傅交流过理发工具的事，师傅说用剪刀剪头发的确容易更有线条感，但是只用剪刀理发会很慢，远不如推子和剃头刀有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师傅在解释剪刀理发的特点时还强调，现在那些理发师愿意用剪刀“磨洋工”，因为他们在理发的过程中需要向顾客推销各种美发护发服务和产品，这些项目是直接和他们的业绩挂钩的，所以“把你困在椅子上越久他们捞得多的可能性越大”。在小林理发店中，师傅不会有业绩压力，如果顾客事先声明不想用剃刀理发，师傅会尊重顾客的决定。

**⑤以空间内所有人员为交流对象，交流内容围绕本地人展开。**在店内很少会有一对一的交流，通常情况下都是理发师和顾客（等候的和正在理发的）参与到同一个话题的讨论中。

小孩的教育情况，子女的恋爱婚嫁问题以及婆媳矛盾是店内的高频话题。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小林家对面的五金店老板拿着洗发水和毛巾来店里洗头，五金店老板说今天晚上女儿要带男朋友回家吃饭，他这个当爹的要保持形象，所以来借水龙头洗头。在

五金店老板自己洗头的过程中，小林师傅边给客人理发边和五金店老板交谈，先是开玩笑地说“草脚老丈人见草脚女婿”，之后就好奇地打听五金店老板女儿和她男朋友交往的一些细节。儿女的恋爱婚嫁话题总是非常吸引人，在座的顾客（大部分并不认识五金店老板）也纷纷加入他们的讨论中，有一个正在烫头发的中年妇女开始讲述自家孩子的恋爱经历，向各位顾客一一细数自己女儿“轧过的朋友”，大家就她的发言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是分享自己的经历。五金店老板洗好头后和小林师傅打了声招呼就走了，店里的讨论还在继续。店里间或有一些街坊来串门，小林师傅和老板娘就会把五金店老板家的事告诉他们，街坊听了消息后会先去对门向五金店老板道喜，然后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五金店老板家今晚“草脚女婿上门”的消息就传遍了整条街。

⑥对外地人的污名化过程。除了婚嫁话题，离奇的社会事件也会引起大家关注。这些离奇的、带有都市传奇色彩的故事内容通常都与外地人有关。正如前文所述，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驻到本地社区、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无形中增加了社区的安全隐患。本地居民对外地人的负面评价就发生在这一空间内。人们在小林理发店内传播新闻报道的、道听途说的离奇案例，例如“我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陆慕（位于相城区）那边有个来打工的外地人组织同乡的打工女卖淫，还勒索嫖客，特别恶劣，最后被人举报抓进去了”。在这些案例中，外地人被塑造造成残酷冷血的不法分子形象，犯下了情节恶劣、不可饶恕的罪行，最后被绳之以法。其他客人分享的经历中那些略有离奇或是教育意义的经历则会在之后的“店聊”中成为“典型性事例”扩散出去。我就发现在前一次理发过程中听说的别人讲的自家女儿遇到的“外地人卖淫事件”在我第二次理发时又被老板娘提及。

类似于这样的交谈场景在小林理发店中天天都在发生。附近的街坊邻居将小林理发店当做茶余饭后联络感情和传播消息的据点。所有交流和对话都是用本地方言进行的，这种设定阻止了外来人口加入到他们的对话中。本地居民乐于在这里对社会事件进行价值评判，理发店就像是一个“安全阀”，人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表达对旅游开发和外来人口的谴责和失望这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生活空间逐渐被侵入的焦虑和不满情绪，从而避免了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和游客之间的直接对抗。他们通过犯罪事件将外地人标签化和异常化，把外地人建构成内部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自身本地人群体的优越感和认同感。

## 二、街区记忆重构

街区记忆是城市记忆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街区作为城市中重要的集体记忆场所，所拥有的记忆是街区主体和街区客体在时间中的交互作用过程。街区记忆使城市中存在的纯粹物理空间变成具有环境意义的场所，同时兼顾空间、时间和人的认知，并重在传达外在表

现形式中蕴含的内在意义。街区记忆主体，从宏观上讲指的是对街区拥有某些感知记忆的群体；从微观上讲则可定义为在街区中活动的个体，因为对于街区记忆内容的表述也只能通过个人才可能得以表述（李霞，2013）。在本文中，古镇区街区记忆的主体是在古镇区生活较长时间的本地居民。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有幸遇到了一位比较特殊的报道人郭阿姨。郭阿姨60年代出生在木渎，从小生活在南街。在80年代，郭阿姨离开木渎去外地参加工作，并定居在外地。她每隔两三年会回木渎与老朋友重聚。2014年夏天，郭阿姨应邀回木渎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借此契机，笔者提出陪同郭阿姨进行一次怀旧寻根之旅。这次古镇区怀旧之行使笔者开始意识到，官方话语下的旅游开发实践对街区记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后期，古镇区是木渎镇的中心，人口最稠密，工商业最发达。而伴随着时代进步和旅游发展，古镇区的传统功能也相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古镇区作为社会经济中心的功能消失，曾经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传统工商业渐渐被旅游商业取代，在外来文化进入、产业类型调整、经济利益驱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古镇区的空间格局、文化传统、街区风貌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等也承受巨大冲击，众多问题和矛盾逐步凸显，导致街区记忆缺失。在下文中，笔者将从街道空间，建筑特色和邻里关系三个维度分析古镇区的街区记忆。

### 1. 街道空间

根据古镇改造工程规划，木渎古镇将分别对山塘街、南街、西街、中市街和下沙街进行规划布局、业态引进等各方面的改造升级，力图重现历《姑苏繁华图》中的“五街格局”。在规划书中有如下表述：

除了山塘街，整体风貌保存相对完整的南街将重点引进茶饮、沙龙、文艺工作室等人文综合业态；西街将充分利用区域内的重要历史建筑、院落以及河街环境氛围，引进集高端会议、餐饮、住宿为一体的企业会所业态，形成具有木渎文化特色的产业街道；而中市街将打造成为四季食俗、庙会民俗街区；下沙街则利用下河塘两侧的原生态历史环境氛围，打造成为深度旅游和人文探访的场所。

在郭阿姨和许多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记忆中，古镇区的“五条格局”并没有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在发展旅游前，山塘街是木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聚集地；西街和中市街是木渎的商业中心，西街主要提供杂货类商品和生活服务，中市街负责居民的餐饮娱乐需求；南街和下沙街是居民最主要的聚居区。现在，除了山塘街已经被系统开发为旅游线路，西街和中市街仍然是商业较为聚集的区域。中市街上除了有木渎的老字号饭店外，也有最早开在木渎镇的大型超市农工商。相比之下，下沙街和南街虽然仍然有大量人口聚居，但人口结构和在全镇中的人口占比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在五街中，作为古镇区最早旅游规划线路，山塘街的街道格局和功能变化最为明显。

郭阿姨对古松园最深的记忆是她小时候放学后最喜欢在这里玩捉迷藏,因为她母亲是木渎防爆机厂的职员,当时防爆机厂的职工子女托管所就设在古松园原址。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工厂的车间和仓库都建在山塘街的园林旧址上,许多镇民的父母曾是这些工厂的职员。在访谈中,不少镇民都对山塘街的旅游开发表示不满,一方面是自己童年记忆的承载场所消失了,另一方面是不满于园林的收费过于昂贵且对本地居民没有优惠。

为了完成上文所述的五街格局的规划,南街 99 号——郭阿姨以前的住址——已经在 2013 年年末被推倒,而新的建筑尚未开始建造,现呈废墟状态。在规划中,在南街 99 号的旧址上将建造茶楼。在郭阿姨上次回木渎时(2012 年),南街还维持原貌。短短两年,南街后半段已经面目全非。看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变成一片废墟,郭阿姨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她欣喜于故乡之发展,另一方面她不无忧虑。过快的开发速度、过多的旅游设施改建挤压了古镇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她担心过度商业化会破坏古镇的原有样貌。

## 2. 建筑特色

从景区内已完成修缮工作的民间住宅来看,主要的修缮方法是改变推倒重建,主要的手法是为建筑增加江南水乡风格,即屋顶采用青色或黑色的屋顶瓦片,墙面通过全顺式(图 4.1)用青砖横向垒砌,外墙墙体或是不刷漆或是刷白漆,也就是在外观上要符合人们对江南水乡建筑的普遍认知“粉墙黛瓦”。

在走访中,郭阿姨指着一面已经斑驳漏出砖块的老宅墙体,让我猜这堵墙是新修的墙体还是老宅子的旧墙。原来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砖块垒砌的方式,这面旧墙的砌砖方式被称为两平一侧式(图 4.2),即先砌两层平砖,再在平砖两侧各立一块侧砖,利用这种方式砌出来的墙内部有一部分是空心的。而 2000 年以后新修的房子多采用全顺式,就是最常见的每层砖块均以顺砖组砌,上下层左右搭接为半砖的砌墙方式。郭阿姨解释说,在她小时候,木渎镇地区的房子都会选择这种砌墙方式。这种墙体没有常见的顺砌法砌出的墙那么坚固,不适宜作承重墙,但是作建筑外墙十分合适。它不仅可以省下多达 25% 的建材,而且可以保温防潮。在长三角地区令人困扰的梅雨季节里,空心的墙体可以减少外部的湿气进入屋内,有效降低屋内的湿度,在夏冬季节对调节室内气温也有帮助。郭阿姨的说法在其他本地居民中得到了证实,这种特殊的砌墙法是本地居民节省建房成本、应对特殊的气候环境而创造的生存性智慧。

现在老宅修缮的方式并没有延续这种做法,郭阿姨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在未来的古镇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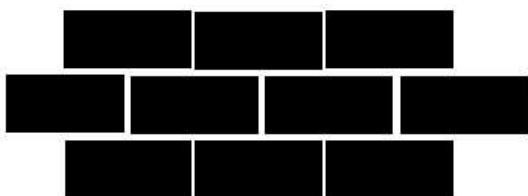


图 4.1 全顺式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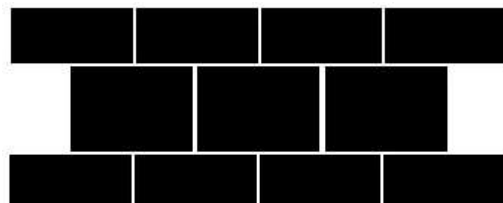


图 4.2 两平一侧式平面示意图

经过规划修缮重建后的传统住宅多了一份标准化的江南建筑风格,少了一份代代相传的民间智慧和建筑特色。

### 3. 邻里关系

当一个街区的居民群体以自然的、有机的方式进行延续和更替时,街区记忆信息的传递也是自然和有机的。而当一个历史街区的居民,即街区记忆主体在较短时期内发生较大的群体性变化时,街区内的邻里关系也会相继发生变化。

近 10 年来,古镇区的人口在规模和结构上都与之前相较有很大不同,一个显著变化是人口规模扩张严重,另一个是外来人口增长迅猛。郭阿姨就明显感受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她每次重回古镇区时,都会看望生活在这里的朋友。她表示,她居住在古镇区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其中绝大多数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就搬离了古镇区。在这次走访中,郭阿姨在古镇区上只拜访了两位长辈(父母的朋友,家里的老邻居),年龄都在 70 岁以上。当她穿梭在古镇区街巷和筒子楼时,她发现居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普通话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而说地方方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些迁出古镇区的亲戚朋友大多把古镇区的房子出租给外来人口。另外,古镇区的本地居民群体越来越集中在西街周围,为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老虎灶、理发店和农贸店也大多集中于此。随着旅游发展与人口置换的持续进行,古镇区居民社会身份复杂性不断增加,尤其表现在地域、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由此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个体化与社会关系的破碎,社会认同与凝聚力的下降,地方感的丧失。郭阿姨称,等她下次再回木渎时,可能已经不需要再安排古镇区的行程了,她估计两三年后,那些生活在古镇区上的熟人应该也要搬走了。

在古镇区,传统的邻里关系逐渐被商业邻里关系所取代,本地居民之间的交往比以前减少,很少把外地人列为交往的对象,以商业街道为单位的新的“邻里关系”正在形成(姜辽, 2014)。

## 结论

### 一、再造古镇: 旅游市场主宰的“地方文化”

古镇再造的官方实践过程是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共同推动下完成的。

“看得见的手”是指镇政府和旅游公司,木渎镇的古镇再造过程,看似是针对全社区的古镇再造实践,事实上是镇政府和旅游公司的共谋之举。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往往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政府是景区内所有事务的全权代表,对于当地是否搞旅游开发,怎样去进行开发往往由开发企业或土地权利的控制者政府所决定,而社区居民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失声状态,没有发言权。

在景点再造中,景区的开发规划由政府全权主导,居民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并无主动诉求。在园林旧址的重建过程中,本地居民面临的是投射在旧址上的社会记忆的消亡;在房屋拆迁和民居修缮的过程中,本地居民处于被动配合的状态。

在商业开发中,旅游公司对五街格局的布局和规划已经涉及到了居民的聚居街道的开发。从规划书中拟定的业态分布来看,这一开发规划的完成是以将社区居民迁出街道为前提的。在民宿和夜游项目的开发计划中,旅游公司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进行招商引资,而社区居民却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

在旅游节开展中,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旅游公司的员工、外来务工人员 and 游客。旅游节为了吸引游客而重构了皇帝下江南的历史记忆和文人园林的精英文化,忽视了来自民间的历史、传统和生活记忆。由于本地居民在旅游空间中的缺席,也造成了本地居民在古镇再造的话语缺失。

如果说政府和旅游公司这只“看得见的手”主导了古镇再造的实践过程,那“看不见的手”直接影响了旅游开发的走向。“看不见的手”是指为古镇旅游带去客源和经济效益的旅游市场,旅游市场的需求决定了古镇再造和旅游的前进方向。不论是旅游品牌的打造或是旅游商品的经营,都受大众旅游的市场需求主导。

政府和旅游公司的实践从古镇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出皇家文化和精英文化作为古镇旅游的文化符号,而旅游商品经营者则将原本不属于本地的商品引入本地市场并将其塑造为本地特产,二者看似主动的实践行为均受“看不见的手”即旅游市场和游客经济的影响。换言之,很大程度上来讲,旅游市场决定了地方政府和旅游从业者所呈现给游客的“地方文化”。

在“两只手”的作用下,景区的功能性逐渐从以本地居民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空间转变为服从于政府开发意图和旅游经济利益的功能性旅游空间。这一功能单一的旅游空间无法满足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居民生活脱嵌。本地居民渐渐地从这一空间中撤出,居民采取的看似主动的避让旅游空间策略,实际上是对政府主导下的景区商业化和制度化的消极抵制。

## 二、谁之古镇：夹缝中的古镇区

木渎镇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带入古镇区,旅游开发将外来人口带入古镇区的旅游空间。本地居民在古镇区社区再造的参与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

从社会空间来看,本地居民在社区中的活动空间逐渐收缩。一方面,本地居民采取避让策略,将旅游空间避让给以外地人为主的旅游从业者和游客,退回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空间也受到外地居民的冲击。本地居民在应对这一群体时采取的不冲突不深交的中庸策略,虽然没有激化本地人群体和外地人群体的矛盾,但是对这两个群体的社会融合也没有起到显著作用。

从社会记忆来看,政府主导的古镇再造实践使承载记忆的工作空间和地方性的建筑特色在古镇区中渐渐绝迹,而外来人口的涌入也打破了社区内的原有的社会关系。作为承载社会

记忆的重要载体，工作空间、民间建筑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本地居民的社会记忆逐渐被磨灭。

从社区传统来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为了迎合旅游市场的需求，景区的旅游商品中出现了并不属于木渎的特产。在这一特产的发明过程中，并没有本地居民的参与，也没有获得本地居民的认可。这些经由外来经营者引入的特产，在木渎的旅游商品市场上获得了游客的认可，从而使得本地的老字号经营者不得不与之同步。

事实上，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本地居民对社区再造过程中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丧失并不激愤，而是感到麻木。他们更为认同的与其说是古镇区，不如说是由本地人组成的社会空间。由于受地域观念和行业观念的影响，本地居民对古镇区的认同感比较有限，这也是导致他们在社区再造过程中参与程度低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古镇区在木渎镇的地位略显尴尬。在本地人心中，只有三种人会生活在古镇区，老人、穷人和外地人。虽然古镇区的本地居民，有一种高于外地人的优越感，但是由于收到地域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古镇区这个社区本身的认同感并不高。“等我女儿/儿子结了婚肯定就要搬出去的”，这是绝大多数古镇区本地居民对未来生活的展望。

其次，本地居民在社区再造过程中参与程度很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旅游业在木渎镇经济格局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本地居民对旅游业这一行业的认可度不高。在本地居民的心目中，旅游业不是“正经职业”，只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和金融行业等传统行业才是有前途的、稳定的“正经职业”，而从事旅游服务业是相对比较低端、没有前途的工作。

在官方和外地人的“合谋”下，本地居民在古镇区社区再造的参与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本地居民主动选择缺席于古镇旅游实践中。以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为主要发展道路的木渎，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多元的发展渠道。受地域观念和行业观念的影响，本地居民不会主动选择留在古镇区从事旅游业，而是转投古镇区外的其他行业。木渎的古镇再造成为没有本地居民参与，只为旅游业而存在的实践。



推介：谢馥春作为一个曾风靡上海滩（上海的戏曲名伶没有谢馥春的鸭蛋粉甚至不肯化妆）并蜚声海内外（一举捧得巴拿马世博会银奖）的老字号，在公私合营的洪流中受到巨大冲击，又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一度衰亡，最后在政府注资收归国有后死而复生。本文将谢馥春老字号谢而复春的发展史放置在学术框架之中，讨论复兴背后的文化逻辑和隐喻，探求谢馥春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体如何嵌入地方实践对当地人产生意义，并通过此案例研究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和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观。此处所选的两章是论文阐述的主体部分，通过走访谢家传人、老厂工、外地游客和本地人，作者用翔实的田野材料反映了人类学一以贯之的自下而上看问题的观点。在第三章中，作者以时间为轴线一步步向我们展示出传统是如何在政府和企业手中被“复兴”，而在老厂工眼中却与之前的谢馥春没有了一点关系，传承人是年轻人顶职的，资历深的老职工反而因身体等各方面原因“怕麻烦不要”，仅通过千秋粉黛馆和传习所这样的再造之物进行展演，Hobsbawm的 *invented tradition* 之意在其中不证自明；由此作者进一步追问谢馥春申请的文化遗产到底是谁的遗产，代表了谁的文化？这与 Herzfeld 的批判遗产研究所问“谁的遗产，谁来决定什么是遗产”遥相呼应，谢馥春在这场申遗盛事中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号，由政府和企业通过实施品牌复兴的诸策略和文化事项填充其叙事，成为他们心目中缔造一个想象共同体的手段和当地旅游的卖点。而谢馥春与当地居民的文化亲昵则在第四章“两个”谢馥春——国庆路上那家向周边居民售卖经济实惠包装朴实的老产品的店面中体现。与东关街上红红火火的谢馥春旅游商店不同，位于扬州市老城区国庆路上的老店保留着传统的销售模式——零拷（据说在英国的某些店打自然环保之牌也采取此种营销模式），就是论斤两称回家去，依旧吸引着一批忠实的消费者，作为老谢馥春的一种延续，满足老客户的需求，顺应也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此外，作者通过老厂工口述史还原了当年的谢馥春厂的生产场景，也赤裸裸地揭开了谢馥春这个百年古妆所营造出的神秘感，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纯天然手工制作化妆品不过是现代营销手段给消费者制造的一种想象。而通过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对谢馥春不同层面的消费，作者认为不同的群体通过选择不同的物品，来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私以为这篇论文资料翔实、框架结构清晰、思路明了、语言优美，然而有些地方行文过于散文化，不过人类学写作方式多样，有时确实需要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也不必过去苛责。此外，是否引入 Herzfeld 的批判遗产研究也许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复旦人类学 2015 级 李兴华

## 传统、地方与消费——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断裂与再造（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2 级 李钰涵

### 第三章 复春之路

2013 年的夏天，在扬州生长了二十多年的我第一次踏进馥园——这所建于清朝的谢家老宅子，现在集园林、厂房、博物馆等功能为一身。之所以是第一次进去，是因为以前的馥园并没有出现在扬州人的视野之中，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安静的，甚至有着些许破败的小园林，与扬州赫赫有名的个园、何园无法匹及。而伴随着这几年的“双东历史街区”改造工程，馥园被修缮后作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对外开放了。刚走进去的一瞬间，一股脂粉香扑鼻而来，与人工香料不同，而是一种淡淡的植物的味道，似乎有桂花茉莉花等等，园子由花卉、植被、叠石、水系和建筑组成。新建的徽派建筑的灰墙上挂着一串串的红色灯笼，门口的这一道的房子主要是生产车间，包括原料房、容器清洁消毒间、更衣消毒间、包装间、成品库等等。那时正值清晨，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工在小道上说笑着，接着走进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沿着再往深处走，一边是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园林，一边则是写着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我跨过一道小门，走进了办公区域，原来里面别有洞天，是一个两层带着连廊的小楼房，主要的办公室都在二楼。站在二楼的廊道上，眼前的场景让我有些许惊讶：一些不整齐的，灰暗的砖瓦房，这与人们认为的古色古香可不是一回事，可以想象到里面居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没错，这就是背对“双东历史街区”那繁华且颇具古韵的内里——不为游人所看见的那一面。



### 一、“双东历史街区”改造工程

谢馥春的复兴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品牌自身的发展,而是被纳入到整个城市的旅游规划中。具体来说,谢馥春的重建与馥园所处的“双东”的改造工程密不可分。双东全称是“扬州双东历史街区”,古老的扬州城有一条横穿东西交通要道的一条大街——东关街,和东关街平行的叫东圈门,两条老街并称扬州双东古街。其中,东关街全长 1122 米,宽约 5 米,位于古城扬州的东北角,因为街道由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或者说直抵东关古渡,故名东关街。原街道路面为长条板石铺设,这条街以前不仅是历史上古城扬州水陆交通要冲,而且是扬州商业、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sup>3</sup> 最近几年双东成了来扬州旅游的必到之处,重要性不亚于瘦西湖。来扬州旅游的朋友总会问我,听说你们双东有很多好吃的,很多老扬州的东西吧?每当听到这个我也总是尴尬的笑笑,双东这个街区作为一个文化名片出现在本地人的话语中,也仅仅是近几年的事。曾经的双东区域不折不扣是一个市中心的“贫民窟”,这里的居民都是低收入人群,一家几口挤在人均不到 10 平米的平房里,房屋里没有卫生间,家家备着痰盂尿壶,或者去街道上的公共厕所“方便”。改造后的双东焕然一新,一些危房拆除了,“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庭院老井更加整齐别致了,修旧如旧地建起沿街商铺,将李长乐故居、逸圃、华氏园等名园组成改建的长乐客栈,整合了各老字号企业,引入工艺美术商店、古玩商店、淮扬美食小吃等,号称力图还原明清时期的双东繁华古貌,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从小居住在东圈门的一位 W 阿姨告诉我,现在东圈门一家号称淮扬菜老字号的某餐馆也不过是前几年刚开的,更讽刺地是该店的厨房曾经是公共厕所。

<sup>3</sup> 以上资料参考中国扬州门户网站群

<http://www.yangzhou.gov.cn/jdtj/201111/0225bff03b9942a9bd4b5111ba419c11.shtml>

“他家哦，生意还那么好，那些人（指游客）吃得那么开心。我都恶心死了，这厨房原来是厕所，要是你们知道还吃的下去？……现在这里是搞得好了，人多了也吵了，老房子还是不少，我们倒是天天盼拆迁换到新小区去，一直说要拆要拆怎么还不拆。”

扬州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强调诸如“还原”“复古”“原汁原味”这样的概念，还介绍到市政府曾经出台《扬州古城保护管理办法》，未来扬州的古城保护工作重点放在古城风貌的更新、古城人居环境的改善、古城历史文化价值的提升上。不过吊诡的是，你在东关街这条号称地方特色的街道上，总能见到一些外来品，比如现代连锁的咖啡馆、英式下午茶、韩式铁板烧、台湾奶茶店等，工艺美术品商店里卖的那些古玩大多是批量生产于温州义乌，特色民间小吃和你在同里乌镇等江南古镇如出一辙，甚至在湖南的凤凰古镇遍地都是的姜糖也在这里出现。毫不夸张地说，双东这样的街道，似乎现在每个古城都有那么一条，诸如苏州的平江路，杭州的清河坊，甚至远在西部的成都的锦里。

更有意思的是，每个城市这样的仿古街道上，也总会有那么一个谢馥春的店铺。

## 二、体制变迁

令人惋惜的是，从改革开放到全球化的热烈进程中，无数根植在中国人记忆中的那些年代沧桑的老品牌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国际化的大品牌。老品牌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们的衰落与消逝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谢馥春可谓是其中一个奇迹，它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起死回生，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彰显活力，在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不可比拟的作用。该品牌是如何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走上复兴之路的？究竟通过哪些具体措施？其成功复兴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它的复兴策略给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老字号企业又带来了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该部分将要具体分析的地方。

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企业的体制变迁，因为制度对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伴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老字号企业如何改变陈旧的管理模式、经营策略，适应新兴经济形式？如何在市场经济中重新焕发活力？谢馥春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处在不断的体制变革中，与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之源，它的几度兴衰也提供给我们反思企业制度与社会背景互动的绝佳案例。从清末到建国前，谢馥春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更确切说是家族手工作坊。但正是在这种手工作坊的制度下，在谢家人对产品研发，技艺传承的不懈努力下，谢馥春一举夺下世博会奖牌，蜚声中外，也成了上海滩明星名流的御用化妆品。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企业改制的宏观背景下，谢馥春的所属权和经营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不断变化，从“公私合营”到“地方国营”。中国在 90 年代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尤其是步入到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大批国营店因为其缺乏效率和活力的体制和管理方式在优胜劣汰中被时代所抛弃，谢馥春也正是其中的一员。扬州市政府认识到该老品牌对于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重要意义，于 2003

年对谢馥春进行了重新注册，正式成为国有独资公司，谢馥春如今属于扬州化工局下属的化工资产经营公司，由化工局派驻抽调人员担任董事长。由此，扬州市政府成了谢馥春的大东家，并给予大力扶植以发展当地旅游经济——这也意味着，谢馥春和谢家的关系彻底了结了<sup>4</sup>，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地位，对于该品牌的发展作用可谓至关重要。

当我问到一位谢馥春的工作人员如何看待谢馥春的死而复生，他竟给我讲起了一套诸如“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类哲学命题，最后把根本原因归结于“这样一个饱含文化底蕴的品牌当然有其内在的生命力，怎么会灭亡呢？”访谈中总是出现大量“文化类文章”（姑且不把这类文章成为学术论文）通用的概念词汇，后来了解到他也加入谢馥春不到 2 年，并且非扬州本地人，主要工作就是谢馥春的品牌研究，我终于理解了他为什么从那样的角度回答我的问题。这样一个老企业，与家族“企业”时代告别，在市场经济中走向了现代管理模式，重新组建管理人员，设立了诸如品牌研究部、市场部、网络宣传部等新的部门，甚至这些部门里的新员工许多并非扬州本地人。于是疑问就这样产生了，复活的谢馥春，还是那个谢馥春吗？当所有权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当产品工艺从谋生技术变成文化传统并要加以传承，当以商品盈利为主要目的品牌被打上文化的烙印，断裂的品牌发展历史被续写，人类学告诉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延续是客观自然的，传统是既定永恒的，本文下面部分将会以具体事件/场景为分析对象，解读其背后的制衡力量和行动逻辑。

### 三、具体措施

2006 年，谢馥春获得国家商务部首批“中华老字号”，2007 年被评为“全国 300 家重点保护品牌”。在企业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谢馥春的复兴之路落实在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策略之中。我选取了以下几个对企业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和事件进行实地研究和分析，采用实地观察和访谈的双重验证。

#### 1. 选秀：扬州美女评选（2007）

重整企业的第一步，便是根据上海某策划公司的建议，进行文化嫁接工作，评选“扬州美女”，并且以此重新设计包装。最终选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12 位扬州美女，分别是刘细君、赵飞燕、赵合德、吴绛仙、刘采春、周宪、周嘉敏、毛惜惜、朱帘秀、冯小青、田秀英、杨小宝。经过扬州美女的评选，谢馥春的包装焕然一新，一改以往的陈旧之感。美女头像作为谢馥春这一古典美妆的标志，商标、产品包装、店内装潢都被打上此烙印，颇具中国风和古典韵味。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美妆系列的高档礼盒更加别致，鸭蛋粉的外包装采用扬州传统工艺——漆器，上面还印有扬州景点标志——五亭桥，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这一扬州美女与扬州美妆的文化嫁接工作，配合包装设计、店铺装潢的品牌形象重构，

<sup>4</sup> 实际上，政府和谢家之间发生了不少纠纷，比如对谢家老宅拆除翻新引起了后人的不满。

对那些古典爱好者颇具吸引力：

“话说扬州出美女，这些美女就是涂着这些东西长大的吧。”

“扬州人好爱美的呀，一条东关街从头走到尾，会看到三家谢馥春。”

“一进店就是扑鼻的香气，香包香囊整个店面都是从里面散发的味道，香味有点浓郁，但用来熏衣服是不错的。而且样子很精致，作为赠送的小礼物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也很合适，正常大小的香包才 28 元一个，还有袖珍的香囊只要 10 元。”

“就喜欢这种包装古色古香的東西。”

“逛关东街的时候，看到这么一家店，感觉这个鸭蛋粉挺适合做特产的。江南女子与胭脂，很有感觉，也是国货，听说还获过奖，买的人也确实很多。”

“看到路过的游客人手一个袋子。”<sup>5</sup>

新包装的怀旧复古风和上世纪末让人颇感过时的包装取得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视觉效果，这不仅仅取得了那些对他乡猎奇的游客的青睐，连本地从未和谢馥春发生关联的年轻人都开始成为谢馥春的消费者。

## 2. 千秋粉黛馆（2008）

结合扬州的“双东”改造工程，打造了千秋粉黛馆。该馆设立在谢家老宅——馥园中，整个建设主要包括：谢氏老宅修复、花厅和部分生产办公用房修复、新建前厅等。千秋粉黛馆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主要功能是展示，比如通过大量史料、图片和绘画形象，扬州女性的传统梳妆台、化妆品等实物，展示历史上的扬州美女及其化妆技艺。上文所提到的评选出来的十二位扬州美女——“扬州十二粉黛”的塑胶雕像也被安放在粉黛馆内。该馆号称中国首家美妆美女博物馆，可是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好。同时，2012 年开始，千秋粉黛馆推出了“千秋粉黛演绎扬州风情”的夜间地方戏剧演出，包括扬州弹词、扬州评话、扬州清曲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号称“该演出将立体而形象地诠释扬州自古出美女的独特文化现象，打造新的旅游和地方艺术品牌。”<sup>6</sup> 票价不菲，散客 100 元一位，售票处的阿姨告知“一般都是旅游团队订票，散客较少。节假日、旅游旺季比较热闹，平时人就少了。”

当你走进粉黛馆，与想象中的有了一丝差别：光线较为昏暗的粉黛馆中，没有什么参观者，十二粉黛的雕像显得有些孤零落寞，此外，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个粗糙的被称为“戴氏夫人”人像，却没有任意的文字说明，听说是因为谢家的子女反对。<sup>7</sup> 里面也设有化妆品柜台，柜台售货员懒懒散散地四处走动，似乎有些无所事事。一楼大厅摆放有八仙桌，便是观众席位，舞台与观众席位之间有一座小桥，下午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位唱扬州评弹的小

<sup>5</sup> 以上资料来源于大众点评网消费者对谢馥春的评价。

<sup>6</sup> 见扬州网·扬州日报 [http://www.yznews.com.cn/news/2013-04/04/content\\_4325949.htm](http://www.yznews.com.cn/news/2013-04/04/content_4325949.htm)

<sup>7</sup> 由于谢家的后人极力反对陈列自己的先人，谢馥春美女馆里的戴氏夫人并没有像其他美女一样有文字介绍，并且也不和其他美女一起陈列在展厅的二楼，墙上的谢馥春的传人的名字也是到了谢箴斋就没有了下文，对谢崇德、谢崇光的女儿们来说，这无疑是不能接受的态度，但已经没有人不在乎她们和这一百七十年、价值数千万元的品牌之间的关系。

伙子穿着蓝布长褂，正在为晚场演出排练，他时而拿出快板，时而弹拨两下三弦，没有游客的侵扰，他彩排得倒也是惬意。我默默地坐着，听着他咿咿呀呀唱着的我听不懂的词。东关街上坐落着不少书场，一位扬州曲艺研究者曾告诉我，现在主要的观众都是游客，因此他们会多排练一些较短的弹词和清曲段子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晚上正式演出开始了，跟我一起看演出的还有一个约莫二十人的旅游团。LED 大屏幕，五彩的灯光，配上茉莉花等地方小调倒是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的意境。身着旗袍的扬州美女们优雅现身，风姿绰约，婀娜秀丽。整场演出将近 1 个小时，对扬州的文化倒是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现：民俗文化、盐商文化、餐饮文化，以及画派、诗词、花卉盆景、工艺美术、戏剧曲艺民歌等。只是在这出精美的综合文化演出中，我不禁有些恍惚。这展现的究竟是谁的文化呢？其中涉及大多数内容是我们这一代人未曾了解更不曾传承的，我们有限的地方知识也仅来源于课本，知道我们好像有着这样那样的民俗，只是现实生活中却没能亲身体验过。这种如梦如幻烟雾缭绕中，台下的观众不管是像我这样的本地人（除了我因为抱有研究目的而来也不会有其他本地人了）还是外地游客似乎都不太能与台上的表演者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鸣。结束后有的游客大呼上当，这么贵的门票，早知道还不如拿这钱去买香粉和香包呢！要不是依赖旅游团队的捆绑销售，怕是这演出更加没有市场了吧。

文化传承出现断裂的原因很复杂，有政治事件导致的浩劫，有制度政策带来的影响，也有我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多重因素的作用。至此我不禁想起自己刚上大学时遇到的一件趣事：当年我刚到宿舍时，遇到一个美丽的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小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真实存在在现实生活中而非在书本上影视作品中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身着 T 恤牛仔裤，梳着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显得精神又干练，我纳闷为何跟我们在那些晚会上看到的身着民族服饰，梳着满头麻花辫头顶戴着小花帽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接着我又问了一个令她啼笑皆非的问题“你们是不是都住在草原上？那个帐篷还是什么跟蒙古包一样吗”小麦笑着说“当然不是，我们和你们一样，都住在楼房里呀。草原上的牧民已经很少了。”我这个对异域民族的刻板印象，却又在之后被加诸到了自己身上，当一个来自广东的同学得知我是扬州这个江南古城时，他好奇地问道“你们是不是都坐船上学呀？”

以上这些看似是大家年少时因生活经验不足而闹出的笑话，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生活在书本和影视媒体对他者所谓“传统”文化的建构之中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吗？更不用谈那些文化普及读物，翻开我们专业书目《中国民族志》，对 56 个民族的人口地理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等进行了一个全面又“权威”的描述，于是我们开始按图索骥拿这些书本上的标准去套用活生生的人，会发出诸如你怎么不信 xx 教，你怎么不过 xx 节，你怎么不穿民族服饰，进而上升到你们不像 xx 族/xx 人，你怎么都不正宗之类的道德审判。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要忽视那些鲜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而非要把媒介所刻画出来的影响当成金科玉律呢？这些标准不正是一种包含了权力关系的被生产出来的知识吗？在此我并不只是想对那些民俗该不该传承还是复兴做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人类学告诉我们要从实地

调查中，本地人视角中去理解当下的文化和日常实践究竟是什么。

馥园作为一个园林、工厂、办公室、博物馆几位一体的场所，使得谢馥春这个品牌的发展也被整合在了扬州旅游发展的整体布局之中，而企业、旅游、政府这几者之间如何协调呢？

“美妆博物馆、千秋粉黛这些是归个园管的，个园是管理，门票，场地这些，和我们（指谢馥春公司）没有关系，我们跟个园是互利互惠。…最开始，06年企业整改，政府对企业扶持，从轻工局化为化工局。现在就是政府部门关心支持，给些优惠政策，大的方向抓下，主要企业自营，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都是我们自己出，政府也管不过来的。”<sup>8</sup>

也就是说，个园与谢馥春的关系是共赢的。谢馥春所处的馥园位于扬州市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东关街步行街，在场地上属于个园管理，个园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考虑，进行博物馆以及地方戏曲的活动安排，但是谢馥春的企业管理是自主的。同时这两者都被整合在扬州的旅游整体发展之中，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游客在餐馆馥园对扬州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也对谢馥春这一品牌有了认知，顺带会买上一些产品作为纪念品。同时，东关街上的谢馥春店就有3家，游客在一路游览的过程中路过门店，对产品的喜爱也会转化为它背后历史故事的兴趣——参观馥园，晚上观看千秋粉黛演出也是一个配套的旅游体验。同时，虽然谢馥春是国有控股企业，在2003年企业重整复出之时，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扶持力度，包括工作组的配备，人员安排等等。但是此后的发展，都是企业自主经营的结果。企业、旅游、政府这几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机整合，使得谢馥春作为地方文化符号为地方旅游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保证了作为一个盈利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

### 3. 传习所（2012）

谢馥春传习所于2012年建立，门上挂着一个大红色的牌匾“谢馥春”三个大字赫然在目，牌匾左边挂着一块铜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谢馥春‘香、粉、油’制作技艺”，右边则是国家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的牌匾，再往上面的砖瓦屋檐下则挂着一个黑色的牌匾，写着“中华首妆”四个大字。这醒目的四大牌匾既是一个获得诸多荣誉的展示，也是一种所谓权威部门对其合法性的认证。走进去会发现，此建筑是一个四合院式的结构，整体看是一个‘前店后所’的格局。仿清的店铺装修风格，店员也身着旗袍。前面的店出售谢馥春的产品，而后面的传习所则可让人了解谢馥春的历史。前店的柜台后面是一格格有点像药房的木制陈列柜，分类标明“天香唇彩”、“香囊”、“绛仙眉黛”、“香包”、“鸭蛋粉”等等，摆放得错落有致。继续往里面则是传习所，左手边的一面墙展示了香粉、香件、梳头油的制作工艺流程，旁边则配有坛子、木勺等制作工具，右手边的柜台成列鸭蛋粉和百年来谢馥春获得的各种奖杯。正对面的一面墙展示了谢馥春的历史渊源，包括品牌创立、各代传人、荣誉榜以及谢馥春在抗战时期对国家支援的义举。其中谢馥春在巴拿马世博会获得大奖这一块

<sup>8</sup> Z某，男，56岁，谢馥春管理人员。



尤为突出，旁边的玻璃柜台也陈列着展现了谢馥春体制变迁的大小近 20 枚公章。传习所的右手边则是游客休闲区域，一个清式的梳妆台，上面摆放着小姐的首饰盒、桂花头油、胭脂等等仿佛还原了清末扬州女性的日常生活。路过的游人饶有兴致地在梳妆台前面的镜子留影纪念，接着坐在休闲区域的凳子上观看右面墙上的图文解说和液晶屏的录像。这时一个小女孩充满童趣地好奇叫道“这么黑看不清楚，他们以前怎么化妆呢？”虽然那一刻正值午后，但稍显空旷的屋子里也有些昏暗，我不明白是因为建筑结构还是木质材料导致光线如此黯淡，环顾四周试图找寻光源：头顶一个仿古的纸质吊灯里挂着一个稍显功率不足的节能灯泡，几缕透过木雕窗棂的光洒了进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一旁立着一的“微信扫一扫”的广告牌倒是醒目，原来老字号企业也运用了新媒体在进行市场拓展和宣传。这一瞬间感觉到有一丝新旧融合的奇妙体验感。

这样一个文化展示场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以笔者之见，以上这些历史叙述和呈现，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是帮助游客更加直观的了解品牌以得到更好的购物体验那么简单。谢馥春的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解释了传习所的建立目的：

“传习所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申请非遗，起到一个展示的作用，申报（非遗）的时候有传统展示的要求。非遗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传承性，另一个是保护性。这两点也是我们这几年工作的重点。我们今后还将继续做好展示的工作，请扬州的‘梳头妈妈’<sup>9</sup>用梳头有再现昔日场景。”<sup>10</sup>

本来我对他所说的“梳头妈妈”梳头场景颇感兴趣，当我于 2013 年冬天回访时再次问道他此活动何时进行，他笑了笑敷衍道那时“那是为了申遗弄的计划嘛……”言外之意，落实在申遗文书上的语言竟比这现实生活的实践更为重要？不过幸运地是，虽然没能看到传习所重现的梳头妈妈，我倒是随后认识了一个几十年坚持用桂花头油的现实生活中的梳头妈妈，这位扬州老人的事例将在下一章节具体叙述。

#### 4.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谢馥春的工作人员所言，传习所的建立完全是为申遗服务的，我进一步开始了解起该品牌的申遗工作。2011 年，谢馥春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正在为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谢馥春聘请了专门从事品牌文化研究的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时间，通过收集资料，走访谢家传人和老厂工，理顺了谢馥春的发展历史文化。

“谢馥春申遗是作为传统技艺的展示，我们找到了 2、3 个老技术工作为代表，因为一直是纯手工制作，这个技术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是鲜活的历史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历史符号来展现。按照遗产法，我们自己认为条件成熟，我们向上面申报……申遗我们也是有优

<sup>9</sup> 梳头妈妈指美容师。

<sup>10</sup> Z 某，男，56 岁，谢馥春管理人员。

势和特色的，一个是含金量高的，曾经获得过巴拿马奖；一个是作为企业，我们在国有化妆品行业的优势。比如杭州的孔凤春，年代没我们长，它们目前为止连自己的历史都说不清楚。他们也没法展示自己的技艺，他们都不是浙江省的非遗呢。谢馥春作为扬州香粉的代表，《扬州画舫录》等历史资料都可以查到，有历史依据一直都很有名气。再比如上海佳化，它是化学的，跟我们这种纯天然的不能比。”<sup>11</sup>

传承人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事项，该管理人员口中所提到的老技术工为什么能具备传承人的资格呢？难道因为他们是谢馥春历史的见证者？我却从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2003年，谢馥春厂里对外宣称的歇业整顿，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块牌子，对内按照破产的方式把全厂三百多名职工解散了。一个当时被买断回家的老谢馥春人L阿姨<sup>12</sup>说起现在确定的传承人颇有不屑之意。

“要说传承人，按理是谢家现在的姑娘，虽说在这个厂里呆过，但是以前仓库上发发料，其实没接触生产，不懂蛮可惜的。之前扬州晚报上不是有么，最后一个谢家的老人死了，汪氏小苑那个汪小姐，是谢家的媳妇。以前大户人家不是都通婚的嘛。老人都死光了，等于都没了。所以等于现在这个跟原来的谢馥春一点关系都没了。现在这个传承人，是那个副厂长，跟这个一点都不相干！他妈是厂里的老职工，他等于就是去顶职的，顶职的意思就是，爸爸妈妈在厂里退休了，孩子可以进去一个。他进去相当于厂里的制造工。以前我们厂效益不是顶好的时候，他就跑去义乌去，义乌经济开发得好，帮人家厂里生产雪花膏，他自己制造的知道怎么配方，相当于把卖这个技术，赚了不少钱。等厂里倒掉之后，建了新厂，他又回到扬州，厂里就把他返聘过来，把他弄成了生产厂长，就把他做成传承人了。这拿人开心呢，其实不搭嘴（扬州方言：不相干的意思）。年龄还比我小呢，真正比他赖斯（扬州方言：厉害的意思）的多呢，比如我师傅，他们那些技术太好呢”

我很好奇为什么传承人不报那些技术好资历深的老职工呢？

“人家厂里都很（现实），谁要那些老的啊，留的人都要留年纪轻的。人家老的身体不行了，要看病啊什么都麻烦……老的一批都不在了，他就。当时在厂里时我们都瞧不起他，叫他小年轻了。但是你晓得人家底子归晓得，瞧不起归瞧不起，但是人家站在这个岗位上，看到我们这一批老的，官架子还大得不得了。我们现在不去厂里，我们去了又没意义，厂里都没有我们老的了。那个是新的，跟我们没关系了。”

L阿姨在访谈过程中反复提到，现在新的谢馥春跟历史上的那个老谢馥春没有一点关系，谢家人一个都不在了，其实就只剩下了这块牌子，卖给了公家。那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又是什么呢？本文的下一章将会进一步进行新老谢馥春的辨析。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申遗这场文化活动，似乎也只存在与谢馥春工作人员和政府人员的

<sup>11</sup> Z某，男，56岁，谢馥春管理人员。

<sup>12</sup> L某，女，52岁，谢馥春的老员工，于2003年被买断。

口中——也就是所谓的地方精英，在我访谈的跨越了性别、年龄和阶层的扬州本地人心中，他们甚至从来不知道谢馥春早于 2011 年获得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当然他们也没有关心过。

## 5. 企业拓展与转型

谢馥春也颇具野心，试图扩大规模，打破原有的纯手工的生产模式，建立起现代企业的发展模式，在产品类型、销售渠道、生产基地上都进行了拓展。在保持原有的古典美妆产品的基础上，谢馥春采用生物科技，与扬大医学院合作，开发了迎合现代人护肤需求的馥春肽系列护肤产品，相比主攻旅游作为纪念品的古妆系列，馥春肽系列更具有实用性。不过我从谢馥春市场部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相比还是古妆系列的销售量占据整个销售额的比例更高。2014 年 3 月，谢馥春化妆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杭集工业园区开工，这标志着该老字号品牌走上产业化、科技化的转型之路。“该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 1.64 亿元，一期项目主要是满足化妆品生产准入条件和古典国妆生产，二期工程主要是建设化妆品研发中心、多功能厂房等，研发天然植物、矿物等美发、护肤、美容、美颜产品和现代日化产品，解决未来发展问题。”<sup>13</sup> 谢馥春这一老字号化妆品的稀缺性在于其历史性和手工纯天然等附加价值，一旦它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大规模生产的日化企业，它的市场竞争力在哪里呢？这是觉得值得持续关注和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同时，谢馥春为拓宽渠道，扩大市场，开启全国加盟店，在江苏本地、北京、上海、福建、云南、安徽、浙江、四川、重庆等省市已开设了 40 多家直营加盟连锁店，同时也开设网店：官方销售平台（3 家）：官网、京东、天猫，网络授权店铺 31 家，均附有详细名录、网址和编号<sup>14</sup>，可见保证了一定的监管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该店在选址上颇有讲究，不同于普通化妆品进驻商城设立专柜或者在商业街区开设专卖店。谢馥春在全国的分店均位于该地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甚至是专门的老字号一条街上。如上文所提到的，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古街，每个古街上都会看到谢馥春。老字号似乎成了一个在拆除老民居基础之上翻新重建的文化历史街区的配套产品。

## 第四章 “两个”谢馥春

人类学是一门自下而上，讲究当地人观点，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学科。本研究以上部分从企业发展角度出发，结合对相关资料考察、实地调查的方式，以具体事件和场所为切入点梳理了企业历史脉络和当下发展的重要举措。本章最终要落实到“人”上，即企业的发展对地方市民生命真正意味着什么？当地人和游客视野中的谢馥春这一品牌又具有什么含义？本

<sup>13</sup> 详见扬州生态科技新城网站

<http://stkjxc.yangzhou.gov.cn/yzxcxq/bmdt/201403/d546775fe4004b05913474fe65873bd8.shtml>

<sup>14</sup> 网店目录详见 [http://www.xiefuchun.com/news\\_detail/newsId=24.html](http://www.xiefuchun.com/news_detail/newsId=24.html)

地对谢馥春的起死回生有什么想法？之所以叫“两个”谢馥春，源于我在研究之处的一些主观偏见，而随着田野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不管是从时间上来看，还是从空间上来看，都存在着另一个与我最初设想并不一样的谢馥春。家乡的人类学要经历一个“去熟化”的过程，同时也要谨防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蒙遮双眼，把自己一些想当然的想法和本地人视角划上等号。事实上，已离开家乡在外求学7年有余的我，在多大程度上又算得上是本地人呢？以及即使是本地人，其内部又存在太多的差异性。介于家乡研究者这样一种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混合身份，所以在田野中多倾听不同人的声音，多留意细节，尽量避免主观判断，多用田野中直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说话，或许是处理这种矛盾和焦虑的有效方式。而这种介于“主位”和“客位”之间的摇摆，也恰是田野中灵感的来源。

## 一、昔日香厂

在访谈对象中，X阿姨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员工，她曾经在谢馥春老厂的香精房工作，掌握大量配方技术，这职业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调香师。当我问到她是怎么看待谢馥春起死回生的。她苦笑了一下说道

“起死回生还要感谢名城公司，老字号的开发，我们就是被遗忘的角落，被买断的，倒闭的牺牲品。”

接着X阿姨开始给我讲起了她在谢馥春厂20多年的工作情况。

“我1980年进厂，20岁，我们毕业以后，要时候假模假样地还要考呢，是考进去的。那时候蛮能进去拽呢。我们几个多少老职工住在我们治淮里面，都说好呢，那时候很好呢。我们那一批15个学生进去，10个女生，5个男生。那时第一批新生力量，多活力啊，之前里面都是老年人，也没技术含量的。我们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学徒，有师傅带着，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学制造。比如，学习怎么熬制润面油，白色的像蜡烛一样，一根圆的。还要帮师傅弄包装，蛤利油的壳子，一公一母要对应起来呢。招工的时候招的叫操作工，实际上这些都工都应该男的做的，都是体力活。我们女孩做了几个月，就把我们安排到车间里，在流水线上分装那些一大罐的，雪花膏、洗发精、灌花露水。到30岁左右，我还是被分到香精房搞配料，香精房相当于一半化验室一半工厂。谢馥春所有产品的香精全是我们这里配的，比如雪花膏就有10种。”

“以前很惨的，全是纯手工，里面都是那些老年人在做，就在拼速度。等我们进来之后，年轻人带进去了技术，开始搞了机电房，半自动。像鸭蛋粉还是纯手工，原料配好了以后，放在模具里面，脚一踩就压出来一个了。就这样一个个地纯人工的做。实际上就是个手工作坊，只要晓得配方简单得很。外面的人不晓得，就以为有什么深文大义很了不起。我们里面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比如）现在香袋里的那些珠子，以前都没这些东西，现在才弄的。不要以为多神秘，其实原料就是香精和滑石粉混在一起浸泡，烘干机烘干了，就变成小珠子，放在香包里。香精在里面，当然能香很多天。”

“那时我整天呆在香精房，每天从里到外都是香的连脚板底都是香的 我自己的衣服在一个柜子里，打开哦，聘（方言，音 PIN 第四声，指特别）香的，进门第一件事先洗手，什么都不敢碰，碰到什么都是香的。我们家婆老太老说香人回来了。我都恨死了被这个香！不瞒你说，我还被别人骂过臭子。那时夏天我们才研究一个桂花香水，那香水是好呢。我们每天在香精房，就像人家医生进了医院，出来身上都有那样一种味道。我天天接触，我那个整个身上哦，待在那个里面。有天我骑自行车回去，骑在一个箱子里，听到人家在后面说，“哎哟，这个女的擦的太香了，太冲人（方言，指刺鼻），这个女的肯定是个臭子！不是臭子怎么会查这么多？我头一掉，望他们翻（白）眼。”

“只要制造一个新产品，有的慢慢调呢。而且你还不能戴手套，因为都是玻璃的量杯，皮手套碰到香精，香精就是油，抓上去不滑吗，所以纯用手抓。回去这个身上不得命，我说肉都是香的。长期这样接触还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我说还没有的坏病还不错呢。无毒不成精嘛，既成精了，肯定对身体有伤害，我们厂里许多死掉的工人，基本都是得的癌症。”

“后来再开厂时，派了个轻工局的，他搞的承包了。他再来找我们几个，从外面又聘请了一些。想让我回去干，因为我懂配料嘛，但是他找我我没回去。那时不去主要一个是怕对身体有伤害，第二个先生在外面忙，03 年我女儿在梅苑上初中，家里要人照顾，我就一直呆在家里再也没出去干过。还好没回去，我们玩的几个老的，有一个回去了。太辛苦了！以前厂里大锅饭多舒服啊，人多 200 多个人大厂呢。现在他们新的总共工人加上管理人员，也就 20 几个。每个人都是一人顶几人用，现在会计都要下车间，电工还要搓香珠，他们经常加班，忙呢。新厂长还是蛮厉害的，这几年把谢馥春做的挺好的。以前谢馥春牌子没这么响。现在他把名号打出去了，苏州上海北京都有了。这以前怎么可能，以前就周边那些乡下来买卖。现在卖的好呢，我看东关街上那些，人家出来都拎几个，几十块又不贵，送给人家不一定用，就摆在那里好看。”

当 X 阿姨说道庆幸自己常年呆在香精房里没得病，也因为顾忌到对身体有害而没有答应重新回到新厂，我不禁纳闷了，“不是说谢馥春是纯天然的吗？怕什么？”

“纯天然？骗你们的，蒙你们外行的。纯天然成本多高啊，谢馥春价格这么实惠。只能说跟其他那些化工的比起来，谢馥春相对好很多。我们干这行的所以我们知道，我现在（皮肤）什么都不擦，只擦一个宝宝霜。这个添加相对少一点。我们在里面的都知道这怎么回事，所以我姑娘从来不用化妆品，越简单的东西反而最好，东西添加多了只会有伤害。现在那些国外的大牌子，都是广告，宣传，都是骗你们小姑娘的。”

X 阿姨的口述史还原了当年的谢馥春厂的生产场景，也赤裸裸地揭开了谢馥春这个百年古妆所营造出的神秘感。要知道，“纯天然”“手工”这样的词语在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中多么受用！“纯天然”勾画出一副自然清新纯净无暇的画面，再配合谢馥春如今的品牌形象，极具东方古典色彩。而“手工”更是一下子与批量大规模生产区别开，前者仿佛凝结着制作者的心血而包含深情，后者则显得因为高效快速而冰冷理性。买到一个纯天然手工制作化妆品

的消费者，仿佛获得了一份汲取了天地之精华的私人定制。然而当我在馥园看到简陋的生产车间，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工费力蹲坐在一个装满鸭蛋粉原料的白色塑料桶搅拌的画面，原料现实总不如广告里描述的那样美。正如 X 阿姨反复强调的，外人不了解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文大义，实际上就是个手工作坊。这让我联想到之前红火的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总是热衷于宣扬少数民族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在纯净无污染的山水中采集捕获食材，精心制作美食的幸福场景。而事实上呢？有的采集狩猎也许是一个辛苦谋生的过程，有的地方美食的创造也许只是物资贫乏的不得意之举。总之，我原本自以为是本地人知识在田野中一再被颠覆，这也让我意识到诗情画意可能是被建构出来的，但脚踏实地的劳作才是生活的真谛，人类学训练我们不迷信不盲从，唯有从田野中获得真知。

## 二、谢馥春与地方消费

在我对谢馥春的研究之初曾带有一个主观的预设，而当我真正下田野时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分明。我最初简单地把谢馥春的消费群体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游客，他们购买谢馥春那些包装精美的古典美妆作为到此一游的旅游纪念品。谢馥春对于他们的意义更在于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形式而非化妆品这一商品的实质。

第二类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再把谢馥春作为日常护肤品和化妆品，而是通过购买谢馥春作为馈赠外地亲友的礼品，谢馥春成了他们像他者表述自我，彰显地方特色的工具。

而在田野中这种两分法远远不能表达消费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一）外地人

东关街作为扬州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成了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此处云集了谢馥春馥园、谢馥春香粉店、谢馥春传习所三个展示窗口，每当路过总能发现门店里人头攒动，售货员穿着旗袍耐心给游客介绍各种产品的功效。路过的游客也总是会停下来，带上一两盒回去作为旅游纪念品。在我蹲点过程中，对路过游客进行了非随机访谈：

“扬州谢馥春很有名的，百年老店。鸭蛋粉啊，香包啊，很出名的。好用不好用我不知道，我就看着香包古色古香的，很好看，买回去送朋友。”

“出来玩总得买点什么回去嘛，但是扬州那些特产啊，你像包子什么的也不方便拎回去，送人吃的也…谢馥春还是比较适合送人的，也显得有点档次。我们中华古典嘛。”

“这个也就买回去当纪念品玩玩，你不可能真当化妆品吧？鸭蛋粉能抹脸吗？我用惯了 XX 牌的粉饼了。”

本来我以为这些访谈验证了我最初的假设：谢馥春在游客眼中仅仅是一个纪念品罢了，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对从厦门来扬州旅游，特地来此谢馥春买护肤品的老夫妇。丈夫于 5、6 年前来过扬州购买了一些谢馥春的商品，带回家后受到了亲朋的一致好评，这次带着妻子

来扬州旅游也再次来到谢馥春。

“厦门也有谢馥春，但是感觉没有扬州的好用，不正宗嘛。我5、6年前来扬州买了十几个香包回家，现在家里还有！现在挂在家里衣橱里还是香，比樟脑丸还好用，都没虫子了。家里被胎拿出来都是香的。这个香包很好用的，回家随便丢在橱子里，这里扔一包，那里扔一包。我家小孩一回家说，妈妈你放了什么啊，怎么这么香。”

当我问到他们有没去馥园参观时，他们对那里毫无兴趣。

“那个园子我们不去了，没好玩的，我们只要买东西就行了。那些霜、蛤蚧油很好用的，冬天涂一涂，手上就滋润了。瓶子装的还不好用，就要袋装的，东西还是老的好。”

这对老夫妻最终买了桂花头油、香包等几百元的产品回去，送给朋友。

诚然对于许多游客来说，谢馥春只是扬州文化的一个符号，品牌对于他们的意义更多是旅游纪念品，而非实际的化妆品，但是也不能否认仍然存在那些因为产品本身的功效而慕名起来的游客。

## （二）本地人

### 1. 礼品

小高是一个在南京上大学的扬州姑娘，因为她所学的专业是艺术类的，周围都是一些青春靓丽热爱打扮的姑娘，她离开家乡去上学时做起了代购谢馥春的生意。由于没有谢馥春官方授权，她没有开淘宝店，而是通过人人网、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进行销售，主要通过照片+文字说明，以及@各种好友，通过他们的分享来扩大信息传播。

“我自己用过谢馥春的腮红、眼影，觉得挺自然的，加上这又是我们家乡特色嘛，就挺想把这个品牌推广出去的，谢馥春的古典包装多精致好看啊，大家都会喜欢吧。我家里也有在谢馥春工作的人，通过内部渠道批量拿货有一定折扣，我自己正好也赚点外快。”<sup>15</sup>

然而半年之后，当我再次联系小高，想了解下她的销售情况时，小高苦笑了一下：

“我高估市场了……我不仅发那些化妆品的照片，还亲自做模特拍了使用效果图，再配上详细的直接的试用感受，可是好像效果并不好……也会有同学找我买，不过大家一开始也就是觉得包装好看，买一个还挺新鲜的，但不会真的长期使用……可能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大城市的，还是不喜欢这种老牌子吧。”

“那你自己还在用吗？”

“也没有了，我们学艺术的吗，同学都很有钱，也都是那种国际大牌，我要是再用这个，也会被别人笑太土的。”

小高所反映的情况再扬州的年轻女性中也颇具代表性，我访谈了几位20岁左右的年轻

---

<sup>15</sup> 小高，女，25岁，扬州人。

女性，她们纷纷表示，甚至从来不会多关注这个牌子。Z 某是一个大学毕业后工作了 3 年的女生，她这样给我们讲述了谢馥春在她心中的位置：

“我平时从来不会用这个，也不关注。我家里人，我周围也没人用。现在那么多牌子，欧美的日韩的，平时谁会用这个啊？……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放假结束返校时，喜欢买点谢馥春的香包做纪念品送给同学。好看嘛，摆在家里也好玩。”<sup>16</sup>

小白是一个典型的 95 后，从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开始接触化妆品，她告诉我她自己喜欢谢馥春，每次回学校都要买些送给同学。当我在她的梳妆台随处可见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国际大牌：Amani 的粉饼，Channel 的口红，Bobbie Brown 的眼线膏等等，我问道：

“那你自己怎么还是用这些欧美牌子呢？”

小白一副资深的样子说道

“欧美的彩妆好呀，不过护肤品不适合亚洲人肤质，亚洲人还是用那些日韩的护肤品好。”

“那谢馥春不是说纯天然嘛，你自己都爱买了怎么不用。”

“那个啊，主要是好看好玩嘛，我都买些香包，桂花头油什么的，送人也有特色，但只要用，哪会用那些啊。”

这样的本地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对谢馥春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谢馥春近几年重出江湖，他们才被那些精致包装吸引和文案吸引，似懂非懂地明白了它是一个扬州本地的老牌子。在本地年轻人的眼中，谢馥春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品牌，他们自己不是实际的使用者，而只是将这些包装精美的小玩意儿作为纪念品送给外地的同学。

## 2. 国庆路上的老店

当我走进谢馥春的老店，才彻底推翻了我原有的主观偏见——本地人也不再把谢馥春作为日常护肤品和化妆品，而是通过购买谢馥春作为馈赠外地亲友的礼品，谢馥春成了他们像他者表述自我，彰显地方特色的工具。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偏见，是因为长期的观察和研究都局限在了东关街上的谢馥春，本地媒体中所宣传的谢馥春，谢馥春现在员工所展现的谢馥春。

谢馥春最老的店铺坐落在与东关街相隔不远的国庆路路，这里也是扬州的老城区和曾经的扬州市中心所在地。与东关街谢馥春的鲜亮精致不同，国庆路的老店却显得有些灰暗陈旧。换言之，如果说东关街上面向游客的谢馥春店铺是全新打造的古典风，那国庆路上的老店则是真正在岁月累积中留下的古老。

---

<sup>16</sup> Z 某，女，25 岁，扬州人。





(图：分别位于东关街和国庆路的谢馥春)

这张地图清楚说明了不同的谢馥春店铺的区位特征，虽然相隔不远，他们却处于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同样，店里也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互动景观。东关街配合周围的一系列文物古迹、文化场所、旅游景点，是游客的集中地；而国庆路则是扬州市民的老城区，在当下整个城市发展中稍显落寞。

与区位特征一致的是，不同地理位置店铺的消费者也迥异。与东关街店身着旗袍的年轻售货员不同，国庆路的老店里的售货员都是中年妇女，她们身着白大褂，像药剂师一般，因为该店还保存着传统的销售模式：零拷，也就是雪花膏、香水、洗发水都散装商品，以两为单位装在塑料袋里售卖，价格非常便宜，一袋雪花膏仅 2、3 元。柜台后面有一些装着这些产品的白色塑料桶，这些售货员平日就将之分装进塑料袋或者小品种。周围的一些老年人会拿着塑料瓶子过来打梳头油、洗发水、雪花膏等等。柜台里还摆放着当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奖牌。



(图：国庆路老店的零拷)



(图：老店柜台内成列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牌)

除了店铺装修和零拷方式的古旧之外，老店也还保存着手工记账的方式。当有顾客结账时，她们并没有电子收银设备，而是拿出一个账本，用纸笔计算出价格。当我疑问现在这种零拷方式会不会有点过时了？售货员指着密密麻麻的账本给我们看，表示许多人会来此购买大量零拷产品。

“你们看，今天上午还刚有一个从高邮来的人，一下子买了几百块回去呢。我们卖得可好了。”<sup>17</sup>

“国庆路上的就是谢馥春的老店，这么多年都还保持着，袋装的、香水、洗发精、护发素，全是厂里的老产品，里面还有三四个原来谢馥春的老职工，是真正老店。老店生意好的很，夏天买那些痱子水花露水好多人买啊。周边的，里下河这一带的乡下的（指高邮宝应

<sup>17</sup> D某，女，53岁，谢馥春国庆路老店售货员

泰兴这些周边县市的)全都是买这些老东西。”

“我们以前每年都是超(提前)一个季忙。像现在年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忙花露水痱子水。9月份就要开始做雪花膏了。花露水有薄荷冰片凉快又都很香,老年人当香水用了。我住在翠园桥老城区,我们那一带都用。你们这一代都没有感觉了,你们都要用那些牌子的了。我们以前厂里的人说,谢馥春就是个大姑娘穿的破破烂烂的,可惜没有好的包装,就像人家农村里来的,穿的不好就卖不掉。那些不怎么样的,穿得好看反而受欢迎。那些上海后起的牌子,哪有像谢馥春品质多好啊。你们这一辈的孩子都不相信谢馥春,你们都是看广告。”

“东关街上的店,包括现在厂门口的店,都以前都是水果店,后来买过来的,后起的。这些都是旅游的嘛,以前品种多呢,有几十种,还有牙膏呢,后来慢慢就砍掉了。现在新的厂人员也少了,产品也单一了,只做几种,就旅游的那些了。”<sup>18</sup>

扬州老城区还保留着一批老店的忠实消费者,谢馥春已经伴随了她们几十年,作为一种传统和习惯一直保存了下去,W某今年70多岁了,她至今还保留着用谢馥春的梳头油梳头的习惯,对她而言,如果不用梳头油就没法出门——这在现在扬州的年轻人中是无法想象的。此外,谢馥春的这些零拷还受到了扬州周边县区人的喜爱,他们经常会来扬州采购大量回去使用。

在一个50多岁的Y阿姨家中,我也看到了谢馥春的零拷产品。



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是不是谢馥春这种古老的化妆品品牌,在本地的消费群体具有

<sup>18</sup> L某,女,52岁,谢馥春的老员工

年龄分化？年轻人不使用了，而中老年人更作为一种习惯保存了下来？进一步研究发现，分类并不是这么简单。扬州的许多中老年妇女也不再使用谢馥春，一名出身在 70 年代的公务员阿姨这样回忆起了自己选择化妆品的历程：

“我小的时候，家里人都用谢馥春，雪花膏啊梳头油啊。后来我到了二十岁，我们都开始所谓追逐时尚了，喜欢用那些上海的牌子，百雀羚啊美家净啊，嫌谢馥春不好。我都跟我妈说不要用谢馥春，用点好的……再后来经济好了，就用更好的牌子了，国际大牌子。”<sup>19</sup>除了年轻人以外，扬州一些收入中上，社会阶层和地位较高的中老年妇女也不再使用谢馥春了，同时人群也与居住格局有关。21 世纪以后，扬州城市中心逐渐从以国庆路为中心的老城区（东部）向新区（西部）转移，西部建立起众多高档新式住宅，而老城区则仍保留着老平房。收入较高的阶层逐渐往扬州新区（高档住宅小区内转移，留在老城区的主要是老年人和收入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当下谢馥春产品的主要使用者。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还是更加青睐于国际品牌，觉得谢馥春档次较低。

总而言之，直到 21 世纪之前，谢馥春在本地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品品牌，扬州的一些老年人仍然会去“陈旧”的店铺中打一些雪花膏等日常护肤品。到了 2005 年谢馥春整顿后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市场，主打产品以“中华古妆”的精致包装化身旅游纪念品，并被市政府整合到地方旅游的发展中。虽然这造成了该品牌的消费主体变得更为多元，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从本地市民手中转移到游客中。老谢馥春的忠实用户们依旧存在着，只不过谢馥春通过新店和老店，两套完全不同的产品链和经营模式，使得消费群体构成更加多元。如果说面向本地和周边县市居民的老店所售卖的经济实惠包装朴实的老产品是为了满足老客户的需求，顺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老谢馥春的一种延续，那么新谢馥春陈列和展现的包装精美的文化商品则是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他们的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究竟是自我选择的消费的主体还是被建构的客体呢？至少在我看来，不同的群体通过选择不同的物品，来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

---

<sup>19</sup> H 某，44 岁，女，公务员。

推介：尽管“抑郁症”及其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已经走向“科普化”，可是当我们谈论“抑郁症”时，可能产生了多少理性的误读？本文的作者从社会医疗化背景出发，讨论了抑郁症的诊疗标准，认为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定义和诊断其实存在着一个模糊的边界，诊断的过程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医生也需要凭借个人经验而非医疗常识进行判断，而复杂的医学术语构建也增加了医患之间的隔阂。从研究视角看，作者不仅兼顾了抑郁症郁友、郁友家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亲身参与了医学院的专业课程，从医学生的视角去考察一整套抑郁症诊疗话语如何对标准化地对个体进行形塑和训练。

本文的另一个亮点是将赛博空间引入对抑郁症的讨论，并且创建性地提出赛博空间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疗愈机制拥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独特的意义世界，并对郁友情绪的舒缓和恢复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虽然作者对此的论述尚待更深入论证，但是在医学话语体系之外增加了另一种对抑郁症的解读方式，这也是对抑郁症愈疗机制的有益探索和补充。总的来看，作者抛砖引玉，论题新颖，视角独特，赛博空间中抑郁症愈疗机制的非正式性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复旦大学 2016 级 张宇芯

## 赛博空间的抑郁叙述与自我呈现（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3 级 雷婷

### 第四章 如何确诊一位精神病患者

#### 第一节 “抑郁症”确诊的合法性来源

在我的研究中，我不遵循一个对“抑郁症”的标准定义，并且“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分往往是模糊变动的，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构建影响，而是去观察和分析“抑郁症”或“抑郁”在实践当中所呈现的意义。

然而从疾病确诊的合法性来源看，疾病、医院和医生，三者虽然谈不上共生，但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疾病的确诊，若是缺少了医生的权威认真，疾病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都是被质疑的。西方医学及其诊疗过程作为一种高级的知识形式，它所构筑的医学逻辑影响着我们对身体的认知，对疾病象征意义的想象，还受到医药生产与销售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一系列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已经表明，医学知识从未如它被认知地那般客观、公正，相反

它自身也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化形式。作为文化，它有源头、有网络、有情感，有诗意。要对赛博空间里的抑郁文化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西方精神病医学知识的剖析，这些诊断程式深刻影响了我的报道人如何认知自我，认知疾病以及医院空间。从目前已有的资料与经验观察来看，目前比较权威的抑郁症诊断依据包括由仲氏于 1965 年编制的抑郁症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这是一种病人能够自己进行抑郁自我评定的量表，可以依此进行初步的测查，作出早期、初步的判断。该量表围绕病人的主观体验设计了 20 道自评题目，例如“我感到情绪沮丧、郁闷”；“我感到早晨心情最好”；“我要哭或想哭”等。而在赛博空间当中，许多不愿去医院就诊的郁友依靠“量表”来为自我打分，这些量表多为网络搜索而得，通常都是被冠以“权威”“标准”等标签。

而另一依据，则是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简称 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为 DSM）一书，它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2013 年 5 月 22 日第五版面世。然而，《手册》的修订和再版面临巨大的争议，盖瑞·格林伯格在美国纽约客网站上发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与疾病的本质（The D.S.M. and Nature of Disease）一文中，谈到《手册》第五版将进一步扩展精神病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一些批评家对此的看法是：新《手册》将让更多人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条件，从而让我们吃更多地药物（超过 10% 的美国成年人服用抗抑郁药）。这警醒我们精神病学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精神卫生中心的一纸确诊单和药方，似乎就是对病症的最终宣判。

我通过朋友的帮助，有机会旁听到了某医学院精神医学本科生的精神疾病诊断学课程，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精神疾病确诊方面的知识。方洁是帮助我进入课堂的关键报道人。当我最开始找到方洁的时候，她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对精神卫生感兴趣，因为即便是作为精神医学本科生的她，对于精神医学都没什么兴趣：

“同学们的态都是接触太少，没有什么兴趣。一般就是胸无大志，比如我，这样子的人才会考研还继续选择精神卫生，大多会转出去。虽然我们是精神卫生，但是我们学的和临床医学是一样的。因为一时都会要考执医证，所以本科生不会分方向的，每个都要学，每个科室都要轮。”

他们班一共有 29 个人，大三学年开始学习精神疾病的诊断学，《手册》与许多测试量表是他们所使用的主要教材，诊断学课程总共有 8 个课时，分为病史采集和精神状况检查，和精神疾病的诊断两部分。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我了解到在他们所接收的系统培训中，精神疾病的诊断被归类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采集详细的病史以及对病患的精神状况作系统的检查；第二步就是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推理，建立正确的判断。诊断依据包括疾病症状、病因、病程、背景（包括病人人格、家族史、发病年龄、性别）、躯体及实验室资料。在课堂上，老师尤其提到一个重要的确诊关隘叫作诊断思维，将门诊过程确立为六个具体的步骤：拟诊，初步确立诊断，更换拟诊，确立诊断，追踪以及诊断性治疗。老师讲

述了一个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名 19 岁的男孩，因为性格孤僻，不与人交往 5 年有余，行为怪异 1 年，前来就诊。整个确诊过程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根据病患家属讲述病症，患者从初中开始怕见人，现就读高二，老师反映近一年他见人用手遮掩，上课时将书立在桌上，独来独往，不与人接触。成绩不断下降，从中上到倒数第 3 名。暑假的时候在墙上乱写乱画，父亲干涉就发脾气，甚至想用刀砍自己的父亲。经常不时的发笑，说自己以后会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然后，由病患自述，病患说因为自己脑内总是听到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考上了大学，并且总觉得同学用异样的眼神看自己，走路故意碰撞自己。用手遮住眼睛是因为眼睛疼，上课把书立起来是因为觉得和老师对视不自在，在墙上乱画是因为没有纸了，砍父亲是因为他干涉自己画画，病患否认自己精神不正常，承认头昏、头痛、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烦躁和失眠；第三步，老师依据病患和病患家属的描述，归纳为 5 个症状：幻听，被害妄想，情感淡漠，社交恐惧以及神经衰弱症状群；第四步，根据症状进行诊断，该病患最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方洁告诉我，在他们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是配合门诊实践的，一般是老师门诊，学生在旁边帮忙写病历和病人聊天，一般一次门诊的时间大约为 20 到 45 分钟：

“门诊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协助老师接管病人，写病历和病人聊天。访谈与观察是最主要的诊断方法，还有就是量表测试。一般有精神性疾病的病人都会有家人陪伴，特别重性的患者都会主要由家属来讲述病症，我们主要依据症状来下诊断。一般门诊在 30 分钟左右，因为门诊量太大了，了解病史和基本症状以后就可以开药了，有些比较严重的会建议住院治疗。从医生或者我们医学院的角度来说，服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病就要治。”

不管是方洁对门诊经历的讲述，还是老师教课时对确诊案例的分析，诊断学的重点都是围绕问诊的技巧、步骤和注意事项，但是却几乎没有涉及如何向病患和病患家属来解释这些复杂的医学术语，这好像也从来不是医生的义务。而大量的门诊，有限的问诊时间，也使得医患之间的沟通十分紧凑有限。这不禁让我感到困惑，不到半个小时，需要多大的神力才能够完美的实现老师口中的从搜集病史到实践六步诊断思维的，又怎样才能够避免不出差错呢？

### 第三节 误诊：从抑郁症到精神分裂

带着这些困惑，再结合我在精神卫生中心的田野经历来看，我认为在确诊的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误诊。医学上对于出现误诊或诊断分歧的原因的解释分为两类：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收集资料的缺乏完整性、准确性，精神状况检查不深入、不细致，知识、经验不足、思维方法错误；客观因素包括疾病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疾病发展过程，疾病不典型。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我作为人类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旁听了由国内某精神卫

生中心的精神病医生主持的有关精神疾病卫生知识宣讲的课程项目，而这次项目主要面对的对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所展开的，而这些患者均为未成年的青少年。在这段时间的田野活动中，关于确诊与误诊的问题也一直是病患与病患家属经常谈论的话题。该项目一周一次，一次为期 2 个小时，分了两部分：精神病医师讲授，以及病人家属的分享交流。在精神病医师的讲授部分，并不局限于对精神分裂症病症、疾病知识的科普，而更多地是针对病人家属的困惑来解答，尤其围绕以怎样的心态应对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这一问题最为核心。在旁听该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一课程项目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在帮助病人及家属正视疾病，配合治疗，特别是在承认疾病的前提下，积极适应社会和生活。他们在谈论的不仅是疾病的症状，而是病与生活的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病患家属分享了许多他们的家庭与疾病之间的故事，几乎每一个家长都经历了从最初发现的些许病症，到鼓起勇气走向精神卫生中心这一过程，这其中的挣扎、无助、困惑并没有随着确诊减轻丝毫，反而各家都有着各自的顾虑。在精神卫生中心的课程项目告一段落之际，我们尝试约访了愿意进一步参与我们私下访谈的家长。最开始的名单有 8 名家长，但最后真正愿意跟我们接触的只有 4 名。而我想要分享的是来自于王爸爸家的故事，当我们耐心地走进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故事当中，或许我们会明白，一板一眼的医学诊断标准在真正的生活中是多么苍白和无情，也更能体会精神病患者以及他的整个家庭，是多么需要支持和帮助。

王爸爸有两个儿子，是一对双胞胎，一年半前弟弟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王爸爸早期经历过文革，知识青年下山，在农村待了 12 年。直到改革开放，回到城市，36 岁结婚，37 岁和妻子有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在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王爸和王妈在现在所在的城市创业下来的家产也不薄。王爸在单位努力工作，分到一个价值两百多万的房子，而王妈之前的房子也因动迁分到了新房子。在家境愈发宽裕的状况下，王爸王妈想的就是，不管怎样，亏自己也不能亏孩子的教育，这方面的需要花钱的，他们从来不落下。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前，弟弟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引起王爸爸的注意，而最为直接的诱因是就是中考的失利：

“他们进入高中，弟兄两个，相差 20 分，当时 530 分就可以进入高中，低于 530 分就只能进入中专，他们考 510，差了 20 分，找原因，无非就是英语或者就是写作文，排列不整齐标点符合什么的，我想能够抓回来的。就让他们去复读，复读一年。结果，我只能现在这么说，事与愿违，我想得到的东西不是那么回事。到了复读学校，强行学习，不让你休息，每个星期都有测验，结果哥哥没退步，考了一个好的中专，他就不对了，状况开始出来了。三年前。一开始，就是走神，思想不集中，随后就是根据录取通知书下来，被中专录取，思想彻底崩溃。怎么个崩溃呢，不吃饭，早上就喝点水，中午胡乱吃个包子，晚上就吃两调羹饭，老师跟他说的话，他根本就记不住。那我们就害怕了。还有就是他的大便，一个星期一次，就引起我们重视了。还有就是无缘无故的笑，没有原因的。再有一个就是，老师说考试的时候把卷子上你认为简单的你先做出来，老师是这么说，家长也是这么说，但是他在考试的时候总觉得耳朵里面有人跟他说话，要他先做难的，出现了幻听幻觉。出现的这些状况，



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碰到过。伤风感冒我们有过，但这种事情没有遇到过，六神无主啊。后来也不敢大声的跟人家说，只能向邻居和同事悄悄地打听，查询各种资讯，报纸广告，像我儿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对待。”

而一开始，对于王爸爸一家来说，要跨入精神卫生中心的门槛是很艰难的。他们听说了很多关于精神卫生中心传说，特别是世博会期间王爸爸亲眼见到有警察抓走路上的“疯子”，听说是要抓去强制治疗，这让他们对医院感到恐惧；还有就是对于“确诊”所带来的一系列“污名化”感到恐惧。所以最开始，王爸爸一家选择了中医。

“一开始相信中医，后来根据实际情况下来，觉得中医不彻底。中医都是报纸上登的，不是什么野报纸，都是官方的报纸，新民晚报，健康与卫生。新民晚报登的一个年级大的老中医，因为中医又不要什么仪器，都是看脸色把脉，望闻问切，开好方子，再去医院配药。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又换了一个医生，说是中西医结合。那位医生说‘你儿子你放心，我来替他看，保证他能好。’他说我这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中医不行，还有西医，他这个话说的蛮到位的。但是后来，我总觉得我还是要到精神卫生中心看。它包括区一级的和市一级的，我觉得还是要跨入精神卫生中心这个门槛。一年半之前终于决定要去精神卫生中心。现在吃药，量也不大，吃三种药：维思通，防抑郁的药，这个小药片和这个是配套的，因为它（指抗抑郁的药）吃了可能会有点副作用，这个药片就是解除副作用。现在吃这三种药，量是最小的，不能把中药当做主要手段，比如睡眠、肠胃、肥胖等，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后来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一年半前，王爸带着孩子来到精神卫生中心，两次门诊之后确诊为抑郁症，但几个月后又改为精神分裂症。儿子的病情到底是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这是一家人到现在还没有把握的事情。尤其是王妈妈，王爸说直到现在王妈妈还是不愿意接受孩子有精神分裂症这些事情，她坚持认为只是情绪障碍：

“我的老婆到现在也不能直接面对我儿子这个情况，她采取否定的态度。天天都在交流，也没用。甚至于到唐医生那里去看的时候，她还在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医生直接说是什么状况，需要吃什么药。我老婆还是觉得我儿子是情绪障碍，我觉得可能比情绪障碍要稍微严重一点。情绪障碍很好理解的，今天父母说两句，你不吃晚饭闹别扭，这叫情绪障碍。你在自己房间里面无缘无故的摔东西，就不是情绪障碍了。我老婆总觉得是情绪障碍，但实际上不是。”

随后，我又询问了孩子自己的感受，出乎意料的是，小王自己给出的答案也是坚持认为自己是抑郁情绪，偶尔脾气不太好，而不是精神分裂症。而王爸坚持认为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儿子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没有能够考取高中，他说他的儿子看着像是没病似的，但是在适应社会的能力方面还是很弱的。这不禁让我感受到这种归因疾病的方式，似乎“疾病”成为了解释原来被我们解读为缺点和不足的一个出口。尤其是反观赛博空间里对于医患问题的讨论，病患、家长和医生三者之间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

常常是不尽如人意的。像王爸家庭中出现的，这种由确诊抑郁症转向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并不少见，我在参与课程项目中甚至还遇到多动症被误诊成精神分裂症的案例。

所以，可见医院空间中精神疾病话语构建背后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疾病的确诊和划分过程，以及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使得大部分的病患或患者家属始终无法找到正确认识自我身体的出口，反而增添了更多地不确定与迷茫。尤其是涉及到用药的问题，病患和家属常常是一知半解的，这也是让他们焦虑不安的重要因素，因为服药常常会相伴严重的副作用。反观，赛博空间中的抑郁小组，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与精神障碍有关的贴吧、小组里面，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在询问用药的问题：

“今天去三甲医院检查，先是让我做了测试，有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症。医生没有跟我聊什么，直接说我的情况需要吃药。开了两个星期的药，让两星期后再过来看医生。我本来以为会先沟通什么的。”

“吃了抗抑郁的药，恶心想吐，是正常的吗？我不太懂双相，医生也没和我说，就是让我吃药，建议住院。”

“如果情况允许，见大夫的时候最好自己一个人去，有人陪同的话医生会默认你已经彻底疯了，会开很重剂量的药而且基本不和你交流。”

我不能担保这些留言不是在危言耸听，做任何真假的判断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更没有想要将责任一味归结为医生，甚至整个精神病诊疗体系之上。但是，仅从对医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看，在整个医患网络中，患者处于一个及其被动的地位，而精神病医师对“病人”的诊断则是当今社会最具权威与合法性的判断依据，他们拥有了分类“正常”与“不正常”的权力。去医院，经历门诊，开药，拿到诊断书，服药，复诊，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性进程，才算是真正实现了“确诊”。然而，当结合抑郁小组里郁友对门诊、用药问题的纠结与担忧，以及我在国内某精神卫生中心参与的青少年精神分裂患者家属的心理辅导小组活动的田野经历来看，复杂的医学术语、模糊不清的诊断说明、不断增加和变化的用药处方，迫使病患与病患家属都难以进入医生阐释疾病的话语世界，这一方面使得他们背负更加沉重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面对来自社会对精神疾病污名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然而，大部分的人总是倾向于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二者之中，歧视和质疑后者的合法性，认为郁友在虚拟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而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抑郁症患者画像才是真实有力的。但从抑郁“确诊”的复杂性及背后所带来的污名化影响，郁友呈现在赛博空间中的形象，虽然触摸不到，反而更是真实。

### 结论：赛博空间中非正式疗愈机制的生产

基于我对赛博空间中虚拟社区里围绕“抑郁”的话语整理与分析，与郁友的深度接触，结合对精神卫生中心病患家属的访谈，赛博空间与物理空间中的抑郁症话语，包括郁友呈现自我

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以及对赛博空间本身与疾病相关的讨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区别，从物理空间出发，我认为主要可以总结为三个原因：精神性疾病的污名化；精神性疾病知识普及教育的欠缺；医患沟通问题。首先，从郁友在抑郁小组等虚拟社区的发言来看，抑郁症污名化有以下几个来源：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由于对精神性疾病的刻板印象，总是将其与“疯子”、“神经病”等形象直接划等号，所有的精神性疾病患者都被看作是有危险的，需要被驯化的。如果一个家庭中出现了抑郁症患者，这常常不会是一件太光彩的事情，甚至在我接触到的案例中，有些家庭只有核心家庭的成员才知道孩子的病情，而选择隐瞒其他的家庭成员；而更大的污名化则来自于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就业机会、婚恋市场等等，有患者家属甚至为了避免患者的档案中出现精神性疾病患病的记录，即使患者有购买医疗保险也选择花更多的钱来问诊买药；第二个原因，是国内普遍缺少对精神性疾病知识的科普教育，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对精神性疾病的病因、病症与治疗方式的普遍缺乏了解，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因此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也有可能由于对病情认识不足而尝试其他无效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治疗方式；对于除郁友之外的群体，这种无知就会造成很多郁友口中的“不理解”，他们会把郁友的困扰归因为个体的原因：包括意志力软弱、庸人自扰、无病呻吟等等，而无法意识到心灵的、大脑的生病也是需要药物治疗的，就跟感冒一样。第三个原因就是医患沟通的不充分，看不懂的确诊单、听不懂的医学术语、拗口的抗抑郁药名、可怕的药物副作用、惴惴不安的未来都成为郁友心底沉重的负担，然而就诊往往并不能够减少他们内心的压力，一颗小小的药丸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

确诊与用药常常是郁友在纠结要不要在物理空间“暴露”自己患病和确认自己“不正常”身份时苦恼万分的问题。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病”来作为解释很多现象，多动症、社交恐惧、双相精神障碍、强迫症等等一个又一个标签为“不正常”的精神性疾病都在改变着原有的精神疾病分类，现代社会人人都随时有可能成为“不正常”的危险分子。而快速地问诊、确诊到用药的过程，让药变得“无所不能”。人类学家凯博文认为这部分来自于社会医疗化的结果，它导致“不开心”或者正常的不舒适都被转化成了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障碍。赛博空间中我所接触到郁友，他们都在谈论“抑郁症”，但是或许他们中的一些只是有一点抑郁情绪了。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反思“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正常性”的广延性和经验的多元性，以及医药市场与销售的复杂性。

从赛博空间中有关抑郁讨论的虚拟社区出发，赛博格又给郁友们实现了什么无法从物理空间中得到的，是他们口中的安全感、理解与自我认同，这是能够抛开“正常”与“不正常”的自由：安全感的形成来自于一个专属于郁友空间的搭建，可以是虚拟社区中的一个小组，一个帖子，一条微博，一个私密的微信群，这些成为他们口中能够无所顾忌吐露心事的“树洞”；而理解则是感同身受之后的贴心劝导与分享；抑郁症患者常常会说，他们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而当现实社会又对他们充满歧视和不解时，他们则更加会反过来否定自己。在这个远离污名化的虚拟世界他们才能够接受

和认同自己的不完美，这或许是他们开始摆脱疾病的第一步。而这些的实现，与赛博空间的匿名性密切相关；但同时赛博空间里海量的用户、飞速更新的信息、多线身份同时拥有的可能性，又让郁友情谊的维系变得艰难。不仅如此，由于抑郁症患者病情的特殊性，他们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影响而变得消极、抑郁，所以在赛博空间的社交与分享，也是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但这正是赛博空间特性所赋予其中人际交往关系的离散与脆弱，这种特性的矛盾或者说力量就在于，这既促成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疏离与短促，却又让他们以安全舒服的方式搭建内心的安全小屋，进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疗愈机制。

在雪梨·特克的研究中，她对利用互联网，甚至是计算机本身作为一种医疗工具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案例是能治病的“帕罗”——半个心理医生，“帕罗”是一个能够倾听病人倾诉的机器人，“孤独会让人生病，而机器人的陪伴可以部分地消除这种负面作用。”郁友在赛博空间中的活动，就是在依赖科技与网络作为平台来消除孤独，寻找理解，包括虚拟社区平台发帖，建立微信抑郁互助小组，还有不断涌现地通过星座星盘、塔罗占星等区别于用药就诊的自救方式。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如果用声波来形容郁友之间的交流的话，郁友就像对着一个广阔无极限的空洞喊出了自己故事，声波通过反射被其他郁友所听到，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不是直接的，是无对象性的。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赛博本身，有时候他们也把它形容成树洞。在我看来，这种避免直接与人的交往，换句话说即越是脱离物理空间的实体的人的对话，越能让他们感到安全，愿意倾诉。上述种种，都促使他们只能将真实的自我寄托于虚拟的空间，这或许不能改善他们的病情，却可以缓解孤独。就像郁友安东尼所说，就好像在沉沦苦海里绝望挣扎的一个人，遇到了另一个人，痛苦依旧，但少了孤独。

推介：既往对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如《金拱向东》介绍了麦当劳在五个不同地区的在地化时间，但是作者受此启发却另辟蹊径，将星巴克的员工——“绿围裙”们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并且真正运用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成为一名绿围裙”同时又保持了“局外人”的相对冷静，因此能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向读者讲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首先，成为绿围裙的入职过程充满着仪式感，并且面临着重重的考核和突击考验，而在他们工作的日常实践中，标准化的操作台、咖啡馆空间布局与走位，以及对咖啡制作与闲暇时间的精准把控，体现着星巴克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对员工无时无刻的内化过程。比较有趣的一点是，“绿围裙”在工作中严守员工手册的准则，但是私下里却会讨论许多关于顾客的八卦，比如说“顾客不懂装懂”，这些闲谈其实也可以体现他们所内化生成的一种精英文化观念，那些“不懂咖啡”的顾客也会让“绿围裙”产生优越感。在星巴克工作因为学习了咖啡的鉴别、品味和制作，似乎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激励着员工不断晋升，从绿围裙变成黑围裙，甚至可以成为“咖啡大师”“咖啡公使”。本文的有点在于资料翔实，记录全面，可见作者在田野中所付出的心血，若能对“绿围裙”的身份建构和话语实践与作者所引述的福柯的“规训”概念之间的联系有更加深入和详细的分析那就更好了。

复旦人类学 2016 级 张宇芯

## 成为“绿围裙”：上海星巴克员工的身份建构与话语实践（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3 级 黄彦闽

### 第 3 章 绿围裙养成记：规训的开始

“当我想到权力的技术性细节，我想到的是权力毛毛细细的存在形式，权力渗入个人气质、直接抵达其身体、弥漫于其手势和姿态之中。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如何学着在生活和工作中共处。”

——福柯与布罗歇尔《监狱对话录》

福柯认为动作技术是通过对整个动作的每一部分进行规定，清晰的描述身体各部分的位置，从而对人进行规训的方法。而话语是权力运作方式中体现得最明显却最难识别的部分（福柯，2003）。

绿围裙的开始，便是从星巴克对其动作技术规训的开始。在各种标准化与专业化服装、

行为、动作与话语的要求，文化价值与咖啡文化的宣导，各种方式的监察与全景式的监测，使得绿围裙置身于各种标准的规训当中，并被其专业化与价值观所迷惑，主动接受标准化与专业化的规训。

无论星巴克的员工是什么身份：大区经理，区经理，店长，副店长或绿围裙，大家都是用伙伴互相称呼。所有伙伴统一着装，围裙、别字围裙左上方的名牌、黑色或白色的带领T恤或衬衫、黑色或卡其色的裤子（不过膝）、黑色皮鞋（防止被烫伤），不留指甲、不美甲、不佩戴任何首饰，工作期间不抹香水。这些装备，除了围裙由星巴克提供，其他服饰都由员工自己准备。只要在门店，无论你是店长还是副店长还是资深咖啡师或是刚进去的新伙伴，所有工作都是按照当天门店经理的安排轮流进行。所以在星巴克，你没法通过一个绿围裙的日常工作内容来判断他在星巴克所处的不同层级。但可以通过围裙颜色来区分这位咖啡师是否得到了星巴克的咖啡师等级认证。

“围裙”在星巴克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星巴克用绿色、黑色和咖色围裙来区分咖啡师的等级。绿围裙是最基础的“星级咖啡师”，黑围裙是通过层层考核的绿围裙的进阶颜色，被称为“咖啡大师”，更专业的咖啡师拥有的是咖啡色围裙，被称为“咖啡公使”。星巴克严格规定了穿着围裙的空间范围和对象：门店内的星巴克工作人员。并且强调进入吧台区一定要穿围裙，离开门店，或者在门店休息时，都必须脱去。这些是受到“层级监视”，一旦违规，则会受到各位围裙的教育甚至警告。

绿围裙是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星级咖啡师，包括实习生、兼职人员、普通咖啡师、值班经理、副店长、店长从绿围裙升为黑围裙甚至咖围裙需要通过层层考核，其中对咖啡知识的掌握是首先要考核的内容，比如能通过品尝一杯咖啡，准确判断咖啡的场地、烘焙方式、风味、酸度、纯度、气味等。目前我国的黑围裙大致 2000 人左右，咖围裙大致 20 人左右。

### 3.1 穿上绿围裙：接受规训的开始

成为绿围裙的每一步都是有着严格的规范、规则与考核方法。

第一步，申请，申请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门店询问的方式填写表格进行申请；二是在网络上完成申请。

第二步，面试，申请通过后便会接到来自星巴克的面试邀请。面试直接在门店进行，共两轮，由店长、副店长与区经理进行考核。面试集中在对申请者能力、意愿与工作时间的考核，尤其重视申请者对星巴克的文化认同。

第三步，体检，需要申请者自己到健康卫生中心体检，并获得上海市餐饮从业人员健康证。

第四步，完成入职表格的填写，以上三步都顺利走完之后，在线完善申请资料，填写员工入职表格和家庭背景表。

以上四步全部顺利完成后，你就将成为星巴克的绿围裙。

### 3.1.1 “绿围裙的一天” (The Green Apron Book): 星巴克文化价值观养成

成为星巴克的绿围裙会获得几本册子,这本小册子主要是宣扬星巴克绿围裙的价值观以及原则性要求。这些价值观从工作态度、服务内心状态、对专业度的需求、对道德的要求等方面对绿围裙做了要求。绿围裙不会因为做错一杯咖啡,打翻一瓶糖浆,掉了一块蛋糕或少收一百元钱受到惩罚,但会因为违背对顾客的态度要求等受到书面严重警告。

星巴克的价值观是强有力的话语权力,将一切技术性上的规训手段被掩藏起来,让绿围裙从内心里认同这套权力,让身体自觉的接受规训,从而来符合星巴克对每个人尊重的价值取向。而这也成为很多绿围裙留在星巴克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在田野调查当中与一些绿围裙聊到为什么会来星巴克工作,甚至持续这么长时间时,收到这样的回复:

“虽然每天动作身体很累,但是心和脑袋不会累。”

“白领内心很阴暗的,在格子间里,就我们楼上的这些人,互相算计,哪里有什么朋友,说句话还要小心翼翼,这也就是了,工作环境还差,我原来在一家广告公司,同事就直接在办公室抽烟,还说得不得,都是领导。在这里大家都是伙伴,环境也好。”

“我大二的时候来星巴克的,伙伴都很照顾我。现在快两年了,要走真的不舍得。但爸妈要我去考公务员,觉得服务业太辛苦。如果我没考上,我还会回来这边。那个时候,希望能来这家门店。”

“上班是累,天天站着,还要不停说话,但是心不累,脑子不用想事。”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在星巴克工作了三年多了,这幢楼的人基本都认识,就觉得很熟悉,还有很多熟客加我微信,有时聚会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去。”

(注:以上几段叙述均为笔者与绿围裙聊天时,他们所讲述的在星巴克工作原因。)

可以看出绿围裙非常赞同星巴克的价值观“充满激情地做每件事,正直诚信,企业家的精神和动力,自豪与成功,尊重我们的伙伴”,并把这套内容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标准与评判周围事物的标准。

### 3.1.2 咖啡护照: 咖啡文化意识的养成

它用来记录绿围裙在星巴克品尝的每一种类咖啡豆与咖啡。每一页是一种星巴克线上咖啡豆的 ID,需要绿围裙来手动填写。内容包括咖啡豆的品名,与这款咖啡有关的故事,烘焙方式,产地,咖啡豆工艺,烘焙方式,咖啡的气味,风味,醇度与酸度等,以及品尝心得。在星巴克定期会举行 Coffee Tasting(详见 2.2.1.1)。咖啡护照就是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记录的。按照星巴克的要求每位绿围裙在一年内都必须至少品尝十三种咖啡豆冲制的咖啡,并记录下来。

咖啡护照的存在是为了通过检查的方式来营造星巴克伙伴间的咖啡文化氛围。但是只要

是检查，就必然有空可寻，每个主体都具有强烈的策略在强有力的制度中寻找自己的舒适空间。绿围裙会通过抄笔记的方式来应对检查。

笔者只和伙伴们一起品尝过三款咖啡，但笔者咖啡护照中已经记了不下十种。接到友情店铺通知得知最近几天有区经理来巡店，于是绿围裙们下班前都要开始疯狂的“补作业”，并且为了应对检查，还会至少背下一种咖啡豆的故事、生产方式、风味、醇度等内容。

### 3.1.2 星级咖啡师学习手册：咖啡制作专业化养成

这本手册是完整的一套规训绿围裙的规则，它对绿围裙在星巴克门店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甚至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做了细致的规定、教学、示范与考核，并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循序渐进对每一位新晋绿围裙的身体、话语与活动空间范围进行规训。

课程主要分为三大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考核：操作考核、内容考核等，这些内容包括企业文化、咖啡文化、糕点与加热、咖啡制作、收银、QA（质量检测）等。每一节课都安排了对应的学习与实践时间，由师傅进行理论与实践，并由店长或副店长进行理论与实践操作考核，考核不通过者重新学习，三个月内部通过考核的则会被劝退。

但是就算再严苛的考核方式，都会有灵活的应对方式。每位新晋绿围裙都会得到前辈友情“赞助”的三页“通关宝典”，里面包含了每一阶段考核的重点内容提要。

绿围裙前辈总会以各种方式“安慰”新晋绿围裙面对通关考核。

“把这些背下来，考试一定没问题。”

“如果这些不会，你是没得救了。”

“多拉着师傅陪你去练，这些东西背下来是基础，重要还是操作。这些就是用来应付考试的。就算你背的再顺，一杯咖啡都不会做，有什么用。”

“如果这么简单的都不去背的话，每句话抄100遍。”

### 3.1.3 一位师傅：教学与检查的能动者

师傅对于绿围裙而言是最重要的老师，对于星巴克而言，也是重要的“层级监视”中的一环。师傅由店内资深绿围裙（值班经理）轮流担任。他将一对一负责新晋绿围裙的教学部分、实践教学以及上线操作的全部内容。还要负责绿围裙今后工作当中每一个动作，每一项操作和每一句话的直接管理与责任人。笔者在以下“建构绿围裙的专业度”部分将详细叙述师傅的故事。

## 3.2 建构绿围裙的专业度

“Be knowledgeable. Love what you do. Share it with others.”

—— The Green Apron Book

（注：星巴克内部手册）



### 3.2.1 咖啡文化与星巴克文化：文化意识建构“咖啡师”的身份认同

绿围裙的第一课从认识咖啡与星巴克开始。

咖啡文化是星巴克在绿围裙中极力营造的文化氛围。Coffee Tasting 是将新晋绿围裙带入星巴克咖啡文化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这被认为是接触咖啡文化，融入星巴克文化氛围的最好方式。星巴克对咖啡豆的故事叙述、研磨粗细程度、制作工具、冲泡水温、冲泡与品尝时间、品尝方式、描述方式、搭配食物等有一套完整的细致的要求。Coffee Tasting 过程中咖啡必须通过手冲的方式进行，绿围裙一般使用机器将咖啡豆磨成粉，然后用法压壶进行冲泡。

对于每一种咖啡的品尝，是从讲述这包咖啡豆的故事开始，包括咖啡豆的烘焙方式、产地、这款豆子的故事，然后是讲述一杯咖啡的品尝方式。品尝一杯咖啡分为四步骤：闻，大力吮吸，确认与描述。而描述一杯咖啡的维度又分为气味、风味、醇度与酸度。气味就是闻出来的味道，比如草药味，花香味等；风味，又根据咖啡生长地区的不同又不同，如亚太地区咖啡以云南地区为代表会出现草药味与泥土芬芳，非洲产地因为水果多，所以咖啡豆的味道呈现出果香味，拉丁美洲的味道则偏重于坚果与可可味等；醇度与酸度指的则是压舌感，如果压舌感厚重则醇度高，相反则纯度低，而酸度则根据喝完咖啡之后口腔分泌的口水来判断，口水分泌多则代表咖啡比较酸。

以此通过严苛的规则和专业度来建构出星巴克对咖啡的权威话语，然后从咖啡文化中建立起对绿围裙的权力规则，让绿围裙从内心认同这套咖啡文化与咖啡规则，并将此内化为自己品尝咖啡时的标准。

笔者第一次 Coffee Tasting 来自师傅挑选的佛罗娜咖啡，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到手冲咖啡。

“这款咖啡豆是星巴克咖啡豆中最受欢迎的一款，这款咖啡豆是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综合咖啡，醇度厚重，口感丰富，具有突出的可可口感，酸度中等，压舌感厚重，其加工方法为水洗法&半水洗法。不仅如此，这款咖啡豆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上线于某一年的情人节：佛罗娜是意大利的小城，相传是朱丽叶的家乡，讲述着战争时期发生在佛罗娜的一段浪漫爱情故事。爱情也像这款咖啡豆的风味一样，口感丰富，初尝苦涩但却带着甜味。星巴克在设计这款豆子包装的时候，最开始采用的就是佛罗娜的那段爱情故事：一对在桥上拥吻的情侣，但现在换成了带刺的玫瑰花，似乎带刺的玫瑰花更能表达爱情与这款咖啡的丰富性。”师傅拿着一包佛罗娜咖啡侃侃而谈。

“哇塞，好酷哦”笔者边品尝边听着师傅说的一板一眼，顿时也沉浸到星巴克所给绿围裙营造的梦幻咖啡文化当中。

“这有什么酷的”师傅简单明了的说“这些都是要求背的。必须要会背，老板会抽查的。”

“所有的咖啡豆吗？”

“不是所有，但至少每次 Coffee Tasting 之后，你要会背一种，不然抄十遍。”

“为什么？”

“因为你是星巴克的咖啡师，请专业一点。别给我丢脸。”

（注：笔者上课期间与师傅的对话）

文化的规训和个体主体性事实就是这样赤裸的冲撞在一起。绿围裙们一方面会因为上级的检查去掌握所有的规则与要求，但这些内容是星巴克希望通过平等的分享来营造的。另一方面，绿围裙却乐于接受这样的硬性考核，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内容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专业度，才符合自己是星巴克中绿围裙的工作身份。

### 3.2.2 糕点展示柜摆放与糕点加热

星巴克的糕点由供应商统一配送，在门店的展示柜摆放。糕点的成本远高于咖啡，保质期却很短，但每家门店每天都有配额的完成糕点任务，因此糕点的售卖对于绿围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修行。糕点相关内容是绿围裙接触到的第一门“必修专业课”。

这门课要求记住所有星巴克糕点的名称、加热方式、摆放规则、QA 要求等等。为了帮助记忆，师傅会提供给一张糕点中英文名对应表，以及加热时在烤箱上的按键与时间。名称与加热方式，比如，蓝莓麦芬 Blue Muffin 加热方式，烤箱“Muffin 1”按键。

掌握糕点在展示柜的摆放规则，由于糕点涉及到食品安全，所以还会特别增加 QA（食品安全的学习）。展示柜的规则非常重要，也是上课期间师傅会不断强调与着重考核的内容。一些规则如当季新品必须放在最上层靠近收银员的位子。每一排的餐盘颜色一致，上下两排餐盘颜色不同。要求摆放清晰美观。糕点的名牌必须在糕点的左侧，朝前，整齐。上午面包、可颂、三明治放在上两层，下午蛋糕放在上两层，每天 14:00 前完成糕点的换层。每样糕点都必须朝前摆放，糕点的保质期卡都必须保留，并将字朝下的放于糕点下方。

“理论和实践是存在差别的。”——绿围裙前辈

比如星巴克硬性要求“拿取糕点或加热时，必须清洗双手，戴一次性手套，用糕点夹夹取。”绿围裙会这样去执行只有一个原因——“检查”——在 QA 或区经理来检查或访店的时候绿围裙才会特别注意的按这点要求操作，而且还会安排一位绿围裙什么杂事都不做，只负责糕点区的事物。因为平常巨大的客流量，拿取与加热糕点的时间根本允许支持绿围裙去重新认真洗手或戴一次性手套。

因为星巴克糕点种类多，向顾客推荐糕点也是绿围裙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而好奇的顾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糕点是什么味道，好不好吃。因此新晋绿围裙就有了一项品尝糕点的特权：由于糕点保质期在 1~2 天，因此，在每天打烊后剩下的糕点，新晋绿围裙都可以在摄像头的监控下，打开每一样糕点尝一口或者全部吃掉，然后扔掉，但是在摄像头之外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是出新品时，公司配送的专门给绿围裙们的试吃。但是，绿围裙总能在规则中找到自己的方式应对，会利用摄像头所在位子以及与值班经理的关系，在打烊后悄悄带走

一两块糕点作为夜宵。

### 3.2.3 咖啡制作：身体的规训

（注：由于饮料配方属于公司内部机密，所以有些部分笔者将模糊处理。）

星巴克通过对咖啡制作每一个步骤、动作行为以及话语要求，来对绿围裙的身体进行规训。

咖啡制作是绿围裙的必修第二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在星巴克几乎没有一位绿围裙是不会制作星巴克的所有饮料的，除去绿围裙中的“阳光伙伴”（有身体残疾或有些智障的伙伴，笔者没有接触过，听笔者的绿围裙小伙伴们说，“阳光伙伴”一般都是在外场区收外场，不会让他们进入到吧台制作咖啡。）

咖啡制作分为三模块：设备的使用、制作饮料步骤、饮料配方。正是因为这三部分的统一标准规定，所以无论你是在地球上的哪一家星巴克，无论为你制作咖啡的绿围裙是谁，你喝到的都是味道一样的“星巴克”。

#### 3.2.3.1 设备的使用

绿围裙要求掌握门店内的所有设备，无论这个设备价值几何，星巴克都要求绿围裙去学习掌握。

星巴克咖啡制作基本依靠咖啡机进行，咖啡机会准确调控咖啡豆的磨制、压力、温度、水的配比等，但是绿围裙仍需要掌握出咖啡的流速来判断咖啡粉末的粗细、水温等，从此来调控机器的正确操作。从咖啡机滴出的咖啡十分完美，三分层次“内核、主体和油脂”清晰可见。而人工需要控制的只有配方、蒸奶和最后的调制。

饮料配方是星巴克饮料的核心内容，不同的饮料全因配方的不同。因此，这也是这一部分绿围裙需要学习的重点模块。背熟并掌握饮料配方是正确与快速制作一杯饮料的基础与关键。学习饮料配方之前，先要学习制作饮料的四步骤。

#### 3.2.3.2 制作饮料步骤

饮料制作的共四步骤为：蒸奶、浓度、糖浆、完成与交流。所有的饮料制作都必须按照规定步骤，就算是不需要滴咖啡的巧克力，红茶拿铁等，在“脑海里”（师傅的话）都必须过这些步骤，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漏说任何一步，否则都会被判定为不合格。

制作工具包括奶岗、Shot 杯、糖浆上的按压工具。这些工具都起着量杯的作用。每一寸都如同化学实验一样精细，却便于操作。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话术“一个 Shot”“两下糖浆”，指的是一个 Shot 杯的咖啡和按压两下糖浆。奶岗中的刻度线更是衡量饮料量的重要测量工具，按照杯型的不同，将牛奶倒置不同的奶缸线。只要按照配方要求操作，所有绿围裙做出的饮料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会一杯杯制作饮料只不过是制作饮料的第一步，一杯饮料的速度必须控制在 18~23S 内，因为一杯 Shot 滴出 10s 后不加入牛奶就过期了，因此咖啡制作步骤拥有一个升级版，

这也是绿围裙必须掌握的，但因为这种制作方式对熟练度要求高，因此也被视为成熟绿围裙的标志之一，是绿围裙升至值班经理的必考项目。

饮料制作升级版，其实指的就是同一时间内，不间断的制作饮料。即一杯接着一杯不间断的制作与出饮料，即第一杯咖啡的奶蒸好后滴此杯咖啡的 **shot**，与此同时蒸第二杯奶，然后完成第一杯咖啡，同时滴第二杯咖啡的 **shot**……如此操作，才可能承受高峰期的顾客需求。

笔者在星巴克工作的第二个月就开始尝试这样制作饮料，有一天下午，接到了 25 杯拿铁的外卖单，笔者就这样一杯接连一杯不间断的制作了 25 杯，至此也算熟练了这个升级版。

在吧台的工作，除了制作饮料，与顾客交流成为重要的考核项目。与顾客交流被写进了课程当中，为了让顾客感觉到被重视与建立起从绿围裙到顾客的亲密联系。但在实际过程中，本应该亲切的交流变得流程化。一方面绿围裙会事先准备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问话，比如“吃饭了吗”“是来休息的吗”“下班了吗”“晚上要加班吗”……另一方面，绿围裙问出这些话之后并没有期待顾客给予任何回答，实际上，也很少有顾客会去接这句话。于是这些交流变成了单向的无意义交流。

### 3.2.3.3 饮料配方

“1, 1, 2, 2”，单看这样的数字，可能很难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星巴克的饮料配方。数字化、简单、明了，是配方的特点。星巴克给每个门店都配有很厚的一本配方说明书，用的是线圈活页，因为每一季度都会有新出的行销饮料，需要不断更新。配方说明的顺序按照以上说的四步骤来写：“蒸奶”，蒸奶不仅对奶量有要求，对充气时间更是有严格要求，不同的配方的充气时间不同，导致奶泡厚度不同，因此不同的咖啡往往有着不同的口感与重量；“浓度”：“1, 1, 2, 2”从小到超大杯型对应的 **Shot** 数量不同，不同饮料调制过程的 **Shot** 与奶放入杯中的先后顺序也不同；“糖浆”，不同的饮料对糖浆的要求不同，糖浆的量用按压糖浆上的泵头来衡量，泵头一次出的糖浆量受泵头控制，泵头由星巴克统一配置；“完成与交流”，不同的饮料的完成方式不同，如卡布奇诺为自由倾倒，拿铁要求拉出爱心（笔者离开前才学会拉爱心图案），**Flat White** 则要求拉一个圆点图案等。

除此简单集中基本咖啡外，星巴克还有许多升级版咖啡，如圣诞节特供的太妃榛果拿铁，蔓越莓百巧克摩卡等等，都拥有 **Plus** 的“浇头”（绿围裙将咖啡上的奶油、糖粒、糖浆等称为“浇头”）。饮料配方，对这些“浇头”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太妃榛果拿铁上的奶油要求两圈半，糖粒按杯型大小分为 2, 3, 4 下，蔓越莓白巧克力摩卡上的浇头除了奶油和糖粒，还要求蔓越莓糖浆五圈半，还有比如焦糖玛奇朵上的糖浆是三横四竖和两个圈等等。

### 3.2.3.4 “交流”

对交流的要求本质是为了拉近绿围裙与顾客的距离，与顾客建立联系，但实际上效果却因人而异，对于部分绿围裙而言确实是负担，并没有建立联系，如走过场般是无意义的存在。

所以“交流”真的存在吗？

“吃了吗？”“来休息吗？”“今天上班累吗？”“今天开心吗？”这是最常听到的

绿围裙用来交流的话语，很多都是事先准备的，唯一要求就是简短，好记。交流过程中很少有眼神交流，口不对心，并不期待，也不需求得到反馈。用绿围裙的话说“其实就是要求说说，除非遇到的顾客特别美，特别帅。”这时的交流往往会成为真的交流：“怎么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来这边上班吗……”

由于背负的田野调查的神秘任务，笔者在交流机会的时候，希望能得到一些真的顾客的反馈，比如“你喜欢拿铁的什么口感”“你平时经常来吗”“最喜欢哪款饮料”“来星巴克都做些什么”等等，但有一次在与顾客交流时简单聊了两句，就立马被绿围裙伙伴反馈，“不要闲聊那么多，除非他是神秘顾客。”

### 3.2.4 点单话术标准化

点单即收银是新晋绿围裙的第三门必修课，由于点单与收银是门店里最先直接接触顾客提供服务的平台，因此对点单的标准十分细致。

点单分为七个步骤：招呼、星享卡询问、介绍饮料、推荐糕点、推荐行销、准备糕点、致谢并指引取饮料。这七步骤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建立联系：招呼、致谢，二是促进销售：询问星享卡（提醒几分和卡内优惠消费，若没有星享卡的顾客一定要推荐购买星享卡）。

招呼十分重要，一般来说收营台是对这进门处的，因此收银区的伙伴需要时刻注意进门的顾客，按照星巴克的要求，每一位进门的顾客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得到招呼，收银区的绿围裙会在每位顾客进门的时候和他打招呼“hello，早上好”“圣诞节快乐”等等，然后在每一位顾客点单前还需要打招呼。笔者总是记不到要和同一位顾客打两次招呼，因此被点名批评过好几次。

星享卡询问，因为很多星巴克的顾客会有星享卡，星享卡一方面有积分性质，另一方面有些星享卡里会有诸如免费中杯券、买一赠一券等优惠券。加上这一部分询问为了避免有些顾客会在买完单之后拿出星享卡要求积分或要求用券购买。另一方面，若顾客没有星享卡，绿围裙需要向他们推销星享卡，星享卡的售卖也是会纳入门店伙伴绩效当中的。关于星享卡的错误新晋绿围裙非常容易失误，最常见的就是给顾客用错优惠券，导致顾客闹上门要求赔偿，然后以得到一杯免费饮料而平复心情。

介绍饮料，推荐糕点以及介绍行销活动，则主要为了建立与顾客的联系，让顾客感到很受重视。但绿围裙觉得，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销量。行销活动一般有如在规定时间内用某信用卡消费可以买一送一等。

对于那些犹豫很久或不知道要点什么的顾客一般会介绍当季新品，或会询问顾客喜欢哪种口感的饮料然后进行推荐，推荐糕点与推荐行销是不能减去的步骤，这是为了扩大咖啡以外的其他产品的销售，尤其是糕点，大部分糕点的保质期只有一天，若当天没卖完，是要全部扔光的。对于门店来说，这一部分又是创收的重要部分。但推荐糕点的时候是有严格要

求的，必须在糕点前加上形容词，而且不能一直推荐同一样糕点，比如第一位顾客向他推荐了“好吃的牛肉芝士可颂”下一位顾客就要推荐“香甜的蓝莓麦芬”等等。

一位好的收银绿围裙不仅能因为点单速度提高收益，而且可以最大限度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当季饮品、糕点、周边产品、星享卡的消费等）。

致谢与指引买饮料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致谢。

笔者为了更好的说好这段复杂的话，于是自己梳理了一遍点单话术“hello 你好，请问有星享卡吗，可以帮你积分哦，星享卡里有什么券，需要使用吗。请问先生/小姐贵姓，想喝点什么呢，要不要试试 XX，是否需要搭配好吃的 XXX，你点了 X 杯 X 饮料，总共 X 钱，收 X，找 X，你的小票与零钱，是来休息的吗（交流），请在左手吧台取，谢谢。”但很多顾客会在绿围裙说这么打断话中途打断或烦躁不堪，因此回应就会变成“哦，不需要，不要，都不要，麻烦快点”，或者“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没有，不要，没有。”

但由于星巴克门店的顾客越来越多，很多门店用点单时候的号数来代替对顾客姓氏的询问，用“No.”替代原先的“X 先生/小姐”，不知道这点星巴克会不会知道，是否违反了 be welcoming 的价值观原则，因为这项里有要求“透过客人所点的饮料及姓名记住他们。”

由于点单是最直接接触顾客的，所以是工作中遇到最多趣事的环节，这些趣事很多都是消费者闹得笑话，所以这些常常会成为绿围裙间的八卦（详见 4.5）。

### 3.2.5 杯子：专业化操作的建构

“越是看不懂的，越是觉得厉害。”

——星巴克消费者对星巴克杯子的看法。

星巴克的杯子是星巴克的象征性形象之一，也是凸显星巴克专业化的窗口之一。在星巴克很多内容中文化的背景下，杯子还是沿用了美国杯子的计量与标记方式，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凸显国际化气质，另一方面构建出专属自己的解释话语权。这部分是很多消费者看不懂却被吸引的地方。

杯子分为四个杯型，以热杯为例：小 Shot 8oz，中 Tall 12oz，大 Grand 16oz，超大 Venti 20oz；分为两大类：热纸杯与冷塑料杯；分为两种颜色：平时的白色与圣诞节期间的红色。杯身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前方的圆形绿色 logo，背面的 Starbucks 和六个小方块栏（规则栏）以及饮用热饮的注意事项。

收银区的绿围裙除了要点单，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标记杯子，被称为“码杯子”（Mark cup）。对于绿围裙而言，杯子相当于 Menu，用来记录所有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的信息（姓，性别，杯数）。而消费者的需求按照六个小方块来标准化，六个小方块的写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书写顺序可以按照绿围裙自己的习惯来。因此，无论绿围裙去哪个门店工作，即使是第一次合作的伙伴都可以看懂标记，正确制作饮料。

六个小方块从上到下分别为：

Decaf, 咖啡因。正常咖啡因，不需要标注；1/2 咖啡因，用 1/2 标明，低咖啡因直接画 X；

Shots, 指的是咖啡量，每一种类型的咖啡都有规定的 shot 量，若消费者没有增减的话不需要填写，默认为正常熟练，比如一杯拿铁的 shot 为 1, 1, 2, 2，而一杯美式的 shot 为 1, 2, 3, 4；

Syrup, 糖浆种类，每个季度星巴克都有至少五种口味的糖浆，如常见的榛果、香草、原味糖浆、蔓越莓糖浆等，还有季节性的如太妃榛果糖浆，白摩卡等；

Milk, 牛奶。默认为全脂奶，豆奶 S，脱脂奶 N，有的消费者还会点一半豆奶一半全脂奶 1/2 S；

Custom, 顾客需求栏，如低温 K，加奶油 CM，去奶泡 F 划掉等等；

Drink, 咖啡名称，美式 A，拿铁 L，卡布奇诺 C，冰摇柠檬茶 BTL 等等。

第一栏的左侧空白处用来写消费者的姓，然后用“S”和“M”来分别表示先生与小姐，接着用在之后用“x 数字”来表示杯子数目。除此之外，还要求绿围裙在这些内容下方画上爱心，笑脸或其他图案，这样做是为了让消费者感受到来自星巴克的温暖。（为此，笔者在星巴克打工期间，还特意练了一些小表情的简笔画。）

码杯子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当一位顾客买了多杯不同种类的咖啡，需要绿围裙加以区分。绿围裙通常会使用封口条的数量不同来区分，但一些顾客会要求更准确的区分，比如用中文来标记。因此有些绿围裙会用中文的简称在杯子上进行区分。但是，除非顾客特别要求，所有的标记都必须用英文字母，否则将受到严重警告与严厉批评。

笔者刚刚开始码杯子时，总会出各种错误，而被其他绿围裙不断警告。

比如写错标记，顾客要求去奶泡，结果笔者头脑短路忘记了应该怎么写，为了方便直接写了“去奶泡”三个中文，想着放在做咖啡的伙伴也是中国朋友嘛，都是看得懂的，结果，被吧台伙伴喝退，进行严厉教育：

“‘去奶泡’谁写的，什么意思，谁教你这样写的，XXX 看你的徒弟在做什么，她竟然写了‘去奶泡’拜托教育好来好吗？！”

然后笔者的师傅拿着笔者标错的杯子问笔者：“‘去奶泡’要怎么写？”

“F 划掉。”

“你不是知道吗，那为什么写中文？”

“想不起来了，一着急，就直接写了。”

“不要给我丢脸，昨天的课白上了吗，给你的内容背了没有，好歹是个研究生，再标错就去抄一百遍！”

然后重新拿一个杯子给笔者重新 Mark。

### 3.2.6 Call 杯

Call 杯，顾名思义就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将杯子上的信息说出来。星巴克要求绿围裙要用英语来 Call 杯，因此记住星巴克所有饮料的英文名称以及配料的英文名称非常重要。

比较常见的三种基础咖啡：Latte，CaCCuccino，Americano。他们的 Call 杯十分简单比如大杯的 Latte，“Grand Latte”。星冰乐的英文：FraCCuccino blended beverage，如抹茶星冰乐，call 杯为“Grand green tea fraCCuccino blended beverage”。冰摇茶的英文：Ice shacken tea，如冰摇芒果木槿花茶，call 为“Iced Hibiscus Mango Juiced shacken tea”。

如果杯子边上的六个小格子都码了字，那这杯饮料 call 起来将会非常复杂。

Call 杯不仅需要收营台的绿围裙 call 给吧台，还需要吧台的绿围裙回 call 以确定点单的正确性。由于现在星巴克的顾客人数越来越多，Call 杯这个原先必不可少的环节似乎已经被选择性忽略了。

### 3.3 绿围裙上线

星巴克通过文字、规范、师傅、层级检测等方式，对新晋绿围裙的身体、话语与价值观进行初级规训，然后通过不断的考核与实际操作来固话这套标准与规则，将其内化为绿围裙自身的潜意识行为，即只要在星巴克门店这一空间中，遇到不同的问题会有相同的反应，且每一位绿围裙都同样如此。

新晋的绿围裙在一个月内需完成以上三大部分的学习与考核，同时每天都要完成相应的实践与能做的工作内容。除去课程与实践，日常的工作内容也都是规定好的，对于新晋绿围裙而言，不出错的办法就是严格按照规定做事。

新晋绿围裙的工作主要包括每八分钟收拾一次外场，需要拿着盆子和消过毒的抹布，深色抹布为外场抹布，浅色抹布则只能擦拭吧台。在工作间有每一次收拾外场的重点工作内容（扫地、擦玻璃、补料理台的料、换垃圾袋）用夹子进行标记，每做完一项，就将夹子下移，以提醒顺序。收拾外场的顺序不仅有要求，路线同样是规定死的，按照门店的流线型路线进行。如果没有按照这一线路进行，其他前辈绿围裙都可以进行警告式提醒，除非出错的是很资深的绿围裙。

除收拾外场工作以外，糕点台是新晋绿围裙最常负责的工作区域，主要负责帮收银台的伙伴取拿顾客点的糕点，按要求加热、堂食或打包；展示柜糕点的补货；展示区以及糕点加热区的清洁工作。这两项工作是最基础绿围裙的日常工作，其他区域工作的绿围裙都可以给这两项工作的绿围裙以反馈指导。

由于笔者最新晋的绿围裙，因此每一位比笔者先进的绿围裙都有权力反馈与指导或要求笔者的工作。于是无论是资深绿围裙，还是比我早去了一个月不到的绿围裙都喜欢无时无



刻“指导”笔者的工作。

在最开始两周，笔者除了上课学习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以上提到的收拾外场、补料与糕点区。由于笔者所在的店外场大概 200 平方米，所以外场的工作量很大，店长定的收拾外场的时间为 8 分钟一次，收拾外场要按照要求，从吧台拿盆子和消毒过的抹布出发，往右手边靠玻璃幕墙一册开始逆时针绕圈，所走线条覆盖了每一片区域的每一张桌椅，最后擦完两扇门回到吧台左侧进入后台处理垃圾与杯子、餐盘等。于是在最开始两周里，笔者每八分钟就可以听到至少三位伙伴喊“XM，外场！”或“XM，八分钟！”，在每天中午高峰期的时候，值班经理干脆把外场 8 分钟的计时器挂在笔者围裙的口袋里。由于外场实在太大，就算是一天只在门店，不去其他地方，笔者的步数都平均超 9000 步。所以，笔者通常会以桌面上的垃圾或不整齐的桌椅为导向来灵活选择收拾外场路线，但是，总会各种绿围裙警告“XM，你那边收拾了吗？”“你怎么不走那边，不要偷懒，请按照要求走。”

### 3.4 新晋绿围裙的烦恼

#### 3.4.1 被重复指挥

因为每一位绿围裙对新晋的绿围裙都有指导的权力，所以对于很多被“指导”过的绿围裙都不会放过这样一次展现自己专业度与权威性的时刻。因为笔者是门店最新的一位绿围裙，所以每一位绿围裙都有权指导笔者。所以每一位绿围裙都想通过对笔者的监督与教导，发表一些对的或错的指导或要求甚至是批评，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有一次，一位顾客点了一份红豆松饼，需要加热堂食，于是笔者按照书本与师傅教的加热之后装在小碟子中，然后放进餐盘，同时摆放了叉子、刀子与湿纸巾，还没拿出出餐区（吧台工作区划分详见附件三），一位伙伴警告说“XM，不要放刀叉呀，松饼有什么好切的直接用手拿了吃呀。”于是笔者把刀叉放进了围裙口袋，还没走两步，被师傅叫住“我上午怎么和你说的，堂食糕点刀叉都要放！”于是笔者默默的将刀叉从口袋掏了出来，就在出完餐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的时候，另一位绿围裙伙伴语重心长的对笔者说“XM，以后湿纸巾不要主动拿，顾客问你再拿，要节约成本。”

虽然星巴克对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制定了细致的规矩，并且按照规矩对绿围裙进行系统的规训，但是，规矩在执行过程中是怎么被理解，怎么去操作的却是因人而异的。

按要求，为顾客打包糕点，绿围裙是需要戴上一次性手套进行打包，之前笔者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但有一次收拾外场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位绿围裙为顾客打包糕点并没有戴一次性手套，笔者内心暗暗记下，于是在下一次打包糕点时也选择性遗忘一次性手套，结果被这位绿围裙看到了，被狠狠批评了一顿，甚至直接将笔者打包好的糕点扔进了垃圾桶，并强调卫生与标准操作的重要性。

#### 3.4.2 克服消毒水

对于餐饮行业从业人员而言，消毒水是躲不过的问题，星巴克的绿围裙也同样如此，星巴克的消毒水至少有 5 种，用于不同的地方：抹布、洗碗机、咖啡机等。消毒水的破坏性是每位绿围裙需要去适应和克服的问题。消毒水的浓度不会因为绿围裙身体是否能够接受或消毒水是否会造成绿围裙皮肤过敏等问题，而更换或调整消毒水的品牌或浓度。

由于每天都要频繁接触消毒水和各种清洗剂，新晋绿围裙的手会出现干裂、脱皮、红肿甚至更严重的过敏现象。这种对消毒水的身体反应持续时间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体质。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消毒水，我的手痒的不行。最开始的时候，我和你一样天天收外场，每天下班后手都是又红又肿，持续到你来，我不怎么收拾外场。现在虽然没有原来严重，但开始脱皮。有的伙伴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我希望我可以快点结束这样的状态。”

（引自绿围裙的叙述）

笔者比这位绿围裙伙伴要稍微好些，只是在整个田野调查期间手都是出于脱皮和开裂的状态，每天下班后都要用大量的护手霜来缓和开裂状况，但一度出现因为脱皮太厉害导致无法吸收的状况。看来笔者不太适应太强烈的消毒水。

### 3.4.3 学会偷懒

偷懒是绿围裙隐藏的重要技能之一。星巴克对正式绿围裙的工作时长要求为一天八小时，做五休二，对于兼职绿围裙要求工作时长达 86 小时以上，而对实习生绿围裙的要求则在 126 小时以上。在工作时间内，绿围裙都是站立工作，在外场的绿围裙是不允许坐着休息的，需要不断进行点单、做咖啡、清洗、补料等工作。在星巴克门店中，男生与女生的比例基本持平，在笔者所在门店中，男女比例为 1:1，但是并不会因为是女生就可以获得更轻松工作的权力。在门店的工作说是体力活也不为过，所以学会找空闲休息，是保持工作体力的重要方式。

笔者刚刚进入星巴克时，一天 8 小时站下来，腿简直是要废掉的状态，一步路也走不动，在与绿围裙伙伴沟通自己状态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安慰，“要学会偷懒，只是不要太过分，不要在区经理巡店的时候休息。”

“在没什么顾客的时候，门面上留三个人就够，你可以和 F（值班经理）申请喝水，上厕所，或者说就要休息，就去休息好了。反正办公室里可以看到吧台（监视器）的情况，人多再出来就好。”但是，笔者知道这只是安慰，因为每次顾客少时，笔者像 F 申请休息片刻的时候，F 都会谆谆教导，让笔者坚持，除非是喝水或者上厕所，但每次笔者申请上厕所或喝水，F 都会直接告知“5 分钟”。有一次笔者因为找不到 F 直接去了厕所，回来之后直接被 F 点名批评并不断强调“离开吧台时必须告知 F，否则会影响大家工作。”

身体对工作强度的适应绝不是趁着空闲休息一会就行，还有身体素质的加强。星巴克的体力活不仅是站立，还有就是倒垃圾和补牛奶。补牛奶的动作被绿围裙称为“ang 牛奶”，一次能“ang 牛奶的瓶数多少”不仅显示出绿围裙的力气，往往也显示了绿围裙的资深度，一

般默认工作年限越久的绿围裙能“ang”的牛奶越多，因为肌肉就是在不断“ang牛奶”的过程中被锻炼出来的。

Ang牛奶对于笔者而言，简直是噩梦，根本不合适笔者这个力量级的绿围裙，因为一次也就能ang10瓶不到。不仅如此，一开始笔者对于大桶的垃圾都束手无策，每次清理垃圾袋的都需要花费全部力气，才勉强将塞满的垃圾袋拿出垃圾桶。其他绿围裙经常嘲笑和安慰笔者“你这个细胳膊细腿的，现在拎不起也正常，等过个几星期，不要说着一袋垃圾了，让你一次拎几袋都没有问题。就连牛奶都可以多ang一点。”但另一位绿围裙伙伴马上小声对笔者说“不要听他们说，垃圾换换就算了，ang牛奶嘛，能偷懒就偷懒。”

#### 3.4.4 “全景式监视”：神秘顾客

“神秘顾客”是由星巴克上海总部招募的一些评估门店服务态度、按规章制度服务、饮料口感、饮料速度、门店卫生等等的特别顾客。神秘顾客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他们往往带有全景式监视的“功能”，不像摄像头位子的固定，绿围裙对神秘顾客是无法完全掌握的。但“神秘顾客”的打分对于门店绿围裙而言相当重要，影响着他们的绩效考核与每月奖金，如果被“神秘顾客”打了低分，则会受到直接的惩罚：奖金取消。

因此绿围裙脑袋上都像安装了天线般，对神秘顾客保持百分的警惕。当判断对方可能是神秘顾客的时候绿围裙伙伴往往会非常小心认真的按流程操作，并且会非常注意交流。

“一定要注意‘神秘顾客’，平常出错就算了，要是被他们抓到了，你一个实习生不要紧，我们就惨了。”

“点单话术请说完整好吗？！被‘神秘顾客’抓到漏洞，我们奖金就都没有了！”

“拜托你奶泡打的用心点好吗，练练拉花，就你这饮料，‘神秘顾客’一拍一个准，你是来坑我们的吗？”

每天都有绿围裙对笔者各样操作的进行提醒与警告。有段时间，笔者一度担心坑了大家而高度警惕。

但绿围裙对“神秘顾客”的判断与应对方式也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方法，“常客肯定不是，两个人以上的肯定不是、直接说想喝什么饮料的也不是。”

“如果进门的时候，看到一个生面孔，还拿着手机，一进门就盯着我们吧台的，一定要大声说‘hello，你好’，省的一进门就被‘神秘顾客’扣了大分。”

“特别要小心一进门就随处看的生面孔，点单的时候手机拿在手上（需要录音），不主动说话等你开口的（看点单流程），盯着你点单、mark杯子与做饮料的、面对吧台坐下，打开咖啡盖子拍照的……”<sup>20</sup>

但为了节约成本“神秘顾客”这个神秘的打分人已经在2015年年底被取消了。为此，绿围裙们都长舒一口气，之前严苛要求的交流、流程等也都放松了很多。

<sup>20</sup> 绿围裙自己总结的一套判断顾客是否为神秘顾客的方法。

之前对笔者的严苛要求，立马变成了：

“点单说那么多话干嘛，没看这边排了这么多人吗，现在没有‘神秘顾客’了，请灵活调整点单话术好吗？”

“拉花做什么咯，赶紧倒呀，没看到这么人在等吗，拜托加快速度好吗，不然就不要来吧台啊。”

看来通过监察方式对个体进行的规训，只要这种方式消失，规训好的身体与思想就会很快的回复到自己舒服的状态，甚至是规训前的状态。

## 第4章 星巴克的绿围裙

通过一个月持续的对绿围裙的规训，基本可以获得一位符合星巴克规则的，在话语、行为、身体连同思想上都较为专业化的绿围裙，但实践过程也才刚刚开始。绿围裙与伙伴之间的关系，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与星巴克整体空间的关系，是否会像星巴克所建构出来的那么专业化与标准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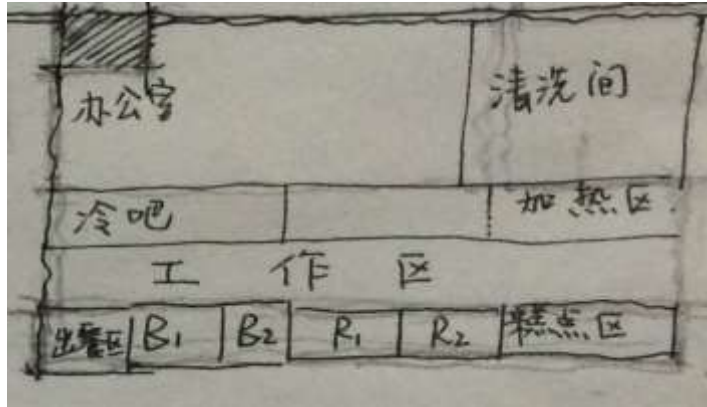
### 4.1 绿围裙的属性

星巴克有一套规训绿围裙的方式，绿围裙也有一套自己对于星巴克这份工作的需求。规训方式自上而下的规范着绿围裙的价值取向与一定空间内的话语与行为，绿围裙自主的选择与意义建构却影响着绿围裙相互间，以及与星巴克间的关系与互动。

在绿围裙“隐藏”下的身份十分多元，他们可能是富二代、官二代、退伍军人、大学生、研究生（除了笔者还有研究生）或是普通学历，没有工作经验等等都不会成为你进入星巴克的门槛，同时星巴克也会聘用有些缺陷的“特殊伙伴”。绿围裙普遍都是年轻人，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发现星巴克并没有刻意强调绿围裙的年龄，但来投递申请的候选人却几乎都是品均年龄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虽然绿围裙的身份十分多元化，但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因为你的身份而不同，相反，每一位绿围裙所要做的工作都相似，只会因为某个时段被安排的岗位不同做不同的事情，但岗位却不固定，轮流着来。不仅不区分身份，而且不区分等级，只要在门店，不论你是店长还是副店长，你仍旧可能会被安排去扫地，倒垃圾。

星巴克门店的绿围裙工作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无论你是全职还是兼职，无论你是店长还是普通伙伴，这些工作你基本都会做到。



(注：门店吧台布局平面图)

**F:** 值班经理，早班一位，晚班一位，F 安排统筹整天的工作以及当天上班伙伴的工作岗位，负责外场和处理紧急事项等。F 是需要通过门店值班经理的相关培训与考核才能担任此项工作内容；

**R:** 收银台伙伴，负责点单与收银，顾客不多或伙伴不多的情况下还会负责糕点柜，根据收银机的数量来安排，主收银被称为 R1，辅收银被称为 R2；

**B:** 吧台咖啡伙伴，负责咖啡的制作、打包，一般会安排两位 B1, B2, B2 被称为辅吧，顾客多的时候与 B1 一起制作咖啡，顾客少的时候给 B1 打下手：配奶，打包，制作冷饮台的饮料。

每位绿围裙任何一个工作环节都可能会犯错，但星巴克对这些除原则（偷盗，辱骂顾客）外的错误都是宽容态度。虽然星巴克对门店中的绿围裙采取的是基于全景式的层级监视，但监视的作用在于纠正错误的行为和话语，将身体关在规则之内，制作出星巴克需要的专业化身体。但并没有人会因为错误而从身体上火经济上处罚绿围裙。

绿围裙之间亲密的关系与信任感是很多绿围裙愿意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亲密关系与信任感来自于绿围裙的规训方式。每一位绿围裙都会有一位师傅，师傅对绿围裙的教导与帮助以及批评，都会在绿围裙与师傅间形成一定的信任感。工作的高强度，和各种奇葩顾客给与了绿围裙之间交流的谈资，当大家的吐槽对象一致时，往往会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秘密，而秘密增加了伙伴间的亲密性与信任感。

规训的存在即使有赤裸裸的监视与检查，但在星巴克，这套规训依靠对咖啡师专业度的要求，使得这套规训方式被绿围裙自发内化的接受并自主的去寻找这种专业度。不仅如此，星巴克的福利也是赢得绿围裙忠诚度的重要方式。

除了之前提到的每工作满四小时一杯免费含咖啡因饮料（详见 4.2 “绿围裙的隐藏菜单”）还有一些专属绿围裙的福利，比如纪念星享卡，工作满三个月并且满足 80h 工时的绿围裙可以获得一本 20 张的免费中杯星享券，生日蛋糕券，以及新品的免费品尝权。区经理

以及店长都会给过生日的绿围裙准备独特的与星巴克相关的礼物。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所在门店的一位绿围裙过生日，区经理将自己陪嫁的收藏了近 6 年的星巴克城市纪念马克杯送给了她。

星巴克为了留住优秀的，想要更好的发展的绿围裙，在绿围裙完成一个月的学习和考核后，会给绿围裙规划三条发展的道路：管理方向（值班经理、店副理、店长、区经理……），咖啡制作方向（绿围裙、资深绿围裙、不同星级的黑围裙、咖围裙等）以及总部（行政等）方向。

星巴克粉丝的简称，很多绿围裙自己就是星粉，当星巴克新出一些杯子、星享卡等周边的时候，他们都会主动掏钱来买。比如 2015 年圣诞季星巴克与安娜苏合作的杯子，与施华洛世奇合作的星享卡，绿围裙在出这些产品前就开始等待，出来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买下他们，即使还不能享受员工折扣价。

## 4.2 绿围裙的隐藏菜单

“星巴克的隐藏菜单真的存在吗？”（引自知乎某网友的提问）

所谓“隐藏菜单”，指的是星巴克菜单中没有的，但可以利用星巴克店内的食材制作出来的饮料。其本质是通过改变甜度、变化糖浆、变化浓度、变化牛奶等来产生菜单以外的饮料。因为绿围裙深谙星巴克内的每种饮料制作方法，以及每种配方，所以通过随意的搭配，就会出现多种菜单以外的饮料。比如浓缩康宝蓝，浓缩玛奇朵，冰摇木槿花芒果茶等等。

每位绿围裙只要工作满四小时就可以免费喝一杯含有咖啡因的中杯饮料，被称为“随行饮料”，随性饮料只能由自己以外的其他绿围裙伙伴进行制作，所以当绿围裙在点随行饮料的时候，总是可以听到些很少听过，甚至从没听过的配方。

比如含蔓越莓糖浆的任意饮料，有关他配方的饮料均没出现在菜单当中，但很多绿围裙喜欢这种糖浆的风味，所以常常可以听到绿围裙这样点一杯咖啡：“我要一杯意式圣诞拿铁，不要圣诞糖浆，要放蔓越莓糖浆，然后不要奶油，多糖粒。”（按照这一要求做出来的咖啡，会呈现出少女般的粉红色，但笔者觉得味道实在像是在和止咳糖浆。）或者红茶/抹茶拿铁加一半咖啡，或者美式 4 个 shot 全冰，或者本周咖啡一半加满奶油，或者冰摇柠檬茶，用木槿花茶（这样做出来的冰摇柠檬茶会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有些一些门店的绿围裙会私下喊这种茶为“少女”）。

有时，“隐藏菜单”会被绿围裙伙伴们取各种有趣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名字，咖啡的制作也可以体现一位绿围裙对伙伴的关爱。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一位其他店的副店长即将离职，她的绿围裙伙伴都十分用心的为她制作她最后的几次随行饮料，比如他们自创的“少女”“粉红色的回忆”“热恋”“失恋”等等。

不仅如此，当绿围裙卸下围裙，自己花钱买星巴克的时候，他们更喜欢所有不含咖啡的饮料，比如冰摇柠檬茶，但他们的要求比较“奇特”，“冰摇柠檬茶，去冰，去茶。”其实

最后得到的是一杯纯的柠檬汁,但只要一听到这种要求,任一家星巴克的大多数绿围裙(除去新人)都会知道这是“自己人”。

除了“隐藏菜单”可以让绿围裙彼此确认身份以外,还有一些“行话”。

### 4.3 绿围裙之间的“行话”

“行话,指一定的社会群体,由于工作、活动或其他目的共同性,在相互间交往交流时,创造、使用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词汇、用语或符号。”<sup>21</sup>

——百度百科对“行话”的解释

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本能的文化性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判断说话者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由语言模式来决定的。显而易见的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的差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而人的所言、所想、所为构成了这个人所在群体的文化。绿围裙在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些内部才听得懂的话,在日常沟通中绿围裙很乐意使用这些行话,用来区分群体身份的边界。“隐藏菜单”也是行话的一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行话,即使是没有穿绿围裙,也可以被其他伙伴识别出来。

#### 4.3.1 “我想去买菜”

这是收银区伙伴的“行话”,指的是去银行缴款,缴款要求不能懈怠任何有关星巴克 logo 的物品,每天的买菜路线不能相同,若碰到打劫的,钱全交,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买菜”是很多绿围裙喜欢的工作,因为是难得的在工作时间内外出放风的机会,如果碰到银行人多的时候,可以坐着休息很久,且在这段时间可以远离店里忙乱的杂事。因此,买菜时间应该被安排在消费者不多的时候。

#### 4.3.2 “千万不要说怎么没有人”

笔者打工期间,这家店的高峰期出现在 8:00~10:00, 11:30~14:30, 5:00 左右,尤其是午饭之后的时间,门店超级像菜市场,大厅坐满了人,吧台聚集了大量点单和等饮料的顾客,这段时间内哪哪都是人,这个时间段也是门面最多绿围裙的时候,一般会在咖啡吧台与收银台各安排一位十分熟练资深的绿围裙,然后在辅吧也会安排经验相对丰富的绿围裙,而像笔者这样的小菜鸟,在这个时间段一般只能协助预点单,招呼高架,大包和收拾外场,而且还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被周围所有的绿围裙责骂。

顾客多的确会带来巨大的工作负担,并不是每位绿围裙都希望自己的门店来很多顾客,因为顾客多意味着自己的工作量要增加,但自己的工资却不会相应的增长多少。对于站在吧台后的绿围裙而言,一批批的消费者就像植物大战僵尸中的一大波袭来的僵尸。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没消费者而苦恼,而是因为害怕说这句话会引来一大群的消费者。

#### 4.3.3 “我要去‘支援’”

所谓“支援”,指的是一家门店的伙伴临时去另一家门店上班。因为几乎每一家门店的

<sup>21</sup> <http://baike.baidu.com/view/568998.htm>

吧台布局都相类似，工作内容相同，所以即使是第一次去陌生门店支援的绿围裙也可以马上开始正常工作。支援不仅是因为人手不够，而且也是为了不同门店之间更好的交流。“支援”成为了绿围裙通过工作来认识新的工作伙伴的重要途径之一，也被一些绿围裙看成了重要的放风时间。这样的“支援”时间不会很长，一般是一天。

#### 4.3.4 “X先生/小姐中了‘CV’”

“CV”指的是在买单时，电脑随机出的“买一赠一”小票，但需要按照小票上的要求上星巴克的网站填写调查问卷后才可生效。这是为了评估一家门店的服务与饮料质量，促进门店的优化。但绿围裙们在与顾客讲解的时候只能把这张小票称为“CV”，不能出现“买一赠一”这样的字眼，以误导消费者这张“CV”的目的与要求。经常出现绿围裙不断的给消费者解释“CV”这个字眼的意义，但是消费者仍然一头雾水，直到反应过来其实是“买一赠一”才明白过来。

### 4.4 绿围裙的八卦

Herzfeld 多次提醒人类学研究者要注意田野调查时听到的“流言蜚语”，即重视对田野中“八卦”的研究。“八卦”是某一社会特定群体之间产生的较为私密的话语，这一私密话语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活信息，同时也圈定了话语共享者的身份认同。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意识的收集者来自绿围裙的“八卦”。只要有绿围裙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各种“八卦”，这些“八卦”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别：

#### 4.4.1 关于顾客的八卦

这些顾客又被划分为以下几类：（注：双引号楷体部分为绿围裙们的原话）

##### 4.4.1.1 “不懂装懂的顾客”

绿围裙对这类的顾客都十分不屑，也是绿围裙们私下最喜欢的嘲讽对象。

不懂装懂的顾客指的是那些在绿围裙看来并不懂咖啡，却装作自己很专业的样子来各种挑衅或为难绿围裙的顾客，他们会通过强调配方的要求来显示自己懂行，或者会用很奇怪的语气语调来评价。

“有一些顾客点拿铁，总喜欢加一句‘不要加糖’。当我提醒说，‘拿铁里面没有糖，只有咖啡加奶’时，他还要硬说‘那之前喝的星巴克拿铁都那么甜’。‘拜托，他喝过拿铁吗？’哪有拿铁加糖的呀？”

“有些顾客以为拿铁指的是咖啡加奶，然后自以为是红茶拿铁也是如此，就是咖啡加奶加红茶，但其实里面是红茶加奶，结果在喝了第一口之后就责问我们，‘怎么没有咖啡味，为什么不加咖啡’然后要求我们重做。对于这样的顾客，我心里一百条草你马在草原上奔过”。

##### 4.4.1.2 “喜欢装逼的顾客”

这类顾客是绿围裙八卦的重要资源。星巴克被网友评为装逼胜地，拍照强调与星巴克的故事已是很常见的，但还有更高端的装逼方法：比咖啡师更懂咖啡。



有一次笔者在店里上班期间，大概下午 4:00 左右，有一位 30 多岁女顾客，和几位朋友一起来星巴克，点了一杯单份浓缩咖啡，就去找位子坐了。因为店里的 shot 小马克杯没有了，绿围裙用了最小号的纸杯用来装她的单份浓缩咖啡，在出饮料区喊了几次她都没有来取，大概 10 分钟左右她突然出现询问她的浓缩咖啡，绿围裙指引了放在吧台的小纸杯咖啡，她直接怒了，指着绿围裙厉声指责道，“这就会浓缩咖啡，你们逗我的吧，放了这么久冷了不说，有用纸杯装的吗？！”然后笔者师傅（资深绿围裙）连忙解释“我们给你重新做”然后把小纸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去消毒柜里去了小的 shot 马克杯，滴完 shot 后放入小磁碟里，递给这位女士，女士扑克脸的端走，笔者趁机收外场跟在她附近，听到她对同行的朋友说，“现在星巴克太差劲了，那个纸杯给我装浓缩，都是冷的怎么喝？！”笔者回到吧台，复述了女士的评价，师傅说“装逼呗”。

还有些顾客对饮料的制作要求很“苛刻”，是因为“自己讲究”，“不想和别人一样”，“只不过是自己的喜好”。比如“冰美式，只要三块冰。”“太妃榛果拿铁不要糖多奶油（不要糖是因为怕胖，多奶油是因为喜欢吃奶油，但是太妃榛果拿铁这类的咖啡，太妃榛果风味不是来自咖啡和牛奶，而是来自糖浆，如果不加糖的话，就等于是普通拿铁加奶油了，所以这时绿围裙往往会告知这点，然后减量加糖。）”“拿铁里 1/3 豆奶，1/3 脱脂奶，1/3 牛奶”等等。

#### 4.4.1.3 “故意惹事却懂得星巴克规则的顾客”

这类顾客是绿围裙最害怕的一类。他们需要的是完全被尊重，甚至是被绿围裙捧着，觉得星巴克的高消费意味着高水准的服务，必须严格遵守国外“顾客是上帝”的信条处事，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服务。

这类顾客被绿围裙称为“没有人性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懂的什么事是可以并且能够成功投诉得到好处”，往往会以“服务差”“没有和我打招呼”“没有告诉我什么咖啡好喝”“没有提前或推迟十分钟开关门”等理由进行投诉。一旦门店吃到一次投诉，意味着这个月所有正式员工的奖金全部取消。

这部分的顾客当中还有一部分难以拿捏的顾客。这部分顾客被认为“对咖啡的味道有着‘奇怪的要求’”。

“有位顾客点了太妃榛果拿铁，结果第二天以‘咖啡味道不合口味，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对门店进行了投诉，导致门店店长特意联系这位顾客，给予赔礼道歉，并递给歉意劝（任意免费中杯饮料）。”重点是“他说我没有告知他这个味道他不喜欢。”绿围裙吐槽该顾客道，“他说他要喝圣诞新品呀，我说这款卖的最好，我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要选的，又不喜欢，怪我咯。”

#### 4.4.1.4 “行为奇怪的奇葩顾客”

这类顾客的存在倒是给绿围裙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与苦恼。行为奇怪的奇葩顾客比

如有专门来星巴克睡觉的，点果汁要加热且要杯子的，只要 w 自己看中的绿围裙给自己服务，在星巴克吃瓜子、板栗直接吐地上的，五个人买一杯饮料加一块蛋糕占一个下午位子外带食物聚餐的，喜欢在座位周围打转转的……

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有一位被绿围裙们评为奇葩顾客之最的，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真的是行为奇怪到很想找他多聊几句，可能由于他来的次数太多，认定了笔者就是绿围裙，就算笔者平时穿着自己的衣服来试图找他聊天的时候，他都显得万分谨慎。他是一位网络小说写手，没有单位，自由职业，来星巴克一是觉得星巴克的沙发很好坐，空间很亮，而且觉得人多他待着比较舒服，并且也有很多写作素材。他几乎每天都会在上 10:00 左右出现在门店，12:00 左右消失半小时，12:30 左右开始找一张沙发靠着睡觉，然后下午 4:00 左右离开。他每次来都是穿着蓝色的夹克，背着一个灰蓝色破旧的书包，一台电脑，有时拿出来放桌子，有时就放在地上，头发揪在一起看起来像很久没有洗过。他来星巴克只消费过两次，一次买了一杯大杯拿铁，喝了一会就把剩下的打翻在地，然后把一位绿围裙伙伴叫道桌子边，要求收拾好之后重做一杯给他，第二次点了一块芝士蛋糕，同样，吃到一半掉到地上，然后拿着粘着头发和灰尘的蛋糕举到绿围裙伙伴面前，要求赔偿一块新的蛋糕。而其它大部分时候，他都会拿着一个塑料蓝色葫芦形杯子要绿围裙们给他倒白开水喝，并且必须先倒下半个葫芦杯的凉白开，再倒上半个葫芦杯的热开水。有一次有位伙伴因为先给他倒了热开水，他直接要求倒掉重装。

#### 4.4.1.5 “星巴克的第三只手”

由于星巴克的门店属于半开放性，除了有几个摄像头外，没有其他的监控方式，且监控内容并没有时时有人盯着。并且一天之内存在明显的高峰期，因此在高峰期往往会出现“第三只手”：小偷小摸的顾客。

笔者打工期间，这家星巴克共遭遇了三次偷窃。偷窃主要是偷高架的杯子，时间往往在中午高峰时间，绿围裙们没法注意到队伍人墙后的时时情况，所以发现时间往往是每天的 F（值班经理）盘活的时候发现少了东西而去调视频查看，然后会把这些视频传到微信群和附近店长微信群，以注意此面孔。

#### 4.4.1.6 “内心阴暗的白领”

绿围裙们对这类顾客嗤之以鼻，讨厌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三只手”。“就是因为知道楼上这群小白领内心有多阴暗，所以我才更不想成为格子间里的白领。”

曾经绿围裙们曾轮番给笔者上了一节名为“阴暗小白领”的课，大家讲述了现在或曾经遇到的各种“内心阴暗小白领”，如半上午半下午带自己空杯子来辅吧倒牛奶的、专门拿吧台纸巾的、拿吧台糖包的……“这些都不算什么，还有一位女性小白领，在大白天，有计划的顺走了别的顾客落在凳子上的手机，而且还淡定的坐在位子上大半天若无其事的离开。”

“原来我在另一家店上班的时候，”一位绿围裙在说到专拿星巴克糖和牛奶的顾客时这样说

到，“我们把这些直接叫做‘拿糖的’‘拿纸的’只要一看到他们出现，我们就会说‘拿糖的/拿纸的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辅吧的大部分糖包/纸巾收起来。”

#### 4.4.1.7 “长相娇好的女性或男性顾客”

这类顾客最受绿围裙喜欢，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女生。当这类型顾客出现时，男性绿围裙总会利用各种规则搭讪，比如收银或做饮料都有交流这一项，平时普通顾客，他们都只会随意不走心交流，但一到这种时候，他们就会“交流”的格外认真，比如会问“X小姐，你的饮料正在做哦，你是新来这边上班的吗，之前都没见过你呀，你是自己来喝X咖啡的吗，男友没陪你来吗……”尽可能的增加与女生的交流时间并套出多的信息。而且“给漂亮女生做饮料都会更用心。”

#### 4.4.1.8 “熟客”

绿围裙们会用心维护与熟客尤其是物业的关系。每位绿围裙都有自己的维系熟客的方式，最常见的大致几种：1. 多聊天并记住对饮品的各种喜好，熟客来光顾会非常热情，有些只爱某类饮料的熟客，收银绿围裙伙伴都能直接称呼出对方，并正确 mark 饮料与喜好要求。2. 员工卡优惠，由于每一位星巴克的绿围裙都有员工卡，员工卡购买杯子都有 7 折优惠，因此往往利用这个优惠与一些喜欢杯子的熟客搞好关系。3. 按顾客喜好制作饮料，比如有位物业阿姨喜欢咖啡上加奶油，所以只要是点本身有奶油的饮料，绿围裙都会给她加双倍甚至三倍的奶油。4. 留咖啡渣，会为熟客留咖啡渣，咖啡渣有去除异味等功效，甚至不要熟客可以说，只要了解到最近家里装修或办公室有异味等，绿围裙便会贴心的准备咖啡渣赠与顾客。因为顾客的好评与粘合度对一个门店当中的所有绿围裙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 4.5.2 “都是被我们宠坏的”

“这栋楼里的顾客都很难伺候的，都是被我们给宠坏了。”

“除了超大杯要给顾客套好杯套外，其他杯型请让他们自己拿杯套，不要把他们给宠坏了。”

（注：笔者在田野中经常听到其他绿围裙这样互相交代）

“宠坏顾客”是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高标准严要求的超出规定的服务顾客，比如为顾客端饮料入位子，帮顾客重新摆放桌椅，给他们所需要的纸杯等等，这些星巴克对绿围裙要求以外的服务，导致顾客对绿围裙的期待过高，但同时给绿围裙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所以现在绿围裙开始严格按星巴克要求行事，不增加自己的服务，导致之前习惯被服务的顾客的不满与吐槽，甚至是投诉。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绿围裙总是“痛心疾首”吐槽这群被自己“宠坏了的顾客。”

笔者在星巴克做绿围裙期间，有一次，一位顾客点了五杯饮料和糕点，一次一个人没法将饮料拿到位子上，于是笔者帮着他一起用托盘把这些饮料和糕点拿了回去。回来之后，不但没有得到伙伴们的表扬，倒是被伙伴们联合吐槽“不要再宠坏他们啦”“让他自己端

呀”“他那边不是还有朋友吗”……

#### 4.5.3 “它们不是星巴克”

“它们不是星巴克。”这是笔者在星巴克田野调查过程中听到的最直接的身份认同。绿围裙，尤其是工作一年以上的绿围裙对星巴克的认同感不仅是对于这个品牌、企业和空间的认同，还有对自己作为星巴克一员的身份认同。

有一天，笔者所在门店副店长在办公室里和其他绿围裙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满记给我打电话，要挖我去当店长！可是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去？”

“满记算什么，不是星巴克呀，谁要去？！”

（注：来自笔者田野的一段对话）

不只是满记甜品，绿围裙也看不上麦当劳、KFC 这样同为美国连锁品牌，而且总喜欢通过与他们的对比，或者嘲笑他们来凸显自身的优越感。

笔者在办公室看到高架上放着一打黑色的绣着星巴克 logo 的帽子，很好奇的询问店里的伙伴，“我们为什么不要戴帽子？”得到的了在绿围裙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答案：

“你当我们是麦当劳吗？”

“我们不是麦当劳为什么要戴帽子？”

“千万不要让我们戴帽子，搞得我们和麦当劳一样！”

“我们是咖啡师，又不是麦当劳卖汉堡的！”

“你见过带鸭舌帽的咖啡师吗？”

“我们是咖啡师！”

“那为什么会有帽子呢，什么时候要求我们戴帽子呢？”

“平常把头发梳清楚就行。只有国家食品安全人员来检查时，才要戴帽子”“毕竟有时候会有头发在制作过程中掉进食品里，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不仅如此，伙伴们还喜好打趣麦当劳或 KFC 的门店。

“还是我们好，没有油烟。看看麦当劳他们，除了满厨房的油烟味，就是烟味，臭死了”

“麦当劳吵死了，那么多小孩子。”

“哦，我们打烊难擦的也就是糖浆和奶渍，麦当劳他们都是油烟。不要太难擦哦。”

#### 4.5.4 监控死角

监控死角只有在绿围裙们八卦的时候才会悄悄吐露的，然后大家心知肚明的在那个死角里做些不能被监控器记录下的事。

星巴克门店都会设有监控器，尤其是在吧台和办公室，在笔者田野调查的星巴克，监控摄像头总共九个，150 多平米的外场步了三个，吧台四个，办公室两个，还有一个对这两

侧的大门。吧台的监控器分别监控了咖啡台、收银台和糕点台三个区域，可以清晰的记录吧台内每一位绿围裙的操作。监控器的存在的确规范了绿围裙的操作，起到一定的“监控”作用，但同时，当绿围裙因为做饮料出了差错被顾客投诉，或收银短溢等适合，监控器内容将会被调出来作为证据。另外，监控器将门店的信息直接反馈到办公室的电脑上，这样当门店人多的时候，在办公室的绿围裙可以随时出来帮忙。

有监控视频，就会存在监控死角，指的是那些监控器拍不到的地方，监控死角是每位绿围裙心知肚明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可以放心的做一些事。在笔者工作的门店，吧台的监控死角存在于糕点台与加热台边上的区域，这个区域则成为台面上一些小伙伴悄悄放水杯，放随性饮料，放零食的地方，有些伙伴也会为了工作的方便，而在这个监控死角喝水，拿东西等等。但如果区经理或 QA 来到店里，无论多明显的监控死角，甚至在办公室，绿围裙们都会按规则做事。

#### 4.5 绿围裙的时间

对身体进行时间控制也是规训的一种重要手段，时间的控制首先表现在“时间观念”，其次是身体动作的时间规定。绿围裙的时间便是跟着星巴克门店客流的时间被切割和安排。

星巴克门店工作分为三条时间线，每条线八小时：早班，中间班与晚班，中间班一般是排比较初级的绿围裙，而早晚班一定都会有一位比较资深的绿围裙。如果把三餐时间作为人一天的三个时间段，那绿围裙的三餐时间则是依照门店高峰期的出现时间来进行调整的：三餐时间早于或晚于门店半小时以上，比正常三餐时间提早或推迟了 1~3 小时。

对于笔者所在门店的早班绿围裙而言，早上在 5:30~6:00 间就要起床，因为要在 7:00 前到达门店，50 分钟的准备时间，7:50 开店门，早餐时间要么在开店门前吃完，要么就到了绿围裙的午餐时间。因为对于早班的绿围裙而言，中饭时间会被安排在早高峰结束，到午高峰开始前。每位绿围裙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所以一般午高峰开始前所有早班绿围裙必须轮流吃完午饭。而晚班绿围裙的晚饭时间一般从 15:00 就开始到 16:30 就结束，一般在 17:00 左右就要开始“预打烊”。“预打烊”也是绿围裙的行话之一，是绿围裙应对打烊时间太长耽误自己下班前所创造的时间场域。

Timer 计时器，一家星巴克门店会有多个 Timer 计时器：外场八分钟 Timer，擦奶棒毛巾消毒柜 Timer，外场牛奶 Timer，本周咖啡 Timer 等等，每个 timer 的时间都设置好，到点就会“滴滴……滴滴”响。其中外场八分钟，外场牛奶和本周咖啡的 Timer 到点响的时候是最需要注意的，因为涉及到食品口感和门店外观。但在门店人多的时候，遇到几个 Timer 一起响叫的时候，无论是哪位绿围裙都会顺手把 Timer 关掉，先抑制住嘈杂的声音，然后从重要程度开始收拾 Timer 的监督顺序。有时甚至直接忽略。

推介：论文的第三章详细描述了外来“新村民”们自上而下的再造乡村实践。无论是政府层面的“美丽乡村”、生态文化村建设等等发展话语，还是社会力量主导的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农业、萤火虫保护、传统复兴、“乐活”等议题，纷纷在岑卜村这片土地上竞逐。在作者笔下，面对外来的冲击，本地村民在经济和文化全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第四章则以“主位视角”呈现了老村民们在生计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面前被动、无奈的状况。在周边地区的发展浪潮中，青西地区由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然而，本地村民们在参与新村民所主导的生态旅游业的过程中，也只能处于边缘的文化学习者地位。

复旦人类学 2016 级 汪醒格

## 美丽乡村：多元话语与乡村再造（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3 级 沈悦菲

### 第三章 自下而上：城里人的“造乡”实践

“新村民”是这些近几年入驻岑卜村的城里人给自己起的称呼。目前，岑卜村有四十多户“新村民”，接近全村户数的四分之一。他们在年龄上横跨二十多岁到七十多岁，来自各行各业，包括 NGO 组织、环保人士、规划设计师、房地产商、大学教授、自主创业者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新村民”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绝大多数接受过本科以上学历教育，新村民们在彼此的口头介绍和媒体宣传中都不忘时时冠以“生态学硕士”、“昆虫学博士”的头衔。根据生活状态，可以把“新村民”大致分为四类：（1）在城市有自己的主业，周末回到村子度假、接待；（2）依托 NGO 或自主创业，全职经营农场；（3）不经营农场，只经营接待；（4）主要在这里生活、养老，兼职到农场或机构打工。

不过，杨阿姨的故事让笔者意识到“新村民”身份并非仅仅依据来源这么简单。杨阿姨反复提到“我愿意回到乡下，就是因为认识了现在的这些新村民，原先这里都是老人，跟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原来，杨阿姨的老家在湖北，高中毕业后到江苏打工，离异后，她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十年前再婚嫁到村里。由于语言、文化上的隔阂，加之常年在外租房打工，她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入本地社区。直到两年前，她接触到村里的“新村民”，开始萌生自己做民宿的念头。目前她家有五间客房，主要依靠主动融入“新村民”圈子获得客源。虽然她是一名本地媳妇，却非常强调自己的“新村民”身份。这完全打破了笔者原先对本地人/外来人、老村民/新村民的简单二元区隔。“新村民”的身份既是由于特殊处境寻求的一种心理、文化归属，也代表了对村里新兴的休闲农业的态度。此外，笔者发现，无独有偶，村里还有不少像杨阿姨这样的外来媳妇。得益于她们的打工经历和特殊身份，机构通常雇佣她们参与

活动组织和日常管理，在休闲农业的实际运作中扮演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新村民”群体内部通过频繁的互动维持着一种独特的圈子文化。一方面，他们试图突破城市社会交往中鲜明的边界感，在乡村空间里暂时地营造一种更开放、温情的交往模式。

“分享”是新村民们时刻挂在嘴边并付诸实践的关键词。“新村民”之间每天都在频繁地串门，他们不仅彼此交换食材、交流种植和烹饪方法，而且时常轮流招待大家一起吃饭。刚开始，笔者很不适应这套独特的“分享”文化。某一天午饭前，一位新进村的新村民在一位定居已久的新村民的陪伴下来到杨阿姨家里考察民宿的环境布置，随后笔者跟着杨阿姨随他们一起去参观他们俩在村里新租下的房子。正巧路上遇到另一位新村民出门来借面粉，杨阿姨和另一位新村民爽快地从自家各拿出大半袋面粉。此时已临近饭点，借面粉的新村民提议召集大伙儿去他家吃饭，另两人以谈事为由拒绝了，杨阿姨却让笔者跟随那人去他家吃饭。见笔者有些踌躇不定，那人对笔者说：“在我们这里，你第一步就要学会蹭饭。新村民聚在一起，就是要形成一个共同分享的和谐社区”。然而，另一方面，尽管看似往来甚欢，新村民对彼此完整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却知之甚少。某次周末在杨阿姨家吃火锅时，两个三十来岁的新村民家庭各自带来食材，一起动手张罗，两个三五岁的同龄小男孩伴着小音箱的韵律嬉戏打闹，十分亲近。席间，笔者却惊讶地发现，两个家庭竟不知道对方平时在市区里从事什么工作。“新村民”们都习惯使用昵称称呼彼此，而从不提及真实的姓名。他们刻意地将自己的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区隔开来，通过营造一种孤立的、幻象的乡村空间，以匿名的方式暂时摆脱城市生活的束缚。

“新村民”们在强调平等互助的同时，形成了群体的内部权力结构。来自台湾的生态规划师“青蛙爸爸”是新村民里的领袖人物，他为岑卜村设计的“美丽乡村”规划不仅在新村民们圈子里广为流传，而且直接与村委密切沟通，在围绕村庄社区发展的决策中赢得了话语权。每当有记者或生态爱好者来岑卜村参观，新村民们一定会带他去拜访“青蛙爸爸”，因为只有他有资格和能力代表村庄向外人解释整个村庄的“生态”发展蓝图。其他新村民位于第二层级，他们既相互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资源，并且通过遵循共享的社会规则营造一种可供消费的、理想的乡村生活体验，又彼此独立，依靠各自的人脉、资金和特长维持着日常运作。对他们来说，眼下的乡村生活既是自身真实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也是在商业思维指导下精心运作的体验经济。相比之下，像杨阿姨这样主动加入新村民行列的老村民则处于新村民群体的边缘地位。他们缺乏前两类人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得不依赖前者获得客源以维持运作，并模仿服从前者的社会规则和话语体系，即使仍然难以摆脱原来生活方式的影响。不同于那些真正合格的新村民，杨阿姨经常在与客人的交谈中详细地讲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人生经历。如此主动、直接的泄露隐私，最初让笔者感到非常吃惊。回忆过去十几年艰辛忙碌的打工生活，再对比她所听闻的其他新村民的生活状态，她很是羡慕，并努力想要向他们靠拢：“有对小夫妻，老公是新东方的英语老师，父母每天有大把的时间陪孩子玩耍、看书，家里像图书馆一样。我的闺蜜是个温柔的美食达人，听她说话感觉就要融化了，

拍的照片也特别好看。我们以前呢，每天就只知道忙啊忙，打卡、加班、熬夜，把小孩丢在家里。没接触到这些新村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生活”。她时常感慨，“这些新村民的头脑、思想都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们是很时髦、前卫的先锋。现在，我喜欢跟这些新村民一起玩，感觉每天都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积累正能量”。

“新村民”们的到来，给这个原本偏僻、传统的村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景观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如今，拜访新村民已成为岑卜村游览行程的一大亮点。“新村民”往往先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听说岑卜村，然后来村里考察一番，一旦决定定居在村里，就要解决租房问题。不同于须经集体转让的土地，“新村民”可以直接向老村民个人租赁房屋。他们只愿意租年代已久的老房子，喜欢院子宽阔、临河边、风景好的房子，然后再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进行修缮。除了花费一定时间经营生态农场、自然教育、民宿接待等休闲农业项目，“新村民”们喜欢养花、种菜、打理家务、读书、喝茶、划船、外出旅行。不过，尽管新村民们热衷于营造这样一种“慢生活”，但实际上有些人的生活却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有的人平时在上海市区紧张工作，周末开车来到村里度假休息，甚至只待上一个下午就返回城里，而有的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考察、会议。

如今，“新村民”不仅构成了岑卜村社区生活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凭借其社会影响力掌控着社区自我表达的话语权。他们带着各自的初衷和理念来到岑卜村，因而常常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借助微信、博客、论坛和新闻媒体等媒介，呈现对生态旅游以及村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不同叙述。

## 第一节 环保主义

受到起步阶段绿洲开展项目的影响，生态农场至今仍是岑卜村生态旅游的最大亮点。据岑谷农场的负责人介绍，“如果把最小单元的几亩地也算进去，现在这里大概有六个有机农庄。我们算是比较大一点的，有 136 亩，小的可能只有 3、4 亩。这个村子，机构的话应该是有 3 家，昕耕，绿洲，还有我们，其它都是属于个人的。绿洲这几年逐渐退出了，但还是有地在这边”。经过仔细了解，笔者发现绿洲和岑谷农场分别作为岑卜村生态农业的排头兵和眼下种植规模上的龙头老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环保组织的背景。因此，国际环保组织的运作模式、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都深刻影响着这些由环保机构经营的生态农场。

绿洲是 2009 年最早来到岑卜村的环保 NGO。最初该机构租了 23 亩土地，实践“自然农法”耕作，推广“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 CSA)，此外，它把 200 平方米的仓库改造成“生耕农社”自然教室，依托岑卜村和小葑漾湿地的自然环境，开展亲子自然体验、自然教育等活动。据了解，绿洲的创始人曾在 WCS (The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工作八年，后来，由于意识到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推广野生动物保护面临很大的困难，才将机构名称中的“野生动物保护”转换成了“生态保护”。无独有偶，岑谷农场的负责人沈先生也曾在 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近八年,直到2011年创办自己的NGO,并从某位大笔投资金泽水乡文化的艺术家手中接盘目前的农场。目前,除了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知名外资企业员工为主要对象的环保教育活动占到农场业务的一半以上。

如今,水源保护地、生态文化村、有机农场……这些标签吸引着大大小小的环保机构和越来越多环保主义者来到岑卜村,使得这个普通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环保圈里的圣地。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机构会根据情境策略性地选择对于本地生态环境的表述方式。调查初期,笔者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到岑谷生态农场的官方介绍:农场位于上海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小葑漾湖畔,为独立半岛。三面环水,有着天然的生态隔离带与常规农业相隔离。属上海市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周边没有工业污染。农场占地总面积136亩,其中耕种面积约110亩,其余为湿地。农场借鉴国内外CSA经验,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模式,基本实现内部的生态循环;农场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遵循有机食品生产、采集、加工等标准,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等;通过恢复生物多样性,结合畜禽养殖、有机堆肥、蚯蚓堆肥、生态厕所、秸秆还田等形式实现农场能量循环。从2010年开始,农场进入了土地修养恢复期,目前的地力和土壤元素等已经符合有机耕作和能量循环的阶段<sup>22</sup>。这段介绍也出现在该农场的淘宝网店和“有机会”论坛页面。“独立半岛”、“与常规农业相隔离”、“一级水源保护区”、“没有工业污染”等用词建构出一个孤立存在、与世隔绝的、类似科学实验室环境的世外桃源,而且新技术的实施似乎水到渠成。但在访谈中,机构负责人们的表述远没有这样干脆利落。面对绝大多数人对“有机”的追问和质疑,机构负责人通常采用主动退让妥协的策略。首先,他们会用“生态”取代原先使用的“有机”。“我们从来不说我们是有机的,我们叫自己生态农场,有机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很难达到”。接着,他们会搬出大量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向提问者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有机”,并通过列举监测数据的变化来论证农场已采用的各种方法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性。最后,他们会努力呈现环境污染的整体严峻局势,并时常将村民的传统耕种方式和生活习惯作为批评的对象。

此外,在西方环保运动的影响下,这些生态农场经营者带着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来到岑卜村寻找一小块可供他们实践理想的试验田。笔者最初进入岑卜村,正是因为世界自然基金会与我校人类学系的合作项目。当时项目的目的是评估太湖流域几家“有机农场”对周边社区和水环境的影响。当笔者和同行队员进村询问近些年村庄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时,本地村民和环保机构双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而不同农业模式对环境的影响成为了争论的焦点。环保机构一方态度鲜明,首先,他们习惯于将“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鲜明地对立起来,继而主张“有机农业”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性,同时将污染源归因到本地村民的“常规农业”耕作方式。“我们都知道优质的土壤应该是很疏松的,我刚接手这块

<sup>22</sup> <http://www.yogeev.com/products/54047.html> 岑谷农场老品种五色稻米|岑谷农场|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原生品种|有机大米|有机糯米|秘境守护者 - 有机会, 中国有机生活第一平台  
<https://cengu.taobao.com/p/rd922875.htm?spm=a1z10.1-c.w5002-1436373724.9.7Y7AQK> 农场故事-岑谷生态农场-淘宝网

田时，土壤是板结的，经过一年有机耕种，土壤越来越疏松了，新鲜的蚯蚓粪越来越多了。我们这片地是由5个我这样搞有机或绿色农业的小农户地连成片的。去年夏天时，那些使用农药除草剂的菜田里几乎听不到蛙鸣，而这里蛙声响成一片，还有很多鸟儿在田间飞翔”。这是从事生态种植的人们在参加各种分享会或博客、新闻上最常使用的叙述方式。然而，笔者发现，与环保机构声称的农民需要启蒙这一前提恰恰相反，本地村民不仅很清楚常规农业的危害，而且保持着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集体记忆。在周边大棚打工的村民提醒笔者，“小姑娘以后买菜的话，千万不要吃空心菜，还有茭白，这种浸在水里的东西，是最最毒的。看他们弄以后，这些东西我是绝对不吃的”。事实上，村民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极少使用农药，如果偶尔为了防止严重的虫灾喷洒农药，他们会算好时间过一段时间再吃。对于“有机农场”号称的不用农药、化肥，老村民们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不用化肥农药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谈及水质变化情况时，七八十岁的老村民们大多仍保留着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记忆：“以前农村里种田，冬天把河泥都弄掉，放到田里当肥料。以前化肥没有的，都靠自己弄河泥、草，所以河里的水干净”，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不用化肥农药是无法取得高产量的，因此质疑这些生态农场宣传的真实性：“骗人的，不用的大概也是有的，但不会丰收的。农药、化肥都用的，不用的可能也有的，我们这里没有的，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笔者发现，产量问题是导致老村民对有机种植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产量的担忧则反映了过去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的老村民们在市场中的心态。超出农民掌握范围的市场运作才是导致农民不得不广泛采用常规农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促使西方有机农业潮流兴起的社会背景。因此，市场体系而非农民本身才是有机农业从业者们应当批判的对象。

此外，村里的环保主义者经常把环境污染归因于老村民“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例如家禽养殖、向河道直接排放生活污水、焚烧农业垃圾、乱堆建筑垃圾等等。面对这些指责，村民们大多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虽然农村人的确向来有乱堆垃圾的习惯，但是某些看似不当的垃圾处理方式实际是城乡管理模式缺乏良好对接的产物。例如，虽然村里如今到处遍布着过去只有城市里才有的垃圾桶，每天也有环卫局的清洁车来村里装走垃圾，但是根据规定，环卫车是只装生活垃圾、而不装农业垃圾的。这种用城市的思路管理农村的做法就造成了豆萁、麦秆等最为常见的农业垃圾只能放火烧掉，而这无疑带来了空气污染。在调查期间，笔者就曾亲眼目睹，为了应付镇里领导的卫生检查，村里的保洁队一清早到田里把干枯的豆萁聚集在篮球场上，然后放火烧掉。此外，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村里的许多家庭纷纷翻建老宅，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垃圾，由于没有渠道处理，只能随意堆放在自家房屋前后或河边，却因此受到“新村民”的诟病。

环境保护是西方新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充分利用新闻媒介是许多环保组织广泛采用的行动策略。岑卜村的环保主义者大多开设博客，时而接受媒体采访，围绕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议题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对他们而言，岑卜村既是一本生动鲜活的百科全书，也时而成为展现人类破坏环境的反面教材。其中，“萤火虫”事件在让岑卜村名声大振的同

时,也更加凸显了村庄社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隔阂。环保志愿者小姜 2006 年底加入绿洲(当时称为上海绿洲野生动物保护交流中心),后来受到一对香港夫妇的影响成为上海野鸟会(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利用周末在上海地区组织观鸟、打捞水生物、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自然体验和宣传教育活动。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经历使得小姜对岑卜村的生态情况了如指掌,正是他最早在 2010 年初在户外网站介绍岑卜村村落改造和开展休闲农业的情况。2011 年,包括小姜在内的上海野鸟会的几位生物爱好者在如今岑谷农场附近的小葑漾一带发现了上百只特殊的萤火虫,经专家鉴定是上海萤火虫新种——条背萤。如今的岑谷农场当时仍由另一位绿洲志愿者小康打理,也就是后来生耕农社的负责人,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她借助昆虫学专家的权威,试图论证有机农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改善作用。小姜则以萤火虫为名,号召身边几个生物爱好者建立起了“萤火虫保育小组”,专门开通博客来进行自然教育和环保宣传,岑卜村的名气由此在环保圈里渐渐响了起来。不过,就在短短两年后的 2013 年,小姜等环保志愿者向新闻晚报记者反映了岑卜村萤火虫锐减的现象,矛头直指新农村建设和村民日常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一些原本的荒地如今被开垦成了农田,一些河岸也浇灌了水泥。除了湿地逐渐消失,新农村的灯光污染也让萤火虫无所适从。以前农民的房子都是比较柔和的黄光,对于萤火虫的刺激不大,但这两年很多房子翻修了,装上了明亮的日光灯,再加上明晃晃的路灯,强光让萤火虫的交配和繁殖都大受影响<sup>23</sup>”。小姜还向记者提到,“这是因为当地村民去年开始在河道里种植菱角,为了保持收成,也需要施用农药化肥,水栖的萤火虫(条背萤)的生存就受到了较大的影响”<sup>24</sup>。2014 年夏天,“萤火虫事件”经由一系列媒体事件的发酵推向高潮。2014 年 6 月,上海旅游局公布了十大上海观赏萤火虫的好去处,其中岑卜村高居首位<sup>25</sup>。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后,随着一篇标题为《青浦萤火虫陷“灭绝危机”》的报道经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岑卜村的“虫虫危机”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委员在 2015 年市政协专题会议上提出了设立萤火虫保护区的提案。

面对突如其来的媒体关注和指责,村干部们觉得自己很无辜,“要不是报纸上看到,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萤火虫的栖息地,新村民也没有跟我说过”。像其他村民们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料想到,河边草丛里稀松平常的小虫子竟会被环保主义者拿来大做文章。村民们对这场发生在网络上的、轰轰烈烈的“萤火虫事件”知之甚少,讨论的议题和媒介都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只是看到突然有那么多人来到自己的村里,过了一阵子人又少了,时而在闲谈之间嘲笑一下那些大老远赶来、像傻子一样候在河边草丛里喂蚊子的城里人。正如农场负责人沈先生坦言“我们做得很不容易,但现在我们这些人,还有那个台湾人(生态规划师

<sup>23</sup> [http://sh.xinhuanet.com/2013-05/29/c\\_132416714\\_2.htm](http://sh.xinhuanet.com/2013-05/29/c_132416714_2.htm) 《浪漫被販售 萤火虫濒临灭绝 别让儿时记忆成传说》新华网上海频道新闻 2013 年 5 月 29 日

<sup>24</sup> <http://www.yogeev.com/article/47353.html> 《岑卜村生态农业的困境与坚持》|岑卜村|生耕农社|欣耕工坊|喜乐农场|笔耕农社|自然教育|社区支持农业 - 有机会,中国有机生活第一平台 2014 年 3 月 18 日

<sup>25</sup> <http://roll.sohu.com/20140611/n400708674.shtml> 《夏夜流萤 盘点沪上萤火虫观赏圣地(组图)》-搜狐滚动 2014 年 6 月 11 日

“青蛙爸爸”)搞的,生态,是村民最不关心的事情”。视角的差异让环保主义者感到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而村民们也质疑这些机构无所事事、坑蒙拐骗,导致双方难以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作为社区原本的主人,老村民们只是这场闹剧的旁观者,而村干部们在其中体会到了新村民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后者由此对社区事务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 第二节 乡村建设

过去十年间,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衰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如火如荼的新乡村建设浪潮。学术界是这股热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02年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2005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成立)等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中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人堪称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提倡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面对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他们强烈批判以城镇化、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思路,批评“撤村并居”和“土地经营规模化”不仅打破了被征地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利于农村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降低了多数农民的各种非经济利益和隐形经济利益。他们主张,通过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重新追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传承,才是新时期农村建设运动的最终出路(申端锋,2006;杨世建,2011;张富利,2013;何慧丽等,2014)。

如今,在岑卜村大大小小的生态农场的介绍里,都会出现一个令人感到陌生的词汇:“社区支持农业(CSA)”。笔者上网搜索了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最早出现在日本和欧洲。与中国当下的情境类似,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绿色革命”制造的化学农业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的工业化和市场化造成了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农民失去对农业的控制,生计艰难。于是,一些农民和消费者主动连接起来,建立了这种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互助模式。实质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自救和互救。消费者提前预付给农民一年的生产费用,农民则以健康的生产方式生产,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通过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从而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1990年代以来,在传统小农场逐渐衰落的情形下,“社区支持农业”在北美地区稳步发展<sup>26</sup>。有意思的是,在学术界的大力推动下,过去十年间,这一来自西方的、类似于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消费模式在传入大陆后,被纳入新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三农”的思想源流中<sup>27</sup>。

目前,岑卜村的生态农场大多是依托于 NGO 背景。这些农场的实际运作仍与典型意义上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经过土地流转,在农场务工的本地村民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和产出的所有权,沦为依附于外来经营者的打工者,并且在农场的实际运作中处于最边缘的地位。这些农场通常从负责

<sup>26</sup><http://gengdu.baike.com/article-22859.html> 《社区支持农业 CSA 的概念是什么?》耕读百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a11f8e0102duba.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a11f8e0102duba.html) 《社区支持农业》\_农家石嫣 新浪博客

<sup>27</sup>[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1/13345757\\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1/13345757_0.shtml) 《“社区支持农业”的三种呈现》凤凰财经

人的老家或本村的三峡移民中雇佣一名种地经验丰富的老农负责农场整体的种植计划和实验，而对于本村村民，只有在农场临时需要的时候才会被雇佣，完成播种、除草、采摘等简单的农活。此外，笔者发现，由于市场刚刚起步、消费者认同尚未充分建立，生态农场在宣传中往往利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强调食品安全，而没有突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一核心理念。以岑谷农场的“用一分地开启不一样的生活”租地项目为例，尽管文案末尾提及“生态农业不使用大棚、农药、化肥以及助壮剂等任何药物，遵循自然规律，科学种植。收成情况受大自然影响较大，有一定的风险<sup>28</sup>”。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风险共担并不能实现。农场的负责人坦言，“如果今年收成不好，怎么办？你去顾客说，因为收成不好，所以不能按计划配送了，他肯定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农场的压力就很大”。由此笔者认为，当下这些由 NGO 经营的生态农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它们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以食品安全入手，让大众逐渐接触到这种新型生产消费体系。

除了经济上的扶助，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新乡土建设运动的另一条重要脉络，艺术家、建筑设计师、文学家是其中主要的推动者。在生耕农社的自然教室门外，有一座已破败不堪的古色古香、青瓦白墙的大戏台，孤零零地矗立在田园里。据了解，其实这并不是村里遗留下来的古戏台，而是 2011 年由上海戏剧学院的胡项城教授捐助，用老的石料和木头、按照江南水乡原有的戏台格局重建成的。调查期间，笔者多次听到人们提起某位“大老板”在金泽到处买地，后来才知道，这位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就是胡项城先生。2000 年起十多年来，他试图通过开展传统乡土文明修复工作，在青浦金泽地区实践他的乡村复兴计划。他的设想包括乡土建设理论研究、行为与礼仪的重建、传统造物工艺的恢复、生态及有机农业的开展、乡村社区建设等，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体验，激发乡村活力。其中，坐落在金泽镇下塘街一号、占地面积达 3700 平方米的“四民会馆”是这一计划的起点。这片的原址是金泽当地一家倒闭的乡办企业，破败的厂房被改造为若干精心设计的明清乡村风格建筑群。按照计划，这里将入驻金泽工艺馆的展览区、民间手工艺的工坊、民族工艺产业研发中心、金泽乡土文化研究所、自然环保基金会以及高校相关领域研究所等机构。除此以外，岑卜村和田山庄这两个紧邻在小葑漾两侧的村庄是胡项城先生开展传统礼仪重建和生态有机农业种植的重要据点。如今，在岑谷农场的大门口，仍可以依稀识别出“迎翔农场”、“金泽文化传习所”的字样。2011 年初，他曾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到村里开展田野调查，了解这里传统仪式和民风风俗，并与村民共度端午。学生们表演了基于射柳、驱五毒等传统习俗创作的舞蹈，还举办了赛龙舟、包粽子、诵经典敬先贤等活动。此外，村里的各个农场也时常会举办一些传统节庆活动，例如欣耕农场的冬令营就在今年元宵节组织本村的小朋友制作兔子灯和灯谜。对于本地村民单调清苦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活动无疑受到村民们的欢迎。但是，短暂的热闹之后，孩子仍旧很快回到城市，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老人们继续留守在日渐衰败的乡村。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面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冲击，脱离了整体日

<sup>28</sup><http://s.etao.com/detail/18422317677.html?tbpm=20160411> 用一分地开启不一样的生活 租地 \_一淘网

常生活的“传统”显得微不足道。

### 第三节 乐活营销

在实践环境保护和乡村建设理想的同时，常驻在村里的“新村民”们还在岑卜村精心营造着一种被称为“乐活”的新兴生活方式。笔者发现，尽管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是岑卜村寻求自身发展和社区转型的一种尝试，但对于大多数外来的游客来说，由“新村民”们打造的、不同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独特空间环境和生活体验，才是真正能够吸引他们的原因所在。

来自台湾的生态规划师“青蛙爸爸”夫妇被看做是岑卜村“乐活”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倡导者。昕耕农场在2012年提出了把岑卜村建设成为“生态文化乐活村”的倡议。更加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初，在国家农业部的官网上竟然出现了一篇题为《青浦金泽镇岑卜村已成为生态文化乐活村》的文章。那么，“乐活”这个显然并非来自本土的概念从何而来？它又是怎样进入和呈现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甚至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的？

通过网上搜索，笔者了解到“乐活”（LOHAS）概念的具体含义是健康及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乐活族”的消费观始终围绕“自我健康”、“家人健康”以及“社会（环境）责任”三个维度，他们崇尚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及家人的健康、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以及自我身心灵的满足与发展。当今工业化的进程发展迅猛，全球资源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及生活的节奏进一步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状态遭遇异化，被认为是促成“乐活”理念的社会根源。这个新兴的市场营销概念被追溯到一项社会学者的研究。根据这套说法，美国社会学者保罗·瑞恩是“乐活”概念的提出者，1998年，在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量的基础上，他提出存在一群追求自身健康与环境的永续发展的文化创意者，并估计美国成年人中约有五千万人属于这个群体。此后，“乐活”概念受到商业领域的关注和追捧，美国、日本、台湾等世界各地的市场调查机构不断以数据证实“乐活”生活方式的兴起，引发了永续经济、健康生活、替代疗法、个人成长和生态旅游等商机和相关产业的蓬勃。2006年左右，肇始于欧美的“乐活”生活方式经由日本、台湾，扩散到中国大陆，并受到中国大陆的媒体和商家的积极推广。2007年4月，国内首家以“乐活”命名的杂志《乐活 SOTOKOTO》创刊，并设立网站，从衣、食、住、行、养、乐、美七大板块呈现一种“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sup>29</sup>。

“新村民”们通过营造一种符合“乐活”理念的空间环境和生活方式，为游客提供不同于城市日常生活状态的特殊体验。首先，注重生态、亲近自然是“新村民”生活方式的一大特色。来自台湾的生态规划师薛氏夫妇是岑卜村“乐活”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们独具特色的小屋“青蛙小站”也成为来访者必定要参观的项目。2011年秋天，他们向村民租下了一整栋房屋，依据低碳、环保、自然的理念进行装修改造。门前的水泥地坪被恢复成了烂泥地，上面铺上原木条，院子里有流水、鱼池、蔬菜地，而门前的柴草屋被改造成接待

<sup>29</sup><http://web.ilohas.com/> 《乐活》杂志

客人的茶室。走在村子里，你可以轻松地把新村民和老村民的房子区分开来。经过新村民改造的院子往往有高低错落的围墙、爬满花草草的篱笆、精心打理的小花园和小菜园、常年养着金鱼的鱼缸、随意摆放的大木桌和收获的农作物。与新村民的入驻同步，过去几年里，老村民在村中也掀起了一轮翻建新房的热潮，他们往往依照心目中城市花园洋房的标准建造，包括面砖、落地窗、车库、地砖和大草坪。在岑卜村，水泥地与烂泥地的争议，象征着两种不同生活理念的对抗，在老村民看来，水泥地整洁美观，而新村民则斥之为现代化对自然的破坏。

此外，“健康”是岑卜村生态旅游过程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在调查后期，笔者经中间人介绍，住到了“新村民”杨阿姨利用自家老屋办起的民宿。放下行李后，杨阿姨立刻到厨房拿出香茅叶和蜂蜜准备泡茶，并主动介绍道“这是我自家院子里种的香茅，特别香。我这里还有很多茶，都是自己种、自己做的，在这里你能学到很多健康养生的知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杨阿姨经常提到的话题，“现在我去菜市场，就觉得害怕，不知道要买什么……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发明什么杀虫剂、膨大剂，这不是害自己吗？如果没有这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人心里就不用担心害怕，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市场了，要是那样，谁还会买 15 块钱一斤的菜呢”。她一边吃饭，一边向笔者详细地介绍食材的来源和制作过程，突出食物的天然、健康和制作流程的透明。同样，在岑谷生态农场的项目宣传中，食品安全被放在“拥有一块土地的 5 大理由”的第一位。食品安全问题这一潜在的社会风险引起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心理焦虑，因此成为“有机”、“生态”等营销的最有力支持。

不过，笔者发现，相比于身体意义上的健康，“乐活族”们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赋予了食物更丰富的内涵。相比于大众化的旅游方式，正在岑卜村兴起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小众的体验经济。笔者先后以不同方式进入岑卜村，充分了体验二者的区别。起先，笔者和同行队员住在村口的水韵农庄。像往常的外出旅游一样，住宿、用餐都明码标价，店家会及时主动索要费用。除了必要的服务事项，游客和店家没有更多深入的交流，服务员即便闲着没有事情做，也只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而不会与客人互动起来。相较而言，“新村民”们经营的接待和民宿则更富有人情味。用餐不仅以饱腹为目的，而其本身就是整个生态旅游行程中的一项重要体验。在此过程中，游客被允许走进农田和厨房，与主人分享围绕食材而展开的故事，并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主人与客人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轻松地劳动、交流、嬉戏，没有既定的目标和明确的时间安排，创造出一种有别于紧张的、高速的城市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状态。

城市中产阶级是“慢生活”理念的主要践行者，对他们来说，乡村是都市生活的短暂避难所。正如另一户新村民家的名字“禧悦养生”，“养”不仅是滋养身体，更重要的是滋养心灵。“禧悦养生”的女主人大约三十来岁，比较清瘦，穿着黑色的线衫，说话有点嗲，很爱笑。她家租下了整栋楼房，主要经营亲子活动、接待和民宿。由于只有屋后路边大约两平米的自留地，通常需要向农场或村民购买接待客人所需的食材。经过精心布置，门前的平房和

一楼外墙粉被刷成了鲜艳的蓝色，院子里的平房上写着“冬冬的厨房”，里面有个老式的大灶。院子里摆着一只长桌，上面散落着几个柿子和南瓜。一进门，女主人就活泼地向笔者介绍自己和家里人，并招呼我们进屋参观。室内的厨房里有一只铺着深蓝色麻布的长桌，能容纳二十来个人用餐，一侧的墙上是摆着文艺气息陶艺品的隔板，另一侧的照片墙贴满了全家人的日常生活瞬间和走遍天下的足迹。

当时有一个四口之家在家里做客，孩子们的爸爸是某英语学习平台的创办者，妈妈平日里在某外企工作，两个小男孩一个三岁、一个八岁。小儿子跟女主人的儿子差不多年纪，两人从鱼缸里舀水浇在院子里的石子路上。大儿子不时地向爸爸请求要给大灶生火。尽管初次见面，女主人却理所当然地安排笔者帮忙洗菜、照看孩子。一直到六点左右，两位妈妈带着孩子去楼上洗澡、换衣服，爸爸到厨房用大灶炒了个大乱炖，笔者帮忙把饭菜和餐具端到屋子里的长桌上，女主人打开音乐，孩子们继续围着桌子嬉戏大闹。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是此类活动最核心的主题。什么时候让孩子回市区？要不要回城里读幼儿园？每当有人提及类似的问题，原本轻松的气氛往往转为一片沉默，“不知道啊，到时候看吧，我就想让孩子自由一点”。父母们希望通过在乡村的自然体验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当孩子们嬉戏打闹，父母们不时地与孩子交流，事后还会仔细回顾、探讨刚才的处理方式是否妥当。对教育问题的过度关注，反映了这些城市中产阶级的年轻父母们对当下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抵触和焦虑。

人们把诸如种田、做饭这些原本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特定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联系起来，甚至出现了宗教化的倾向。活动策划者从基督教、儒家、道家、佛学等各派经典中获得素材，结合读书会、品茶、冥想、插花等活动，通过分享人生感悟，实现自我成长。下面是某农场发布在博客上的一篇文章：

《有地种，有书读，便是幸福》<sup>30</sup>

从2013.5.1号至今天，每天都在地里劳作着。艰辛着，喜乐着，享受着。不觉得累或体累心快乐着。

坚持着将每颗菜，每颗稻，每只鸭用爱心培育，都精耕细作。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人工除草。采用轮种、香草间作等传统、自然的方法防虫、驱虫并顺其自然的接受大自然的赠与。一场大风大雨过后，不会有报怨，只是感恩地里还有的，枝上还挂着的。或许销售的菜品相不好，或者对“上帝”服务不好，但我们在真诚地用心耕种，一步步努力，真正好的食物和服务都源自内心！做一个纯粹的人，还原食物最本质的干净和清澈。在冷酷和粗暴的世界里，做一个坚持的人，坚持种出自然的食物。甚至觉得，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信仰。

即便是注重本土文化保护的生态旅游产业，伴随旅游开发而来的商品化和去地方化仍然不可避免。这里的生态旅游并没有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挖掘本土特色，而是积极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元素融合起来，并赋予新的意义。重要的并不是嵌入于具体情境的、真实的乡村

<sup>30</su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019e5c6b0101ms1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019e5c6b0101ms1k.html) 《有地种，有书读，便是幸福》\_喜乐农场沈太\_新浪博客



生活，而是人为营造的、符合“乐活族”理念的一整套生活体验。

## 第五章 美丽乡村：不确定的未来

### 第一节 冲击与涵化

2010年世博会前夕，水韵农庄和岑卜农业体验园作为第一批由村委主导的农事旅游项目经过匆忙的筹建正式开门营业。据了解，当时雇佣了大约一百名村民，接近当时常住在村里的老人人数的一半。其中绝大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主要负责农场种植、摘菜配送、打扫客房、厨房后勤、餐厅服务。尽管这两个项目的实际运营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红火，在过去几年里，农庄一再转让，体验园被后来的更多 NGO 机构和个人接盘，规模越来越小，但在“农庄”和“体验园”工作的经历已经成了村里的大多数老年妇女共享的集体记忆。因为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能再外出打工，于是他们回到村里，重操旧业。不过，眼下的“种田”已经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境截然不同。曾经的集体大田和自留地都承包了外人；过去看天吃饭、担心收成不好，现在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赚不赚钱是老板的事；曾经生而为农、靠土地吃饭的无奈和艰辛，变成了城里人亲近自然、放松消遣的体验。

调查期间，笔者始终带着一个疑问：既然看似获利颇丰，为什么几年下来，除了到农场打零工，本地村民对生态旅游的参与度不见提高呢？后来，笔者发现，尽管解决就业、增收扶贫是政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理由之一，但实际上，参与其中的村民基本全部都是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无法再外出打工的老年群体，“六七十岁，年龄大了，到外面很难找活”。由于市场定位和客户要求的转变，这些生态农场的管理必须跟上现代服务业的技能和观念要求。因此，这些老年村民仅仅承担最基本的种田和清扫工作，日常管理工作则大多由嫁到村里的年轻外来女性和一些在村里定居养老的城市老夫妻承担。“机构负责人-外来人口-打工者”三层次结构是岑卜村大多数生态农场共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其中，机构负责人主要负责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开拓市场，经常参加各种论坛、分享会、项目考察等活动；雇佣的外来人口包括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嫁到村里的年轻外来女性和一些在村里养老的城市退休夫妇，他们主要负责具体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以及财务、仓储、物流、人力等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打零工的老年村民只承担最基本的种田和清扫工作，对机构的整体运作了解非常有限。

张阿姨夫妇是上海某高校的退休教师，三年前开始在岑卜村定居养老，目前负责某生态农场的日常配送和餐饮接待。当聊起农场的日常运营，她屡次向笔者抱怨，村里的阿姨懒散、不会做事，“这地里的活，说实话，真的是不累，又没有人说这半亩地今天一定要完成，随便干，像玩一样。有时搞活动让她们帮忙一天，她们反而觉得比地里累”。所以，很多事情只能由她亲自上手。“我这个人就是看不惯，本来我炒菜都放手了，但是不行，还是我自己烧。我们要六菜一汤，荤菜两锅，四个素材要炒八锅，我们都自助的呀。炒菜也蛮累的。收了人家那么多钱，不可能只给人家吃菜饭的。”此外，她抱怨客户对蔬菜配送的要求很高，

表示压力很大。“老板的目标是每周 100 份，现在就十几份、几份，我都搞得头疼。每份十种菜，还要有变化，这个星期是这十种，下星期还给他这十种就不行了。十几份菜要好几个阿姨才行，要称好，包好。我跟你说，客户很难搞的。我现在每天五点半起来叫阿姨摘菜，八点半要配好。透明的袋子全部要一层层放整齐，人家拿在手上很漂亮。走顺丰当天件，下午三点多就能到了。最讨厌就是夏天的叶菜，很烦的，送过去烂了，只好再配再送过去。”

年轻的外来媳妇凭借在外打工的经历，成为了村里争相雇佣的稀有人才。杨阿姨今年四十多岁，湖北人，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曾在上海宝山地区的浴场工作十多年，有丰富的服务行业管理经验，十年前再婚嫁到村里。婚后，她先后在青浦周边打工、开店，直到两年前前接触到村里的“新村民”，开始萌生自己做民宿的念头。由于丈夫的兄弟家已在青浦城里买房，村里的老屋空置已久，院子的场地上也堆满了杂物。经过精心改造和布置，目前她家有五间房间供接待客人，自己基本不做宣传，主要依靠主动融入“新村民”圈子获得客源。除了在自己家里经营民宿，杨阿姨还提到不久前金泽镇上的某家大型生态农庄的求职经历。“到那边也是做客房，有大型公司里的老总来开会。初试过了以后，复试是老板亲自面试的，也看上我了嘛，因为我以前做了十多年服务行业，客房虽然不是一样，但大体也是一样，换汤不换药”。调查期间，笔者很好奇，既然旺季价格动辄三四百的民宿加农家菜生意显然获利颇丰，村里的其他村民为什么不自己做呢？杨阿姨向笔者解释道，“也有，但做得不好，就是农场里面做的几个阿姨，卫生不达标，也不会整理。老式的房间，就像我婆婆一般住的，很乱的，床单被套还是那种老式的，还有那种彩色的枕巾。他们不会跟新村民交流，也不会去看看参观一下。上次做类似爸爸去哪儿那样的活动，让我们把房间照片发过去，我也发了，阿姨她们也发了，我看到，啊？这也可以？我以前做管理，卫生肯定是做得很细致的，都要用纸巾擦”。此外，杨阿姨还向笔者抱怨，在她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婆婆不愿意与客人互动，表现非常冷淡，“对这些老人真是无语，有客人来，我介绍说这是我婆婆，她不笑一下，也不打招呼，像木头一样。现在算是好一点了。刚开始认识我闺蜜，她就说，看到你婆婆有点怕哟。这次我回老家，她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我拿个鸭子经过你家，我说我不敢杀，是你婆婆帮我杀的。我心里觉得，嗯，我婆婆也有转变了”。由于城市新中产阶级家庭是亲子活动和民宿项目的主要对象，因此不仅生活设施必须符合城市现代生活的要求，而且经营者也需要具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游客相近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这是导致本地村民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只能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之一。

从生产性农业到休闲农业的转型，其实质反映了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的根本性社会变迁。“新村民”带来的人际关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给原本相对传统、封闭的村庄社区造成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作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手段之一，休闲农业通过满足城市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从而带动乡村发展。因此，在此过程中，外来的现代城市文化无疑居于优势地位，扮演着牵引者、建构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处于弱势地位的“老村民”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的涵化，扮演着文化学习者的角色。

## 第二节 剥夺与逃离

对于村子近些年的改造和变化，村民们大多轻描淡写，只有仔细追问，他们才会稍稍提及。“这里改变就是从新农村开始的，06、07年吧，原来没有这么好看的。像这种路都是那时候修的，以前这后面很荒的，前面那条健身路没有那么多高，往上抬了很多很多，原先它的地势是很低的。最早的是水韵，那块地原来是个发动机厂，旁边是一个小的庙，拆了。大大小小的庙都是重建的，原先都很破很破。这里的桥也都是重新修过的，原来的桥都是拱形的，高桥”。当笔者不禁赞叹村子整洁美观时，村民们却显得提不起兴致：“我们这里好吗？嗯，现在路灯么也有了，自来水么也有了，跟以前比么是好多了……（沉默）”在他们看来，水泥路、路灯、自来水这些基础设施的确大大方便了日常生活，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内心也感到丝丝的欣慰。但是，与他们听闻或有所接触的周边地区相比，青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以及日渐明朗的、自上而下的、以环境保护为主线的区域发展规划，令他们越来越陷入无奈的沉默当中，“金泽这边，青西地区一直是发展得很慢的。青浦么，以前跟你们宝山差不多的，都种田的，种粮食的。现在你们宝山好了，金山也好了，搞化工，就我们这里，上面定的，没办法了”。明显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让他们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心生憧憬，但在国家制定发展方针面前，普通村民对改善个人生活条件和处境的渴望显得微不足道。“这个地方趋势是越来越好的，就是没有工厂，不许开，淀山湖游览区。以前有些小厂，污染，不许开了。现在金泽过去，苏州什么的现在条件都很好，那边发展得快。像金山那边，它跟昆山一样都是工业园区，都是做化工。这里游览区游览区，厂又不好开。青浦区，金泽是条件最差的，东面的徐泾、赵巷，条件好。青西这边是全上海最后一块很落后的地方”。

发展浪潮中的弱势处境给本地村民制造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通过磨洋工、占便宜、散播闲言碎语等消极的抵抗方式表达内心的不满。例如，水韵农庄的经营状况不佳，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日常管理不善的结果。按规定，水韵农庄的住宿费用是包含第二天早餐的，但在农庄打工的本村阿姨们早上九点多甚至十点多才会来上班，导致住宿的客人无法吃到早饭。忙完午饭，阿姨们十二点多又骑车回到家里，有时午饭的饭菜就一直在桌上放着，等到晚上再来收拾。另外，阿姨们做饭时会多煮很多米饭，然后带回自己家里喂给鸡吃。

此外，村民们制造了许多关于外来新村民的流言蜚语。调查期间，笔者拜访了一对住在某位“新村民”的隔壁的本村老夫妇。同村里的多数家庭一样，他们的儿子平时在青浦城区从事售楼工作，儿媳妇是移民到岑卜村的三峡移民，小夫妻俩带着十岁的孙子买房定居在了青浦城区里。丁大爷在附近的厂里打工，阿姨隔周到青浦城里帮忙照顾孙子，还利用空余时间做一些计件制的手工加工。提及隔壁的“新村民”，老夫妇俩都表现得不屑一顾，“不知道哪里人，上海人么不像上海人，哪个上海人会住在乡下这种地方来。隔壁那个男的，40来

岁了，也不结婚的。家里连个电风扇都没有，这么热的天，跟老妈一起搭个帐子睡在露天。肯定脑子有问题的，走过他身边，就闻到一股臭味。还总是有人到他这里来玩，不知道来干什么，傻子骗傻子”。尽管这样的丑化令笔者感到不可思议，但老夫妇俩仍然对自己的说法确信不疑。他们接着绘声绘色地补充道，“傻子不止一个，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看到有个人影在灶间里，进去一看，吓得退出来，男孩子，光着身子，坐在那里。赶也赶不走，后来打电话叫了村委会的人过来，才把他弄走。这种人家肯定是在城里觉得没面子，混不下去了，搬到乡下来的。上海人好好的这么可能住到我们这种乡下来”。

面对生计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金钱”成为触及村民内心的敏感话题。土地流转之后，老宅是村民手中唯一可以快速兑现的资产。随着岑卜村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每天都有人来村里看房子，租房价格一路飙升。据了解，三年前，租一整幢三上三下的房子，一年的租金是一万左右，如今已经涨到了三万。由于很多房东已定居城里或婚嫁到其他地方，加上眼下几乎没有动迁的希望，岑卜村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租房现象。这里的租房合同时通常长达五年、十年、甚至二十五年。根据合同，新村民自己掏钱装修或者干脆在宅基地上新建，合同到期后，房屋归房东所有。在金钱的直接刺激下，房东们很快学会了捕捉商机，纷纷指望着把原本破旧不堪的老屋换个好价钱，顺便还能给自己修好房子。每当有人敲门询问租房事宜，房东们第一句就要先确认来访者是不是“老板”。除此以外，本地村民时常这样解释青浦高昂的房价：“这边外地人多，都是做生意的小老板，无所谓。浙江的、安徽的，你去西岑、金泽看看，菜场里都是外地人，摆个豆制品摊，一年好赚二十万。今天我在西岑给一家人家弄水电，东北的，儿子女儿都在上海，电视台的，条件好得呀，租整个楼房，我看停在那里几辆车子都要一百多万。”

笔者发现，由于生态旅游产业在整个青浦地区的蓬勃发展，实际上许多村民都曾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但即便如此，他们对于村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做法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边缘地位。在他们看来，旅游的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老板”，而自己只是打工的。“不看好。他们的想法就是得过且过，反正每个月的工资发给他就行，农民就是想得比较实际，眼前的”。过去二十年间，不论这里的青壮年还是老年人，都已渐渐习惯依靠四处打零工来补贴家用的生计模式。在这个处于城市化边缘的小村庄，“非正式就业”形成了一种常态。他们是拥有上海户籍的“农民工”，从生存意义上讲，他们早已脱离土地，但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仍是农民，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变这一身份的机会微乎其微。这种漂泊而模糊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极度渴望稳定的工作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身份，从而形成了传统保守的职业观念。“这里的孩子，要么读书艰苦点，读出去，那么找个工作好一点，读不出书不行的。人生啊，希望工作找得好一点，工作好么，工资大，人又省力，工作不好么，钱又少，人又辛苦，肯定是这样的……乡下人到城里，买不起，现在买房子，再破也要两万块，一百个平方就要两百万。工作好么，公积金贷款，稍微好一点，所以工作要找得好，交得多么，无所谓的。商业贷款，要大一半都不止”。

留守乡下的老人们在田间村口攀比着晚辈在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城市成为整个家庭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所在。于是，一切资源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生动地反映在每一户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岑卜村，出现了许多奔波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候鸟奶奶”。她们隔周准备好自留地里的蔬菜，提着大包小包地赶到西岑镇上，乘着超市免费班车到城里帮子女们照顾孙辈。此外，为了给晚辈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留守老人们生活大多极其清苦，独自在家时，他们几乎不买菜。很多早已远远超过退休年龄的留守老人仍在努力挣钱。在某次农场的活动上，笔者见到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灶台前忙着下水饺、收拾桌子。只要农场正常营业，她就每天来干活，一天的收入是八十元。在村口，有一对年过七十的老夫妇一边守着小卖部，一边埋头编着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手链。编一根这样的手链大约需要十五分钟，收购价格是四毛钱，老人每天从早编到晚，可以挣到大约十块钱。据老人自己说，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在青浦城里买了房，一个在西岑镇上买了房，有个孙子在上海的名牌大学读研究生。言语之间洋溢着欣慰和骄傲。

然而，关于自己如何度过晚年生活，老人们表达了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眷恋。“像我这种年纪，还是想呆在这里，家乡，乡下有乡下的生活。现在我到青浦去，路上都是人。上半夜一个小小孩哭，下半夜一群外地人聊天，闹是闹得哟睡也睡不着”，同时也透露出丝丝的无奈和凄凉，“像我们儿子媳妇，一年回来一次到两次，以前是没有车子，现在有车子了，还是在青浦外面玩。以后这里都是外地人。像我们这种年纪，两家并一家，再老么，四个老人送到敬老院去，肯定是这样的”。

### 第三节 蓝图与现实

即将启动的“美丽乡村”建设是眼下岑卜村的热门话题。“美丽乡村”建设是继“新农村建设”之后新一轮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新热潮。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提出10年左右时间，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乡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为贯彻中央精神，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2014年7月，青浦区政府形成了“1+6”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制度，从2014年到2016年，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先行先试，创建美丽乡村达标村50个左右，在此基础上，创建美丽乡村区级示范村20个左右。2015年4月，金泽镇蔡浜村被评为首批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就在同时，金泽镇东星村、岑卜村、淀西村被列入2015年度镇级美丽乡村试点村，在此基础上，2015年末岑卜村通过2016年度区级美丽乡村试点申报工作区级评审，即将在2016年启动建设。

来自政府的巨额拨款，吸引着社会各路规划设计人士一展身手，同时这也意味着乡村发展面临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村委会领导班子组建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岑卜村美

丽乡村规划组两支规划队伍。其中，“新村民”群体的领袖人物来自台湾的生态规划设计师薛璋是美丽乡村规划组的带头人。他拿出了酝酿多年的《岑卜村美丽乡村运营项目及相关设施方案》，这是多年来“新村民”最为直接、有力地参与到村庄社区发展事务当中。根据他的设想，旨在把岑卜村打造为“让农村回归生态物种多元化、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农业回归自然耕作提供健康蔬果粮食、农民增收小康”的“居家养生乐活社区”<sup>31</sup>。

据笔者的初步了解，“河道是否应该拉直”是目前各方面临的最大分歧。村委会认为，拉直河道、加筑堤坝，能够避免水草漂浮，美观又干净；“新村民”则以周边已经完成改造的蔡浜村为反面教材，批评这样做不仅破坏自然生态，还影响了水乡村落的景观。调查期间，几位新村民向笔者抱怨道，“我们考虑环保，可是他们想要硬化，一硬化就不太好了。有个蔡浜村，已经把这个美丽乡村落实了，但是它搞得不太理想，地面都硬化，家里都铺上石头，家里没盖楼房的，统统给它盖上。听说家家都有几米高的围墙，大院子。有几千万，那简单得很。那就变味儿了，人为的事情太多，不像这边自然味道的，还不如现在的房子”。有部分“老村民”持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心拉直河道需要拆除临河的房子，会影响到自家房子的结构，而对于更多的村民来说，新一轮建设的启动意味着拆迁的彻底落空，于是更加置身事外。

“美丽乡村”建设正在金泽镇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生态旅游这条看似光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否真的如人所愿？尚待时间去为我们揭开答案。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是政府在推广生态旅游过程中强调的一大利好。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吸引多少劳动力返回乡村。就在不远的将来，有耕作经验的劳动力将彻底消失，生态旅游的美好蓝图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有人已经开始担忧“现在六十岁算是最年轻的，再过五年，真的找不到人干活了。快要五十岁的人，从美培亚退下来，肯定还会来干。五十岁再以下的人，就困难了，他要是不在美培亚，在市里，就不会回来干农活了。”也有的人这样麻痹自己，“这也是个问题，不过到时候总有办法的，总会有人干的。社会上的事情，不要去多想，总会有新的事情出来”。

笔者久久忘不了那一天夜晚，划着小船，凝望着在这静谧的美丽乡村，几位“新村民”之间简单而意味深长的对话：

“五年以后，这村子要大变样”。

“也不会多大变样，现在这一级级的”。

“五年以后，你还想在这里吗？”

“在不在呢，谁也不知道”。

“这几年是没问题的，混混吧”。

<sup>31</su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744290102wmp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744290102wmps.html) 《岑卜美丽乡村运营及相关设施方案》-青蛙小站\_新浪博客

推介：柴茜的硕士论文《记忆之城：平遥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地方与晋商想象》以平遥古城中柴油机厂为中心展开田野作业，在访谈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回顾了从平遥柴油机厂到平遥国际摄影展所经历的三次经济转型，并从国家政策主导、地方权力运作和个人惯习认同等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三次转型过程，以平遥的转型折射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时代风貌，作者所提出的晋商想象很有新意，晋商想象是平遥不同于其他古城的区别符号，但不足之处在于以晋商想象为核心的平遥社会记忆在平遥柴油机厂转型为平遥摄影展的过程中所担纲的角色应该有更为清晰的分析。

复旦人类学 2014 级 冯博雅

## 记忆之城：平遥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地方与晋商想象（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4 级 柴茜

### 第三章 从衰退到重塑：平遥柴油机厂的三次转型

从平遥古城的西门凤仪门进入，沿着西大街走不到十分钟，就能看到一间占地面积广阔的工厂遗迹。之所以称其为“遗迹”，是因为这里的厂房、烟囱、车间无一不在向观者诉说着从前热火朝天的工业生产场面，但是走进厂房，里面空空荡荡，没有机器，没有工人，没有声音。建筑看似维持着从前的形貌，但仔细看却会发现不少修饰、改建的痕迹。门口也不再 XX 厂的明显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九韵·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几个醒目大字。

这个占据了平遥城内寸土寸金的一大片土地的地方，曾经是拥有职工一千余人的晋中柴油机厂（当地人通常称其为平遥柴油机厂），也是平遥有名的“铸造孙家”曾经的大本营。据《平遥县志》记载，民国 9 年（1920 年），在天津新式工厂当过工人的孙希发（河北交河县人）和本县刘玉章在城内西大街合伙集资 675 元，兴办聚兴铁工厂，有职工 20 名，生产设备有 6 尺元车、1.6 尺钻床、熔铁炉、1.5 马力煤气引擎机等。主要生产轧花机、机械齿轮和农机具零件等，年产值 2455 元。随着业务和设备的不断提升，聚兴铁工厂的锻造技术成为山西省内前列，孙希发联合山西的其它机械厂家共同成立了行业协会，并担任行业会长。

新中国成立初，聚兴铁工厂更名为玉记铁工厂。1954 年公私合营后改名为“榆次专署公私合营平遥玉记铁工厂”，成为当时晋中地区的首家公私合营企业<sup>32</sup>。60 年代末，玉记铁工厂被彻底国有化并转型成为动力型工厂，更名为晋中柴油机厂。

这一时期的转型是由国家主导、推动完成的平稳过渡。鼎盛时期的平遥柴油机厂，占地

<sup>32</sup> 资料来源：郝亮《平遥近代工业发展概述》载于平遥文化网，2012.5  
<http://www.pywhw.com/pywx/ShowInfo.asp?InfoID=6333>

面积 11.3 万平方米，拥有职工 1398 人，固定资产 957 万元，最高年产值曾达到 760 万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柴油机专业企业<sup>33</sup>。当时平遥有三家同类型的单位，被当地人称为“三大厂”。属于重工业的两家分别是省营的电机车厂和地营的柴油机厂，还有被划归为轻工业的平遥火柴厂。

柴油机厂是其中唯一一家厂址位于城内的工厂。从西大街的正厂门一直到西城墙根包括了工厂的工作生产区以及家属生活区。<sup>34</sup>

从厂区一直往里走，穿过车间和厂房，曾经的一大片工厂家属区如今已作他用。而厂区本身则自 2005 年左右工厂彻底宣布破产后便一直荒废。没有立即进行开发的原因有很多，但在确定开发策略之前，这里只好持续闲置。2001 年起，每年一届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开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游客。破败的工业时代遗迹，鲜明的体制烙印，逐渐聚焦了外国摄影师的目光和镜头。人们发现这片破败荒废的厂房原来还有其它的价值。经过翻修和重新规划，2011 年这里被第一次启用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主场馆，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一间小县城里的大型国营工厂，平遥柴油机厂的兴盛、衰落、转型都与这座小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更直接影响着本地居民的职业和生活。作为平遥工业化时代的典型，以柴油机厂为代表的平遥“三大厂”在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期和转型的阵痛期，小城经济和小城居民的生存状态也同时经受着巨大的打击。如何走出困局，成为这些晋商后代们远离本业近一百年后重新思考的问题。

### 3.1 适应市场：柴油机厂的第一次转型

1969 年前后，平遥柴油机厂正式国有化并转型为动力型工业，开始主要生产柴油机。尽管在鼎盛时期拥有相当规模的职工数量和工业产值，但由于生产的柴油机属于国家高度控制的职能产品，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产包销，并且产品由国家定价，工厂本身基本没有什么利润，收入刚够职工开支。

可以说从转型为柴油机厂一直到改革开放，除了按照规定向国家上缴税收之外，厂子并没有为国家创造什么利润。

工人们承认柴油机厂的存在是国家计划的产物，探究其效益本身，似乎并未给国家经济带来什么大的推动，主要的作用则是解决了大批本地人的就业问题和生存问题。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得“三大厂”的工人和工人家属们成为平遥县城里令人羡慕的一个群体。

而到了计划经济后期，虽然国家尚未完全放开市场，但几个国营大厂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对于平遥柴油机厂来说，竞争对手来自南方比如无锡、常州的柴油机厂，也有山东、东北的几个大厂。一旦市场形势不是太好，这些大厂就基本占据了国家的需求指标，“包产包销”已无法落地，厂子自然也就处于了亏损的状态。熬到改革开放，国家政策的潜台词是“不挣钱的企业就自然淘汰”。平遥柴油机厂更是面临着重重困境。

<sup>33</sup> 资料来源：康少琼《平遥孙家山西铸造业里的大宅门》载于山西新闻网，2014.9

<sup>34</sup> [http://www.sxrb.com/wb/wh\\_0/4107523.shtml](http://www.sxrb.com/wb/wh_0/4107523.shtml)



改革开放以后，平遥柴油机厂努力适应市场和自由竞争，也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效果。例如 80 年代开始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产品质量明显提高。1984 年，平遥柴油机厂生产的 S195 型柴油机获得了山西省优质产品称号。

但是短期的成效依然不能阻挡整体效益的迅速下滑，时至今日，工人们认为当年转型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平遥柴油机厂始终背负着国营单位的沉重包袱。包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受限于体制，在灵活性和经营手段上比不了私营企业；二是几十年下来积累形成的职工保障负担。

虽然在改革开放头几年，国家的意思好像是名义上让你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但是实际上，给那些私营单位放的口子更大，给国营单位说起来是在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上不是。为什么不是呢，私营单位比如说你是老板，今天需要 100 万资金，你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融这个 100 万或者贷款，比如 1 月份需要这笔 100 万的贷款，我 12 月份就开始跟银行协商，1 月份这个钱就到位了。不管是用什么手段去找银行也好，总之是这个钱很容易到位。对于国营单位来说呢，会计制度等等都还得按以前毛泽东时代那套走，一个厂子的厂长也不敢从财务动用上钱去打点银行什么的。1 月份你需要到位，但实际上 6、7 月份也给你到不了位。到年底了，国家考虑到要养活职工，就把这笔钱通过官方渠道给你放出来。但实际上机会已经失去了。机会一失去，这个钱拿回来也没用了。厂子在这几个月时间已经垮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钱到位以后只能补，补一些窟窿，而不能继续用来发展。所以厂子就逐渐逐渐往下垮，国营单位大部分都是这样垮下来的。

再一个，柴油机厂改造是在 54 年，54 年改造以后一直都是国家在经营这个厂，到改革开放以后，老点儿的职工都退休了。当时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也是企业来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这个厂子就不能甩开手去发展，不是说所有的收入都能放在经营上。至少一半的钱都得拿去对付这个历史包袱，肯定不能跟那些新成立的公司去比，负担太重。所以国营企业逐步逐步就垮了。

柴油机厂试图“适应市场”的转型行动可以说是跌跌撞撞终归失败的，导致其衰退期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用工人们的话来说是“垮了好几次”。在邓小平时代，厂子效益不好，但总归还能发发职工工资，自己还能发展少数新产品。当时政策要求工厂必须“挺住”，因为不能让大批的职工全都跑到社会上来，“抢”社会上普通居民的饭碗或者其它行业的饭碗，给社会增加负担。在这个时候，厂子为国家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即使重重负担阻碍发展，也必须让职工待在厂里不让出来。工资则是越发越少，从百分之七八十，到百分之五六，再到百分之四十。到了江泽民时代，厂子里连百分之四十的工资也支付不起了，这个政策基本上也就执行不下去了。

在跟几个厂子的老员工交谈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让去看几部讲述这段历史的电视剧，他们认为电视上演的完全就是他们当时的状况。对于国营工厂改制的过程里面职工受到的那些磨难，他们感同身受。

当时我们几个工人坐在一起就没有其它谈论的，就是说咱们咋办呢，咋办呢。那时候都为了一个求生存，都不可能考虑这个厂子以后怎么样，国家以后怎么样。国家都不管我们了，我们还能管厂子什么。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在基本收入都无法保障的状况下，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开始在工厂本职之外寻求额外的收入。头脑灵活一些的，胆子大一点的，做起了一些小买卖。比较老实的，搞技术的，就出去给个体户打打工。如果是技术能力比较单一的，像火柴厂的工人，很多则找不到事可做。好多人家几代人都是一个工厂出身，就是向亲戚朋友求助也没有用处。你是这种情况，他也是这种情况。

原来在柴油机厂当车间主任的李宏龄，1993年开始也不得不辞去车间主任的职位，开始出来打工。用他的话说，“不能干了，生活不下去，不要说养活自己车间的职工了，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由于技术水平强，他陆续给一些做铸造和机械加工的个体户打工。个体老板们大多出身农民，对于技术一窍不通，但是人家有些门路，能从银行贷出款来，就能把厂子办起来。但是厂子办起来以后缺少技术工人，柴油机厂和电机车厂这两个大厂出来的老职工成了技术主力。但是个体企业的利润属于经营者，工人们每天只能赚十几二十块钱的工资，而身份依然隶属于国营工厂。

这段时期给工人们留下的记忆是非常苦涩的，一方面他们要为了生存苦苦卖力，另一方面他们则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柴油机厂的衰退过程有多久，工人们遭遇的困窘局面就有多久。漫长的忍耐和等待磨掉了大家的锐气，工人们希望能够更快地摆脱当前左右为难的状况，哪怕需要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 3.2 破产改制：柴油机厂的第二次转型

在难以扭转形势的客观环境下，破产清算似乎成为了企业唯一可行的解决手段。然而柴油机厂“闹破产”过好几次，却通通被政府驳回。或者只能是名义上破产，把原来的一些债务沉淀，让企业不再背这一部分负担，但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可以说这个是从政策上，各级政府搞出来的。所以我们厂破产破了三次，前两次破产都是改上个厂名，换上个大印，跟银行把这些手续一转，就属于破产了。所以我们的厂名后来搞成机械制造公司什么的。

政府对企业破产行为的把控主要还是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大批下岗工人进入社会所带来的就业压力、维稳压力成为了各级政府拖延时间的理由。

直到2004、2005年的时候，国家大规模企业改制，从政策层面只保留扶持大中型企业，像平遥柴油机厂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则被大大放宽了破产限制，甚至鼓励破产清算。政策方向的扭转终于给柴油机厂带来了破产清算的时机。总体来说，平遥县的国营企业破产改制时间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了政策原因，平遥对旅游业的逐步开发也让在城内搞工厂根本不再可能，更何况是

污染特别严重的铸造业。要么破产，要么迁移到城外，成为了柴油机厂面临的唯二选择。

国营企业的破产清算重点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资产的清算，二是职工的安置。

工厂破产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穷二白，技术设备大多数都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民营企业。只有城内的土地比较值钱，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土地价格。国家对破产企业最大的政策要求就是要把职工安置以后才能完成破产程序，安置职工的费用则大多来自于出售土地。当时电机车厂和火柴厂的土地都由某些出来自己经营公司的职工出资购买了。但是柴油机厂由于位于城内，这块地皮不允许建厂，所以搞工业的没人愿意买，反而成为一块扔不出手的烫手山芋。最后，一家名为九韵集团的企业出资七千万购买了这块地皮用于旅游开发和经营。而这家企业的来头、性质则让职工们议论纷纷，给当地人留下了许多猜疑和八卦的话题。

在职工的安置问题上，大家反而都没有表示出太多的不满，反倒是觉得至少有了解脱。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出来，无论是“买断工龄”，还是针对“4050”群体的“10年养老保险”，对职工来说都是一种交代和了断。因为破产以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工人们一方面名义上保留着厂里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还要在外面给个体户打工以补贴收入，在社会上的位置也是特别的低。给个体户打工呢，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可言，老板对你尽可能的刻薄，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做人。

尽管在解决职工安置的过程中，部分单位的下岗职工针对解决方案进行过激烈的反对和抗议。但是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人对于这一下岗潮的态度是“终于解脱了”，意味着持续二、三十年之久的体制职工生涯的终结。从此之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迅速扩大。借助旅游业的东风，平遥人“胎儿带”的商业基因似乎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在这条产业链中找到自己谋利的一个点。李宏龄也进入一家私营公司担任技术指导，养老保险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他觉得自己终于过上了“有质量”的生活。

真正从改革开放到我们能有靠得住的生活状况，都是退休以后了。到了胡锦涛时代，当时比我们年龄大一点的，都给办了退休。尤其是把退休职工的工资全都给纳入了国家的劳保系统。这部分退休职工的工资跟企业脱钩了，所以到月底的时候不管高低但终于按时发放了。这才开始让这些工厂里的职工有点生活保障了，生活得比较轻松了。真正有压力的时候持续了将近二十年。

此外，在以柴油机厂为代表的国营企业破产改制的过程中，当地人中间还私下流传着一些“变公为私”的八卦议论，当地一家大型的焦化企业老总成为了这场话题的焦点。

这位老总的出身是平遥电机车厂供销科的一个普通职员，还曾经在化肥厂当过工人，后来改革开放以后调到了社队企业局。由于头脑灵活，会做事，再加上妻舅是晋中地区某经委主任，他在社队企业局站稳了脚跟。当时的山西经济，可以说是哪里有煤矿，哪里就富裕。虽然不像附近的介休、吕梁那样资源丰富，但是平遥也开始计划发展煤矿和焦化企业。这位老总借助县里的投资，在附近的村子搞了一个焦化厂，一个汽车运输公司，这两家企业仍属

国有,而他本人则成为具体的负责人。这个当时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后来逐渐变成了私营老板,而且几乎垄断了社队企业的煤矿资源,逐渐发展为当地最大的私营集团。

对于这个“变工为私”的过程,当地人悄悄说“就是拿共产党的棒子敲共产党的大腿”。他们对此的理解是,企业以公家的名义去搞确实面临很多限制,国家收的利润也高。在当时的改制潮流中,该厂也曾公开搞清算、引资。这位老总起初不动声色,表示估价太高负担太重不愿购买。一家天津企业的老板来平遥谈合作,却因为背后的阻力太大不得不撤资。这时候这位老总站出来搞股份制改革,自己成为了主要控股者。社队企业的煤矿和焦化厂都归了他,他几乎掌握了平遥主要经济脉络的一半以上。后来 2013 年、14 年的时候,国家政策又出新改革,这家企业通过购买职工手中的股份,彻底成为了个人的集团。当年职工一万元购入的股份,公司以二十万的价格赎回,高额的回报率让这一过渡平稳而高效。

对于这个当地的“首富”,最大的私营集团的领导,平遥人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承认他有本事,会做人,也有的认为他不过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他实际上就是个投机取巧的本事,是政客的本事,不是商人的本事”,有人这样评价他。

这一批国营单位的改制转型过程大都是晦涩而不够透明的,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职工,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似乎都在摸索着前行。没有一个规范的准则去依据,没有一个切实的机构去监督。灰色地带的存在,除了给当地人留下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也确实成就了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资本积累阶段。国家力量主导的第二次转型中加入了更多市场和人为的干预因素,在国家对一些个人力量干预的默许和放纵背后,政府和个人力量所达成的实际上是某种合作的关系,共同将政府手中的资产推向了市场。

### 3.3 从工厂到摄影大展：柴油机厂的第三次转型

前面提到由于占地面积广阔,且古城内土地使用的限制,破产清算时的平遥柴油机厂厂区一度成为无人接手的“烫手山芋”。后来,这片土地以七千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名为九韵集团的公司用作旅游开发。当地人认为这个集团的性质不明,似乎是政府官员私下主导的。而当笔者来到平遥县委宣传部访谈相关人员时,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融资、投资的运作平台,作为政府的桥梁用以完成一些从政策层面不能以政府名义出头的开发项目。他们表示这一企业完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引进外资搭建的平台。

最开始,柴油机厂的厂址被定位为开发高端一体化服务的国际会议中心。国家禁止新建场馆和高规格会议中心的指示出台后,该集团就只负责柴油机厂厂区的日常管理和旅游开发。除了重点服务于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之外,该公司平常也会适当引进一些外地项目,比如灯光展、昆虫展、冰雕展、儿童乐园等等,作为一点额外的补充收入。

自此,已经失去实体的“平遥柴油机厂”彻底转型成为了一个旅游开发项目,平遥的工业被移出了城墙之外。柴油机厂重新出现在游客面前,就是一个具有工业艺术气息和时代

建设印记的展览馆，作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一部分而存在。就像北京的 798，上海的田子坊，艺术家们在此寻求着一种名叫“怀旧”的文化气息。然而又与 798、田子坊不同的是，平遥柴油机厂的生命力似乎只在每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的那段时间里散发光泽。除此之外，这里通常只是一片游客罕见的空置区。

说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这是当地政府认为除了 1997 年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外，平遥最为成功的一次对外宣传。平遥的旅游业直到 1986 年才开始陆续展开。1995 年到 1996 年，平遥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旅游兴县”的政策，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平遥一下子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游客猛增，仅当年门票收入就达到了 104 万元<sup>35</sup>。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China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简称 PIP）起始于 2001 年，于每年 9 月 19 日开展，到 2016 年刚好走过 16 载。2016 年的主题是“天地心，家国情”，共计有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81 名摄影师，522 个展位，15000 余幅作品参展。作为中国十大节庆之一，它被视为中国国内最大型、最知名、最为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摄影展览，甚至被称为“全球摄影人的奥斯卡”<sup>36</sup>。

作为政府推动操作的文化项目，从国家到省、市的各级单位都表示出了相当的重视。2016 年 8 月，当笔者第一次来到平遥县委宣传部采访相关人员时，他们刚刚从北京和太原开会归来，带来了本年度最新的上级指示。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筹备工作由三个团队共同完成：组委会、执委会和艺委会。组委会来自于山西省委宣传部，负责摄影大展的组织规划；艺委会来自于太原一家名为新晋商联盟的艺术策划公司，负责具体的策展和艺术策划；执委会来自于平遥县政府，主要负责行政协调和接待工作。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诞生原本就是省里自上而下推动策划的旅游项目，因此在大展的前几届，筹备工作都是由省委宣传部直接参与，平遥当地政府只负责配合协助。直到 2015 年，组委会权力下放至平遥县委宣传部并取消执委会，当地政府在活动当中的参与度才明显有所提高。这一权力下放的指示来的非常突然，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而对于摄影展来说，艺术策划才是真正关键的部分。太原新晋商联盟与组委会之间属于合作关系，是独立的运作单位，在策展方面拥有着较高的话语权。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抱怨，这些艺术家们都很有个性，常常不接受政府给的安排，跟他们沟通起来有时十分费力。而关于这几个筹备单位之间的合作方式，“15 年之前，三大委员会是各管各的，各做各的。9 月份之后才聚在一起协调办公。”

<sup>35</sup> 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平遥县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9：808-809

<sup>36</sup> 资料来源：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官方网站  
<http://www.pip919.com>

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成功经验在前，国内各地也纷纷模仿推出了各种地方摄影展。但平遥的筹备人员表示，“平遥模式”已经渐成体系，这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他们的信心来自于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既有优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尤其是最能代表“官方”的声音。

以同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正在尝试举办的图片展为例。他们认为丽江古城的地理环境限制了摄影展的开发。丽江古城没有城墙，城内建筑依山而建，导致展馆无法集中。同时他们的艺术策划也比较简单、单一，策展单元、系列不清晰，没有世界著名的摄影大师加持，也没有专门的接待机构和管理团队。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奖项没有官方的认证。

尽管工作人员对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信心十足，但他们也承认目前遇到两大问题，一是存在摄影家流失和艺术水平的问题，二是资金保障的问题。

国内外的艺术家、策展人们总是偏好于最原始、最不加修饰的地方来激发创作灵感，平遥的摄影展越发成熟的同时，古城旅游业的开展也让这里改变了最原始的风貌。最近几年，摄影家们开始出现流失的情况，但同时新人的补充让这一问题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另外，平遥的摄影展举办了 16 年，在艺术创新和艺术水平上却没能和参与人数的增长保持一致。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资金有限和感情原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十几年从未换过艺术策划团队，但在不换策展人的前提下艺术风格很难改变。如何传承、创新、发展，这是他们最近研讨会的重点，但未来的走向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位。

此外，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的资金投入非常庞大，“相当于是政府出资的公益性活动”。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门票收入、和艺委会一定范围内的招商收入。但后两者所占比例很小，主要来源依然是财政拨款。“省委宣传部给一部分，市里一部分，县里一部分。但是平遥的比重最大，每年都会有专款支出，有审计部门专门审计”。

资金保障的主要压力在地方政府身上，当前的政策要求是“竭尽全力保大展”。摄影展在政府层面是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更是缓解平遥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但是政府层面对于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发展却同样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因为，“领导一换届，思路就变了”，这使得平遥的旅游开发难有连贯的、体系化的发展路径。

此外，在笔者亲身经历第 16 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也发现，普通居民在当地的这一标志性活动中参与甚少。除了旅游业的从业者为了接待短期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所做的准备，普通居民对摄影展习以为常且缺乏兴趣。他们觉得这是办给游客们的活动，是每年生意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与当地文化和日常生活并无太大关联。

人们依然习惯将西大街的那块地方称作“柴油机厂”，因为除了每年为期一周的摄影节期间，那里依然是一片废弃的厂区。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柴油机厂”始终是他们古城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他们生命历程的重要回忆。当地人对柴油机厂这样的国营工厂怀

有深刻而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这里既承载了曾经关于集体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幻想，也记录了工人和家属们长期困窘和担忧的苦难记忆。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并未能够带给他们完全的信心。一些从工厂里出来的老职工们对平遥经济发展的现状仍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普通居民所从事的旅游业都不过是小本经营，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只有煤炭、焦化、制造这样的工业才是地区发展的根基，而平遥的这一根基现在正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

## 第五章 结语

平遥古城的经济转型实践既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缩影，也极具地方特色和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计划经济时代的平遥陷于困窘中无法解脱，而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波折重重。平遥柴油机厂的三次转型和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发展历程共同展示了地方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力量、地方政府和个体生活世界三者之间的力量博弈。

计划经济和单位制度的遗产不仅在改革初期影响着企业转型的宏观方向和具体举措，并且在整个转型阶段始终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

魏昂德（Andrew Walder）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度下形成的地方社区里，政治、经济权力和大量的政治组织几乎完全深入地融合成了一体。他提出了“组织依附理论”来解释工作单位在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单位的重要性，工人及其家庭、国家、政党都依附单位组织实现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国家通过单位来控制经济同时实现稳定社会的功能。个人对于单位的依附则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几乎完全取决于政策指向和上层意志。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单位制度下是极为分散的，他们作为国家力量的具体执行者而存在，起着行政协调的功能。

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下的单位没有明确赋予的产权，企业的层化并不以盈利能力来决定。平遥柴油机厂即使在其发展的辉煌期也没有创造属于自己的“利润”和“资本”，工人们所依附的单位并没有独立保障其生产和生活的能力。地方政府和单位本身都是国家力量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在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放松了紧密的控制，地方政府“接管”了一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通过单位制度建构起来的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将国家力量的权力关系记录并传递了下来，以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在市场和市场化企业中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力量依然保留着对发展方向的决策权。“道路独立”的模式在当地显著存在，先前存在的制度、结构和状态深刻影响着改革后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此外，地方政府以“公司”身份介入当地经济转型和旅游开发的过程，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地方发展实践的一个重要特色。地方政府的这种“非正规实践”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并常常被认为是中国惊人的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

柴油机厂的破产改制，九韵集团的成立和运作，甚至于一些平遥当地焦化企业的私有

化过程，背后都有着地方政府的深入参与。通过对资源和权力的协调，以及对非正规运作的默许，地方政府同时以政策制定者、监督者和市场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地方经济转型实践中，使得地方经济的转型同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滋生了灰色地带的出现和政府腐败、经济公正等问题。

而作为普通个体的平遥当地居民，在地方经济转型实践中的反应最初是被动的。单位制的解体，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和重塑，让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被打破和彻底消失。下岗工人和农民都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和新的角色。他们在宏观社会改革的推动下被迫转换职业，得益于旅游业的春风重拾传统的经营活动。

但在新角色的塑造过程中，平遥商人的自我转型实践是主动的，并且充满了调适性的智慧。平遥人对于经商有着继承而来的一套成熟的商业理念，并有着适用于经营的良好个人素质。平遥古城的一度贫瘠成为了平遥商人们改善生存环境的最大动力。他们用“胎儿带”来生动表达其对于商业经营的高度自我认同，将历史经验和强大的集体驱动力转化为具体的、因地制宜的商业策略和商业行动，在经营活动中大胆而果断，清醒而谨慎。

平遥的票号历史在一百年后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平遥古城有着相比其它内陆小城更为成熟和超前的借贷思维。旧有的“欠账文化”和各种新出现的借贷方式同时存在，人们共同遵守并维护着良好的信用环境。在从国企工人和普通农民到商人的职业转型过程中，平遥人能够快速调整身份，进入商人角色，从不够成熟的经济结构中寻找个人发展的突破点，灵活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构建经营关系。除此之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决断力、执行力、话术和策略等方面，平遥人都展现出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商业素质，构成了地方商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时期的经济转型实践中，平遥商人们从当地传统的商业文化里获得了相当的助力。经济伦理（economic ethic）从未消失，而是嵌入在文化和惯习当中，通过指导具体的社会行动和调适性策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产生深刻作用。

人们对于早已沉寂许久的晋商群体怀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想象。《乔家大院》、《走西口》、《白银帝国》等等影视和文学作品更是将这种想象传播到公共媒介。各种复杂而系统的经营管理体系至今仍吸引着大批经济史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对于当地人，对于这些真实的晋商后代来说，他们所继承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观是通过家族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叙述和建构所传递和巩固的。

对于商业文化传统的记忆并非是一种个体意识，而是社会事件，尤其是集体事件。家族历史和个人生命史的反复叙述成为记忆建构的日常主导力量。国家和政府曾经对此采取遮蔽、弱化的态度，试图用集体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和私营理念，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开始重新接纳，并尤其鼓励和强调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身份下，地方经济伦理和价值观存在着多维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想象。



但令人遗憾的是，平遥再没有了当初金融发展的时机和社会环境，大的商业格局难以建构，平遥商人的“小商人意识”愈发浓厚，再难重现当初的辉煌。

在平遥经济转型和古城开发的过程中，城市功能逐渐改变，古城空间被重现设计，古城生活遇到了诸多困境。当前的平遥旅游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疲态，包括市场逐渐饱和带来的恶性竞争问题；亟待提升旅游市场层次的问题；古城维护和规划力度不够的问题；年轻人口不断流失的问题，等等。如何应对发展疲态，推动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决定这座古城未来十年发展可能性的关键议题。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在地化”和体验经济的浪潮，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将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命题。平遥古城要想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地居民作为地方文化和地方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权力并持续稳定的发展规划，更加立足于当地历史和现实实践调整开发策略，同时完成好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使命。

推介：在本章中，作者在丰富的田野素材的基础上对翁丁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当地人、游客之间的互动形态、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民俗村落的“旅游凝视”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行动是强势的，充满了规划者对当地文化的想象和他者化，而当地人在经济驱动和市场化的影响下正通过“反向凝视”逐渐掌握主动。当文化性遭遇商品性，翁丁文化景观的再造将走向何方？

复旦人类学 2014 级 柴茜

## “原始部落”的打造：一个村寨的权力关系与族群变迁（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4 级 冯博雅

### 第三章 从“自凝视”到“被凝视”的过程：“原始族群”的再造与复兴

在了解作为凝视中心的翁丁当地的历史发展和生活状态，以及权力关系变迁之后，我们进一步考察随着现代化发展翁丁作为民俗村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目前，翁丁作为“原始族群”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旅游开发，翁丁不断接受着政府，包括旅游局的传统侏族文化塑造，伴随着旅游凝视，形成以政府主导，当地村民参与的“文化景观”再造模式。

#### 第一节 政府与翁丁旅游地的发展

##### 一、政府的强势介入

当地政府作为侏族典型村寨文化景观的开发主体，在开发初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翁丁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与修缮。在对村政府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建设这个翁丁文化旅游是为了保护侏族传统文化，对其他村寨起到示范作用，使他们能够一同效仿，唤醒民族意识。同时，打造‘中国最后一个侏族原始部落’的旅游名片，是为了提升沧源侏族自治县的文化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为此，政府联合各方制订了翁丁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民居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培育等多个关键举措。

起初，政府为翁丁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旅游的机构，村民将其称为“管委会”，管委会就在村子里，2007年，又直接划归到沧源县旅游局统一管理。在2012年3月成立沧源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翁丁村的旅游开发，但由于公司的投资主体是沧源县政府，这使得旅游开发过程中并未涉及到经营权划分的问题，依然是以政府主导构成的“文化景观”打造权利主体。

现在翁丁村村民的感受是“上边对这里是不清楚的，不深入，很难搞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了嘛。”当地的李老先生谈到：“你看到外面才铺的石子路了嘛，都是政府用旅游的钱搞的，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铺啦，你说这些钱又不给我们，也是我们挣得嘛，也不和我们讨论，那个路之前的石子好好的，干嘛一直铺。”

政府的行政干预在沧源旅游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在翁丁的茅草房建设中可见一斑。在云南日报的报道中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归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一个村寨要进行旅游开发，总是要进行一系列改造的。在旅游开发之前，翁丁村的村民都已经过上了“现代人”的生活，不少人家建起了石棉瓦房。但最近，翁丁以“新”换“旧”，将石棉瓦房拆了重建茅草房，走上回头路，重享过去简单朴素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承诺每户补偿4000元作为茅草建筑经费，以此拉开了翁丁回归祖祖辈辈生活方式的大幕。”<sup>37</sup>根据少寨主杨建国所说，为了发展旅游业，政府要求翁丁全村改回茅草房，但茅草并不实用，每年都要修补草片，每五年还要重新换茅草。按现在的行情，每片茅草1块五左右，每户全部换成茅草需要1000片或更多。由于茅草也易引起火灾，为了经济成本以及安全考虑，当时很多村民不愿意换茅草，所以为了完成房屋重建，弥补村民的损失，政府每户补贴4000元，除此之外每年还有500元的茅草补贴，为期五年。

如果说翁丁原来是一个佤族自然村寨的话，在旅游开发以后，政府以强势主导的身份进一步“还原”其民族特色，在管理中，是对一个景区的纯粹商业运作，不仅在外观上改变村落，也不断改变着当地佤族村民生活和观念。

作为代表政府在翁丁行使开发权力的旅游局三不五时会到村里视察，对村民进行行为指导。在田野中，也遇到旅游局来视察的情形：

旅游局局长一行来到翁丁视察工作，到大门口见到导游，反复强调寨子里的村民，尤其是导游必须穿佤族服装，普通话要标准，见到客人来要用礼貌问候用语“您好，欢迎来到翁丁”，让人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到了佤王府，要求看守的老人要爱护卫生，不要随地倒茶叶和烟头，见到垃圾要捡起来，要把这里当自己家。（奇怪的是，这里本来就是他们家）“尽管很多游客只来一次，我们要让他们觉得我们虽然落后但是讲卫生的。”在村里遇到老人和小孩的时候，和他们说尽管不会说普通话，但是对于客人的要求尽量满足，比如拍照合影，不要拒绝，也不要向游客主动索要东西……在政府和当地村民之间，老人和小孩仿佛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村民对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意识，只能被动的跟着政府走，但同时他们也坚信“政府是不会害我们的。”“我们这里的人单纯，没有政府也不知道要怎么整。”

2016年，沧源县政府也加大了对翁丁景区的投入，根据最新版的《翁丁民族文化保护规划》，我们了解到当地政府正在按照5A级景区创建目标，打造建设翁丁佤族文化旅游体，并即将启动翁丁申遗工作。

<sup>37</sup> 李春林、谢进“《翁丁佤寨焕发生命力》，[http://yndaily.yunnan.cn/html/2014-10/18/content\\_890508.htm?div=-1](http://yndaily.yunnan.cn/html/2014-10/18/content_890508.htm?div=-1)

## 二、政府对文化景观的改变

在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中，基于政府对当地文化的凝视，重塑了当地的文化景观。现在翁丁的文化景观主要以展示作用为主，展示形式分为静态和动态，静态的族群文化展示主要是民居建筑、民俗陈列馆、佤王府、寨桩、墓地、寨门、木鼓、牛头桩、撒拉房等；动态的族群文化展示主要是村民的日常生活、歌舞表演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政府对当地的文化景观改造主要体现在静态的族群文化展示。

2006年，围绕着沧源县政府提出的“旅游富县”发展战略，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了《沧源翁丁佤寨原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经过多方筹集，前期总共投入了510万元，用于对翁丁的“原生态”的村容村貌进行的保护和再开发工作。以此为契机，在翁丁佤寨拆除了原有的购销店、粮店、学校等，同时也新建了佤王府和佤族民俗陈列室，改造了民俗活动广场，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和景区管理模式。与此同时，政府也着力保护翁丁佤寨内保留较完整的佤族民风民俗和建筑群，其中包括传统杆栏式茅草房、祭祀房、木鼓房、神林、女神图腾桩、寨桩、及传统家庭式的手工艺作坊等。下面笔者会以佤族民俗陈列室为案例介绍这种文化景观的塑造。

翁丁佤寨自旅游开发以来，吸引着中国的国内外旅游者，当地政府意识到“再现传统”的对保护古村古寨和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因此，独有“恢复记忆”功能的民俗陈列馆，作为整个佤族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作用不言而喻。笔者第一次进到翁丁佤寨时，就参观了个村支书强烈推荐可以介绍佤族文化的民俗陈列室。翁丁的民俗陈列室规模很小，占地面积438平方米，有两层楼，一楼是文字展板介绍翁丁发展历史，二楼里面展示的以农耕器具和打猎武器为主的物质景观，许多或是精美或是简陋的“原始”器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躺在橱柜里等待着游客的参观。

展览橱窗有两排，橱窗上的介绍文字除了汉语还附有佤语，依次分类，放着佤族传统生产和生活所用的物品。其中有种田工具（耙 *pa daix*），织布工具（*graeng*），刀具（长刀 *vaig lang*），容器（小土罐，大土锅），猪槽，水筒，乐器（芦笙，竹笛，竹弦鼓）等。在跟随笔者参观的当地大哥的讲解中，笔者发现展出的很多物品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是政府通过向所有佤族村寨征集才找到的。“我们见到有些东西也是没见过的，比如刀具啊，现在都不用了，以前佤族打猎啊，收割啊，现在种地都有机器。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用了，像喝茶我们都拿玻璃杯，只有一些老人还在用小土罐。”陈列室着重于再现已经在历史长河湮灭的前现代佤族社会的物质文化景观。在这里我们提出的“物质文化”是指那些“和人紧密缠绕相连”的物，“物质文化”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被提出的。在进入现代20世纪之后，面对新的文化的冲击，过去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体系等不断被瓦

解，与其形成直接关系的许多事物、意象也不断被边缘化、碎片化，与日常生活日益疏离，内在意蕴渐趋消散，成为与现代性不同的“文化他者”，只留下一些形象化的展示功能，我们得到的是有关“乡土”、“稀有”、“回忆”、“神秘”的景观价值。这样的陈列叙述结构虽然一方面体现了搭建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之上的种族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对这个进化论排斥的，对这些被认为是代表落后的物象及其价值的留恋，具体表现为深深的和怀旧相关的失落感。

在展览中的景观中，有两个橱窗放着佤族视若神灵的牛头以及葫芦。在翁丁，牛头的白骨可以说是挂的到处都是，从进村寨之前的路边的木桩上，树干上，到寨子里各家各户的门框上，无论走到哪，一不留神就会与这些当地奉若神灵的牛骷髅来个大眼瞪小眼，尤其是晚上黑灯瞎火的如果不小心走近了看到，笔者想想都觉得有点吓人。历史上，佤族人有剽牛和猎人头的习俗，牛头是佤族祭祀文化的符号。据当地长者介绍，一个家门口的牛头越多表明这家祭祀的次数越多，同时也表明这个家族在翁丁经济地位更高。究其原因就要说到佤族起源传说：司岗里（佤话，汉语就是葫芦）。传说古时候的一场洪水使得生物几乎灭绝，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头母牛，这时候天神让他们两个结婚，之后母牛怀孕可是却生不出来，结果男人就把这头母牛给杀了，剖出葫芦来，男人就把葫芦种在公明山上，通过浇水施肥，葫芦长大后，男人听到这个葫芦里有动静，就把葫芦剖开，发现里面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佤族的祖先。根据司岗里传说，当地人将牛当作是他们佤族的祖先，葫芦是他们佤族的圣物，也就是佤族的图腾象征。图腾对于一个族群是极为神圣和不可亵渎的，因为原古的人类在把某种生灵等当作自己的亲属、标志的时候，是将其看作保护神的，他们坚信这个图腾拥有超自然力，能够保护自己所在的族群，祈祷丰收和族群人丁兴旺。对于现在的佤族人来说，牛头和葫芦仍然是被当作“图腾”来崇拜的，就此而言图腾体现了一种血缘关系，图腾崇拜对于佤族的族群认同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图腾崇拜，能够确保族群成员在血缘上的一致。有的学者，如泰勒，认为“图腾文化”是一种宗教信仰，其体现的是一种万物有灵的理论渊源。而翁丁佤族信仰的多神教历来讲究万物有灵，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图腾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展馆设计者将当地的信仰以可见的方式展出，本意是希望佤族文化流传下来的同时，同时也是向大众传播当地的文化渊源。但是随着这些物品的展出，原本所含有神圣性也在被凝视的过程中逐步被消解。在对这些典型性的物品选择上，正是展示了政府开发过程中，政府和当地居民及其文化载体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对于佤族文化在陈列馆中的书写，这种怀旧的对象属于和现代文化不同另一种文化体系，展品处处体现了野蛮/文明，现在/过去的二元对立逻辑，由陈列馆展品反观整个旅游开发，似乎这个旅游地的开发就是为了展现一种“原始”与落后。有学者也曾将现在民俗旅游的这种趋势总结为“内部东方主义”（Luoisa， 2000），也就是说中国内部民族之间造就形象和

文化政治统治之间存在很大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中从事相关工作的上层人士主导描述的“东方主义”中，放在翁丁也就是地方政府对于翁丁佤族文化的凝视，规划者对当地文化的想象和他者化。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单方面的塑造，在民俗旅游的规划中似乎总是缺少当地人的声音，但考虑到翁丁长期在国家渗入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发展旅游业的今天，权力政治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得以表达。

## 第二节 当地人与游客之间的互相凝视

### 一、翁丁村落在旅游业中的参与:跃跃欲试源于经济驱动

在翁丁村旅游开发项目主要参与的村民比例很低，从2005年的5人到2015年12人，增长并不明显。他们主要负责售票，佤王府值班，旅游纪念品销售，卫生管理。当然这个现象不是刻意人为造成，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饱穿暖，自己直接能获得的收入，稍有余力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也没有专业的旅游管理知识，他们认为“政府带着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吧”，长期的依从关系也让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成一味听从，很少有不同意见。

当地村民对于旅游开发的不断跃跃欲试来源于直接的经济驱动。

“一天下午，在访谈中偶然闯进一位隔壁村寨的大姐，在我们聊到旅游的时候，这位大姐十分激动地表示自己村寨不让搞旅游日子很不好过。儿子初中就辍学了，还不是因为家里穷。于是我深深的明白对于穷困的边疆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会牢牢抓住任何可以发财致富的机会。”

住在寨主家客栈的我在山寨主空闲之余也谈到他建立客栈的契机：“当时（2007）是稻草人旅行社（苏杭一带的旅行社）组织学生过来写生，体验生活，就住在我家，打地铺，来的人也多了，当时寨子里没有客栈，我就想自己盖一个，政府一直没批准，但是我还是盖了，有了客栈么，多点收入，生活好过点嘛。”

在访谈一位兼职导游大姐时，我们发现她也是一名女司机。“一开始就是织布，但是村里织布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不好做。我发现很多游客来的时候打车来，回去就没有交通工具了，发现这是个机会，就去学车，跟人家借钱买了个车以后就在村里拉活，一天也有700、800的，挣的钱也够一家开销，和两个儿子上学了。”

在翁丁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是存在的。对于村民来说，发展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文化能够成为获得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文化资本，并不断带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当然，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村民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同的，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对于高收入接待户的羡慕以及一些收入不明的讨论，在村子里也是很常见的。在紧密狭小的村落邻里关系中，消息传得特别快，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两个导游接待户之间

的攀比猜忌的状况更为突出，除了每个月 300 的工资外，每个导游还有旅行游客单独给的费用，不过这笔费用不是强制的。由于笔者在田野中都访谈过这两位导游，在聊天中她们问的最多的就是另一个导游的收入问题。

透过这些攀比冲突，我们不难发现，在市场不断入侵翁丁的过程当中，当地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在走向崩盘危机的讯号。

## 二、游客凝视下的当地人

在任何一次大型表演中，翁丁村民身着佤族服装，卖力的演出就是为了给游客观看，在这里，表演的他们就成为了被凝视的对象。小李是一个在昆明上高中的孩子，他并不喜欢穿着又闷又黑的佤族服装。这些硬性的规定是没有办法违抗的，小李就会找一些颜色相近的裤子穿，但上衣就没法换了，作为表演中的个体，也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此时游客是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符号来欣赏的。在仪式过程中，游客们不仅用眼睛看，更多时候使用机器，也就是照相机来注视着这一切。

表演时被凝视，不表演时，村民也是被凝视的。村落日常生活也是照相机下被记录的对象，或许是在家里织布时有人突然闯入进行拍照，或许是背着背篓上山砍柴途中遭遇摄影的需求。在游客游览途中，经常见到的是老年妇女，他们穿着穿传统佤族服装，包头，戴着大耳环，手拿烟筒，这些传统的装束赋予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呈现，不断吸引着游客驻足观看，拍照。

一群游客来到撒拉房时，碰到在里面抽烟筒休息的老奶奶，旁边放着刚从菜地摘回来的菜，游客产生了兴趣，想要和老太太照相，有游客就让老奶奶把背篓背上进行拍摄。7，8 个人依次与老奶奶进行了合影。

游客们对当地村民的凝视更多源于一种好奇，在一个个影像被定格的背后，村民日复一日的生活在这些被游客们看作新奇神秘的物象中。有村民很自豪地和笔者聊到：“他们没见过才会来嘛，我们自己天天看也不会特意跑到哪个寨子里去玩，来玩的都是离这里远的。”翁丁的游客与当地人只是短暂相逢，凝视和被凝视成为二者互动以及佤族文化景观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

同时，这些凝视带来的的是看与被看权力的书写，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在医院，监狱，学校等全敞景式空间里，凝视的可见性直接产生了权力，不断规训着社会，这种观念在旅游中也被广泛应用。在翁丁佤寨这一敞景式环境下，游客们肆意，自由的用目光凝视着当地村民，游客们是有特殊权力的。那么，这个权力是从何而来的呢？首先，游客买了门票，从社会交换的角度上看，已经成为文化符号的佤族人民被纳入了文化景观的范畴，应当接受游客的凝视。另一方面，虽然村民不必因为一张门票就展示在对方的影像中，成为权力的被动者，但是处于他们朴素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的认知中，游客花了钱想拍拍，想照照都是理所应当的。“来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就让他们拍拍吧。”当然，也有一些村民不愿

意被拍，其中一位老太太被要求拍照时，因为不会说汉语，直接就跑走了。过后，会有旅游局的负责人过来做思想工作，希望大家配合翁丁的旅游开发。这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同时在照相机面前，村民也具有一种“敬畏之心”，参加拉木鼓视频拍摄的小姑娘告诉笔者“有镜头在面前，就要好好的做。”在此之外，具有凝视权力的游客在心理上占据更多优势，在目光的碰撞当中，当地村民往往目光游离，不愿与其正面交锋。

一日，在与正在织布李姐交谈的过程当中，一堆旅客走了进来，纷纷拿出照相机进行拍摄。李姐被游客包围，明显感到不自在，平常娴熟织布的动作在镜头前也逐渐慢下来。

这样的权利书写是扎根在市场的土壤中的，在政府主导下，社群居民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投身于旅游开发，作为文化景观存在，接受了他们在镜头中的位置，也接受了他们在这个既有秩序中的位置。

### 三、当地人对游客的凝视：市场化下的异化

#### 1、两个案例

##### 案例一：佤王府的主客交往

在村寨里最高大的建筑就是佤王府了。听到佤王府，笔者第一反应是难道曾经佤王住在翁丁吗，据导游杨姐所说，翁丁的佤王府是参照班洪的佤王，也就是胡玉山的王府重建的，这里以前并没有佤王居住。解放后结束了班洪世袭土司的历史，佤王府在各个佤族旅游景区“出现”，不再具有原来的政治社会功能，作为游客参观、体验的场所之一。佤王府的整体布局结构与一般民居无大区别，相较而言，佤王府更宽敞高大，屋子中间佤王座椅、枪杆与烛台还在，都保持原样，火塘也依然熊熊。负责在佤王府看守的五个老人，轮流来佤王府坐班，每天早上8点多钟，他们就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坐在火塘边，老人说道“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烧烧水，让客人在这里有茶水喝”。这些看护佤王府的老爷爷极少言语极少动作，但他们却会为前来的每一个人奉上一碗橙红透亮，冒着热气的大叶茶，让游客们宾至如归。跟随导游到这里的游客，如果有意愿，还可以在这里穿上佤族服装，坐在佤王座上，得到有偿的拍照留影服务。同时，如果游客想体验一下叫魂或者取佤名，也可以向导游支付一定费用获得这些服务，佤王府的老人会负责“给你一个佤名”，或是嘴里念念有词的为你“叫魂”。

作为一个人工旅游景点，佤王府就社会功能来说，已失去其原本的政治意义，而是带有明确的经济目的。这种被展示的“传统”与“权威”与翁丁佤族民众自身的族群生活或是文化传统已相去甚远，却和他们的经济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和其他商品一样，一旦文化被变成了商品，通过交换，商品就会发生异化，商品生产者也会与商品相分离。我们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及权威感受的展示也是基于比如游客旅游的需求以及要宣传佤族文化的考虑，而不是根据同一时空下当地佤族生活以及文化的需求，从某一角度上来说这正属于文化在商品化过程中的异化过程。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分离即文化商品生产者，也就是当地的



族群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或信仰需要来生产产品,而是为了和自己的文化毫无关系的旅游者,也就是商品消费者,来生产产品,即我们看到的侂王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侂王府以及其他以旅游为目的建造的侂族静态文化展示的文化性已被商品性所取代。

#### 案例二:导游和游客之间的交往

在这样的异化下,导游在引导游客参观这些静态文化景观的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讲解词进行包装,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以及主观性,游客获得的知识更多是被重新建构的知识。在跟随导游几天的导览后,笔者观察到尽管在寨门外的指示牌上的景区线路示意图上有着四条线,分别是:以寨门为起点,人头桩为终点的西线;以寨门为起点,神林为终点的南线;以寨门为起点,龙潭为终点的外围线一以及以杨氏神林为起点,民俗广场为终点的外围线二。但是导游带领游客的线路是固定且单一的。在买好门票后,导游会带领游客由寨门进入,经过侂族民俗广场,参观民俗陈列室,然后到木鼓房参观,接着去侂王府喝茶,随后经过女神图腾桩处,游览民居建筑,途经撒拉房,寨桩,人头桩,墓地,最后来到杨氏神林,顺便拜访寨主家。在这个过程中,导游对木鼓和寨桩的讲解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这天,导游肖姐带着一行人参观寨子,在木鼓房的时候,肖姐先给大家讲述了木鼓过去是侂族祭祀的讯号工具和族群间纷争械斗时的报警器,一般是平常是不轻易敲的。但游客们却习惯地拿起鼓槌正在敲敲打打,这时肖姐就说:‘向木鼓虔诚的祷告,不仅可以原谅你乱敲,还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很灵的。’说这个的时候让笔者想到生日许愿,游客们都相信了,煞有介事的开始许愿,还有一个游客问肖姐可以许几个愿。随后游览到寨桩的时候,肖姐照例给大家讲解:‘我们现在在寨子的中央,寨桩是每个侂族村寨必有的刻木记事图腾,寨桩台上的石头是寨心石,如果想要摸的话,可以许个愿,很灵的。’肖姐随后和我聊到实际上寨心石是不能被外人摸的,但是很多游客当时不摸,到了时间还是会摸的。在构建完这样的神话之后,我们到了杨家神树也有类似的构建‘你们当中有姓杨的吗,如果姓杨可以在这里拜拜,神灵会保佑你的。’事实上在之后和寨主家聊天的时候,了解到杨家神树不是什么人都能拜的,即便在寨子里姓杨的人也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权利,只有寨主家的人才可以。”

这些构建的说法,为这些静态的文化景观赋予了新的意义,邀请游客在这些景点处许愿体现了这里的“神圣性”,正好满足了游客不远千里前来这个“原始部落”所抱有的文化想象。在这个远离尘世的村子里,交通不便,宣传也不是特别到位,在游客来到这里之前,可以说基本上对这儿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更便易地”让当地在文化景观的展示中,加入更多可调节的讲解与故事。

## 2、反向凝视下的自我表演:自我意识的重建

1月的一天,有一场迎接需要打歌,在吃过午饭以后,少寨主通知各家各户做好准备。今天是1组和4组负责迎接,大约六十人,大家都换上了侂族服装,背上村民自己织的包包,

几个小伙子在脸上抹了“摸你黑”。头人指点两个年轻人将摆满礼物的小桌子摆在打歌场中间，当游客来时，他们唱起佤族歌曲，用所有热情迎接这些游客，妇女们手拉手围成圈，将男性围在圈里，一些男性在中间边跳边吹着芦笙，还不时发起一人带头，众人附和的高昂的呼喊声，其意思是：“好热闹呀好欢乐，大家快快来跳舞，跳的人人乐哈哈。”（1月10日笔者田野笔记）

和游客以及笔者看到的一样，“表演”已经成为村民的一份工作，当地村民通过表演获得工分，每天参与表演的村民工作一天可以得到10个工分，月底结算，一个工分2块钱。如果有重要客人光临，过了下午5点值班表演的村民可以额外获得2分的工分，而其他大型如“拉木鼓”这些大型表演活动的工分另算。基本上寨子里每家每户都参加这份“工分制”下的表演工作，不论男女老幼。可以说，靠着这份20元每天的收入，小学毕业就没有上学的小杨基本能够衣食不愁了。笔者访谈小杨时，他也和笔者抱怨现在旅游不景气，“今年‘拉木鼓’的活动少，希望五一十一多一些。”对他而言，拉一次“木鼓”就代表能够多挣了一次工分，拿到更多工资，“可以买好吃的，还可以请朋友一起吃饭。要是可以，天天拉就好了。”

在通过“表演”挣得工分之余，除了这样的大型表演，村民和游客交往的日常随着时间累积也和从前的互动模式不同了。在和游客的不断的接触中，当地很多村民比较明确游客想要什么，于是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摄影爱好者面前，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演。

“一位拿着相机的中年男子来到寨主家想要给寨主家的成员拍照片，这时，寨主拿出祖传的刀，背上自己家手织的包包，特意回去拿了长长的烟筒进行拍摄。”

在寨主家参观的时候，喝茶，拍照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游览环节，当问到寨主家是否会收藏一些这样的照片时，他们兴奋地感叹道“都拿回来都几千张了，有几张吧。”

在佤王府的老人也是游客竞相合影的对象，老人也是无比配合。

“一日一个女游客要求合影的时候，老人赶快回头拿上烟筒，想要尽量多的展示佤族特色，女游客一把拉住老人的手说不用了，这么拍就行。”这也让笔者觉得啼笑皆非。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拍照的场景还算比较被动的，翁丁有的小伙是随时准备要和游客合照的，小肖就是其中一个。

每当有游客来，小肖就会上前询问是否要拍照，如果同意，他就将自己“理想化”的面孔展示出来：解开头发（长发），脱掉鞋子和上衣展示自己的“佤族野性”，同时手拿镖枪，表情威武。

我认为他这种自我表演不仅来自和游客不断接触，也源于旅游局负责人的指导。小肖提到“旅游局会过来教我们跳舞，表演，这些着装都是他们要求的。”寨子里的传习所无疑就是充当了一个教导村民在旅游发展中那个展现佤族特色的重要场所。在拍照结束，小肖也会得到游客的夸赞和欣赏，他也就保持了在日常生活中穿佤族服装，留长发的造型。像小肖这样的群体属于在他人的投射下，在他人的期待下进行表演，这种表演贯穿了他的日常生活，

不论是否是真的，这已变成他生活的常态。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拟剧思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意无意的运用某些技巧表演。在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在特殊的旅游场景下，这样的场景更加催化了人们的表演动机及策略。

在村民的自我表演之余，在侬王府的另一幕也在高调上演。老人嘴中念念有词，在为游客“叫魂”。大体的意思就是“欢迎尊贵的客人来到翁丁，希望不要碰到石头，一路平平安安，离开以后升官发财”之类的，老人后来回应道这些话非常简单，只是用唱的形式，就和叫魂“一模一样”，反正游客也是听不懂的，就是老人自己编撰出来的。很多叫魂时的操作都没有，更是没有分肉这一说，就只是唱唱，这和日常生活中家里有人生病，盖房子的叫魂属于两个体系，更多就是一种表演。

表演成为常态，当地人就是演员，游客就是观众，当地人和游客的接触互动的场所就是前台，日常的生活，一切可以汲取作为“表演”养分的日常就是为前台做准备的后台。戈夫曼认为在前台“演员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标准类型的装备”。比如当叫魂在侬王府成为表演展示给游客的时候，前台里的火塘，草凳，茶叶等就成为表演者所运用到的“舞台道具”，这也就是游客所了解的侬族文化，而后台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旅游者短期的逗留很难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旅游开发初期，伴随着游客凝视，作为凝视对象的当地侬族通过对“对立面”——游客的反向凝视，重新确立、演绎了自己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一直被凝视是处于弱势的权力关系中，那么当地村民反向凝视的开始，就是从弱势中逐渐掌握主动的表现。在这一阶段，当地村民和政府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对当地侬族文化的表演和演绎发展翁丁旅游业，当地村民也能获得一些收入。但随着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规划下的商业化考量，当地村民好像就变成了“阻碍”旅游业进一步开发的因素，当地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从友好的“合作”转向重重的“矛盾”

推介：本文是以人类学视角观察、记录和剖析居家养老体系建设。其呈现的田野数据质量，就深度和针对性而言，比起那些动不动就甩出模型和统计数据，“科学”证明一些常识的定量研究，要宝贵的多。尽管作者在运用理论来阐释研究问题时，还有不少瑕疵。在国内耗资巨大对老龄化和养老实践进行研究的诸多文本中，这是极少的一篇采用质性方法而且接地气得政策人类学微型民族志。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 民族志视角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基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田野研究

### （节选）

复旦人类学 2013 级 沈高明

#### 第四章 “似是而非”的居家养老服务

如今，随着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居家养老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为广泛，提供的服务也更为多样化。在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的居家养老无疑会继续推进。不可否认的是，居家养老在一定程度确实解决了老人们面临的问题，也给老人们带来了方便。然而，在居家养老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仍存在着种种弊端。在田野研究中，笔者发现在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框架下，这些居家养老服务只是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却可能无法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也给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带来了问题。

##### 第一节 被“风险”和“标签”建构的居家养老服务

“风险文化”和“标签理论”视角之下的老年研究最初肇始于上世纪 80 年

代，深受老年研究“问题化”的影响，而在之前并不是如此。上世纪中叶以前，由于老年人口的占比较低，因此老年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使得老龄化现象开始逐渐才被人重视。为了推动老龄化现象和老年福利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开始利用西方文化中对“年老”的惧怕和排斥来推动老年福利制度的建成。分析西方老年研究起飞期的文献不难发现，不管是宏观或微观的老年研究还是老年福利制度建设动力，均主要是“问题驱动”<sup>38</sup>。这样就会使得研究人员在挖掘老龄化现象背后的成因及如何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不断强调老龄化现象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而各类媒体也肆意宣传和强调老人面临的各类困境，认为老人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负担。如此，则更强化

<sup>38</sup> 陈雯 江立华，《老龄化研究的“问题化”与老人福利内卷化》[J]，探索与争鸣，2016:1

了社会对于老人“问题化”的认识，从而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离不开“问题框架”。随之而来的则是居家养老服务在对于老人刻板认识的“标签”之上进行，处处以风险为导向。这样的认识会产生一定弊端，诸如评估不公、老人丧失自主性以及容易使得老人产生依赖性等。

从文化角度理解风险，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提出的。她提倡从文化和符号（cultural-symbolic perspective）的角度来看待风险。玛丽·道格拉斯对自我、群体和组织在与他者之间保持界限、处理社会越轨以及获得秩序的重要性方面进行解释，她认为风险是文化认知的结果，是某一个社会群体对于风险现象的文化认同，这个社会群体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

在玛丽·道格拉斯的研究基础上，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提出了“风险文化”，认为风险文化的传播是依靠其价值观念，体现出对于社会的反思和自省（S.Lash, 2000）。因此，在风险文化的时代，对社会成员的管理主要依靠的是理念和信仰，这些理念和信仰也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可见，在当今社会，老人群体一旦被“问题化”后，就会产生新的文化规范，认为老人是有风险的人群，而老人存在的风险则是需要防范和化解的。这样，就会使得居家养老服务处处以风险为导向，从而再次强化了人们对于老人的风险认识，进而限制了居家养老服务的范围，无法满足老人的需求。

此外，老人在被“问题化”后，除了被认为是风险人群以外，老人还会被贴上各类标签，诸如体弱多病、有依赖性、经济收入较低等。“标签理论”是解释越轨行为如何产生及发展的理论，其理论根源是“符号互动论”，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探讨越轨行为，认为越轨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因此，当老人被贴上标签后，就会进入消极和依赖的状态。当老人明白他们按照社会的认识应该如何行事的时候，原先的独立自主能力就会消退，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于是便开始越来越消极，最终则又再次加深了社会的歧视，加剧了负面效应。可见，老人的“问题化”大多是被标签后的结果，也是老人自己受消极暗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满足老人的需求，更要提升他们的自主性，增强他们的信心和能力，积极面对生活。

虽然，以风险为导向和受标签理论影响的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着一定弊端，会使得社会上滋生出对于老人的厌恶、歧视甚至敌意。但是，由于受制于财政资金及服务资源的限制，为了节省开销和提高效率，前述二者仍然是较有效的指导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即使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根据相关规定，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民非机构应对申请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进行综合评估，包括身体状况与经济情况，以确定照护等级与是否可以享受补贴。而上海各级部门在推进居家养老相关工作时，也反复强调对于老人进行照护等级评估的重要性与必须性。

最初,对老人进行评估的目的是考察被评估对象是否符合养老补贴发放标准,只是对老人的经济条件进行评估。此后,随着全市各区县开始陆续开展居家养老工作后,评估内容也从经济条件扩展到了身体状况,以明确老人的照护等级与补贴金额。在这一环节,全市各区县并没有达成一致,使用各自不同的评估标准。

2013年,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发布国内首个《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旨在科学界定老人的照护需求,继而为其匹配相应的养老服务。《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通过设定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行为、视觉四项主要参数,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等背景参数,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进行基础判断,得出“正常”、“轻度”、“中度”、“重度”四种评估结论、三个照料等级,并根据评估结果为老人提供服务。<sup>39</sup>发布初期,只在徐汇、闵行、普陀、杨浦和浦东等五个区进行试行。从2016年起,正式推广到上海的所有区县。

毋庸置疑,《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的推行可以使得上海对居家养老工作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并以此标准界定老人是否存在照护需求,继而匹配相应的服务。同时,也为合理配置老人照护资源提供了技术支持。虽然,此项举措表明了上海对于居家养老的重视程度,以及在此领域的先行。然而,却更反映出目前在养老事业中的弊端:即所有为老工作都是以风险为导向,随意使用“风险”一词,以规避风险为目的,从而忽视了老年群体的自身资源与自身能力,把他们当成了为老工作中的“他者”,而非“参与者”。

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在《老年照护等级评估需求》的四项主要参数中,“认知能力”和“情绪行为”这两项参数的评估选项会引起有些参与评估的老人的不满。在“认知能力”的评估事项中,共有四项内容:在“近期记忆”项下,让老人回想近期发生的事情;在“程序记忆”项下,让老人对于自己完成习得的生活技能(如穿衣、烧水泡茶等程序)进行回想;在“定向力”项下,让老人对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进行识别和判断;在“判断力”项下,让老人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等作出判断。在“情绪行为”的评估事项中,则有三项内容:在“情绪”项下,考察老人对客观事物的主管态度体验是否与实际相符,能否被常人理解;在“行为”项下,考察老人的动作举止等行为表现有否异常;在“沟通力”的项下,考察老人在交流中能否互相理解。这两个主要参数都会根据老人对于评估选项的回应情况,把老人在该选项下的表现划分为“正常”、“轻度异常”、“中度异常”、“重度异常”。

有些参与评估的老人告诉笔者,当他们戴上老花眼镜,仔细阅读完评估员拿到他们眼前的评估表后,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认知能力”和“情绪行为”这两个主要参数的评估事项并没有直接把他们认为是认知障碍和情绪行为异常,却明显地把老人与正常人群进行了区分。有些老人认为,甚至评估事项会给他们戴上“异常”的帽子,令他们十分不悦。为了获得居家养老服务,他们只能配合评估员,完成相应的评估。

在笔者的接触的老人中,有一位老人退休于某区的精神卫生中心。当问及评估表时,他不假思索地指出,通过评估表可以看出,现在进行为老工作的时候,相关负责单位会直接把

<sup>39</sup> DB31/T 684-2013, 上海市地方标准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

老人定义成“病人”，评估事项也是围绕“病情”轻重而展开的。当他第一眼看到评估表时，觉得跟以前工作中使用的精神科量表很像。仔细一看，与精神科量表相比，评估事项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在精神科量表中，虽然也考察前来就医的人的行为能力和认知功能，但却并没有加上“有否异常”、“实际相符”、“能否理解”等字词。这位老人也表示，评估表的初衷是好的，也便于为老工作的开展。只是在评估事项的表达中，隐约表现着对于老人的歧视，令人不悦。

可见，评估表对老人进行了种种假设，预设了前提。这些假设也是在给老人贴上“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反应迟钝”等标签的基础上形成的，完全忽视了不同老人身体情况的差异。这样，就只会认为老人是“异常”的，是“问题群体”。是有“风险”的。此后，为老工作也会围绕这些认识而展开，并使得“风险”成为评估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决定因素。这也导致了评估人员所进行的评估工作被局限在由“标签”和“风险”所建构出的框架和指标中，并用统一的标准去对待所有老人，从而忽视了老人的多样性和和异质性。同时，评估也只是往往关注老人的身体功能，这样就无法摆脱“风险理念”，也就无法分析风险背后的成因。这也是现行的各类评估标准的一个不足，过于关注身体功能和行为能力，容易忽略其背后由于结构性原因所引起的贫穷、疾病乃至不平等给老人带来的困难。

## 第二节 “国家视角”塑造的居家养老服务

从 2013 年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颁布国内首个《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

求》到 2015 年 8 月上海市民政局颁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实施细则（试行）》，表明上海市各级政府对于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表明上海市各级政府在不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制度，努力提升质量。虽然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的覆盖率已经得到了提升，但是服务的成效仍然有待商榷。很明显，这些居家养老服务究竟是相关部门为了统一标准而设置的。那么，这些官方标准的居家养老服务能否满足老人的需求？

目前，在上海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主要为“六助”，分别为：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这些服务内容都是“按量定需”，与在“风险理念”框架下的评估标准一样，都是以风险为导向，没有实现以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为基础的公平。从而形成了“风险”高于一切的局面，导致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处处防范风险。同时，由于对于老人有着刻板的印象，对老人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者会认为所有老人的需求是一样的，没有对老人群体进行细分，统一安排。这样，就会使得老人服务的选择范围较为狭窄，真正需要的服务无法满足。

生活在文成里的张阿婆是符合标准的高龄独居老人，可以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与养老服务补贴。在选择服务内容时，她选择了上门家政服务此项内容。经过几次服务后，张阿婆开始面临问题。因为她的房子比较小，只有十平方米，不需要费时打扫，而她的子女也会定期帮忙清洁房屋。因此，她并不需要上门的家政人员过多的打扫。同时，由于她行动不便，需要

家政人员帮忙洗头、洗澡、擦身。但是，家政人员并不能提供这类服务。主要原因在于，家政人员只能提供家政服务，而洗头与洗澡等服务并不在菜单内。此外，家政人员帮助老人洗头与洗澡等，也会与老人产生身体接触，存在一定风险，怕担责任。同时，家政人员只是以是否完成老人指定的服务以及是否做满工时为考核指标，并不强调是否满足老人需求。因此，上门家政人员无法满足张阿婆的需求。鉴于此类情况，张阿婆的子女只能另外请钟点工照护老人

虽然，上海市民政局在下达相关通知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同老人的不同服务标准与服务内容。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只是刻板地执行各种被规范过的服务，对老人的实际需求却爱莫能助。在某社区，有位 95 岁的独居老太需要有人陪夜，而在服务内容中却没有陪夜选项，居家养老机构因此无法提供陪夜服务。最终，还是通过社区的居委干部找到了相应的人选，解决了该老太的难题。可见，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应该侧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一书中，阐述了很多失败的大型社会工程。其中包括德国的科学林业工程、苏联的农业现代化、巴西的城市改造以及坦桑尼亚的农村改革。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然而，从基层受众的角度来看，却没有实际享受到益处，带来的甚至是巨大的灾难(Scott, 1998)。

而借用斯科特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事实，即以官方标准塑造的以为老人谋福祉的居家养老服务，却因为各种因素而不能满足老人的需求，甚至也容易产生歧义。

在另外一个从事居家养老的民非机构中，会向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一项名为“心灵关爱”的服务，即由该民非机构的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负责，每天给已接手居家养老服务的街道内符合“高龄独居”标准的老人拨打电话，进行慰问。目前，此项服务已覆盖至上海的多个区。然而，经过对于享受该项服务的老人的调研以及某区民政局组织的居民代表座谈会后，发现对于以工作人员拨打电话进行“心灵关爱”的看法，各有说辞。有人觉得这项举措很好，可以帮助老人排忧解难；也有人认为这项举措完全是多此一举，甚至会带来老人的厌烦，却又不得不接。

以位于上海西北部的某中心城区为例。该区共有符合标准的独居高龄老人 7600 余名，名单由老人所在社区的居委干部统计后上报。此后，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周会主动拨打一次这些老人的电话。在第一次拨打电话前，这些老人所处居委的工作人员会跟他们说明这是区里的一项为老服务项目，希望他们可以接受。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老人接到电话后，会认为这些都是骗子电话，生怕上当受骗。即使反复说明，有些老人仍心存疑虑，将信将疑，甚至与居委的工作人员反复进行确认。时间长了之后，有些老人也会开始心生厌烦，认为自己情况很好，根本不需要此类形式上的心灵关爱，即使每周一次，也会觉得麻烦。



此外，工作人员每次会把电话的等候时间控制在 50 秒左右，目的在于防止老人为了接电话而出现跌倒等意外事故。即使如此，意外事故也会偶尔发生。有一次，一位老人正在厨房烧开水，水即将沸腾的时候，关爱电话来了。他赶忙跑过去接听，几句应付之后，听到水壶的声音响了，急忙挂上电话，往厨房冲过去，却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另一位独居老人，有一次，他正准备洗澡时，电话响了，他赶忙跑到客厅去接电话，也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骨折。

可见，由相关部门推行并由专业民非机构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只能满足需要帮助和照护的老人们的最为基本的需求，而对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则无法满足。这样的话，实际的效果往往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 第三节 无法认同的价格和被依赖的“国家”

在田野研究期间，当笔者向老人们问及对于服务的看法时，很多老人都会提及“价格”。他们认为，这些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还是偏贵，希望可以更便宜。

在广慈南路街道，参加养老服务合作社中的部分老人经过评估，往往会被分为三类，每类享受的服务补贴不同。低保或低收入家庭老人、高龄纳保老人根据照护等级不同，而被分为 A 类与 B 类。其中，A 类照护等级为“中度”，按项目价格 30% 收费；B 类照护等级为“轻度”，按项目价格 50% 收费。而月养老金低于全市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 1.5 倍且照护等级为“中度”的，按项目价格 70% 收费。补贴部分以代金券或是充入消费卡内。一般来说，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的老人，只需每小时支付 15 元-20 元不等的费用，就能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了，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价格问题仍然是最敏感的因素。

在居家养老服务合作社成立初期，居委会动员了一批老人参加。然而，在初期的新鲜感过去后，有些老人开始退出合作社了。因为在成立初期，需要老人进行试点服务，而这些老人并不是符合补贴条件的。在试点结束后，需要他们自费享受服务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开始萌生退意。在巨鹿社区公益站，遇到了一位郭阿婆，她虽是独居老龄老人，但是经济条件与身体状况都不错。在合作社进行试点服务时，她就参加了。然而，得知试点结束后，需要自己付费时，她则申请退出合作社。她认为，养老服务合作社在成立初期，让她进去免费体验下，这是件好事，说明国家想得到老人。但是，试点结束后又要收费了，她觉得这些服务对她来说可有可无，更要自己掏钱，则更没意义了。因为，在她看来，即使低于外面的市场价格，这些服务的定价仍然偏高。

在锦江社区日托中心，笔者遇到过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伯，提及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时，他总说：“我知道与市面上的价格相比，现在的服务价格已经很低了。在古北地区，家政服务价格已经到了每小时 30 元或者 35 元了。虽然这里的服务价格仍只是 15 元，但是我还是觉得贵。因为这是政府在为老人办实事、做好事，价格再便宜点的话，就更好了。”

经过与多位各社区公益站负责人及老人的沟通，笔者发现，老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合作社

价格敏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养老金的不足，很多老人的养老金基本集中在 3000 元至 3500 元，除去日常开销外，如果让他们自费为服务掏钱，则是比较困难的；二是长久以来的节约精神与消费理念，即使退休金较多、手头较为充裕的老人，他们仍会比较节约，考虑为子孙着想；三则是认为这些服务都是国家应该提供给老人的，不用白不用。一旦需要自己掏钱，则开始犹豫不决。

而在其他民非机构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地区，也能发现相同的情况。

2015 年上半年，杨浦区民政局结合市场情况，提高了收费标准，由原先的每小时 20 元上升至了每小时 25 元。虽然享受补贴的老人只需支付一部分价格，但是仍有部分老人对此持有异议，几次跑去街道询问情况。可见，老人对于价格的敏感性，使得居家养老服务在定价方面存在很大难处。既要使得老人满意，同时也使得承担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可以顺利开展，也使得政府在财政资金拨款上游刃有余。

同时，在有些免费接受居家养老服务和补贴的老人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觉得晚年应该理所当然享受这些服务，这些都是国家亏钱他们的，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服务。拥有此类心态的人并不在少数，而这也使得助老服务社与上门家政人员的工作难以开展。

“乐龄会”的上门家政人员王淑芬今年 45 岁，来自崇明。由于长年从事体力劳动，因而使得她的容貌与年龄并不相仿。自 2014 年开始，她就需要为广慈南路街道辖区内 13 户家庭进行助老服务。其中，7 户家庭享受政府买单或补贴的“居家养老服务”，剩余 6 户则是自费买单。

通常，王淑芬每次会在一户家庭中进行两个小时的工作，工作内容包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洗头、助浴等，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在 7 户享受政府买单或补贴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家庭中，除了替老人服务外，有些老人也会时不时地要求王淑芬帮忙替老人的子女打扫卫生等，甚至替子女缝补羊毛衫。有时，王淑芬还会替老人外出开药。而上述这些都是常规服务之外的事情，王淑芬也不能多收费。面对此类情况，王淑芬只能按照老人的嘱咐去做。

虽然那些老人虽然指挥王淑芬不停的做这做那，然而对待她的态度却并不是很好。在她进行工作的时候，冬天不让她用热水，夏天不允许她开电扇，甚至不同意她借用插座给手机充电，也不让她使用微波炉加热午饭。不仅如此，他们对王淑芬的服务更是斤斤计较，要求也很高，动辄就以服务要挟。老人如此，老人的子女亦是如此，认为这些都是国家应该给予他们的福利。

有一次，某户家庭的老人因为多次要求王淑芬进行服务内容之外的事情，王淑芬不堪忍受，拒绝了为其服务。之后，老人拨打了“乐龄会”的服务热线，投诉王淑芬工作态度不好。而相关负责人知道这户老人的行径历来如此，却也只能劝说老人作罢，并保证安排其他家政服务人员，以替换王淑芬。与政府补贴的那 7 户家庭相比，6 户自费的对待王淑芬的态度则好得多。

其实，此类现象并非个案，享受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认为提供服务是国家的义务，是他们应该享受的，因而对上门家政服务人员横加要求。迫于无奈，上门家政服务人员只能满足这些老人的要求。与这些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的老人一样，上门家政服务人员的条件也并不很好。用王淑芬的话说，她们这一人群同样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是出于生活所迫，不然谁乐意去做伺候人的事情。

除了上门照护，其他服务也存在着各类相似的情况：“机构喘息服务”时间到期后，子女把老人扔在街道敬老院里而不闻不问；不符合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要求的老人强行要求享受补贴。然而，也有很多老人也认为：与过去相比，国家对待老人越来越好了。老人应该适可而止，也要为国家着想，不能一味只考虑自己。国家为老年人提供这些服务的初衷是很好的，也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老人。但是在养老的事情上，老人不应该处处向国家提要求，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国家。

可见，在居家养老服务开展过程中，了解老人的想法与认识，也是极其必要的。不然，则会使得老人过分依赖民非机构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其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 第四节 对于托养机构的再思考

在本节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田野发现，对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托养机构进行考察。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托养机构一般指日托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而且都被列为了上海市的重点建设项目。然而，笔者发现，日托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太理想，甚至和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

##### 一、日托中心

日托中心，也被称为日间照料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托老所”。在这里，老年人在白天的时候，可以接受照顾，并参加各类活动。而在晚上，老人则可以回到自己家中。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本意是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助老服务，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

几年前，上海市政府就将筹建老人日间服务中心纳入了政府实事项目，初衷是为高龄老人或半失能老人提供综合性日间照料服务。然而，通过对于广慈南路街道的日托中心以及全市其他街道的日间服务中心的走访，可以看到日间服务中心并没有起到初衷的作用。原本要求入住的是行动不便或是半失能的老人，他们才是日间服务中心的主要受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进入日间服务中心更多的是健康老人，行动完全能自理的。同时，日间服务中心也变成了“升级版”的老年活动室，这也违反了项目的初衷。可见，日间照料中心的功能性质已经扭曲，已经偏离了最初定位。

在上海市日间服务中心一览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乐龄会”的本部日托中心、思南社

区日托中心、锦江社区日托中心均在上列。虽然，名字是“日托中心”，但起到的作用却是跟日间服务中心完全一样。而在这几个地方的日托中心，却往往并没有如此，只是起到了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并提供午餐。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的领导曾明确表示过：“日间服务中心（日托中心）决不能单纯的成为托老机构，也不是老年人活动室，而是可以提供护理服务的社区机构。要对入住老人进行评估，健康老人不能收，需要重度护理的老人也不能收，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需要轻度和中度护理以及高龄独居的老人。”

“乐龄会”的某处日托中心位于复兴中路上，这里是曾经的法租界，至今也被认为是上海的黄金地段。该日托中心位于一个新式里弄内，这个里弄在上世纪 30 年代落成，史良、何香凝、沈迈士等文化名人都曾经居住于此。如今，随着年轻人的搬离，整个里弄的人口结构基本由老人以及外来人口构成，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独居老人，有着较大的养老需求。目前，每天有 8 位老人固定在日托中心活动。早晨 8 点半左右，老人会来到日托中心。中午时分，会在日托中心内吃一顿午饭。下午 5 点半，则会离开日托中心，回到自己家中。除了日托的老人外，还有 10 余位老人在日托中心内订餐。

日托中心的场地比较大，环境也比较敞亮，有两位负责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运营工作。每天，那些入托的老人基本就是坐在那里，聊天、看电视、打牌、唱歌等。每周二，也会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到日托中心内给老人测量血压。老人们表示，他们只知道日托中心是一个可以白天去的地方，有人管他们，还提供午餐，并不清楚日托中心的真实作用。而在“乐龄会”的其他日托中心以及上海市其他的日托中心内，情形并无多少区别。

笔者的田野研究发现，日托中心目前提供的只是照护功能，包括吃饭、洗澡、午休、接送等，依然只能被视为“升级版”的老年活动室，并没有起到提供护理服务的功能。虽然上海的有些街道的日间照料中心做到了，做到了收纳轻度或中度失智失能老人，尽可能恢复老人的生活独立、功能维系，提供护理服务。但是，绝大本部分的日间照料中心远未做到如此。此外，目前在上海范围内共有 381 家日间照料中心，而总共服务的老人在册数量却只有 1 万多人。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形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 二、长者照护之家

2015 年 6 月，上海市民政局推行《“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方案》，旨在调动社区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社区托养机构，满足老年人社区就近养老服务。2015 年 6 月，在 5 个街道进行首批试点。2015 年 9 月，则在 20 个街道进行第二批试点。而在 2016 年则要实现在上海开设 50 家长者照护之家，在 2017 年则要实现在上海的全面覆盖。广慈南路街道被纳入了第二批试点名单，而在前文，笔者也曾提及广慈南路街道长者照护之家的情况。而在下文，笔者将结合田野发现，对长者照护之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与反思。

目前，在各大媒体上，对长者照护之家的宣传基本是褒奖之词，不同的声音几乎听不到。然而，在很多长者照护之家，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并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有的甚至是门

可罗雀、入不敷出。

上海出台长者照护之家相关政策的初衷是在于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的社区托养设施，功能介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敬老院、护理院之间，一般采用小区嵌入式设置，并辐射周边社区。为缓解上海市养老服务场所资源短缺的压力，市民政局在部分街道开展“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鼓励街道因地制宜、盘活资源，发展家门口的“迷你养老院”<sup>40</sup>。但是，在笔者对部分街道以及广慈南路街道的走访发现，长者照护之家并没有充分得到利用。

某街道的长者照护之家设有 30 张床位，而另外一个街道的长者照护之家设有 20 余张床位。在没有去到这两处长者照护之家前，笔者的印象里觉得应该是人满为患，供不应求。然而，真实场景则是另外一幅景象。装修精致、功能齐全的长者照护之家，老人数量并不是很多，也是比较清冷。在这两个街道的长者照护之家，分别只有 7 位老人与 8 位老人入住。通过与老人以及工作人员的访谈，发现主要症结在于评估限制、收费问题、有入住期限、内设医疗资源没有获批。而广慈南路街道的长者照护之家在试运营初期，由于居委摊派了人头指标，最终也仅仅只有 15 位老人入住。而在正式运营后，就出现了少人问津的场景。

**评估限制：**由于在入住长者照护之家前，先要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办公室的评估。主要评估经济情况与身体状况，并同时考虑是否为离休干部及是否为高龄独居老人。满足条件的老人，才能优先入住。经过评估，有很多想入住长者照护之家的老人就被拦在门外了。

**收费问题：**目前，上海市绝大部分的长者照护之家的收费标准都是在每月 4000 元左右，而大多数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则在 3000 元左右，无法全额负担长者照护之家的全部费用。然而，无论对于街道还是承担长者照护之家运营工作的机构来说，四千元左右的收费标准显然过低，背上了财政负担。即使如此，有些老人还是认为价格偏高，他们无法承受。如果不是街道补贴或是子女支付的话，很多老人绝不会主动提出入住长者照护之家的要求。

**有入住期限：**对于入住长者照护之家的老人来说，他们多数都想能在里面常住的。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多为独居老人或是孤寡老人，身边没有子女可以及时照顾。一旦出现意外，往往不能自理。因此，他们一旦入住长者照护之家后，就不想离开了。然而，即使相关条例没有规定入住时间，长者之家的运营方出于床位与护理资源等角度的考虑，只会让老人入住一定的时间。到期之后，则会让老人回家。出于这点，许多老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内设医疗资源没有获批：**上海市政府与上海民政局一直强调医疗资源打通养老机构，完善医养结合。但是，出于各单位间的协调配合、审批单位怕承担责任等原因，养老机构内设医疗资源往往较难实现。即使有，也是个案。有些街道的自成立到现在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设医疗资质迟迟没有审批下来，因而使得长者照护之家不具备医疗资格，使得一些需要医护资质的护理服务不能开展。与其如此，老人还不如呆在医院或者家里，而没必要跑至长者照护之家。

<sup>40</sup> 沪民福发〔2015〕27号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推进本市长者照护之家建设的通知

笔者在广慈南路街道遇到了一位愿意入住长者照护之家的老太，从她的个人经历和视角或许能有所启发。

老人名叫龚伊琴，出生于 1931 年，自从结婚后就搬到了淮海中路上的新式里弄。她最初在徐汇的教会学校教数学，后来调任卢湾区某公立小学。她和丈夫育有三个女儿，同时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2000 年时，她的丈夫因罹患淋巴瘤而去世。

在她丈夫去世后，她曾萌生过入住养老院的想法。在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组织下，她曾参观过好几个位于市区内的养老院，但是觉得地方太小，不适合居住。之后，她也去过位于嘉定南翔的市级养老院，也比较满意。但是，这个养老院的收费比较高。出于经济实力以及不想依赖子女的考虑，她最后打消了入住念头。一个人独自生活至今。

2015 年初，自从她的三女儿卖掉位于虹口区的某高档楼盘的房子，并购买了位于南汇横沔的亲源老年公寓后，她又再次萌生了入住养老院的想法，而在 2015 年 11 月，她因心脏搭桥手术，而住了院。住院后，恰逢长者照护之家寻求老年人试住。她知道后，主动报了名，抱着体验的心态，想去亲自感受一下。她认为，她出院后，需要有人照顾，而子女那里也不是很方便。如果可以入住长者照护之家，那么就有人可以照顾她了，即使时间较短，她也并不是特别在意。如果条件允许，也想再次入住。

当谈及入住体验时，老人认为，长者照护之家的服务的确非常不错，但就是入住期限太短，而且里面不能看病，不能解决她的根本问题。每天出门的时候，还要和管理人员打报告，签字确认后才能放行，觉得这样就过于麻烦。而在住宿、饮食、管理等方面，长者照护之家都给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而在 2016 年 10 月，当她再次提出入住申请时，则被告知希望她能有机会留给其他有需要的老人。因为她之前已经住过了，希望她能有机会让给其他有需求的老人。

从龚伊琴的经历可以看出，长者照护之家确实能够满足老人居家养老的需求。然而，在但是相关配套政策尚未落地、老人生活理念、收费标准等问题，阻碍着长者照护之家吸引更多的老人。长者照护之家的目的是让老人能够足不出户，在社区内就可以享受养老机构高质量和专业化的服务。同时，在预设的社区服务半径范围内，将专业的照护服务和医疗护理延伸到老人的家中。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达到此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初衷良好的顶层设计往往存在着一定缺陷，执行时也不到位，最终形成了偏差。

### 第五节 第三方民非机构的困境

民非机构是指以服务大众或互惠为主要宗旨，有别于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各种正式或准组织性的组织。通常，公共部门是通过公共政策等具有强制力的方式来实施社会管理。而民非机构则具有“非营利性”、“自愿性”等特征，从而使得民非机构能够更快地得到社会的认可，能更高效地运用各类社会资源，并能有效地推动志愿者活动的开展，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原先的公共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养老负担。因此,我国政府开始尝试向第三方民非机构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公共资源的补充,完善养老服务体系。通常,这些民非机构基本为“民办非企业机构”,有着非营利的属性。因此,这些民非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较弱,在资金积累上存在着较大不足。一旦遇上资金投入较大的项目而财政资金无法到位的时候,民非机构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同时,由于养老服务行业的政策落地较慢以及配套体系尚不完善,从而使得民非机构在承接居家养老服务时,往往力不从心。

2008年,自广慈南路街道前主任刘红把“乐龄会”从江西上饶引入上海,已经八年多。从那时起,“乐龄会”就开始承接整个广慈南路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乐龄会”也属于从事居家养老服务较早的民非机构。

在这八年间,“乐龄会”的工作不可谓不到位,建立了社区公益站和日托中心,招募社区志愿者,招纳各类服务供应商,为社区老人提供服务之余,还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然而,“乐龄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迟迟得不到扩大。相反的是,有些成立较晚的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和企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势头和影响力早已超过了“乐龄会”。

根据广慈南路街道的财政计划,街道每年给“乐龄会”拨款约200万元,向其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用于工作人员工资的支付、活动费用、日常开销以及其他费用。而除了街道每年的固定拨款,“乐龄会”并无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使得“乐龄会”平日的运作捉襟见肘,带来的结果就是“乐龄会”很难开拓业务到上海市的其他区域。时至今日,除了广慈南路街道,“乐龄会”仅仅承接了上海市徐汇区两个街道的部分居家养老服务。而且,其在广慈南路街道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2015年,广慈南路街道被纳入了第二批长者照护之家的试运营名单。为了建设长者照护之家,街道把原先的综合生活服务中心搬了出去,把场地让给了长者照护之家,并在2015年10月进行装修和改建。在装修的同时,街道领导的想法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此前,街道领导想直接和“乐龄会”签订合同,把长者照护全部交由“乐龄会”运营。但是,在2015年11月时,街道领导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希望以招投标的方式来选定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方。同时,街道领导也表示,如果“乐龄会”中标的话,则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全部由他们负责。如果是其他民非机构中标的话,“乐龄会”也能参与一部分运营工作,但并不是由乐龄会全权负责。作为深耕于广慈南路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乐龄会”对于竞标必然志在必得。虽然街道负责养老事务的副主任对于“乐龄会”持非常支持的态度,但是街道主任仍然希望进行招投标,由具有运营养老连锁机构的公司来运营服务中心。同时,在“乐龄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即使中标了服务中心,这也会凭空增加“乐龄会”的运营负担;此外,就“乐龄会”目前托管的社区公益站与日托中心以及养老服务合作社等,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加强,以提升服务质量,打造自身品牌。因此,长者照护之家的得与失并

不是特别重要。

然而，对于“乐龄会”的负责人马崇峻来说，他是急切想拿下长者照护之家项目的，这样就能依托长者照护之家，完善广慈南路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如若失去了长者照护之家这块阵地，“乐龄会”这些年在广慈南路街道的努力极有可能付诸东流。为了招投标工作，“乐龄会”甚至在广慈南路街道社区范围内开展了老人需求调研工作，为长者照护之家的服务安排和定价提供依据。

最终，“乐龄会”没有中标，而是一家名为“舒享家”的从事家政服务培训与家政人员输出的公司取得了广慈南路街道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资质。无疑，对于马崇峻而言，他是极其失落的，“乐龄会”也丢失了一块可以发展居家养老业务的重要阵地。

对于“乐龄会”而言，正是其民非机构的属性，需要街道财政的不断扶持。由于广慈南路街道已经每年在向“乐龄会”支付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费用，如果再由街道负责筹措长者照护之家的资金的话，则是额外的负担。因此，街道需要有支付能力的机构进行承担。而作为一家企业，“舒享家”具有的家政培训业务和家政服务输出业务给其带来了收入和现金流，而这些业务则能支持“舒享家”的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用“舒享家”负责人的话说，他们已经做好了亏损的准备，可以承受三至五年的亏损。而如果由“乐龄会”承接运营的话，整个长者照护之家的盈亏损失都需由广慈南路承担，街道并不愿意这么做。正是考虑到财政负担的原因，广慈南路街道最终选择了“舒享家”。

而在其他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中，笔者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同样，以长者照护之家为例。在大部分街道，长者照护之家都是由民非机构负责运营的，这些机构与“乐龄会”一样，都是需要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很多街道在购买服务方面的经验不足，导致了配套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或许，这也是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陷入泥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民非机构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往往也会导致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日常服务的运行。如果某民非机构自行设定了辖区内居家养老服务的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后，如果产生了利益冲突，街道极有可能不会同意这些设想，迫使这些民非机构修改方案。最终，民非机构拿出的方案会优先满足街道的需求，其次再是那些居家老人。

从“乐龄会”等“民非机构”承接长者照护之家的故事中，可以发现民非机构在实际工作开展时，往往会囿于资金的问题，进而一筹莫展。因为相关政策的规定，“民非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这样就失去了自我造血功能。同时，由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补贴较少，也加剧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加速形成。只有拓宽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才能使得这些机构安心地扎根社区，为居家老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此外，很多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都表现出了一个通病，即专业性不强。而专业化人才的欠缺，也会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无法提高，原地踏步。

在“乐龄会”中，工作人员主要分为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其中，管理人员包括本部的工作人员与基层站点的负责人。“乐龄会”本部的工作人员约有二十人，他们中只有几个人



接受过专业的社工培训，而仅有一名工作人员是从丹麦某高校的社工专业毕业，并在香港的社工组织工作过。而在笔者的田野研究结束后不久，她就因和“乐龄会”负责人马崇峻的理念不合而辞职。随着她的离去，“乐龄会”也就没有专业性人才了，也不再招聘。而专业化人才的缺失，则会使得很多服务在设计环节就存在着一定缺陷，往往会以任务为导向，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而基层站点的负责人则包括社区公益站和日托中心的管理者，其中多为女性。她们的年纪平均在 60 岁左右，基本都是退休后再进入居家养老服务这个行业的。驱使她们参加“乐龄会”工作的主要原因基本都是热心社区事业，乐于志愿者工作，专业知识也较为缺乏。

而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的欠缺则更为明显。目前，我国很多居家养老服务只是局限于上门照护。而在实际工作中，上门照护与家政服务的区别并不是太明显，只是打扫屋子和帮助老人进行个人卫生清洁工作。而根据定义，上门照护并不是简单的家政服务，而是为老人提供健康护理、个人照料和社会服务，并以提高老人生活质量为目的。而“乐龄会”的服务人员多为外来人口和下岗职工，文化水平较低，也未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只能从事基本的家政工作。服务人员专业技能的欠缺，也会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单调，服务质量停滞不前。

除了资金来源和专业技能外，社区环境也会对民非机构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产生重要影响，有的是负面的，甚至会带来抵抗情绪。

在广慈南路街道，很多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认为这类服务是非常到位的，给老人提供了帮助。然而，也有享受服务的老人仍然认为“乐龄会”收取的费用较高，觉得“乐龄会”在其中赚取差价以图牟利。当笔者和有些老人提及“乐龄会”时，有老人甚至会说：“那个光头（指“乐龄会”负责人马崇峻）不办好事，只知道赚钱，只会拍领导马屁，根本不为我们老人考虑。”一旦有人如此认识，这种声音和情绪便会马上流传开来，使得很多老人在潜意识里开始抗拒“乐龄会”，并不是太配合工作。

因此，在目前的政策和环境下，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非机构会面临着各类困境，阻碍为老服务事业的不断发展。只有加强对于这类民非机构的支持力度，在行政上制定相关政策和激励制度，并在财政上加强资金扶持，保障民非机构的正常运行。而在民非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面，政府应当注重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的提升，帮助树立品牌形象与扩展影响力。最后，在社区环境中，政府、舆论和民非机构都应努力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加强老人对于民非机构的认同感，特别是那些接受服务老人的认同，从而在社区打下基础。只有这样，这些民非机构才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笔者在田野研究结束前，曾和“乐龄会”的负责人马崇峻做过一次长谈，在目前的政策制度和社会环境下，对于继续从事居家养老服务，他也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了弥补“乐龄会”在财政上的缺口，他在江西上饶老家向政府申请了一块地，用于当地创业企业和民非机构的孵化，希望以此能改善“乐龄会”资金不足的局面，能够使得“乐龄会”继续正常运转，甚至扩大服务范围。

##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通过笔者对于广慈南路街道以及其他区域的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的研究和分析中,可以发现,现行的居家养老体系看上去解决了老人们的一定问题,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将老人“问题化”的社会背景下,很容易将老标识成“风险人群”,又给老人贴上“落后”的标签,并在此框架下进行居家养老服务标准设置和流程塑造。如此则会使得老人被动的接受服务,失去了其原先所有的主体性,并对国家形成了依赖,最终造成了不良的循环,对老人无益。而居家养老的收费标准也是整个环节中较为敏感的因素,很多老人对于目前的收费价格并不认同,这也不利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此外,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第三方民非机构也面临着组织困境、资金困境与专业性亟待提高等问题。

居家养老服务的目的是让老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养老服务,满足养老需求。然而,笔者在本章中所描述的现象也的确存在,这就会使得居家养老服务和既定目标大相径庭。同时,笔者也发现,针对这些现象和不足,也有一线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提出过改进建议。但是,这些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忽视了。对于不同声音的忽视甚至是拒绝,极有可能导致居家养老服务停滞不前,形成资源浪费的局面。

在下一章中,笔者将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第六章 总结

### 第一节 田野发现和总结

通过对上海中心城区居家养老服务情况进行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这些以满足老人居家养老需求为导向的服务难以完全满足老人的需求。自上而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和其倡导的服务模式,往往会面临操作中的困境,这点不容忽视。而在包括老人和工作人员在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各主体视角的基础上,融入笔者的田野体验,笔者尝试展现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是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划就能解决的。

本研究的初步发现表明,在以风险化与标准化为导向的居家养老服务往往会过于程序化,忽略老人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使得老人在服务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被迫接受,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也会加强老人对于国家的依赖性,这样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对于目前的居家养老服务来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老人的确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不能一味排斥。

虽然,在“风险”和“标签”导向下的各类标准确实存在相应的指示功能,使得相关工作更有放矢。但是,我们既要关注风险与标签,也应重视老人原本就享有的自主性与自主

权,改变老人在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局面。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派的创始人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其著作《疾痛叙述》(The Illness Narrative)一书中提出:如果单单以科学标准和医学术语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于所谓“疾病”诊疗意见和治疗手段,这样完全无法理解病人的疾病经验和道德体验。而对于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关键在于医疗制度应将病人视为主体(Arthur Kleinman, 1985)。因此,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老人应成为主体,可以进行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剥夺服务中的主动地位,进而被迫接受或许可能不需要的服务。

此外,也应注意的是,老人群体的本质是具有高度多样性的。随着国内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变迁,老人内部已经出现了整体性的差异。老人所拥有的收入水平、权力地位、名誉声望和代际资本等已经将老人群体进行了划分。贫困老人和富裕老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体制内的老人和体制外的老人的地位出现了差距,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的需求也不同。因此,可以说,老人群体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群体,而是一个有着高度多样性的异质群体。

基于田野调查,结合居家养老服务现状,笔者认为为了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改善:第一,就前期评估工作而言,建议相关部门对全市所有老人情况进行排摸,开发全市统一的居家养老服务数据库,确保最符合条件和最需要介护的老人及时得到日常照护与上门护理,使得评估工作更为公开公平公正;第二,应将提前干预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目标,关注有可能进入失能失智状态的潜在老人,对这些老人进行积极干预,为他们提供帮助,延缓这一过程,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待他们失智失能后再进行介护;第三,则应向社会大力宣传“积极老龄化”,使得老人在变老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而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以提升生活质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潜能,积极面对晚年生活,进而改变社会认为老人是负担的看法,改善老人的形象,最终使得居家养老服务从目前的以需求为基础而转向以权利为基础。

## 第二节 对老人主体性和价值回归的再认识

在西方国家,社区照顾的历史已有了近四十年,而英国的体系则更为完善。但是,仍有学者认为,此类体系会加强服务提供者和老人之间的不平等(Estes & Phillipson, 2003)。在向社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的过程中,英国机构并不会给老人提供自主决定和自主参与的机会,而是强调对于服务的把控与管理。在英国,社区照顾的宗旨是促进老人的“正常化”,而侧重于把控与管理的照护服务显然与此理念相违背,也会使得接受服务的老人无法正常表现出其自主性。

在笔者的田野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作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主体之一,对于服务的选择和接受,老人却是被动的,只能越来越依赖这些服务,逐渐丧失了主体性。而公共政策、医护体系和社会服务也会不断深化老人群体的依赖,最终形成“结构性依赖”的局面。

在前文中,笔者从“风险”、“标签”和“国家视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三种视角是

如何塑造出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以及如何给居家养老服务带来影响的。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若继续延续这样的视角，则会把老人群体当成“他者”，而并不是真正的“参与者”。基于此，被局限在风险和标签所建构出的框架与指标中，并以“问题化”为导向，把老人当成“落后”和“孱弱”的群体，无法做到满足老人的需求，也无法给老人增权，使得老人无法获得能够正常生活的机会。

因此，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服务提供者既要注重老人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关注，也应充分考虑到老人本身应有的主体性。如果随意从前述的这些视角出发，无论是对于老人群体还是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都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后果。比如，过度依赖医学手段，则会加深老人身体和智能是不断退化的刻板印象，使得老人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使得照护服务显得相对简单以及程序化。此外，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评估体系也常常注重老人身体的功能性失范，无法摆脱风险视角来对待问题，也无法深入分析构成风险的原因。

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派的领军人物凯博文（Arthu Kleinman）在其首部专著《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愈疗者》（Kleinman, 1980）中指出，疾症（disease）和病痛（illness）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特殊布局中的构建物，必须在由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文化环境中理悟其蕴含的意义（Kleinman, 1980: 73）。此外，凯博文也对中文里对应“疾病”意思的三个单词进行了区分，这三个单词是“sickness”、“illness”和“disease”。凯博文认为，在这三个单词中，只有“disease”是可以用来指称病理上的疾病，而“sickness”和“illness”都有着强烈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原因（Kleinman, 1988:34）。因此，医学人类学将患病体验与社会文化引入研究范围，使得人们能够对于疾病的认识从狭隘的医疗范畴中摆脱出来。

在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不应以将老人“问题化”为导向，从而简单的将老人的有些问题归结为疾病（disease），否则只会依赖医学手段来对对待老人。如此，就不会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老人本身的原因，而如老年贫困和老年歧视等结构性原因也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应注重结构性力量对老人产生的影响，不再用机械的介护手段进行照护，并充分意识和尊重老人的主体性，使得他们不再被迫地接受服务。

而对于老人主体性的提升，笔者认为社会各方面都应积极挖掘老人与老龄化在社会当中地积极作用和价值，引导公众从积极地方面对老人进行思考，为老人群体寻找到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使得老人在社会中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也能使得老人享有充实的生活，从而尽可能不依赖于他人，延长健康期和自立期，让老人实现自我价值地回归，也就是“积极老龄化”。

在广慈南路街道，笔者所遇到的“新沪商”的社区志愿者即能很好地对此进行诠释。在这些志愿者中，她们中有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然而，她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希望能够为社区和其他比他们年纪更大的老人带来更多的帮助。趁她们现在还能独立行动，就尽量比较成为别人的累赘，尽可能地发挥自我价值。可见，“新沪商”的社区志愿者在努力避免被“问题化”，寻找适合其自身的位置，实现价值回归。

然而，虽然要注重对老人的价值回归和“积极老龄化”，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一旦过度地重视价值，则也可能给政策设计和实施带来麻烦。因此，社会在关注老年群体本身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更要重视对于老人价值的挖掘。通过挖掘老人所有具有的特殊的生产性价值、社会参与价值和文化影响价值，从而抵消“问题化”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此举也有利于居家养老服务更好地开展，并给社区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 第三节 顶层设计需要“实施的科学”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来自于“系统工程学”，其含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是自上层建筑开始的总体构想，也是在最高层次

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从几年前开始，“顶层设计”开始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指的是通过中央政府层级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再造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于是，在很多领域和行业都开始频繁使用“顶层设计”这一名词，希望能够籍此深化改革，促进行业发展。而在养老服务领域，亦是如此。

相比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及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上升，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监管者，政府在养老事业发展中，既担当着教练的职责，也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基于此，民政部和各地政府开始着手设计和制定各类养老规范，其中也包括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于是，各类政策法规、法令条例、服务规范以及评估标准等条文开始陆续出台。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政策、指引和规范等的落实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和构想想去甚远。结合笔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田野研究，不难发现，“顶层设计”的不足会给实际操作带来麻烦，达不到设想的效果。

正如上海推行的长者照护之家和日托中心，政府部门的设想是收纳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并依托这些平台，扩展居家养老服务半径，以达到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目的。然而，笔者的田野研究发现，长者照护之家的少人问津，日托中心的功能错位，显然是决策者没有想到的。同时，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的补贴政策、评估标准和服务规范，也是为不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诟病的，认为这些举措忽略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并没有使得他们受益。

“顶层设计”对应的英语为“Top-Down Design”，是西方国家源于自然科学或大型工程领域的一种设计理念，引入国内后，被翻译成了“顶层设计”。其原意是站在一个战略的制高点，从最高层开始，弄清楚要实现的目标，进而从上往下地把一层一层设计好，使得所有的层次和子系统都能围绕总目标，产生预期的整体反应。显然，“顶层设计”包含了对高层次的设计、对中层层级的设计以及对基层层次的设计，并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就是对高层次的设计。因此，“Top-Down Design”既包括了“顶层设计”，也包括了“基层设计”。如果单单是宏大的宏观战略设计，忽略了基层设计和执行，则最终效果极有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现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Jim Yong Kim) 在《实施全球健康》(Delivering Global Health) 一文中指出: 许多政策的实施最后都失败了, 原因在于政策实施并不是简单的生效或是无效。例如某国尝试努力提升教育率, 最后却往往适得其反; 又如某国进行立法以打击贪污腐败, 效果甚微。因此, 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了解每个项目的特定背景知识,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解决方案, 也应去承担一定的风险, 并时刻关注实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同时, 在实施过程中, 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剥夺政策实行对象的能动性, 而是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 共同促进政策的实施 (Jim Yong Kim, 2008)。可见, 就上海的居家养老服务而言, 如果要使得政策顺利实施, 并达到预期的效果, 则应在相关工作过程中, 时刻注重老人的需求, 并不断进行调整, 这样才可能达到居家养老服务的初衷。

无论如何, 现行居家养老政策的初衷和本意是很好的, 也确实为老人做了实

事, 然而在政策传递与实践过程中仍应进行改善。现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上任后曾多次提出“实施的科学”<sup>41</sup> (Science of Delivery), 即在旨在为当地人提供帮助的政策项目实施过程中, 从事前到事后都应结合多学科对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设计与论证, 而不是简单的执行, 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并最终改善当地人的生活。虽然“实施的科学”针对的是贫困与疾病, 但是之于居家养老服务, 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居家养老服务从设计到执行, 都应仔细论证, 始终以老人需求为首要目标并注重他们的自主性, 最终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 第四节 研究限制和研究展望

在笔者的田野研究中, 由于受到研究资源和研究时间的限制, 展示出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and 各类视角更多的来源于学术上的建构。笔者的质性数据多来自参与观察以及对于老人、服务提供者和民非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 来自决策者的信息较少。因而, 如若在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时候, 还应对民政部门、医疗部门以及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知晓他们眼中的居家养老服务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及存在的问题, 从而加深笔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理解。

此外, 在未来研究中, 笔者也应扩大田野研究的范围, 不仅仅只是局限在社区, 而是将田野研究范围扩大至护理机构、养老院和老年公寓等养老服务提供主体。探讨在推行“居家养老”的语境下, 各类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探索全方位的体系和模式。甚至有可能的话, 笔者也将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对各国的养老体系和居家养老服务进行研究。

<sup>41</sup> 见金墉 2012 年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上的题为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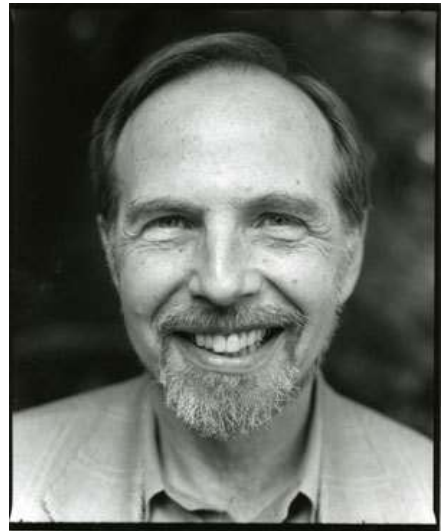
## 书海撷趣

## 医学的符号现实：有关医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Kleinman, Arthur M. 1973. *Medicine's Symbolic Reality: On a Central Problem of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Inquiry* 16(1973): 206-13.

这篇发表于 1973 年的论文可能是凯博文最早的一篇引起医学人类学同行重视的力作。在文中凯博文 (Kleinman) 用维特根斯坦的日常生活语言来隐喻“由新旧楼房所组成的街道和广场迷宫”，用科学语言来隐喻“笔直规整的街道和千篇一律的房屋”。针对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反差，凯博文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观点，即：正在学界出现的对于科学、医学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兴趣，将彻底地改变学界对医学的认识(1973: 208)。凯博文认为：有关现代医学的社会和文化维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医学现实的符号特征。而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医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普



遍模式。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医学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文化体系，其中符号意义在疾病的组成、病痛的分类和认知管理以及疗法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医学的符号现实也在文化和心理生理现象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成为医学理论和医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人类学者（如古德）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凯博文的提议，对不同情境中组成医学文化和实践的“街道和广场迷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过程中，“阐释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得以逐渐完善。在论文中，当时还是外科医生的凯博文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学理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什么是个体、社区或者某一人群的真正健康需求？临床护理的目的何在？临床解释和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医学愈疗是什么？医学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的？它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又有什么关联？权力的社会资源是如何被发掘并未为解释和疗法所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本文篇幅短小，但的确在当时成为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文发展的某种思路展示。年轻的凯博文在发表此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重构医学人类学学科并最终创立哈佛学派的荆棘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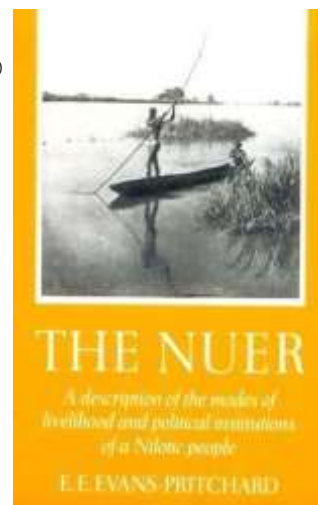
## 深读《努尔人》

复旦大学人类学 2015 级 陈若云

Reading *The Nuer*, *Current Anthropology* 24, no. 4 (Aug. - Oct., 1983): 481-503

如何可以把书评写成权威期刊的论文？Ivan Karp 和 Kent Maynard 于 1983 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 杂志上题为“Reading The Nuer”一文是绝佳范例。这篇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民族志名作《努尔人》进行深度和评论的文章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篇普通书评的体量。两位作者将民族志文本和学界评论进行并置，对围绕《努尔人》的讨论所指向的理论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回应、分析和再阐释。

作者在文章开头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旨在达到的两个目的：一是力图展示带有不同理论视角的学者对于《努尔人》的不同解读是对现实中复杂的多重因果关系中特定原因有所偏向的结果；二是试图说明关于《努尔人》著作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论点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的争议可以从文本本身找到答案。



《努尔人》自 1940 年出版后，引发了人类学界持续的讨论，文章开篇引用杜蒙的一段评论来说明他认为这本民族志引起热议的缘由，“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然宣告了它所具有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是描述生态环境及其对努尔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展现一套和环境全然无关的概念系统和机制……或许，正是因为读者拥有倾向于这二者之一的选择，这本书才在专业领域如此流行。”(Dumont, 1975: 329-30) 杜蒙认为《努尔人》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而波科克 (Pocock) 的评论也显示出《努尔人》原作意义上的解释弹性。波科克认为《努尔人》标志着人类学理论关注点由“功能”到“意义”的转变，普理查德在书中所言，“价值观念体现在语言之中，并由此影响行为”(Evans-Pritchard, P1940a: 135)，这句话可作为其关注语义相对性和“意义”的佐证。除了杜蒙和波科克之外，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都曾写下他们对于《努尔人》的解读和看法。比如，唯物主义、生态学取向的评论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在书中认为生态环境和物质是导向分支裂变的宗族体系的原因，利奇 (1961) 和萨林斯 (1961) 就都曾将《努尔人》作为反对神秘主义取向、认为政治分支裂变自成一格的观点的例证。

Karp 和 Maynard 逐一列举出各学者对《努尔人》的评论中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并点明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波科克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聚的作品标志着“意义”转向，但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功能”和“意义”概念似乎并存于普理查德的论述中，此外，很难直接定义所谓的“意义”由生态适应所决定，还是不依赖于物质、仅仅和社会结构的规则相联系。而利奇和萨林斯等人将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归因于文化系统之外的环境因素，则忽略了文化模式与实际实践之间的区别和冲突。

综合各位学者对于《努尔人》的学术探讨，文章作者发现各方讨论的分歧大致集中在同一个问题上，即：在一个社会中，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二者如何相互影响，或者一方决定了另一方？大部分对于《努尔人》的学术评价均认为这是埃文斯-普理查德在书中所试图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文章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是对文本的过度简化。他们并不同意部分学者所主张的观点——《努尔人》一书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和断裂，而是揭示出这种看法所基于的前提假设是对物质环境和价值观念的简单二分。

Reading The Nuer 一文的两位作者认为，社会秩序和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联系，是跳出上述论争、理解《努尔人》的关键。社会秩序使努尔人的行动成为可能，而个体的能动性则使得社会秩序不断被再生产。在埃文斯-普理查德对于努尔人劳动的分析中，人的能动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将努尔人的生态环境和物质条件与努尔社会的结构化原则和文化模式联结起来的中介。(Evans-Pritchard, p.482) 文章作者以民族志的第一章“对牛的兴趣”为例详细说明了人对能动性的关注在书中的具体体现。章节标题中的“兴趣”一词也间接凸显了埃文斯-普理查德行动者导向的观点。牛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努尔人饮食和经济的重要来源，对努尔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约束，同时也是某些社会行为的动机。对牛的兴趣和自然环境相关，但也成为诸如保护领土等政治目标背后的动因。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笔下，努尔人的生产劳动使牛成为连接物质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媒介。牛可以被视作一个隐喻，而一旦这类隐喻承载了一系列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社会生活中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它们就会从从中扎根其中的经济因素中脱离出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两位作者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生态环境的勾勒并不表明他持生态决定论，对于努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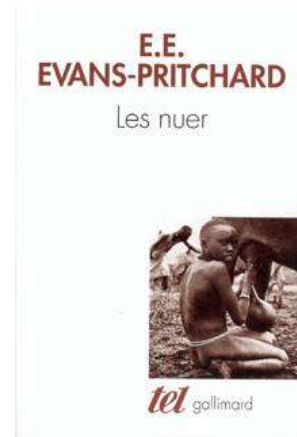


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族体系的论述也不是在宣告他认为努尔人文化自成体系的立场。无论是对牛在努尔人社会中核心地位的讨论，还是在书的其他章节中对努尔人时空观的呈现和对政治制度的分析中，埃文斯-普理查德辩证看待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相互生成的观点和他反决定论的立场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Reading The Nuer 不仅是一篇常规意义上的书评，它注意到了以往学者对《努尔人》的多种解释和理论建构，将民族志文本放置在学术历史的脉络中对其进行分析。它提醒我们注

意，将人类学者划归入特定的理论流派是后人的行为，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对特定流派所持观点的刻板认知会加剧理解原始文本的难度。两位作者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关注并揭示出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之间作用的相互性和机缘性。当然，这种理解也是文章作者站在自身学术立场上所做的解读。

和正文同时刊发的还有一组其他学者对这篇解读的简短评论和两位作者的回应，部分学者也在评论中指出他们认为这篇再阐释所遗漏的部分，比如 **Burton** 就认为，两位作者的分析中存在和埃文斯-普理查德同样的问题：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相信在这些学者热烈的学术讨论和对话中，读者可以获得经典民族志阅读的新视角和新灵感。哈佛人类学者 赫兹菲尔德在他讲授 *Critical Readings in Ethnography* 课程时，特意推荐此文作为课程作业的样本推荐给研究生，供其参考。



## 对于“多点民族志”的再思考

复旦人类学 2013 级 沈高明

Marcus, George. E. 198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95-117

三十年前，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教授基于他在汤加王国的田野体验，首次提出“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这一概念（Marcus 1985）。当时他发现汤加移民流出日益增多，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马林诺斯基等早期人类学家所倡导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逐步囿于困境，无法从更完整地叙述与还原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汤加文化与社会。所以，乔治·马库斯开始认识逐渐意识到“多点民族志”此概念，并尝试以此种形式写了一篇汤加文化国际化以及汤加要素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得到重置的文章（乔治·马库斯，1980）。



其实，先于乔治·马库斯，已有学者尝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包括了空间上的转换。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屈顺天（James Watson）在对香港新界的文氏宗族进行研究时，不仅只在新界的文氏村庄对文氏族人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同时，也利用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教书的机会，对于那些已移民伦敦并在那里以靠经营饭店为生的文氏族人进行观察与研究，前后持续了三个多月。最终，完成了《移民和中国宗族：文族在香港和伦敦》（*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一书。此时，距离乔治·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还尚有时日，可谓是“多点民族志”研究的早期范本。

与其他人类学家早期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认识一样，乔治·马库斯先前也只是认为其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乔治·马库斯，2010）。而在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更应知晓关注对象的意义、如何关注以及整个追踪过程的如何进行。

相对来说，以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进行入手，是比较方便的“多点民族志”样本。但是，这些方法也使得一些人类学家产生了困惑，此种方法势必使得民族志研究变得单薄，从而导

致对于投入田野工作强度的削减，而正是那种长期细致深入的田野工作才使得人类学

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建构呈现其独特价值（乔治·马库斯，1997:97）。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得“多点民族志”研究更深入，更能挖掘出现象背后的意义所在，恰恰是如今的人类学研究者所应充分考虑到。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除了在某些范围内移动的被研究对象外。更多的时候，“多点民族志”的被研究对象往往是跨文化与跨国界的。此时，更需要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了解跨文化之于被研究对象的意义所在。

“多点民族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则离不开“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 System System）。“世界体系理论”的确立，为“多点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础。“世界体系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而马克思学派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阐释。他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交织而成的整体，在这个网络中，有历史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非西方关联到了一起。在其代表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探讨了 16 世纪后，欧洲大陆是如何把其他大陆的不同社会组织和族群的国家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其中，“没有历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指的是被西方世界隔离和孤立的“原始人类”（primitive people）。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是不被现代社会所承认的一部分（艾瑞克·沃尔夫，1982:3）。但是，这些不被承认的一部分，却已无法避免地卷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中。因此，对于这些民族或是国家的理解，既要从其内部入手；同时，也应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对其文化的内涵进行解读。

所以，对于“多点民族志”研究来说，不能只是研究独立的民族与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仍保持分离和静止不变，而是应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研究。此时，恰恰需要的就是跨文化研究，将被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体系之下，才能更为立体、更为生动地还原出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关系。

在“多点民族志”研究过程中，除了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仍应将各种过程及其社会建构的地方层次相结合。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一文中，乔治·马库斯认为，好的民族志研究，往往需要对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有感受力。他以二战后的美国为例：二战后，国际秩序日渐衰弱，美国开始占据霸权地位，而这种霸权甚至开始侵蚀美国自身的福利国家形式；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他们感觉到了国内与国际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反映到学术界，是已经中心化与组织化的知识领域的广泛撤退，如历史、文学、艺术及建筑学等学科；中心化与组织化开始让位于碎片化和实验精神，而在此过程中，民族志则是先于这一潮流而成熟的利器（乔治·马库斯，1986:167）。所以，可以认为，在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开始向民族志进行转向，而优秀的民族志研究往往也不能脱离于历史、政治及经济等各类背景，“多点民族志”研究更是如此。

除了跨文化研究与对于政治经济学等的考量外，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乔治·马库斯时时刻刻强调“合作”（collaboration）。他认为，自《写文化》（Writing Culture）问世二十五年来，对于“合作”的强调一直在持续。虽然人类学学科还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在进入田野调查环境的时候，往往需要有“当地人”的配合，不是突然空降到某一社区的。进入的过程与周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不开“合作”。在西方语境中，二十年前的“合作”，是强调“发展”；那时，人类学家的作用是很边缘化的，只是在涉及某些具体开发项目的时候，才参与相关的咨询工作，使得项目得以顺利地进行。而在二十年后，“合作”则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意味着可以明确双方各种合作的方式和标准，这样就使得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走得更远；二则意味着“合作”也可以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各方聚拢融合，不仅是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中所能践行的<sup>42</sup>。

如今，对于所有的“民族志”研究来说，注重全球化背景的同时，也应意识到互联网与新媒体所带来的冲击。网络空间的虚拟化、虚拟化背后的个体的空间转换、网络空间身份认同等，都给“多点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新的挑战。

可以说，无论时间与空间是如何不断发生着变化，理解“他者”与构建“他者”仍是人类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在理解和构建的过程中，也是通过发现“他者”与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而乔治·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则恰巧可能是较为有效的途径：通过“追踪人群”（Follow the People）、“追踪事件”（Follow the Thing）、“追踪隐喻”（Follow the Metaphor）、“追踪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追踪生命历程”（Follow the Life）等方法来跨文化、跨地域进行展开（乔治·马库斯，1995:95-115）。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他者”，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 参考文献：

- 1) Marcus, George. E. 1980. "Power on the Extreme Periphery :the Perspectives of Tongan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Pacific Viewpoint 22:48-64
- 2) 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11:3
- 3) Marcus, George. E. 1997. "The Uses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ense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presentations 59:85-108
- 4)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5) Marcus, George. E. 1986.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sup>42</sup> 根据乔治·马库斯 2015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所进行的“*What is the Space of ‘Paraethnography’ Especially in Multi-sited Projects That Depend 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ojects of Other Sorts of Experts, Activists?*”整理而成。

- Modern World System” , in Clifford and Marcus, Writing Culture
- 6) Marcus, George. E. 198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95-117

## 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和人文主义

复旦人类学 2016 级 张宇芯

*Turner, Edith 2007.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Vol. 32, Issue 2, CC 108-116.*

如何能够体现人类学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答案莫过于民族志的写作。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文化的事实描述，同时希冀让读者理解：文化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功能的。研究者所搜集的田野资料愈加生动丰富，那么他所展现的民族志写作风格也会愈加出色。弗吉尼亚大学已故人类学者伊迪丝·特纳（1921-2016）基于其长达 58 年的教学研究生涯，在此文中对比讨论了两种风格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她认为：其中的一种风格是备受田野工作者推崇的，而另一种则是高等院校考官和研究经费资助人所欣赏认可的。而在伊迪丝看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人类学家能够描绘出一幅更接近人们真实生活的图景。

伊迪丝在本文开篇提到了人类学的任务是提供关于人类自己的知识，而人文主义人类学更加关注那些活着的“人”。*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内封首页上就这样阐释了人文主义人类学的使命：

（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文主义人类学家试图在“他者”和“我”的文化中寻找答案。无论是个人生命史还是人口统计学，诗学还是营养学，艺术表达还是学术写作，这本杂志所持续关注的就是那些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AH 杂志鼓励那些为了展现人类社会的一切欢愉、暴行、荣誉和苦难而进行的写作，并因此能够推动跨文化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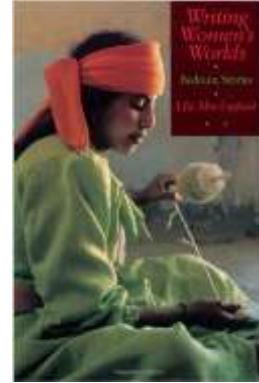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特质了——它包容涵盖了大量对人类的情感和激情的描写，而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常见的。那么那些“欢愉、暴行、荣誉、苦难”在人类学者的写作中到底有何作用呢？作者在文中援引了大量人类学的作品对此进行说明，这些字眼曾出现在 Renato Rosaldo、Ruth Behar、Duncan Earle 等人的作品中。AH 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 Bruce Grindal 也曾在 1993 年说过“我们必须冒险去写作并出版那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无独有偶，Barbara Tedlock 也曾在“从参与式观察到参与的观察”一文中列举出诸多杰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里是特别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将真实的人性的温暖带入到写作中，帮助读者去对另一种文化感同身受。

许多人也许都曾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开始一段故事叙述来反映他们民族志的核心内容，这是他们是头脑清晰且思维流畅的；然而当他们希望从自己获得的一系列结论发现中推断出理论性的总结，当他们使用那些他们认可的、经典的、学术化的学科训练思维，那些模糊不



清的论述似乎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尽管这时他们自己都不能够说服自己。我们为什么不停止这些无谓的叙事？鼓励那些满怀信心的田野工作者勇敢地放开手，去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像 Samdar Lavie 混迹于贝都因人中一样，去爬一棵椰枣树帮花授粉、生病后请来当地的巫医治疗，去真正地参与和体验。（Lavie, 1990:16）

Lila-Abu-Lughod 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喜欢和埃及的贝都因人闲聊，在其专著《书写女性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一章中，她提到一位当地的 Migdim 嬷嬷告诉她的一个故事。Migdim 嬷嬷经历过奔放的少女时代，当她的家人希望她嫁给父亲家的一个堂兄，年轻的 Migdim 并不喜欢这个人，面对家人的施压，她跑到一个山谷中连续十天大声尖叫，她又跑到自己将要结婚的帐篷里，将要涂刷帐篷的黑色油漆从头浇落。从这时起他的家人安静下来，婚礼也被延期了，之后人们甚至忘记了有这回事。（Abu-Lughod, 1993:47-48）最终 Migdim 同意嫁给了自己伯母的儿子。伊迪丝：



认为 Lila-Abu-Lughod 的巧妙之处在于在书中她推翻了父系制、一夫多妻制、父系表亲婚姻、荣誉和耻辱等概念，她把自己眼睛所见的事情记录下来——贝都因人是如何行动的——尽管这会是复杂而令人惊讶的工作，但是她却成就了一本畅销书。（参见复旦人类学公众号“每周一书”推介：《书写女性世界》（2016年1月15日））

过去的人类学家们希望那些被研究的对象尽量保持最初的原始状态，担心自己的介入会打破这个状态，因此他们将自己视为“置身事外”的观察员，但按照人文主义人类学的观点，他们忽视了“我们”与他们正共享着同一个社会和生态系统，我们共属于同一个物种，而“我们”本身也不能脱离“他者”存在。爱迪斯认为应当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去按照当地人的礼节和习惯生活，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要敞开心扉去与他们做朋友，Edward Burner 在 1984 年曾说：“在我们的学术训练中，出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一切变得更加有趣也更加开放，我们可以对自己保持城市，并且承认我们情感的力量。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与我们的主观意志共存，对人类学和自我都保持开放的姿态。”

然而现实似乎并不如此乐观，新一代的博士候选人们走进校园，互相竞争以展现自己出色的学术素养，他们是布尔迪厄、科马罗夫、德里达的整脚的模仿者，他们的写作似乎在宣告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传递信息而已。他们仍然被教导不要用第一人称叙述，引述他人所言时要使用引号，好像自己只是在旁的围观者。人文主义人类学需要放下对传统学术规范的执念，让民族志的写作变得更加轻松有趣，便于理解。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那些传统的严肃的写作风格仍然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你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学生们需要在未来谋求一个教职，他们被要求按照这样的规范写作。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中，它好像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黑洞，不断吸引着那些初入校园的年轻人。

Dennis Tedlock 也曾比较过这两种风格的民族志，他更偏爱前者：“拉近读者和当地人

的关系,将让双方置身于更亲密的对话之中,这样文化差异就不必是通过解释而消除的。(而后者)它所面向的受众只是本学科内的人而不是公众,好像民族志的贡献只是学术圈里的自娱自乐。”(Tedlock, 2004:14)人类学者就好像是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而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田野居民。

民族志写作应当比宗教作品更深刻,比神话作品更实际,同时运用诗化的暗喻,因为这就是人类学,不是充满教条说教的神学,也不是仅仅为了感受美之震颤的诗歌,亦不是如社会学家口中所说的对奇闻逸事的猎奇。因为人文主义人类学是社会的医疗者,我们感受着社会的痛楚,并尽努力移除这些病痛之源。

伊迪丝还在文章最后提出,人类学家需要培养自己善于发现特别事物的敏锐洞察力,那些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提供的过分修饰的研究计划是没有意义的,田野工作并不依赖预先的计划。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冷冰冰的陈述,而是强调与当地入进行的深度对话。

文章最后作者再次提出,讲故事在民族志中是具有极高的价值的。格尔茨认为人类学者只能对他人的解释进行再解释,因此能够把握的只是表象。可是当他躲避警察的围追堵截,在斗鸡比赛之后嘲笑巴厘岛人,他似乎也已然忘记了“自我”的存在。用生动的故事取代学术术语,可以将已经过去的经历重新鲜活起来,可以带领读者拨开层层迷雾,去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入理解,同时拓宽人类学学科自身的道路。民族志给予文化现象真诚尊重,并且绝对诚实地记录这些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如同当地人在亲身诉说,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得应有的认同和理解。

### 参考文献:

Abu-Lughod, Lila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uner, Edward, ed.

1984 Introduction: The Opening Up of Anthropology. In *Text, Play, and 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 Edward Bruner, ed. CC. 1 - 1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Lavie, Smadar

1990 *The Poe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Mzeina Allegories of Bedouin Identity under Israeli and Egyptian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edlock, Barbara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1): 69 - 94.

Tedlock, Dennis

2004 Voice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Statement for the Writing Culture  
Planning  
Seminar,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Santa Fe, October 28 - 29.

## 血缘，地产，和移民社群的变迁——再访文氏家族

复旦社会学 2016 级 梁群茹

*Virtual Kinship, Real Estate, and Diaspora Formation: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

(JAMES L. WATSON)

Watson 这篇报告，讲的还是香港新界新田村的故事，关注点是移民社群的历史变迁。民族志的有趣正在于它没有定论——人是鲜活的，移民更是如此。从 1969 年开始，Watson 用 35 年对分散在全世界的新田人进行田野调查，在“多点民族志”这个词还没被发明的时候，Watson 就已经在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了。移民们的生活图景今天是这样，明天却未必，关于他们的民族志记载无时不需重新书写。

### 一、为什么踏上远行之路？

新田文氏的始祖叫做文世歌，于十四世纪在村里定居。在移民之前的 600 年里，文氏后人依靠在深圳河边种植红米而生，每年举办盛大的开灯仪式来纪念祖先，撰写同一本族谱，服膺于同一种准则，自然也共享同一份经济利益。

今天的香港或许只是一个金融中心，普通而庸常，但在六十年代，它是“相互抗衡的两个世界相遇的地方”，作为冷战的前沿阵地，香港一边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这种有趣的境地增加了文氏生活的复杂性。

香港 50 年代初，香港和大陆明确了界限，新田农民红米的市场被划分到深圳河另一边的社会主义阵营，新田的种植条件并不优渥，至少不能支持他们像周边其他村子那样改种蔬菜，这样一来，新田农业因而面对着严重的危机。文氏族不得不放弃农业，却又难于在科技日益昌明的现代世界中寻到出路。他们步履维艰，在历史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幸而香港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蛮夷之地，新田一直与海外世界保持着不多不少的联系，适逢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新田绝大多数男性劳动力去到英国，成批地涌入当地的工厂、交通、旅店和餐馆，并很快形成了移民社群——这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 二、全球化所未能动摇的：宗族活动

宗族在很长的历史里都是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方式，多少有些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意味——长久不变的规则、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这一切都像与全球化的浪潮背道而驰。一个人走出了地理的限制，又如何凝聚于宗族的力量呢？

然而在新田文氏，宗族之兴与全球化之兴并行不悖。在移民社群的第一阶段，50年代末-70年代初，Watson称之为羁旅阶段（The Sojourner Phase）。移民们在国外打拼，手头逐渐宽裕，开始有能力开始资助家乡的戏剧，修建庙宇、祠堂和学校。例如，移民们不仅承担了50000美元的当地天后庙的修缮，还支付了修缮完成后为期五天的庆典。族里老人请了香港最流行也是最昂贵的粤剧班子来娱乐村民和远道而来的亲戚，大摆140桌宴席来恭祝他们的保护神“天后”。总之，大量移民后，传统仪式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变得更兴盛了。

这是因为在移民早期，文氏的移民显然还是深深地根植于家乡的——他们维持着艰苦的生活，将辛苦积蓄寄给家里的妻子、孩子和老人，过个三五年攒到些钱就会想办法回家一趟。几十年的清苦生活只为了在家乡盖一座小楼，好衣锦还乡、安度晚年。

### 三、全球化的影响：团结自身和与外部世界的对接

首先，语言使用的变化昭示着社会的变迁。早期第一代移民，真正的双语者极少，即使生活在国外，但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主要使用的语言仍然是粤语，他们最大的梦想仍然是荣归故里，安度晚年，他们的所有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对家乡生活的想象。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许多第一代移民的子女被接到国外，承担挣钱养家和照拂父母的责任，也就是文氏家族在海外的第二代移民。理所当然，第二代移民比他们的父母更善于社交，他们的读写能力使得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更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读写汉语——这是第三代移民所不具备的了。

其次，除了语言，宗族组织中权威地位的来源也发生着变迁。在乡土社会，辈分、年龄和他所拥有的祖产决定着宗族成员的权威地位，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与他的年龄有着直接联系。而在动荡不安的移民生活中，年龄和辈分变得不那么重要，关于世界体系的知识摇身一变，成为重要的权威来源：哪些时候哪些边界容易跨越？比利时的签证规则是什么？哪些城市有更好的开餐馆的位置？哪里打印菜单更便宜？出了市长和他的家人，我还该请谁来我的开张仪式？……特别是1990年代后到21世纪初，移民社区形成的后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Phase of Diaspora Formation）。航空旅行、电子交流和国家边界的多元性改变了文氏移民子弟的世界观。一方面，文氏宗族成员定期往返于欧洲/加拿大与香港，特别是经商人家，宗族内的表兄弟尽力保持彼此联系，一开始是电话，传真，到后来的电邮、手机，跨越三四个国家的生意合作也很常见。此时，宗族网络就是一张信息网络，信息严格限于“真正的文氏子弟”中，即不包括女婿或其他外系姻亲，宗族成员间密切的信息交换是文氏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文世歌坟前的传统仪式每年仍在进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宗族子弟主导着这场仪式，他们用邮件和电话传递消息，用录像机纪录仪式，他们组成是跨越世界各地、多达4000人的世界性网络。

### 四、女性的崛起与继承之争

不难想象传统社会中女儿的生活状况，便是布迪厄《单身者舞会》中女性的处境也是类似的，她们没有资格继承家产，只在结婚时得到一份嫁妆作为放弃财产的补偿，婚姻犹如一场利益的博弈和权力的交换。直到 1980 年代，文氏还是男性的，女性不被认为是宗族的合法成员。新区的广东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姓的融合，女儿们始终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地位上：在单姓村落，她们没有选择必须要外嫁，而且嫁过来的女人也都只能是外人。一旦女性接受了父母陪嫁给她的金首饰，便视为放弃了继承家产的权力，当然，她们的权力将从丈夫那里获得。

全球化带来了性别平权的观念，也为文氏女性创造了获取知识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海外家族企业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女性的身影，她们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也开始要求在遗产分配中占取一席之地。

与《单身者舞会》不同的是，中国是世代相袭的大家族，各系各房都能够享有继承权。每年的土地红利，是以世系的分支为单位领取，而不是按人头，也就是说独生子生的独生子要比大家庭拿到更多的钱。那些来自最大的系（传统说来最不富裕）的人就很自然地要求更多的红利。财富的生产与遗失，都是基于文世歌这些土地的事保留还是售出，以及与此相关的继承系统。文氏和他们的后代在快速、直接和个人化的新风俗中，经历了内部的分裂，继承权之争暗暗燃烧。

## 五、政府、人脉与投资

90 年代晚期，国际政策变化，发生了移民大举回乡的浪潮。文氏回归后，宗族热情复燃，一来表现在全国文氏同姓会中逐渐占据领导地位，二来表现在他们重新与音信隔绝 40 年的深圳河另一边的族人取得联系。他们选择吉安县为宗族活动的主要场所，因为这里是他们假定的祖先——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文天祥是否真的是新田文氏的先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民族英雄正作为一种契合当前主流价值观的文化符号，激发着文氏宗族子弟的文化认同，凝聚着散沙化的个体。

当地政府对于文氏宗族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宗族这件事，即使在 90 年代还是有些不尴不尬——国家宏观力量已经不再渗入宗族的管辖范围，可是宗族权力早已失去其合法性的来源，一般来说，政府是不太愿意掺合其中的。只是，文氏的宗族复兴的牵头人往往是经商有成的归侨，他们选址也不是纯粹的文化活动，而是带着“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投资当地产业和企业”这么一层意思。文氏的选址，对于本不富裕的吉安县是难得的发展契机，当地政府自然殷切。我们看到，至少在这个例子里，国家权力并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而是有其利益导向的。

再说亲属网络重建背后的根源。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相关，当初香港大陆的分界将庞大的文氏一分为二，一边生活在资本主义和移民的环境中，一年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辖区。对应的，香港这边重聚的牵头者是富商们，和深圳这边是政府干部们。他们的重新汇合，是纯粹血缘

力量的神秘召唤吗？不，归根到底是社会精英寻找商业伙伴的过程，来自深圳河两边的精英，具有对方所需求的资源，这是他们重建联系的重要根源。用 Watson 的话说：这些地区性亲属关系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变相的商业框架。亲缘与生意，这两种因素造就彼此缠杂，即使是行动者本人也说不能说清哪个是本哪个是末。

## 六、宗族复兴动力何在

至此，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文氏没有淹没在现代性中，没有像其他宗族一样成为记忆呢？现代化进程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渐行渐远，可是新田文氏却如同一股逆流，继续了下来。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可他们不仅保持着联系，且始终没有放弃过寻找失散的宗族成员的努力。他们组织海外文氏宗族会，更新族谱，为了编纂文氏宗族的历史而成立跨国协会。这种凝聚力，来源自何处？

或许你已经发现了：不论前面我们讨论的是女性地位、是族会选址、还是宗族凝聚——始终有，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即经济利益。在个体主义价值观横行、生活状态流动不羁的今天——归根到底，是地产将文氏宗族凝聚了起来。

文氏农田约有 1000 顷，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开阔空间之一，越来越高的办公建筑中显得难能可贵，香港不少地产大亨，包括文氏企业本身，都对这些土地饶有兴趣。写作本文时，香港政府已经制定实施了土地发展计划，但文氏家族内部对此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对宗族团结产生了悖伦性的影响，他们之间发生口角，还雇佣了昂贵的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文世歌已经死了六个世纪，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说他还活着，且是作为一个香港最大最有策略的地产商活着。财富的生产与遗失，都是基于文世歌这些土地的事保留还是售出，以及与此相关的继承系统。

## 七、狭隘的“地产决定论”与狭隘的“文化决定论”

我们常常讨论中国式价值观，但我觉得中国人在观念上的特殊性，与其说是文化浸染的结果，不如是土地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作用的结果。在依赖于脚下这块土地生活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维持秩序、巩固礼法的知识；在移民流出的初期，人们更加严苛地抓住昔日的规则，掩盖乱世的仓惶不安；当他们逐渐在海外立住脚跟，对世界体系的知识是他们最大的诉求，具备外部世界知识的人成为宗族的引导者。而当家里的土地带来日益丰沃的收益，他们与家乡的羁绊就不会消失。

纵览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近年来了的宗族复兴势头，我们很难对背后复杂的动机与以概括——实际上，“概括”本身也违背着人类学的初衷，但我相信经济是支撑着文化活动的根本。例如复兴活动往往见于曾经的望族，或多或少牵扯得上某个颇具盛名的先人，牵头的积极分子通常是当地较有声望的退休老人，等等。并不能说每一个有复兴势头的宗族都像文氏那样有着丰厚的祖产，但是显然，经济载体就像一个巨大的吸盘，牢牢抓着海外游子的步伐，也

承载着对故土和历史的“想象”。

Watson 对于地产的论述十分精妙——他说宗族的兴衰随着地产的存亡而变化，地产如同穿针引线般掩藏在宗族子弟的文化实践后，这种操控力有时剑拔弩张千钧一发，有时影影约约遁若无形。这不是一种必然式的物质决定论，事实上，出于对人类世界复杂性的尊重，我们很难做出某种必然的陈述。我想 Watson 大约会喜欢韦伯的观点：“不要试图用狭隘的唯心论取代狭隘的唯物论，也不要再用狭隘的唯物论取代唯心”，唯有带着这样的关怀，我们才可能向这个波诡云谲又切实可感的世界，多靠近一点。

### 参考文献：

James L. Watson, Rubie S. Watson. 2003.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 Watson. 1975.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人类学视域下医患关系研究的两种理论路径比较：以围产期研究为例

复旦人类学 2016 级 张宇芯

*Elle. S. Lazarus, 1988,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of a perinatal Stud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关于医患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一种是以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为代表提出的“文化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s),另一种是“批判式的医学人类学”(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前者关注的问题是,对患者来说“疾病”和“健康”是如何被认知的?基于患者对疾病意义的理解,他们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如何行动?后者则将医患关系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并认为对引发医患矛盾的社会性因素进行深度剖析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将这两种理论路径并置,并讨论它们在分析医患关系时的有效性,并在最后提出了另一种可供研究者选择的方法路径以弥补前两种方法的不足。本文作者 Lazarus 曾于 1981-82 年和 1986-87 年两次,在位于美国一个工业大都会地区的市中心区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进行田野调查,这些田野数构成了本文论述展开的基础。这家医院服务于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患者,并且以中低收入阶层居多,作者以围产期妇女为研究对象,追踪了 27 名波多黎各裔妇女和 26 名在美国出生的白人妇女。

凯博文等人(1978)认为,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也就是他们的文化解释模型——对治疗的理念、价值和目标的理解和认知——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医生与患者各自对健康、疾病和治疗的认知存在差异,并且缺少相互间的沟通,从而导致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美国传统的医学院教育只注重向学生传授一整套生物医学的知识和方法,而甚少提及要培养医者的跨文化沟通和理解能力,即使身处同一个社会中,不同患者的文化背景也可能千差万别。

在最初的访谈中, Lazarus 并没有发现所谓的“解释模型”,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与受访者的交流中搜集大量零散的信息。如果按照 Engel(1977)的理解,模型就是一套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使不能解释之事能够合乎情理逻辑的理念系统,那么这些妇女们的“文化解释模型”就是从医院的科普手册和大众媒体上获得的关于医学的碎片化的信息,她们相信到医院来接受一系列产前筛查和检测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一位 21 岁的波多黎各裔孕妇在生产前突然停止了宫缩并回到自己家中,她的祖母,一位波多黎各的助产士,建议她在分娩的时候不要咀嚼冰块,当她第二天再次进入产房后,她拒绝了医生提供冰块的

建议并且顺产下了一个婴儿。尽管在波多黎各妇女和白人妇女中都存在一些关于怀孕、生产和照料婴儿的本土知识,但是她们往往在现代医学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后才会诉诸于这些传统的方法。

Lazarus 认为这些孕期妇女在文化解释模式上与产科的医生并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她们大多数人仍然对自己所接受的医疗护理不满意,而产妇和医生在互动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认知差异的。Lazarus 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将患者对医疗的碎片化认知归纳总结成为“文化解释模型”是存在问题的,而这种方法过分强调以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为中心,而忽视了患者与医生的互动过程本身。

既然文化的解释模型认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那么他们为什么只强调文化的解释,而不考察其背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变量呢?“批判式的医学人类学”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关系的核心就是,那些掌握着医疗资源生产分配的一方和作为资源消费者的患者另一方之间的关系。Taussig (1980) 认为医学权威的合法性依靠着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建立起来,并控制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全过程,使患者丧失了绝大部分的自主权。Katz (1984) 将其称之为“沉默的利他主义”(silent altruism),医生并不会向患者提供关于疾病的相关信息,并且赋权于患者和医生共同决策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不可让渡背后映射了医生的个人价值观、其所接受的教育、对科学的确信以及可能的经济需求。批判式的医学人类学将关注点聚焦在医疗服务的质量上,他们关注医疗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关注患者不服从不满意或是与医生缺少交流的现象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患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Lazarus 在文中提供了两个可供对比的案例:Lisa 在产前一个月来到公立医院接受检查,检查过后她出现了出血的症状,但医生只是询问了向 Lisa 的住院医生询问了情况,并没有直接向 Lisa 提供解释,因为公立医院要为众多的患者提供服务,因此医生并不能给予每一位产妇太多的时间。而 17 岁的产妇 Lynette 却在另一家私人助产诊所接受了产前检查,在等待了 45 分钟之后,Lynette 在接待护士的带领下来到了诊室,为她检查的医生关切地询问了 Lynette 的心理状况,也十分关心她是否会因为预产期的到来而感到紧张,在接受检查之前,医生告诉 Lynette 这项检查后可能会有出血的现象,让她不要过分担心。在接近 25 分钟的检查过程中,医生不断鼓励 Lynette 可以向她提出一些问题。

通过这样的观察,Lazarus 认为若想要更加接近医患关系研究的核心,第一,要关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本身,而非只是关注患者如何理解疾病;第二,要关注社会医疗体系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对医患关系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单一地从文化认知的路径,或是权力批判的路径展开分析都是不全面的,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之下医生与患者的社会互动过程的特殊语境中进行研究,将会在“文化解释模型”和“批判式的医学人类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注：2007年凯博文在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对自己和同事当年创立的“病者文化解释模型”进行了反思和修正。

**参考文献：**

Kleinman, Arthur, Leon Eisenberg, and Byron Good, 1978, Culture, Illness and Care: Clinical Lessons from Anthropological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88:251-258.

Engel, George L., 1977,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 *Science*, 196:129&136.

Taussig, Michael, 1980,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4B:3-13.

Katz, Jay, 1984, *Silent World of Doctor and Pati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我们，蒂寇皮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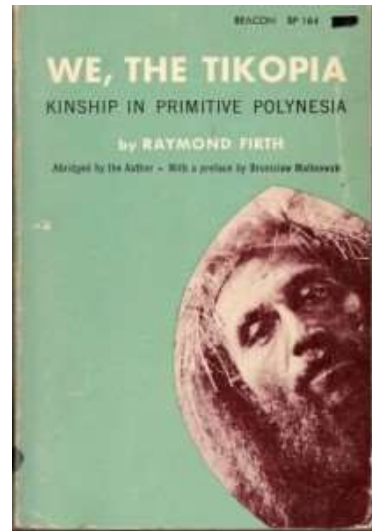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Firth, Raymond. 1936. We, the Tikopia. Boston: Beacon Press.*

标签：亲族研究，部落社会组织，经典重温

此书是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的代表作。虽然在上世纪 40 年代，他的学生费孝通翻译过导论格式的《人文类型》（Human Types）。但从实际影响力来说，《我们，蒂寇皮亚人》无疑是弗思更具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一部民族志作品。

1914 年著名人类学者李佛斯(Rivers)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一书，其中有关蒂寇皮亚的材料来自传教士杜拉德（Durrad）的记述。而《我们，蒂寇皮亚人》一书的第一手材料，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弗思是最早将马林诺斯基的“参与式观察法”真正付诸田野实践并获得成效的门徒之一。马氏在序言中对他的褒奖之词包括“人类学研究的榜样”（1936: xxi）并将弗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与贝森（Bateson）、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的已有成果相提并论。



此书对于 21 世纪的读者，至少有以下 6 大看点：

- 1) 如何从田野细节出发来建构理论模式（或者说如何不让理论预设来阻碍自己对人类日常行为的全面观察和揣摩），弗思的这本《我们，蒂寇皮亚人》提供了绝佳范例。
- 2) 针对结构-功能主义流派解释社会变化时所凸显的软弱无力问题，弗思强调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如亲族）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使田野工作者得以识别什么是恒定的模式（结构），什么是体现活力的个体和集体的真实行为（组织），好似行动理论出炉的先声。
- 3) 在本书第一版的序言中，弗思提及小说《红楼梦》中“有血有肉”的亲属称谓对他的深刻影响（1936: xvi），丝毫不亚于摩根的《易洛魁联盟》。
- 4) 他对于亲族的定义顾及了当地社会生活和组织制度的方方面面，从居住模式到饮食实践、物质文化、传统信仰等等路径，使得人类学者在研究家庭和婚姻实践时比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同行有着更加丰富的视角。
- 5) 此书为田野技巧的示范之作。以男性成人仪式（割礼）为例，弗思强调了观察者的理论

解释以及当事人对于实际发生事件的说法之间的区别，展示了如何从细节描述中提炼出抽象特征的具体做法（1936：382）。

- 6) 如果我们用挑剔的眼光和后见之明来再度审读《我们，蒂寇皮亚人》的话，会发现一些硬伤。如：在论及蒂寇皮亚传统宗教实践时，弗思显然忽视了相当多的当地人已经成为基督教信徒这一重要信息。但教训和反思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如果当年费孝通率先翻译的是弗老师的这本《我们，蒂寇皮亚人》，他没准能写出绝对有故事性的《侂，吴江人》，为后学提供比《江村经济》更为生动鲜活的民族志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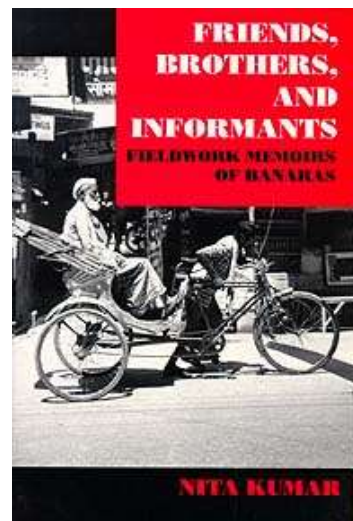
## 朋友、兄弟和报道人：贝拿勒斯田野研究回忆录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Kumar, N. (1992) Friends, Brothers and Informants: Fieldwork Memoirs of Banar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标签： 田野研究，民族志写作，“本土”人类学者的困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欧美人类学者开始把猎奇的目光从非西方的异域他乡投向自己一直熟视无睹的文化和社 会环境，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焦点议题开始审视和反思。与此同时，从费孝通开始，非西方的人类学者在接受西方人类学专业训练之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做本土研究，也已经蔚然成风。一般人会认为，本土出身的本土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和社会实践，有着独特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洞见，做起田野研究来势必轻车熟路。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朋友、兄弟和报道人》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这一本土人做本土田野研究的常识。



《朋友、兄弟和报道人》一书的作者库玛(Kumar)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裔社会人类学者。该书是她以自己在印度古城贝拿勒斯的田野研究经验为基础而写成的回忆录作品。此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对田野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挫折和问题所做的翔实记录。来自印度德里的库玛选择贝拿勒斯市作为田野点。入场不久 她很快发现，就语言、文化和地域差异而言，贝拿勒斯对她来说无疑是充满神秘感的异国他乡（Kumar 1992: 15）。人山人海、黑压压的危房陋屋、调皮捣蛋的猴子、肮脏不堪的食物以及刺鼻的恶臭，是她初来乍到时的真切感受。在此后的几个月间，她不得不适应这个对她来说非常陌生甚至不太友好的城市。

凭借社会关系网络，库玛终于打通了当地官僚关节。然而，她始终却苦于找不出好办法来接触她最感兴趣的当地手工匠人社区。为了找寻可以成为“知情者”（informants）的编织手艺人，库玛至少经历了四次周折。她最早遇到的编织艺人与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来往密切，后者常常会送旅游者来编织品店购物。库玛显然不想成为给他们的生意来源。库玛第二次遇到了一位开办编织场的穆斯林商人。由于没法打消对方的疑心，她只得另找他处。库玛遇到的第三位关系人是一位莎丽传统服装的推销商。他热情地把库玛带到一个编织艺人聚集的市场。不过让库玛十分尴尬的是，他会不时地叫来编织艺人与她交谈并谈论她的研究。

库玛的第四次尝试始于她的一次意外发现。两个做鞭炮生意的家庭成员刚好也是编织艺人。她受邀到其中一位兄弟的织机房去看看。然而，在一大群单身汉中间，库玛觉得非常不自在，只得把拔腿开溜了事。一个极为偶然的机，库玛通过绢丝生意人的引见，在一片政府廉租房区域找到了一家编织户，一个让她觉得安心的场所。才几个星期，她就按惯例成了这户人家主人的干女儿。女儿的身份让库玛感到亲切、自然和安全，使她得以从容地进行田野研究。

这部以回忆录样式写成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思色彩，然而库玛却没有陷入自我呻吟和对于真理和权力本质进行反复解构的后现代陷阱（尽管她受训的伯克利大学里充满了深谙此道的同僚）。与《摩洛哥田野研究反思》一样，此书以令人信服的田野遭遇故事，对科学主义的客观数据收集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库玛以幽默生动的叙述，告诉读者人际交往中的“因果细节”，如：说话音调、身体姿态和表情变化都是用“严格”研究手段难以捕捉和吸纳的田野数据。同时，库玛将本地档案和田野获取材料综合使用以获得新知的方法颇有创意。库玛在田野中接触到的朋友、兄弟和报道人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手工艺匠人，而她本人却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人士。如何获得信任（raCCort）并建立跨阶层的友谊，始终是一道难解的伦理谜题，不管人类学者选择的田野点是在印度的贝纳巴斯，还是美国的中西部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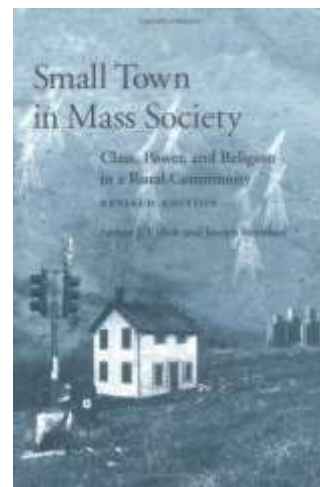
## 大众社会中的小镇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Vildich, Arthur J. and Joseph Bensman. 195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标签：社区研究

《大众社会中的小镇》首版于 1958 年。两位作者试图将地处纽约州的小镇春谷（Springdale）置于一个更大规模、日趋官僚化的大众社会框架中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从而为当时已显出疲态的社区研究找寻出全新的发展路径。他们发现身处小社区（small community）的居民在面对来自“更大社会”（larger society）的制度化力量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常人想象中的那种小镇自主性已经不复存在。作为首部审视集权化行政机构对美国社区生活持续和深远影响的社会学专著，此书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与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的阶级和族裔这两大维度，进而展现集权化行政机构对美国社区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后果。



时至今日，这部社区研究力作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里程碑意义。首先是此书刻意“舍弃”了理论综述、文献回顾、脚注和参考书目等常规学术论著必备的组成构件，可谓大胆。或许是没有理论模式的羁绊，此书得以承载来自田野体验的丰厚数据和深邃洞见。阶级、权力和宗教这些议题是在田野研究过程中逐步呈现和聚焦而成，而并非事先“闭门造车”的产物。作者结合微观和宏观视角，展现出外部管理体系渗透微小社区的过程。此书没有可供检验的假说，因为作者真正在意的是去体会和感悟社区成员日常生活的意义。

最令专业人类学者感兴趣的，应该是该书中有关小镇八卦(gossip)的描述（参见 1958: 41-45）。两位作者发现：公共领域里充斥了赞美和肯定和睦和平等这一小镇理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然而，八卦作为社区的一个隐匿和隔离的层面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礼俗，八卦使人们得以将社区的负面新闻曝光，并谈论他人的缺失。同时闲言碎语本身所具有的隐秘和不公开特性，使其很少对公共意识形态造成损害，对任何个人也没有不利影响。作者由此以对小镇的私人 and 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反思。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之后，小镇居民对作者在书中描述八卦的部分还是表示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信任和好意遭到了滥用。作者在再版时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



尽管《大众社会中的小镇》不是一部具有理论野心的民族志，然而它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官僚化这三股宏观力量扩张下小镇社区自主性持续衰弱的趋势，做了相当戏剧化的呈现。著名政治学者普特南为挑战此书有关小镇权力的观点，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让民主运转起来》。作为一部由实地体验和洞见驱动的作品，《大众社会中的小镇》在科学主义的冷漠无情和后现代主义的自恋多情之间，力求找出更有操作性和示范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之道

## 田野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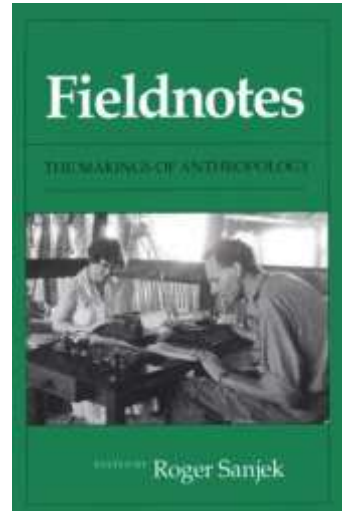
复旦社会学 2011 级 王淑茜

*Sanjek, Roger.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言中说：“想象你自己独自一人，突然到了一片热带沙滩上……想象你自己第一次进入了村庄……”也许，就是一片茫然。田野工作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更是充满神秘性。原本这么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知道怎么进入田野，知道要观察什么，记录什么，然后从田野中退回来思考，获得一些新的洞见，这自然是最美妙的。殊不知，这背后有多么不确定，一份经典的人类学作品，或许真的可遇不可求？

最典型的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的形象是，在“那里”与当地入同吃同住、参与观察，并写日记做记录，然后回到“这里”写文章。具体整个过程却不为我所知，想要还原一次田野工作经历，人类学家的随笔似乎是不够的，可最原始的田野笔记又难见庐山真面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弄清楚一次田野研究中，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关系网络，终究不能获得圆满。

著名城市人类学者桑杰克（Roger Sanjek）编纂的这本题为《田野笔记：人类学是这么玩的》（本人意译）的文集中论述了关于田野笔记的很多吸引人的话题。全书由五个被分散拆开的章节组成。



### 一、与田野笔记一起生活（Living with Fieldnotes）

第一部分中，Jean E. Jackson 在她所写的“我就是田野笔记：专业认同符号的田野笔记”一文中，就访谈法的运用对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两个社会学家、两个政治学家和一个语言学家进行了访谈。主要议题涉及田野笔记的定义、导师和训练、分享田野笔记、保密性、死亡、有关田野笔记的感觉、田野笔记作为一种人类学家创造的独特文档。

在这一章中，原来很多被访者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做田野笔记的指导，即使得到过田野工作训练的人也认为众口难调，很难用一门课程去应对不同风格、不同研究兴趣和不同环境的田野工作。他们的训练也恰恰反映了田野工作和田野笔记的神秘性，就是说，学习的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即 sink-or-swim）的方法，你依恋、你灌注心力、你真正被激发起来，也只有这样，每个研究的地点不同，研究计划不同，人类学家也不

同，人类学也不是一个你能知道最好方法的舞台，而且由于理论和方法的新旧之争，田野笔记训练的传统也不可能出现。①Jean E.Jackson 在结论中还说，研究生训练中，那种“故意不知道任何事的精神”的暗示也恰恰是促使学生成为人类学技艺的积极的创造者或者再创造者这一隐藏课程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反倒可以说，即使不太知道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也没有关系，只要去做就好了。

桑杰克在这一部分中的文章是“天灾人祸和魔法师的徒弟”，主要讲了田野笔记的物理遗失和精神分离。田野笔记凝聚了田野工作者的很多努力和精力，它满载着人类学家的情感，也能够揭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唤起他的职业感、个人胜任感和责任感。作为实物的田野一旦遗失，便是一个人类学家最糟糕的事儿了。事物总有两面性，有时候“写出一篇引人注目的民族志最好的方法就是丢失了田野笔记”，此时能自由地代表事实来说话。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利用、回忆和增补田野笔记的努力。田野笔记是珍贵的，短期看是人类学家自己的面包黄油，但是长期来看它就像是一个孩子，不会是其作者的私人物品，正如最后的那首诗写到“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通过你来却不是从你那儿来，尽管他们跟你在一起却不属于你，你能给他们身体的住所却不能给他们灵魂的居处，因为他们的灵魂居所是你不能访问甚至都不能梦到的明天……”用孩子之于父母来比喻田野笔记之于其作者真是妙绝了。

## 二、打开田野笔记 (Unpacking “Fieldnotes”)

第一篇文章是 James Clifford 的 Notes on Fieldnotes.他分了写的三种类型, Inscription, Transcription 和 Description。这是三种相互联系的写的形式。相对而言, Inscription 程度最浅, 就是快速记录下一个观察或者某人刚说的话, 这个过程最能体现田野工作的混乱和不可避免的灵活性以及记录数据的挣扎努力。民族志是一个完美田野笔记中的纯粹的 Inscription 成, 这样子的观念却因为 Inscription 是在记录者的选择和控制影响下而受到冲击。实际上有关事实的 Pre-figuration 和 Pre-encoding 的理论也使得 Inscription 的原始性受到质疑, 因为观察者不会单单收集和记录信息的。Transcription 就是转述已经形成的和固定的论述或者知识。Description 就是或多或少更对观察到的文化事实的更加一致连贯的描述, 这产生了格尔兹所说的“浓描”, Description 更加注重反思、分析和阐释。在这里, 三种写的场景是在一系列偶遇、感知和阐释中混合或者快速转变就是田野工作。

第二篇文章是 Rena Lederman 的 Pretexts for Ethnography: On Reading Fieldnotes。田野笔记是一种很奇怪的文体, 既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民族志的一部分, 也为这两方面所形塑。同时, 它是针对自己的, 绝大部分人类学家在拥有自己的田野笔记之前是没有读过其他人的, 也没有现成的好的模式可以参照着做。读自己的田野笔记如果说感觉到不舒服, 除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个人的焦虑和不足, 或者模棱两可, 还因为它很危险, 原本是记录下观察来辅助记忆的, 实际上它却挑战记忆, 使人回到了不确定性之中去, 田野笔记可以反对民族志撰写中所鼓励运用的单一的人类学的声音。说到有方向感或者迷惑的时候, Rena

Lederman 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讨论了个人日志、每日笔记和整理打印的文档，每一种记录田野数据的形式对读者来说都有明确方向感和迷惑的感觉。比如说个人日志，对特定问题有着详细和综合的描述，是自己对事情如何契合在一起的感觉的记录，显然有着比较明确的导向。在另一方面，对整体的感觉却很难连贯一致，因为这种对田野整体的这种感觉一直在变化而且来源很多，熟悉的“这里”将另外一个世界纳入关系之中，不熟悉的“那里”通过大量写作。

那么怎么利用这些田野笔记呢？Rena Lederman 说首先用来自我澄清，试着去捋顺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往往能够发现不协调的或者遗漏的东西。对踏着田野工作日常节奏的田野笔记的分类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沉淀。另外一个利用田野笔记方法有关于它的自我维持，这是为了作报告和确认不同于形塑田野日记的情境。田野笔记通过描述事件并探寻事件之间的联系来定向确认，也就是说基于事件来记录，因为事件有着明显的完整性，助于感知到当地的逻辑和兴趣，而且再次阅读事件导向的笔记增大了发现笔记之间新的关联的可能性。田野笔记的最后一个作用就是整合到民族志的撰写之中去，使之有一种相对的不单一的声音。也许通常的民族志写作引导着读者以小说方式看世界，然而用一种没有导向的写法反倒可能激发读者去再思考新的分类和视角的再定位，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 Roger Sanjek 的“有关田野笔记的词汇表”。主要介绍了田野笔记的相关词汇，比如 Headnotes、Fieldnotes、Scratch-Notes、Fieldnotes Proper 和 Fieldnotes Records。Headnotes 很巧妙地形容对田野的感觉，这种感觉显然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Fieldnotes 写下来在之后是不会改变的，而 Headnotes 却是可以变化的。Fieldnotes 在田野里产生，那么 Field 在哪里？田野不一定非得要跟旅行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田野就单单与注意力和惯常社会联系的转换相关，田野笔记是关于田野的，而不是在田野里的。Scratch-Notes 的生产就是之前所说的 Inscription，把 Scratch-notes 转换成 Fieldnotes 这个过程还是一个 Description 的过程，Fieldnotes Proper 就是一般说的“Journal”“Notebooks”“Daily logs”。Fieldnotes Records 又可以称作数据，是独立于连续的田野笔记的信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每个研究计划中独一无二的问题。分支学科和方法的要求促使人类学家直接去收集 Records，相应的 Fieldnotes Proper 就减少了。如果说要真实地去描述个人行为 and 思想的话，没有 Fieldnotes 的 Records 可以说是危险的。为了平衡这两者，the Johnsons 提出了一个文化情境清单，作为将整体性关怀重新引入田野工作的中介。Texts 就是由 transcription 产生的文本。Journals 和 Diaries 服务于分类梳理的目的，长期建构的 Journals 是田野笔记和记录中的信息的关键，而 Diaries 则记录了民族志学者个人反应、挫折以及田野中生活和工作的评估。Letters、reports 和 papers，书信往往是田野工作者写给导师同学朋友亲人的，记录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是一种不正式形式的描述和综合，在这里，这是将 Headnotes 转化成 paper 的第一步。最后一种田野笔记形式是录音文字还原稿。

### 三、田野笔记实践 (Fieldnote Practice)

第一篇文章是 Simon Ottenberg 的 *Thirty Years of Fieldnotes: Changing Relationships to the Text*。作者将田野工作与童年进行了类比，一方面，在田野中作者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够自己做决定，这种兴奋感却被抑制了，因为需要不断的报告导师，他总是在那儿，这就好像是一个发展一个自我的同时却丢失了自我。另一方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学习语言和规则，要学习怎么生存，以前的经验没有用，或者根本起相反作用，在田野中依赖于翻译、田野向导、一起住的人以及朋友，学文化的时候就像是孩子，当得到了一些知识和经历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成长的、青年的、成熟的感觉。田野笔记恰好就反应了这个“文化童年”。同样作者还提到在他内心的个人不朽和个人成功的欲望。

在这里 Ottenberg 阐述了 *Headnotes*，就是脑海中的田野工作的记忆印象，写下来的笔记其实压制了很多鲜活的记忆，虽然 *Headnotes* 也会被曲解、遗忘、精心设计或者屈从于作者自己的田野的刻板印象。虽然写下来的笔记还是那样，但是作者在交流、教学、写作等活动以及自己学术的越加成熟之中，*headnotes* 改变了，对写下的笔记的解读也转变了。*Headnotes* 和 *Written notes* 其实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对话之中。Ottenberg 还觉得在田野中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因为在田野中有着自己的个人关系，写作会带来时间和精力与田野工作的紧张冲突，而且在田野中爆炸性数量的数据也很难使人能看到秩序。田野笔记就是代表着无序和不规律，这是相比较出版的作品和 *Headnotes* 而言的。如果说 *Fieldnotes* 是一个童年成长的物质象征，那么 *Headnotes* 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不断成熟和独立的成人自我，它们之间有着持续的对话。那么，远离田野的写作就包含着 *Headnotes* 更多曲解的可能性，尽管这也提供了一种重新整理数据的机会。在这里，Ottenberg 承认自己毫无疑问地陷入了殖民网中，但是他并不后悔或者感到羞耻，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批判当时殖民意识的学者也就是没有意识到当下的政治氛围，在现在的框架中过去显得很同意理解，但是又该怎么应付对现在这个世界的误解以及对研究的影响呢？人类学理论在不断变化，文化中心主义、整体性取向、实证主义等等的被新的理论所取代，Ottenberg 发现自己的笔记代表的正是那已经死去的传统，尽管如此，他把自己的田野笔记看作是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童年和生命，早期的田野笔记也是自我服务的，但较之自我理解，更侧重于个人的提升和成功。事实是文化相对主义被文本相对主义所取代，所研究的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应该转变成为阐释和阐释者的，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阐释，文化是一种被阐释的文本，田野笔记也是一种文本，生活在一个解释学的，象征符号的和隐喻分析的世界之中，人类学有一种很强烈的审视自我的转向。而所有的这些却使得 Ottenberg 能够继续用他的殖民笔记来写作，只要把这些田野笔记看做是文本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意想不到的扭转。同时，作者发现，在他在其他理论指导之下得来的数据，也能够用当今的理论和术语来重新解释，即使这些不是新鲜的数据。如果说写的东西并不是客观的，而是阐释性的，这样子的理解，反过来，

却也作用于田野工作，使得能够得到更丰富的洞见。Ottenberg 还觉得人类学转向了自我、自己的人类学过程、反思和文本，部分的就是对一些不幸的话题的回避、一种对研究过的人的现状的失望的抵抗机制。自我的取向，不应该仅仅是对自己，还应该是对所研究的人们的自我的研究。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提到的，对他的助手马里克的变化认识，在马里克的图式中，不是用社会经济阶层来理解村庄的，而在拉比诺的催促下，他才尝试将每个人纳入特定的阶层，这个时候马里克新的自我意识和原来的自我形象截然不同。当所研究的人们为了人类学家把自己的世界对象化而自我反省的时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过程。

第二篇文章是 the Johnsons 的 Quality into Quantity。人类学跨坐在科学和人文的边界上，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每一步走向科学的信度不可避免的就与人文的亲密关系远了一步，许多层次的人文主义的阐释的成就也是以科学的准确性作为代价的。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首先，人类学笔记常常是记录观察和印象，试图描述多种多样的事件、感觉和想法的散文性文本，即使在作者头脑中有图式来指导，但是田野笔记却没有显然的编码图式，以至于不能够马上定量化，甚至不能简单归类成分析性分类。其次，大多数质性研究设计的松散性导致了极度费力的像真空吸尘器般的综合收集。最后，这个在小社会中的参与观察，反复记录的还是那些人，这就损害了合理抽样程序中的“观察的独立性”标准。但是，如果把田野笔记限定在基于合理抽样和测量的数据，那么问题又来了，首先行为主义科学家从来不会知道他们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要是不信任研究者就很有可能保留或者歪曲信息，不能保证效度。这第二个批判就是严密的推导性的研究设计常常就是简化主义的，用几个变量来解释一个现象。人类学中的科学和人文貌似很难调和，极端的定性定量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在不损害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性的情况下定性的资料也可以转换成定量的数据。问题是需要确定一个笔记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的样本？如果按照以下三个程序做的话，这也是可以解决的。首先，如果没有偏见地出现在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面前那样子的话，就这笔记会是事件发生的代表性样本，其次，如果倾向于没有偏见地记录被访者的所有生活方面的话，这笔记也会是一个代表性样本，最后的话，就是说如果在理论性的合适的方法上来对事件进行分类的话，那么也会产生有意义的事件的计数。前面两点是抽样问题，最后一点是测量问题。越发地去遵从前两点的话，就越接近整体论观点。人类学整体论的核心意义就是文化是一个整合起来的整体，个人只能在整体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被理解。整体论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想法一种技术，还是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科学和人文的人类学的基本的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后半期，人类学却从整体论中游离开去，这也许就是人类学科学方法论渐强的结果。从科学主义角度来看，人类学整体论是一个模糊的混乱的想法，聚焦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拒绝了整体论，而且作为专家有责任少关注研究计划之外的东西。其实人类学家有责任来提供一个围绕着特定研究焦点上的情境资料，这样子，其他研究者就能有机会用整体的数据来批判和扩展分析。

整体性田野方法存在描述的地点偏差和内容的偏差。任何影响人类学家何时何地如何进行观察的偏差性就会在田野笔记中反应出来,而减少这种偏差的方法就是运用时间分配的方法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聚焦于某个问题的研究设计总会或多或少将研究限制在特定方面而没法把握全局,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是时候去重新思考缺少推断性理论的旧式样的整体主义和缺少综合性的现代特殊主义。研究者最好在进入田野的时候有一个聚焦的特殊问题,同时有一张整体主义的清单来提醒他们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东西。总结起来看的话,案例计数确实提高了田野笔记的精度和完整度,其可能性也由于处理文本的电脑软件而大大提高,虽然人类学田野工作不可避免是存在偏见的,但是通过随机化方法和整体性清单,仍然有可能使田野笔记足够能代表一个共同体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

这一部分最后一篇文章还是 Roger Sanjek 的 *The Secret Life of Fieldnotes*。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了田野笔记的历史,对此的叙述,散落在个人田野工作记录、论文记录的报告性辑录,民族志的前言附录、旨在方法论的论文,对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中,以及 Cushing、Boas、Malinowski 和 Mead 等人类学家的日记和信件中。在下面的文章中,主要介绍了 Frank Hamilton Cushing、Franz Boas、W.H.R.Rivers、Bronislaw Malinowski 和 Margaret Mead 这五位基于田野工作的人类学的奠基人的田野经历和贡献。Malinowski 提出的 *Speech in action* 就是指除了询问资讯人,人类学家还要在日常生活的自然背景中倾听当地人的交谈,如此记录下来的数据对 Malinowski 努力达到的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他们与生命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也恰好是参与观察的核心。

1920s 到 1960s 是古典时期,人类学从文化主义-功能主义-整体主义转到了对互动、个人行为 and 复杂性的不断增长的感兴趣之。美国的人类学家带着一个特定的问题开始田野工作然后从那儿扩展开来,从 *Transcription* 转向了 *inscription* 和 *description*,从文本转向了 *Fieldnote* 和 *Records*,而英国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缩小他们的研究,让问题在田野中出现,整体主义的田野笔记也试图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

从 1960s 到 1980s 这段时期总体说来结构主义和象征人类学不需要广泛的田野笔记,文化生态学也不需要。认知人类学也是需要正式的记录。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象征人类学中,田野笔记更加重要,它集中于实践、行动、互动、活动、经历和表演,集中于行为者、能动者、人、自我、个人和被访对象,还集中在交换、投射、生涯、发展周期等等。

接着 Roger Sanjek 论述了 *Speech-in-action* 和访谈的田野笔记。凡是谈话事件在资讯人的领地上的就是 *Speech-in-action*,在民族志学者自己这边的就是访谈。根据谁控制着谈话这一标准 *Speech-in-action* 和访谈还能各自分为三种情况,资讯人控制说什么,民族学家试图控制谈话以及协调的共享谈话权力。这样子的分类有助于民族志学者对症下药。

#### 四、流通中的田野笔记 (*Fieldnotes in Circulation*)

第一篇文章是 George C. Bond 的 *Fieldnotes: Research in Past Occurrences*。什么是田野笔记？George C. Bond 在这里说到它至少包含着两种系列的品质，写下的文本和话语。话语是有意义的行为的瞬即的谈话，包含四种品质，它是在临时和现在中实现的，它是自我指涉的，总是有东西要表达，也是交换所有信息的中介。文本是一种更加去情景化的话语，把特定的说话者和地点移开，在实践之外的语言和社会系统中重构它，文本是固定的、自动的、重要的和开放的。

田野笔记既不同于文本，也不同于话语。文本把写作和阅读分开来了，读和写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而田野笔记是由读者写的，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对话，一次他们跟现实和田野数据中记得的经历的关系的追问。田野笔记建立了与过去的时间的对话，它也只是一部分固化的话语。田野笔记是复杂社会历史结构的部分构建，是协调了的和破碎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在当地的向导、资讯人、我们的观察和理论的相互作用之中建构起来的。它是多声道的产物，是实验、转述和阐释的角斗场。它也是收集、协调建构点滴现实的行为结果，所以它能暴露出参与观察的弱点和强势之处。

最后一篇文章是 Roger Sanjek 的 *Fieldnotes and others*，田野笔记的最开始的关系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而这篇文章则讲到了田野笔记跟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资讯人、其他学者和学生、工作组以及田野笔记传承之人的问题。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在资讯人面前做笔记或者根据记忆来写笔记，在一些特殊的仪式庆典时当地人十分希望人类学家当场做笔记，有时候，人类学家把写作、整理笔记、分类法、地图和机械帮助等直接展示给资讯人以获得支持。像 Mead 和 Ottenberg 等人把他们的田野笔记给他们的学生看，这不是一种对如何做田野笔记的说教，而是田野笔记的分享，这种分享仍然是比较少的，而且集中在比较亲密的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田野工作不是像马玲诺夫斯基那样单枪匹马，而是组织化的团队研究，在这样子的团队努力中，田野笔记的角色和流通形式各异。比如调查员做快速记录，此时还有一个平行进行的拍照或摄影观察者，这样子的结果就是非传统的以照片为基础的行为分析。如果说草稿没有及时誊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内部交流，没有人会读过所有的田野笔记，这对团队的整合来说不是好事，设计者如果每隔一段时间跟其他田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报告、讨论、记录田野笔记然后根据主题做检索和分类，这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过程。关于田野笔记的传承问题，当 *Headnotes* 随着人类学家的死亡而不复存在的时候，只剩下了写下来的 *Fieldnotes*，但存留自己的田野笔记对人类学家来说也是一个按不确定性，矛盾和预设的。

## 五、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 (From Fieldnotes to Ethnography)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很精彩的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决定性战斗不是在田野中的战斗而是之后的工作。David W. Plath 写了 *Fieldnotes, Filed Notes and the Conferring of Note*。对田野工作来说，能够计数起来笔记的页数，录音的时间，胶卷的长度，就是衡量工作量的标志。



对文件工作来说，从短期来看，特别是在形成专论或者可视化文件的时候，你最好的活动指标不是产出，而是扔掉。从如此多的资料中筛选可以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工作。不容易解释的是很多人类学家公开讨论其职业活动时候的甚至都羞于提到文件工作。在这个论题上的唯一的评论是米尔斯的“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心智的手艺活)。米尔斯描述了他自己的文件，如何用在智力生产中？他的答案是这种文件的保持就是智力生产，他的文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实和想法的仓库，从最模糊的到最精巧的。

此外，文件工作中可能确实有一大翻恭维的话，伪造数据和捏造事实。但是作者嗅出来的最浓烈的味道不是这种腐败，而是这种努力持续承受的泪水和汗水。

不论是在田野还是在文件中，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理解工具持续的是人类的搜寻“是什么”内在的敏感性。人类学通过宣布一种最适应生存的现象来引导我们的这种搜寻。但是在做田野笔记和组织记录文件的时候，不仅仅是抓住和传递信息，更卷入了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带来特定人们和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公共媒体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将一些社会意义注入其中，还有潜在的力量。对这个过程很敏感的人就能够期望将这种敏感性转移到更新的境地中去，特别是到人类学的田野中去，看看当地人关注什么，搜寻“是什么”。

Roger Sanjek 最后给我们奉献上的是一顿关于民族志学的效度论题的大餐。到底是怎么“写起来”？拥有资料只是一件事儿，用资料是另外一件事儿。写作最开始需要一个结构化大纲形式，这就是索引。做索引的过程就告诉我们民族志是怎样构建起来的。怀特是以他研究的群体作为基础来分类索引，随着资料的增多，记忆可能都不容易定位了，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初步的索引系统，分三栏的页面，分别写上访谈观察的报告、日期和研究对象，以及简单的总结，这样子需要 3 到 8 页，需要回顾这些笔记的时候，只要读索引就能回忆起笔记完整的画面。Wolff 发展处一个主题分类，产生了 66 个标题，分为了 7 大类，包括背景材料、文化变迁、社会关系、社会设置、评估或解读、模式的线索、理论和方法。而这样子的检索也会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而变化。

写作有时候是一个社会过程，马林诺夫斯基在做出详细的大纲之后，就会与他人讨论交流，更典型的是，很多民族志写作是在田野工作之后，利用 Headnotes 和 Fieldnotes 独自写出来的。写作，把民族志学者从发现的情境逮到了报告展示的情境，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笔记的持续分析，他的田野工作的方法，第一层是孤立事实的观察，具体活动、仪式或者行为准则的记录，第二层是把这些机制联系起来，第三层是各个方面的综合，这样子就很容易转入展示报告的情境中。而怀特很清楚简洁的说明了写作方法，他说，在写作报告的时候，可以直接把索引做成论文的大纲，几分钟的对索引的再读就能得到一个系统想法。然后根据每个话题，就能把访谈数和相关材料的页码写到大纲上去。精读索引能够更新对访谈的记忆，回忆起是不是重复了一些东西。人类学研究讲究的是效度而不是信度，人类学是在效度语言上来表达的，比如机制、模式、结构、大纲、网络、组织、关系、地图、网格等等这些都是

在讲是不是说了自己声称的内容，这就是效度问题。人类学效度衡量是根据三个准则的，理论的坦白、人类学家的足迹和田野笔记证据。人类学田野研究有很多选择，对于选择的理论性原因的解释是必须要讲清楚的，重要的理论决定了带入田野的地点、问题和记录目标，这水平的理论把田野工作联系到更大的社会、政治、符号和经济问题中去。此外，田野工作者还发展起来了重要的关于人、时间和地方的地域性特殊理论。很坦白的对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当地发展出重要理论的表露也是提高人类学效度的方法。作者同时问了不少关于理论的问题，哪里的理论？在田野中或者在田野之外。什么时候的理论？计划田野工作的时候或者形塑研究指导方向的时候。为什么要理论？给人类学意义和目的，避免所有事物的乐观研究。哪个理论？必须要诉诸于政治和批判价值。搞明白这些问题，在理论的坦白这方面，效度就大大提高了。

人类学家的足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则，观点很简单，就是说任何有效的人类学家都发展了田野工作过程中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既是研究事业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结果，所以如果把这个网络更详尽地分类，而不是单单的以日期分类的话，就能得到一个珍贵的额外的视角。重要的资讯人不仅提供了大量信息，而且将人类学家介绍给其他的资讯人。从田野笔记中，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公开重构资讯人联系的图。

第三个标准是田野笔记证据。Headnotes 的证据会在民族志中得到证明，但是，田野笔记就很少得到公开的检查，对田野笔记和民族志的关系的一个解释也是衡量效度的很重要一个标准。一种是围绕着巨多田野笔记材料组织起来的民族志。一种是利用情景分析或者说扩展案例方法来组织的民族志，原则在一个一个案例中和相关参照中重复出现。还有的常常利用缩进的从生活史访谈材料中的小点来显示这民族志文本的效度。大多数民族志中田野笔记和资讯人的声音常常被有规律地筛掉，就显得是远距离的人类学家在讲述。叙述和修辞决定主导了“写”，田野笔记的出现不是为了效度而是为了这修辞或叙述的手法，这就不得不面对这难以理解的包袱了。田野笔记的多声道模式就寻求与资讯人分享民族志权威，就像交响乐一样，Clifford 就真心提倡将资讯人也作为作者列上去，资讯人的文章也要与民族志学者一起发表。所以说，仍然需要去思考不能用自我和他者这两分法来预测的人类学。

最后 Roger Sanjek 引用了爵士发明者 Miles Davis 的话，“你需要知道号角，知道和弦，知道所有的调子。然后你忘记所有的东西，只是演奏。”知道人类学的传统，知道田野工作的方法，知道什么组成了民族志效度是需要的，但是这并不能产生民族志。就像爵士，人类学需要即兴演奏的人，不仅知道这么做，而且就在做的人。

### 参考文献：

[1] Roger Sanjek. Fieldnotes :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英]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 [3] 保罗·拉比诺,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4] [美] 威廉·怀特, 街角社会[M]. 商务印书馆. 1994
- [5]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6] [澳大利亚] 林恩·休谟. 人类学家在田野[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6-17

## 基布兹的家庭和社区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Yonina Talmon. 1972.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Kibbutz.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学界对于以色列基布兹（Kibbutz）的浓烈兴趣，并非为弄清这一公社制度内部运转机制，或者说是理解其产生、缘由以及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跨学科的视角内，基布兹这一社会实践案例所具有的价值，不外乎于为应对下列现代社会难题寻求可行之道：核子家庭的不足和缺陷、性别不平等和劳动的压迫性和单调性等等。以色列基布兹作为公社生活基本模式在上世纪的成功，对美国城乡的实验性公社生活的推行，曾经起到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一般来说，以色列本土学者对于基布兹社会制度的研究，要更加细致和周到，他（她）们没有国外学者的猎奇心态，也从



幻想基布兹能否成为治疗西方社会顽疾的良药。尽管如此，基布兹作为当代“意向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的奇迹案例，的确为以色列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家庭、教育心理学、产业社会学、儿童心理学乃至军事社会学（基布兹曾是以色列陆军和空军招募兵员的重要来源）的上佳田野点或者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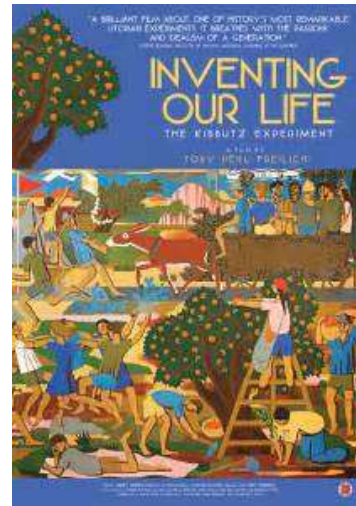


本书在众多基布兹研究的文献中，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鹤立鸡群”的经典案例。作者陶尔蒙（Yonia Talmon）毕业于希伯来大学，曾经在伦敦政经学院进修并且任教于哈佛大学。她以满腔热情投入了对以色列社会的研究，同时对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了如指掌。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她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基布兹社区的运行机制和日常生活实践，而且不失时机地把每一个阶段性成果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英年早逝的陶尔蒙留下的七篇发表在包括《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在内的论文和一篇待发论文，经过编辑后以《基布兹的家庭和社区》为题出版，成为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布兹的范本。

书中各章的主题涉及基布兹的婚姻、家庭结构、公社育儿模式和基布兹精英组成等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末尾的研究方法附录中有作者专门为学者和合作者撰写的《基布兹社会学研

究》一文，在不到 10 页的篇幅内，把研究方法的使用交代得如此简明扼要，着实令人钦佩。作为以色列公民，陶尔蒙丝毫不隐藏自己对公社式集体生活的憧憬，并且尝试通过研究来寻找使集体理念和原则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出路。然而她没有拿基布兹说事，试图把基布兹包装成一尘不染的乌托邦模式来强加给读者。相反，基布兹社区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始终是陶尔蒙的兴趣所在。

本书的第六章“在革命化社会中的老年历程”（原文发表于 1961 年 AJS）可以说是陶尔蒙阐发“问题意识”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典型案例。如果仅从表面看，基布兹似乎初步解决了让西方社会头疼不已的老龄化问题。首先，基布兹的年迈老人在经济保障方面可以高枕无忧，无需担心通货膨胀，随时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也没有由于退休带来的心理不适，因为基布兹为社区内的老人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使之发挥余热。那种将老年人从其生活环境中抽离，放入所谓退休社区(**retirement communities**) 或者说养老院的做法，对于基布兹社区的居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可怕



梦魇，因为这与基布兹的意识形态完全背道而驰。基布兹在成立之初就鼓励入社的年轻一代在社区内生儿育女，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享受绕膝承欢的美好老年生活。然而，我们能否由此推断，在基布兹颐养天年将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自然衰老”过程吗？陶尔蒙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她的观察和分析。她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老龄化在基布兹同样是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问题，尽管与西方社会的情形很不一样。首先是在一个以年青人中心和以未来为导向的社会中，任何变老的个体都会感到紧张不安。陶尔蒙指出：如今安居乐业的基布兹老人在当年可都是崇尚创造力和革命美德的叛逆者。然而为了维护基布兹的道德秩序和未来存在的合法性，这些老人得强调稳定和持续的必要性，从而放弃他们年轻时代的革命激情和乌托邦思想。这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为了确保年轻社员对基布兹的忠诚和执着，这些老人还不得不扮演保守者的角色。陶尔蒙还注意到在有些地方，对于辛劳工作和生产效率的那种带有宗教性的执着和热情，将工作视为一种自我纯净的仪式，一种从“寄生”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行为，此类带有强烈犹太文化印记的价值观使得年老体弱的社员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始终摆脱不了负疚感。陶尔蒙还对西方退休工人与基布兹同年龄段老人对于社会福利和回馈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照，还对基布兹的老龄社员和前来陪伴居住的社员的老年父母这两个人群的心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极有预见性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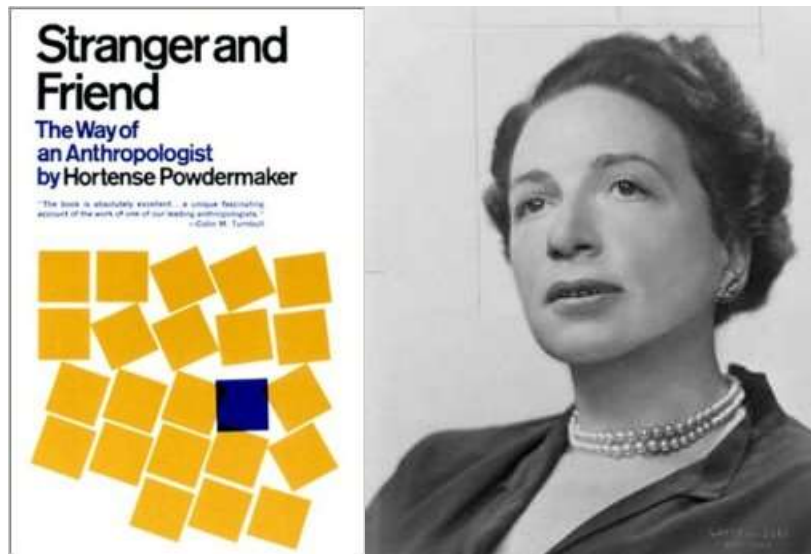
本书各章相对独立。这是因为受到病魔困扰的陶尔蒙没能写出像民族志那样具有整体视野的作品。然而，陶尔蒙研究的敏锐性和专业性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笼罩在基布兹社会上的神秘面纱和刻板印象。她描绘的是一个自身带有局限性和压力的公社组织，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安排和大体上比较成功的实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陶尔蒙是在“基布兹”的黄金时代（即上世纪 50 和 60 年代）进行的研究，她的冷静、执着和严谨，使得本书具有不可忽视的前瞻性和植根性。当然对于跨文化和跨地域的理念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比较研究（如人民公社制度），此书在视角和方法的选择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指南。

## 生人与朋友：人类学家之道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Powdermaker, Hortense. 1966. Stranger and Friend: 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 New York: Norton.*

标签：民族志写作的前瞻性探索，田野回顾与反思，自我与他者



在后现代思潮浸润人类学学科之前，就有不少颇具前瞻性眼光的行家里手将自己对不同场景内田野遭遇的反思，用幽默的笔调写成札记。就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来说，丝毫不亚于拉宾诺（Rabinow）那本出名的《摩洛哥田野工作反思》。出版于1966年的《生人与朋友：人类学家之道》就是这样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民族志故事文本。作者鲍德梅克（Powdermaker）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文化语境迥异的美兰尼西亚、密西西比、好莱坞和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等地区进行田野研究，先后写成《乐素生活》（1933年）、《自由之后》（1939年）、《好莱坞，梦幻工厂》（1950）和《铜镇》（1962）等跨越不同时空界限的民族志作品。鲍德梅克学术生涯的丰富多彩以及她尝试进行各类田野实践时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在当代人类学者中也不多见。

在人类学学科还为科学实证主义所困扰时，鲍德梅克就毫不讳言“人类学家本身就是研究他者及其社会的人体仪器（human instrument）。而且在成为人类学者之前，就已经开始习惯在社会环境中担当“进得去”并且“出得来”（SteCCing In and SteCCing Out）的研究者角色（1966：19）。她的犹太富商家庭背景以及在学校感受到的排犹压力，使她对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感到厌倦，同时也对自己的族裔认同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1966：22）。在成为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弟子之前（1925年），她已经是一位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劳

工运动积极分子。这一经历似乎预示着鲍德梅克的未来研究必定具备的植根性和公共性特征。

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作者回忆了从师马林诺斯基的愉快时光。她极为赞赏马氏激励学生思考和辩论的教学风格。有意思的是，她毫不避嫌地对马林诺斯基与（其学术对手）拉德克利夫-布朗进行了性格方面的比较（1966：42）。她认为较之前者，后者显得孤傲不群，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澳大利亚。然而，作者对拉德克利夫-布朗最致命的评论还是学术性的：在他的论著和演讲中，他看来只对作为社会制度部件的人感兴趣。很难想象他与他所研究的安达曼群岛的民众能产生深刻的个人关系。岛民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行为的怪异乖张之处，完全不在其兴趣和视野之内（1966：42）。可以说，早在伦敦政经学院的读博阶段，鲍德梅克就已经与风靡一时的功能主义绝缘了。

田野工作者如何将个人的感受、情感以及认知和美学层面的细节整合到写作过程中去，也是本书散议的焦点之一。在最后一节，鲍德梅克将人类学者的角色与历史学者、小说家和剧作家进行了比较，并引用同行 Eric Wolf 的说法，将人类学看作所有人文学科中最具科学性和所有科学学科中最具人文性的一门学科（1966：296）。她的论述可以说为此后格尔兹的《工作与生活》（*Works and Lives*）和《写文化》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先声。

在去世前两年，鲍德梅克以荣休教授身份开始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校园进行青年文化的研究。她去世后的纪念仪式，是生前友好按其生前意愿在起居室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为她得人类学传奇生涯做了生动和圆满的总结。



## 域外之音

## 芬兰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企业<sup>43</sup>在社区服务和管理上的经验

作者： Juha Hämäläinen, 教授, 东芬兰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张倩楠, 复旦大学社工系硕士 译

### 一、引言

本文聚焦于芬兰的组织社区服务,并简要介绍芬兰社区服务体系的主要特点。众所周知,当我们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时,要完全了解和熟悉一个国家特定的社区服务体系的本质是非常困难的,其中的挑战即包括语言的多样化、行政系统的不同也有多元文化的差异。

关于芬兰社区服务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社区。对比中国和芬兰的情况,发现社区这个概念就映射出截然不同的国家历史。长期以来,社区一词被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塑造和影响。为了真正全面地理解我们谈及的社区服务意味着什么,对这个概念背后的历史范畴进行思考和探索是非常重要的。

### 二、芬兰社会制度下的福利服务

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芬兰社会参照北欧福利模式得到了发展。在北欧福利模式中,公共机关对提升群众的福祉承担着广泛的责任。包括社会安全、社会正义、以及社会公平在内的核心政治理念得到了强有力的重视。民众享有获得充足福利服务的基本权利。

追溯历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可称为芬兰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大量的福利体系得到建立,作为一种福利推进专业工具的社会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外,民众获得充分的福利和关怀的权利也从法律上得到了明确。

大量的福利设施的建设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利环境。社会工作被视为社会福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芬兰,因为社会福利主要是公共责任,所以大部分社会工作从业人员都直接受政府机构雇佣。作为公务人员,社会工作者能够行使重要的公共权力,尤其是在儿童福利和社会支持两大领域。

以下专题描述了在北欧社会福利模式下,芬兰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特征:

- 1.通过为全体民众提供社会津贴和福利服务来促进社会的安全(普遍的社会支持)
- 2.从富人到穷人:实行资源的重新分配(收入转移)
- 3.公共机构对全体民众的福祉承担责任(通过税收的连带责任)
- 4.把公民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制度化成为公民身份的一部分

<sup>43</sup> 论文摘要,第九届浦东社会工作节《多机构参与社区管理的治理》:2015年5月29日

### 5.促进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平等原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虽然芬兰的社会福利基本原则相对稳定，但是社会福利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重建，到目前为止，每个地区当局都要根据民众的需要保障其获得充足的福利服务，这类服务主要是由当地的税收资助。然而，市政当局并非直接提供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向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购买。

广泛的福利体系是一个包涵了多个专业的分化型的系统。在多学科团队和网络中，不同专业和团队的合作在其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福利体系涵盖了包括社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福利体系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基础设施来保障社会关怀服务。

## 三、芬兰的社区服务体系

下文中我们将运用“社区服务”的概念来描述本土地区层面上不同类型的福利服务供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服务的本质和组织方式，首先需关注芬兰总体的社会规则和秩序，并做基本和必要的概念澄清。

总体而言，芬兰是一个文明、法制的国家，也是一个福利国家。其文明体现在芬兰政府针对科学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与文化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政治关注；其法制体现在芬兰社会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并且公共决策受到强有力的法律维护；福利国家则体现在芬兰所有的公共机关机构都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全与安定，促进人们和社会的福祉。

在芬兰，社区服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当地政府在促进福利(事业)上扮演的角色。自治市区的政府当局在政治自决方面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这也关系到当局在履行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法定义务时的政治决策权。

自治市区的政府当局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的重要责任是基于民众所拥有的宪法的权利——即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的尊严，他们有权得到充足的物质帮助和必要的照顾。尽管不同市区在福利提供上的政策内容和实践方式有差别，但是群众获得福利服务的平等权利不受居住地点的影响。在芬兰的国家社会政策中，平等原则在福利服务获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般而言，社区服务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领域：法定服务和附加（额外）服务。第一种类型是基于民众的合法权利，当地政府必须向群众提供的；在芬兰，有大量的单项法律，对人们获得足够的福利服务的权利做了详细的规定。除此之外，自治市区还可以为民众提供不同种类的附加福利。

社区服务的供给主要包括在社会和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服务。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在其他领域也有提供服务的法定职责，尤其是在环境安全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在本篇报告中，笔者将聚焦于福利服务的内容。

社会和健康保健部门针对那些有不同的福利需求的目标群体，提供不同种类的丰富的社会和医疗照顾服务。多种社会支持可以用于家庭，例如儿童日间照顾、儿童监护和家庭咨询、

儿童服务、领养服务以及家庭帮助服务，除此之外，也有提供给青年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社会服务和福利。

#### 四、社区服务的资金/财务

对于群众依法享有的社区服务，基本由当地政府资助。地方政府可以决定直接提供服务，或者购买非政府组织（包括营利性或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服务。平均而言，芬兰社会和卫生保健支出的份额超过了地方预算的 60%，而教育的支出也大约占到了 20%。

在芬兰市政自治的框架下，自治市区都有税收的权利。税收一部分源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所得税，另一方面源于该区域内的企业社区税。在市政税收中，居民的所得税税率一般在年收入的 17%至 20%之间，所有居民的收税比率是相同的。然而在国家/州一级，所得税则是以累进税率原则为基础的。

在芬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历来十分密切。一些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动和支持的关于福利供给的民事活动也得到了公共机构的资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这一图景。

在北欧的福利体系中，营利和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辅助和补充的重要角色。过去二、三十年来，地方政府采用“买方—供方”模式来广泛提供外包服务。根据这个模式，政府当局从一些非政府机构处购买服务。通过竞争性招标的过程来选择服务提供方，根据竞争性招标法规定，各个市区必须对此加以严格遵守和使用。

目前，芬兰的社区服务是一种“福利组合”的状况，即社区服务的提供方既有政府组织，也有营利和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趋势给福利服务的供应带来了一些新的商业的元素。以公共筹资为基础的福利市场导致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这样的术语就是用于区分不同组织在当地福利制度中的性质和地位。

根据芬兰的经验，有多种模式来为民营企业在福利供应中提供机会。其中一种模式是，服务用户直接向服务提供者支付费用，或者当地相关机构根据设定的标准，从财务上为服务用户或者服务提供者提供资助。在这两种情况下，服务用户都应该为服务质量的控制负责。另外一种模式是市政当局根据双方订立的契约从民营企业购买一定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质量控制的负责人就成了市政当局。

市政之间通常会通过合作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大多数时候会合并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我们称之为市政间的联盟，这个组织有其单独的治理主体和行政设置。这样一个联邦组织，既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购买服务。市政当局还可以在特殊的福利提供领域建立自己的基金会或者附属企业。有时，这些组织会在激烈的招标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来与其他服务供应商进行竞争。

在一些社区服务中，服务用户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费用。在芬兰，教育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在社会和健康保健的服务领域，需要服务用户承担费用。用户付款在公共社会和医疗保健

服务的总开支中覆盖约 7%的份额。

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福利市场，与食品或者汽车这类商品市场相比，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任何情况下，作为服务购买者的市政当局，对于服务提供的标准和质量有绝对的发言权。福利服务的购买协议通常是三年，但如果服务供应商没有充分履行承诺的质量标准，市政当局可以撤销合同。也正因为如此，在竞争投标的准备中确定质量标准非常重要。

## 五、社区服务的多职业特性

在芬兰，社区服务的体系由许多不同的职业群体构成。每个群体和每个员工根据他们的专业所长都有各自的角色。同时，该系统也是基于多职业协作的跨学科的网络和团队。其他的分组织之间通过互动和协作来完成市政府的职责。在下文中，我将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来阐明多专业合作的理念。在芬兰，社会工作者大多由当地政府雇佣，他们大多工作在市社会局，处理不同领域的社会照护：如社会协助、保护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麻醉物品和其他相应群体的特殊社会需求。许多芬兰的社会工作者都是行使政府权力的政府官员。

除了这些负责管理市政社会办公的社会工作者外，约 1/4 的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都致力于提供健康服务的机构，如医院、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康复机构；另外约有 10%的社工从事学校社会工作。在芬兰，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和健康保健方面的整合，这既包括管理的统一，又强调社会和卫生保健人员和机构的合作。相应的，芬兰立法规定，学校需提供包括综合学校和职业院校在内的多专业的学校社会福利。

芬兰的社会工作者既在市政社会办公室工作，也致力于其他的公共组织和机构。包括帮助服务对象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服务的行政工作、根据案主需要提供社会心理的协助、在福利体系范围内进行个案管理以及参与当地福利政策的制定。

在芬兰，社会工作的品质相对较高。作为一门社区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关键专业，这得益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社会工作者都期待能广泛地与其他的专业群体在跨专业网络和队伍中进行合作。例如尤其是，心理学家，医生、护士以及学校教师，他们都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业搭档。在芬兰，只有那些经过专业学习的，有资质认证的工作者才能被称为社会工作者，那些缺乏足够教育的人会被排除在外。

## 六、社工专业的职业教育

在芬兰，社会工作资质的获得需要具备五年的大学教育并获得硕士学位。在芬兰有六所大学提供社会工作的学习项目。此外，还有少数应用科学类的大学也提供社会研究的相关项目，并最后发放一些其他社会类专业的资质，比如咨询、活动引导。但这些专业从业者都并非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研究的内容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工作中所需诀窍的本质理解。一般而言，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的划分：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理论上的自我概念、方法的理论背景、理论传统、历史和伦理；

实务层面的专业知识、技巧和方法：目标人群、社会法律法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问题即社会心理问题的本质以及沟通技巧。

学术能力：在社会及行为科学架构中的学术能力：哲学基础、科研方法、基于研究的科学方向。

在芬兰，提供社工教育的六所大学都遵循以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理念。目标在于将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门基于科学教育的职业。这不仅仅关系到术研究的重要作用，社工实务实践在科学问题的解决中亦是重点。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研究的技能也同样被视为重要的社会工作技能。

同样，应用型大学也基于社区服务为学生设置了学士和硕士阶段的相关社会研究项目。这些专业人士拥有关于咨询和指导的专业技能，足以去应对不同的机构环境和不同的服务群体。此外，在芬兰，职业学院会培养专门的社会职业，提供三年的学校教育，传授一些关于基本照料的社交技能和护理技能。

## 七、社会工作实践

作为系统的福利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正在履行许多相关的法定职责。在不同的机构背景和环境里，社会工作的任务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芬兰，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维度聚焦在行政工作：包括协助案主正确使用社会福利体系、获得心理社会援助、在福利服务体系中进行个案管理。在多学科团队和社会网络中贡献专业知识，并通过为福利策略和项目提供必要的信息来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社会工作发生在地方的社会办公室，包括处理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内的儿童福利，青年人福利和家庭福利以及协助存在社会心理问题和需求成年案主。此外，在健康照顾领域（公共健康照顾中心、医院、特殊保健中心）和学校系统内都有专门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不同教育机构中的学校社会工作）。一些有资质的社会工作者也被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部门雇佣，但这并不常见。

在芬兰，随着人们对社会和健康要素互相影响的认识的加深，在社会福利政策中，社会事务与健康事务的整合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重视。在健康照顾体系中，社工旨在提升案主的社会整合能力与参与度。最基本的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协助案主提升行使职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确保案主获得应得的利益与服务。通过传递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来对多学科团队和网络做贡献。在芬兰，有大约 1/4 的社会工作者在健康照顾机构工作。

在芬兰，学校社会工作建立在民众对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二者互相作用的理解之上（学

校福利服务)。在教育机构, 社工旨在促进学生的教育生涯的规划、促进学生的社会统整和参与(综合学校、职业学校和高中)。在学校里, 社工的基础性工作是通过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技能, 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搭建桥梁, 以确保学生们有权获得的利益和服务, 同时促进学校多学科团队和网络(尤其是学校福利团队)有大约 10% 的社会工作者从事于教育性机构。

作为福利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工也被期待通过促进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安全来完成社会问题的预防工作。预防性取向与人们对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保险、利益、足够的法定社会和健康服务)。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工作是一种公民和福利制度之间的中介工具, 社会工作的角色在于根据人们的权利和需求, 提供财政支持并帮助人们获得利益和服务系统的优势, 特别是在个案管理方面。

## 八、展望

在芬兰, 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面临着不少挑战。这与迅速的社会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处于中心的挑战是在当代社会下, 随着就业市场和教育领域的高门槛高要求, 一大批年轻人受到了社会的排斥, 面对后工业高科技时代对高效率、自动化和科技化的要求, 他们没有能力获得一个被就业市场所需要的职业资质。

另外一个苛刻的挑战是老年人口迅速膨胀带来的老年化问题, 人口变化意味着老年人的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芬兰, 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最后一个重大挑战, 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心理健康、酒精滥用和其他生活管理方面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帮助的需要。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在两极化和边缘化的背景下, 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加剧的趋势。也因此, 广泛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不会再是芬兰社会里强大力量的存在了。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资助福利制度, 芬兰社会正面临着社会政治的悖论。在良好的经济运转时期, 福利制度因被需要而得到了有效运转, 在经济情况发展不佳、但福利服务相比之下有更多需要的时期, 却难以维持系统的发展。

在未来, 芬兰依然有强烈的遵循北欧福利模式的政治意愿。社区服务的发展会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财政能力。在这个紧要的时刻, 加强和深化社会和医疗保健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强大的趋势。这也将带来包括社会服务、初级医疗保健和特殊健康照顾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变过去单纯地基于个别社区提供服务的状况, 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基于更广泛的组织基础和财政基础的省级综合服务单元。

